TIME LIF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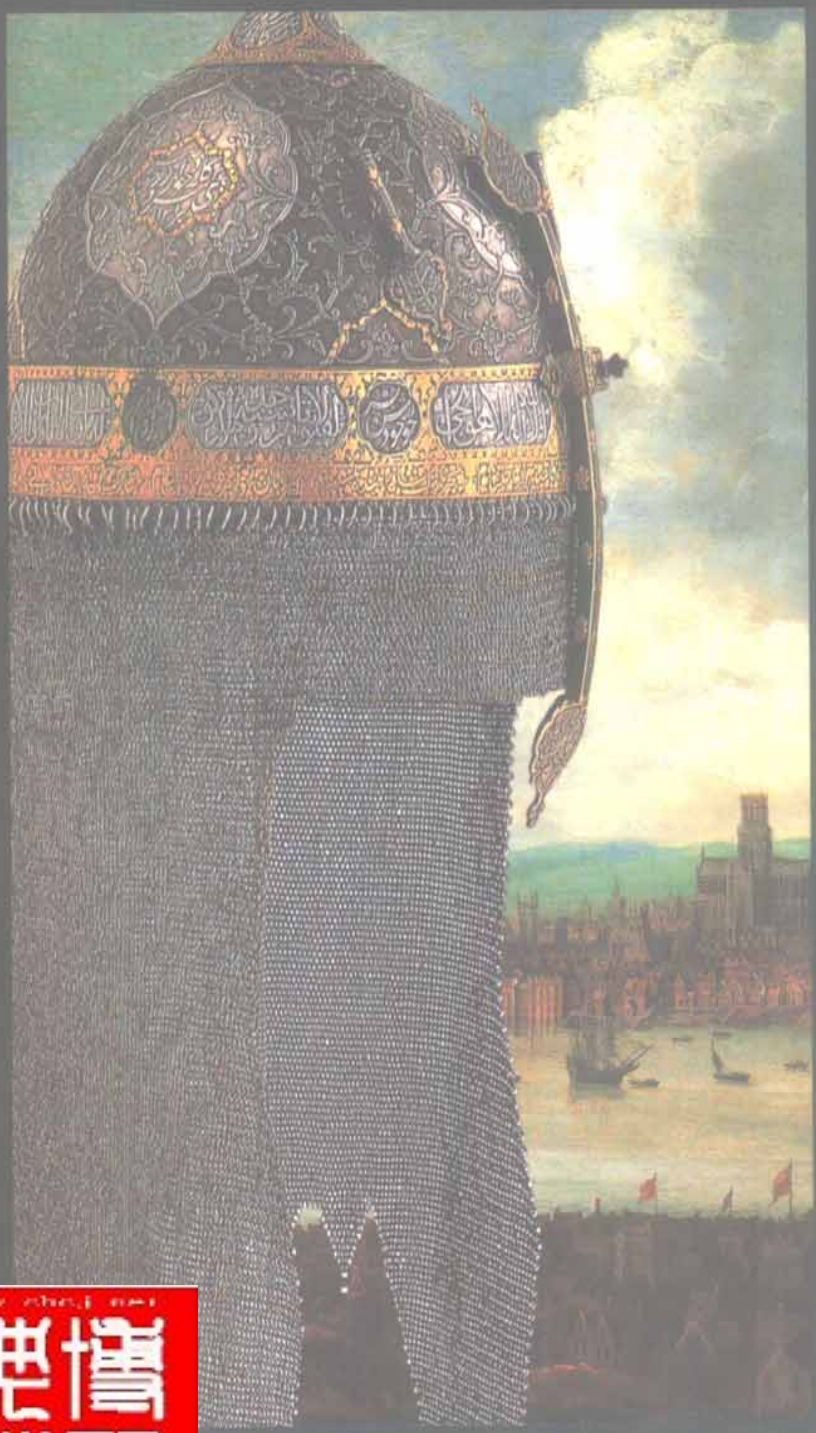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人类文明史图鉴

君主威权

公元1600年—1700年

德川时期的日本／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波斯大帝／英国内战
荷兰共和国的兴起／新大陆的新移民







人类文明史图鉴

君主威权

公元1600年—1700年


北美洲
荷兰共和国
英国
公元 1600 年 - 1700 年


波斯
日本
中国



K103-
Q7
13

人类文明史图鉴

君主威权

公元1600年—1700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执行编辑：吉里安·穆尔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策划部助理主任：玛丽·斯塔普尔斯
研究部主任：亚尼萨·克莱默
副主编：伊尔斯·格雷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托尼·阿兰

《君主威权》编务：

策划：玛丽·斯塔普尔斯
撰稿：佛吉斯·弗莱明
研究人员：卡罗林那·阿尔考克
鲍尔·都斯威尔
助理编辑：克里斯蒂那·诺贝尔
策划助理：瑞克尔·吉比逊
编务助理：摩里·苏特兰德

图片部：

管理：阿曼达·新德利
图片统筹：佐伊·斯班塞

编辑制作：

主任：萨曼达·希尔
程序控制：艾玛·维思
编辑部：特尔萨·约翰
德伯莱列里奥特

本卷顾问

概论：

杰佛里·帕克，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伊利诺伊。

克里斯托夫·贝利，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印度史现代讲师。

日本：

I.J. 麦克缪兰，牛津大学日语讲师。

中国：

戴尼斯·特维切特，吴文俊，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教授，普林斯顿，新泽西。

波斯：

戴维·摩尔根，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系，中东史讲师。

英国：

尼古拉斯·泰克，伦敦大学院历史学高级讲师。

荷兰共和国：

约纳丹·I·伊斯瑞尔，伦敦大学院荷兰历史和风俗教授。

北美：

G.V. 斯卡迈尔，剑桥大学潘布鲁克学院研究员。

特约撰稿人：

詹姆斯·查姆波斯，斯蒂芬·道恩兹，内尔·费尔贝恩、艾伦·加尔福德、罗伯特·厄尔文、戴维·尼科里（文献）；雪拉·科尔、提摩太·弗兰瑟、巴巴拉·希克斯，卡罗林那·卢卡斯，杰克伊·马休兹（研究）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里默（波恩）；克里斯蒂纳·利波曼（纽约）；玛丽亚·文森扎·阿洛瓦西（巴黎）；安·纳坦森（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卡瑞尔·欧恩斯泰思，
萨斯克亚·范德林德，
韦伯·范德林德，
艾利克·范·兹瓦姆（阿姆斯特丹）；
杨金全（北京）；奥图·艾比斯，
罗伯特·克卢恩（日内瓦）；
崔斯尼·班德斯（马德里）；
伊丽莎白·布朗（纽约）；
玛丽·约翰生（斯德哥尔摩）；
迪克·伯利，米科·伊科达（东京）；
特劳迪尔·雷森（维也纳）。

中文译者：

宋　鸥　放春颖
苑海波　王　强

责任编辑：

李书源

目录

1 德川时期的日本 9

2 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 35

3 波斯大帝 55

短论:创深痛巨的三十年战争 72

4 英国内战 79

短论:在“太阳王”的宫廷中 103

5 荷兰共和国的兴起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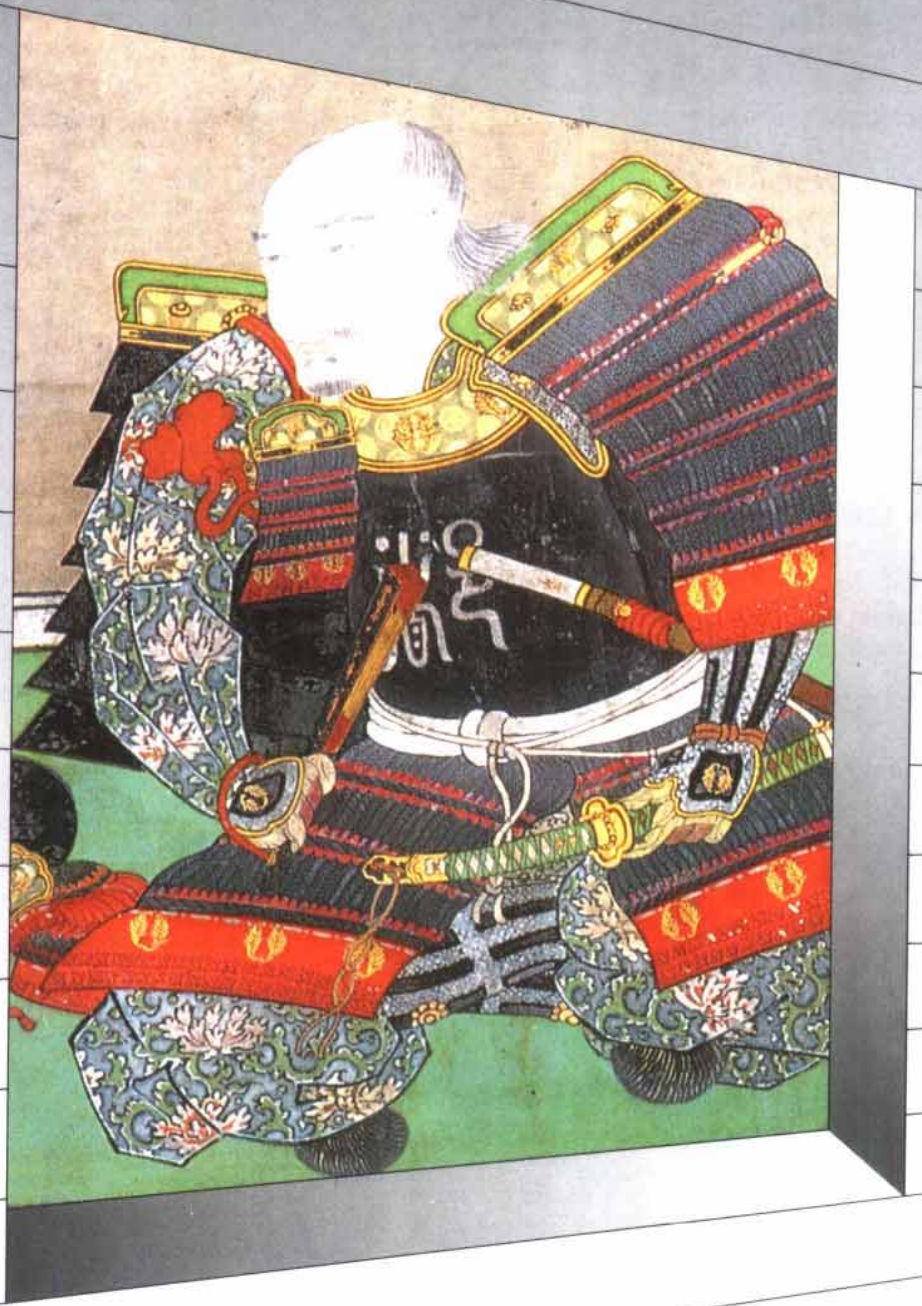
6 新大陆的新移民 135

短论:对自然规律的阐释 159

大事年表 170

索引 172

参考文献 175



德川时期的日本

1

对于8 000名在小早川秀秋的命令下宿营在松尾山的士兵来说，1600年10月21日的夜晚是他们在户外的一个不幸的时刻。这个季节的气候非常恶劣，夜幕降临时，一场原本轻微的毛毛细雨突然变成了倾盆大雨。他们的山顶阵地在日本最大的岛——中部本州的关原村庄上，这一位置使他们完全暴露在自西而来的肆虐狂风下，风怒吼着穿过沿琵琶湖延伸而来的小路。但是基于两点考虑，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暴风雨还没有恶化为夏末和深秋经常蹂躏日本的台风或“飓风”；而且至少他们不在行军途中，不像他们在下面山谷中的盟军那样，还在泥泞中跋涉。

在子夜过后的几个小时里，约有7万浑身湿透的人到达了关原村庄。他们是军阀石田三成的联合部队。雨水几乎使他们视线模糊，夜幕中他们在齐膝深的泥水中蹒跚行走了16公里才到达这一防御地点。他们的旅程象征着两个月以来战役的顶点，在这些战役中，石田三成与强大的东部贵族德川家康为争夺日本的领导权而厮杀。前一天的战斗显示出双方的势力已大体接近，同时也间接表明了德川家康的战略：袭击关原村庄隘口，占领古城京都和门户港口大阪。现在在关原，山峰掩护了石田三成的侧翼部队，他希望将追击的德川部队引至一决胜负的对抗中。

黎明来临时，暴风雨停息了，只剩下毛毛雨和浓厚的大雾。在山顶上安全度过了一夜的小早川秀秋的部下，透过一片白雾，依稀听到最后到达关原村的衣着邋遢的部队低沉的咒骂声。大雾中，能见度还不到两步远，仅靠前面传来的声音引导部队前进。人们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碰撞声和行军士兵发出的隆隆声不仅仅来自石田三成的部队，德川家康的部队的先锋已进入他们的队列中。一时间，完全的混乱占了上风，浓浓的大雾使双方除了一团糟的撤退外别无所求。已艰苦跋涉了4个小时的德川前卫军在他们军队的余部到达时占领了阵地。一个小时后雾才消散，飘到了附近伊吹山的斜坡上，关原这才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然后战役打响了。

当战斗激烈地进行、双方胜负未定时，秀秋安全地站在山顶上观察了4个小时。按照原计划，他要一直等到德川部队全部参战，然后猝然下山攻击他们的左翼。到中午时，时机成熟了，约有6万名德川部队追进山谷，石田三成向秀秋

在这幅17世纪的丝卷画上，一位上了年纪的日本勇士正准备战斗。画中描绘的人物叫锅岛直重，起初是南方军阀一个不起眼的门人，他在16世纪末导致国家分裂的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勇猛，站在得胜的军事领袖德川家康一边。德川家康及其继承人统一了分裂的国家。这名勇士1618年以80高龄安详故去。作为一个地方贵族，他一直活到得以享受长久的德川和平的最初果实。

发出了行动信号。

在松尾山上没有一个人活动。几周以来22岁的秀秋始终在玩一种等待的游戏，每次他站在石田三成一边作战时，他都以向敌人主动示意来掩护自己，今天也不例外。德川家康希望山上的部队能为他所用，最初，他很失望，秀秋并没决定忠于哪一方，所以不响应家康的信号。最后在德川部队一阵箭矢的驱使下，他才加入打击石田三成的行动中。

石田三成也并非完全未做准备，他已觉察到他的年轻的同盟者的阴谋。但是出乎将军意料的是，他的左翼战线上的军官们竟然接受了秀秋的暗示，转而反对他。由于受到四面围攻，他的编队队形瓦解了，石田三成本人被杀，他的部下穿过隘口仓皇地向西逃往琵琶湖。是夜，家康的得胜之师露营在战场上。通向大阪之路敞开了。

关原战役是历史上日本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使德川家康夺取了日本的统治权，也宣告一个空前的锁国与停滞时代的来临。在德川家康的继承人的统

16世纪末、17世纪初日本在政治上重新统一的经历，部分地也是三个城市的故事，它们都位于中部本州岛。日本帝国的首都是古城京都，在这里，天皇——一位令人尊敬却几乎没有实权的人物——主持着金碧辉煌的宫廷。国家事实上的统治者是接连不断的军事领袖。他们中最伟大的是丰臣秀吉，他自内海的港口城市大阪发号施令，两次发动侵朝战争，都未获成功。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赢得权力，他将政府所在地迁移到东部城市江户——今天的东京。江户位于关东富裕的农业区的中心地带。在早期内战中，德川家康奠定了自己的权力。



治下，日本竟然做出了几乎完全断绝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大决策，实行“闭关锁国”。

日本的选择实在令人震惊，因为它是在其它地区眼界正放宽的时候做出的。17 世纪是世界发生天翻地覆变化，并日益昌盛的一段时期，也是以欧洲向北美移民为特征的探险和拓殖的时期，出现了一批能力非凡，长寿的君主，他们借助枪炮、印刷术和进步的交通联络系统所有这些相对新的技术进步的产品来加强统治。

在这一世纪的进程中，日本的邻居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王朝的统治，并产生了一位两千年帝国统治中最伟大的皇帝。波斯在阿拔斯国王统治下也经历了复兴，阿拔斯击退东西两线的敌人并建立伊斯法罕城以炫耀辉煌。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位君主的统治胜过法兰西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他的凡尔赛宫成为王权专制主义信条的圣殿。

但是有两个国家作为这一规则的例外而存在：英国和荷兰。英国有两个国王被废黜，一个国王被砍头。新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荷兰共和国选择了共和政体，这使它的保皇党邻居感到恐怖。然而这种事件对日本并不意味着什么，日本这个时候已经从内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但又把自己紧紧地裹了在孤立主义的茧丝中。

几个世纪以来，多山的日本群岛一直受古代传统和军事实用主义的混合统治，国家象征性的首脑是天皇。根据日本的传统，天皇是创造日本诸岛的太阳女神的后裔。天皇在京都主持宫廷事务，他引导宗教仪式，以确保日本的持续繁荣，他自己作为半神而受到人们的崇拜。根据帝国的法令，国家要由官僚来统治，所有日本人都要效忠天皇。

然而，从实际权力，而非礼仪上的权力而论，天皇的影响不如其强有力的臣属——以幕府将军而闻名的军事独裁者的势力大。自 12 世纪末起，武装力量控制了国家权力，天皇必须同意幕府将军的支配权，认可他们对帝国的管理。皇室不久就明白反抗将军的命令是毫无益处的，因为将军不仅是国家的总司令，也是最大的地主，权力根植于土地中，蕴藏在无数极小的茅草村庄里，他们的稻米收成不仅是国家的主要物产，也是交换一切有价值的资源的中介。

土地既能生产出食物，又能提供人力。日本的农村被分成采邑，每块封地都由一位地方贵族或大名来管理。大名在领地内依靠武士来维持秩序。武士是武装侍从，大名分给他们小块土地，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持续的忠诚。大名本人又对将军表示效忠，所以如此，或是感谢他获得的土地，或是惧怕将军收回土地。这些地方贵族承认天皇的统治权，但在战争中集结在将军的旗帜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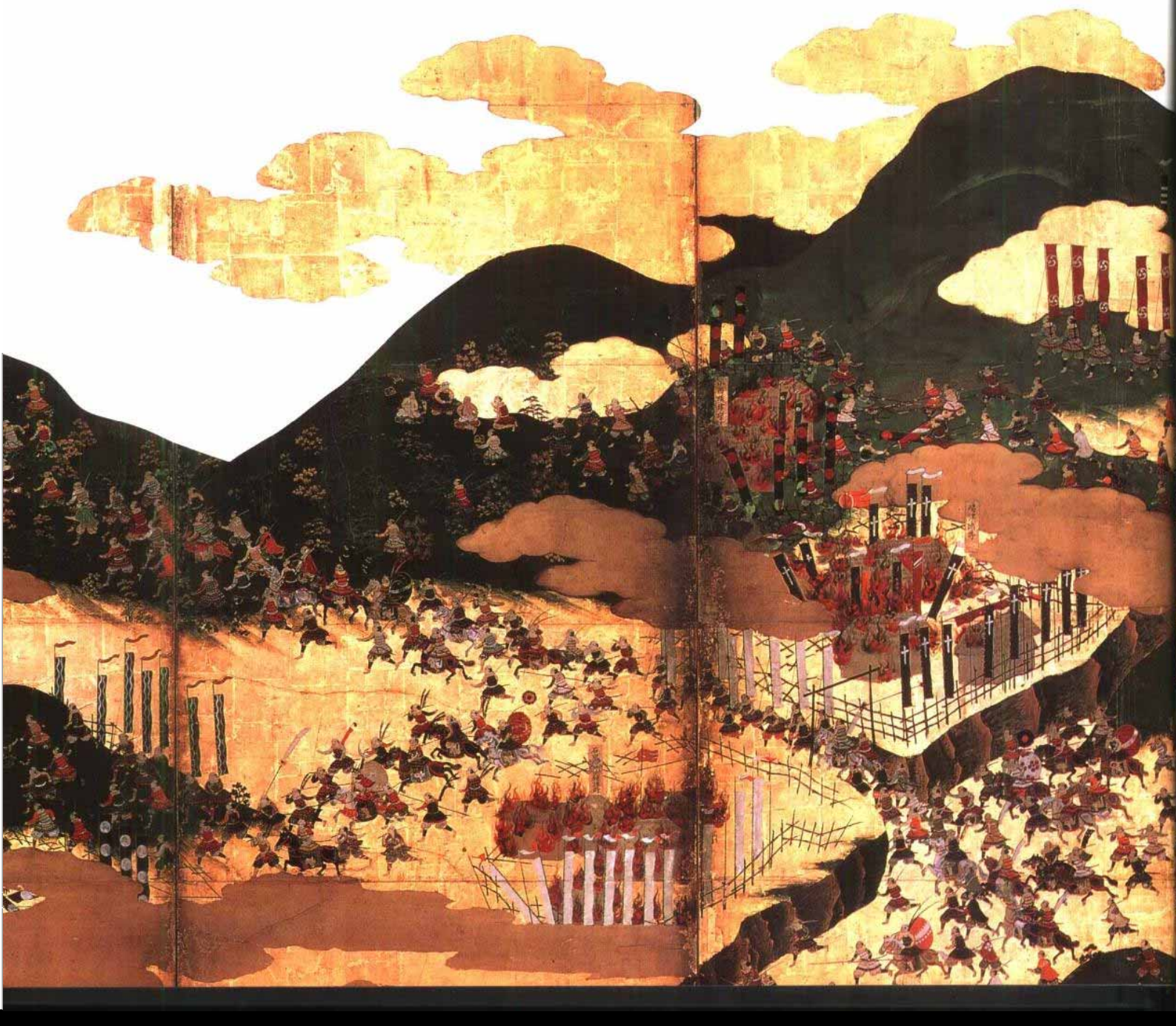
正像日本没有单一的统治者一样，也不存在一个所有日本人都赞成的宗

一位无名艺术家描绘了身着宫廷服饰的德川家康，这幅画是在他死后绘制并被展示给人们的。他死于 1616 年，时年 73 岁。那时他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已故去，他稳固地获得了作为幕府将军或是国家军事统治者的地位。曾亲身参加 50 多场战役的家康以狡诈、耐心和非凡的坚韧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士兵称其为“老獾”。他奠定了家族的命运，德川家族在其后的 250 年里统治日本，这不仅依赖于至高无上的军事权威，也取决于他在管理国家、提高税收和驱逐敌人方面的技巧，德川王朝的继任者们同样继承了这些才能。



教。岛上固有的神道教承认数不清的神灵，既有有生命的，也有无生命的。天皇提出崇拜神道诸神。通过这些神，信仰者们认为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持续的，都会得到好运或恶运。公元 6 世纪时，日本从中国引入佛教，根据佛教原则，在经历了无数次再生之后，每个人最终都能从世间存在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与这两种信仰共处的是儒教，它也源于中国，儒教强调恭顺、忠孝和公益。

尽管存在这种相互抵触的对封建主效忠的混合物，但一段时间，日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稳定。然而，到了 15 世纪中期，日本的和谐开始出现裂痕。一个麻烦是，京都是个不合适的权力所在地，它位于本州岛中部，在整个国家最富裕的农业地区关东平原以西约 360 公里，关东这个富裕的平原距首都太远不容易被控制，但是它却又足以成为威胁首都的根据地。更为不利的是，京都距被本州环绕的内海 60 公里，西部的九州岛和南部的四国岛才是群岛真正的中心。像位于东部的大阪和堺、西部的长崎这样的港口城市不易被位于内陆的首都所控制。而且，作为日本与外部世界门户的



整个西海岸也不在京都的防范之内。

只要将军仍是日本无可争议的主人，那么首都的战略弱点本身就不成为问题。但是在后来的岁月里，大名及他们家族的权力逐渐增大，地方势力日益强盛而将军的势力则却日益削弱。由于将军奖赏追随者的唯一办法是把自己的财产转让给他们，因此就削弱了自身的根基，而加强了臣属的地位。宗教机构也变得难以驾驭，许多和尚看出同时做武士没有什么不合适，他们把寺庙变成要塞，并获取大片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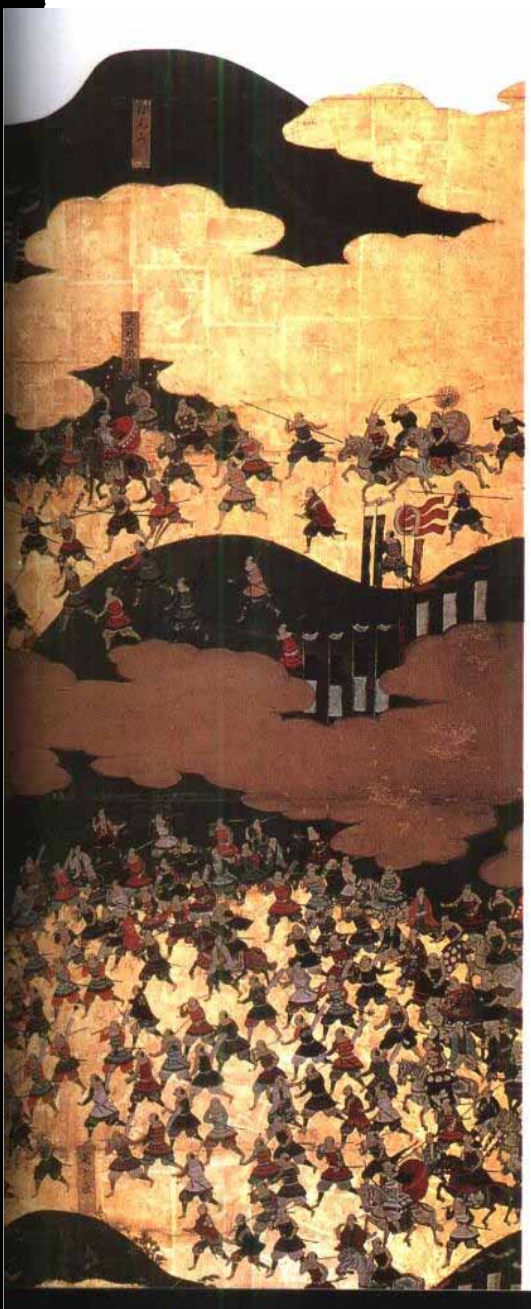
1467 年危机出现了，当时将军发现他无法在对继承权有争议的情况下实施统治，竞争各方甚至在京都街头动手互殴。首都内长期的战斗使这个曾经人口众多、繁荣兴盛的城市变成一片焦土废墟，军队可以随意调动，就好像他们身处一个不设防的国家中。帝国的世系濒于灭绝，中央权威不复存在，内战硝烟弥漫全国。此处，大贵族被小贵族推翻；彼处，武士联盟宣称他们的权威；在其它地方，得到脱离束缚的农民支持的具有和尚和武士双重身份的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不同的大名支持那些互相竞争的对将军的统治地位提出要求的人；在 16 世纪的进程中，只有一位将军逃脱了被罢官的命运，但他被谋杀了。

实际上，冗长不堪的战争并非完全是毁灭性的，国家的经济因为战争的刺激而兴旺起来。除非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战争对城镇和村庄的损害通常不是特别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贵族愿意毁掉可能会属于自己的土地。成功的统治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建立起对所有地方的统一控制，在水利灌溉方面尽可能取得大规模进展。农业生产稳步上升，大名不是唯一的受益人。在全国性的灾变中，农民们可以通过逃往邻近的地区来躲避高税收和压迫。因此，更为贤明的统治者寻求以更有效、更有益的方法来实施统治。几个家族建立起自己的行为法则来规范个人行为，强调诸如公正的判决和诚实管理等美德。

城市居民也繁盛起来，频繁的战事必须保证给养供应，城镇因提供军需品而变得富裕，一些城市甚至趁机利用不稳定的均势来获取适度的独立。例如，在大多数战争中，繁荣的港口城市堺都保持中立，来这座城市参观的敌对贵族也不得不放下武器，保持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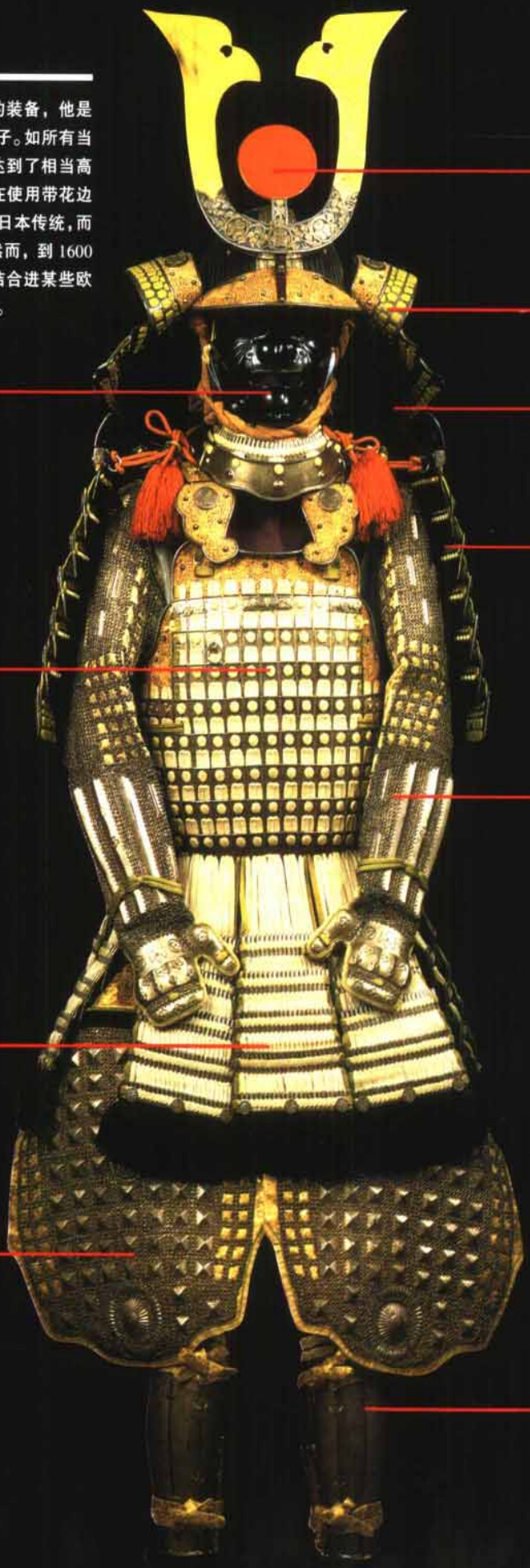
监督管理的缺乏也便利了航海者，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人们惧怕中国海岸沿线的日本海盗和奴隶劫掠者，所以，更加太平的商业贸易远在印度尼西亚经营。日本通常从这种交易中获益：自 16 世纪 30 年代起，当技术娴熟的中国、朝鲜技师和冶金家被招入日本的矿井工作时，金银的产量就会有大幅度的增加。

其后不久，西方文明一剑双刃的益处来临了。当葡萄牙水手首次抵达南部岛屿种子岛时，他们奇异的行为方式，尤其是他们的火器使当地人大



这幅细致的图画在一个屏风上，屏风是德川家康女儿嫁妆的一部分。它展示出 1600 年关原战役中将军大获全胜的情景。德川家康善用谋略，出奇制胜，石田三成则雪上加霜，遭同盟者的背叛。画中描绘石田三成所部正从熊熊燃烧、即将化为灰烬的营地仓皇出逃，遗留在身后的旗帜表明他们中许多人是基督徒。家康的部队在低云密布的掩护下蜂拥向前，大雾把战役推迟了一个多小时。那场战役实际上比这幅受胜利者委托绘制的画面所揭示出的更残酷、持久和混乱。此后没有一位日本贵族敢于在公开战中与德川军队遭遇。

这套礼仪盔甲是德川吉野最喜欢的装备，他是屋张(现为名古屋)的领主、家康的第三子。如所有当时最好的产品一样，它的轻度和强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它主要是由银或红漆铁制成。在使用带花边的金属片和细小的长片方面，完全遵循日本传统，而不采用欧洲人喜欢的坚硬的钢制品。然而，到1600年，用于实战而不是展览的设计经常结合进某些欧洲的特征，以期提高对火器的防范能力。



盔饰
是由连接起来的铁片制成，这个加了顶饰的头盔用于识别战斗中的人。

盔边
这些头盔边有助于防御剑刺。

护面具
这个面具的鼻子和上唇能够移动，使穿戴者得以谈话、饮水，下面还悬挂一个柔韧的脖颈保护装置。

护颈
从头盔上悬下的漆铁片保护脖颈和肩膀。

袖甲
松散地镶漆片花边的套袖，保护上臂和身体免受侧面剑的刺入或是箭的伤害。

胸铠
这个胸铠是由许多小而轻、镶边的漆铁金属片制成，它能够对矛、剑、箭提供安全保护，但是不能防住滑膛枪的弹丸。

护臂
缝在丝底上的锁子甲用铁片加厚，用来保护前臂和手。

裙甲
组成裙摆的金属片要大一些，花边较松，为的是在骑马保护下体时能灵活一些。

腿甲
这个带有锁子甲的丝制衬裙是用铁片装钉起来的，它的作用是保护上腿的前部。

护胫
把铁片装上铰链镶在布上，这些护胫只保护前腿，小腿处于自由状态，以便使骑马的武士能够夹紧马。

为震惊。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已为日本人所知，但是欧洲的火绳枪这种有效、便携、能射穿盔甲的武器却使他们感到新鲜。一年之内种子岛的铁匠就制造出了仿制品，但不能射击。后来，一个葡萄牙枪手泄露了制造西式枪管的秘密(据说是以日本一个铁匠师傅的女儿为交换)。此后，所谓“种子岛武器”遍传日本。由于最初数量很少，物以稀为贵，尤其受到武士——和尚的重视。最终它们竟威胁到了日本的社会秩序：一个用这种武器武装起来的地位低下的步兵甚至成为技艺最精湛的武士的对手。

欧洲人也带来了其它新事物：烟草、眼镜、新式服装和饮食，还有改进过的盔甲，它用熟铁片做成，而非日本传统的漆丝和竹子，它可以对火绳枪子弹提供某种防范。另外，他们将天主教引入日本。比起西方的火器，耶稣会传教士对日本已确立的秩序是潜在的更大的威胁：一名日本天主教徒对天主教的忠诚超越了他对自己的国家和天皇所应有的忠诚。可是，最初传教士没能使几个人皈依天主教，日本人的清洁和聪慧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日本人的残忍和商人的狡诈也使其感到痛惜，日本商人通常备有两副秤，一副计量精确的用于称他们自己所购之物，另一副则用来欺骗他们的买主。传教士们更加悲哀地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此美丽的土地竟然淹没在无穷无尽的战争中。

螺旋式上升的暴力行为似乎要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这时，即16世纪末期，一位领袖人物脱颖而出，他即将把日本带入几个世纪的和平轨道。1568年，在经历了8年的战争、围困和背叛之后，一位35岁、名叫织田信长的大名终于拥有了进军京都的力量，并指定了自己的幕府将军人选。在这项计划中他得到了两位杰出的军人的帮助。一位是丰臣秀吉，是个家系不明、矮小而憔悴的人物，但极其狡诈，他崛起于一个地位低下的步兵阶层(或者，据某些人的看法，是个土匪)，后作为一个忠诚的武士而供职；另一位叫德川家康，是个年轻的勇士，最初他反对织田信长，后来转而效忠，并积极成为织田信长最喜欢的将领之一。

织田信长本身的成就并非是空前的，但是，与其他成功的指挥官不同，他不是简单地为自己及家族的野心而奋斗，相反，他怀有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和平与统一的理想。他明白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他的目标，他的座右铭是“以武力统治帝国”。一个在京都供职的耶稣会神父法路易斯·弗洛伊斯对织田信长曾有过生动的描述：“他极端好战，……藐视所有其他的日本君主及诸侯，转过头来大声对他们讲话，好像他们是卑微的仆人一样。……他特别讨厌任何耽搁或冗长的发言。”

织田信长的偏狭性格的较早的受害人是他扶殖上台的傀儡幕府将军。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初就很麻烦，刚上任时，将军为表达他对织田信长的感谢邀请织田信长参加一个晚会，演出的是连续13幕的古典戏剧，织田信长的

忍耐在第5幕段后终于到了极限。到1573年，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织田信长干脆废黜了这位他自己扶植起来的将军。并且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用任何官方头衔，此后就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

织田信长对佛教武士——和尚怀有特殊的憎恨，焚烧他们的寺庙，把佛像熔化后用来铸枪，并残忍地屠杀他们的支持者。但是，从不骑马的佛门勇士身上他也看到了步兵的重要性。1575年，他的身穿防水蓑衣、携带火绳枪的步兵杀死大批身披铠甲的关东骑兵。1582年，大阪的大寺庙被毁，和尚们被活活烧死在里面，堺的富裕港口不再要求独立，臣服于织田信长的权威下。

现在，织田信长已把本州的中心区域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佛门中的武士——和尚已被打垮，剩下的任务，仅是去征服其他大名。为实现这一目标，德川家康的部队向东挺进，进入关东，而西线在丰臣秀吉的掌握之中，他现在是一位被信任的将领(虽然他的主人仍然称他为“猴子”)。正是在部下如此地忙碌奔波时，织田信长死去了，他在京都遭到袭击并被自己的一个大名谋杀。

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很可能是受丰臣秀吉的指使。丰臣秀吉充分利用了这种形势，几乎没有耽搁任何一点时间，马不停蹄，8天内就回到了京都，处死了暗杀织田信长的人，将首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德川家康对政变没有察觉，开始做了进行抵抗的象征性表示，但最终他别无选择，只有臣服丰臣秀吉的统治。

新统治者优先考虑的事情是使自己受到贵族的尊重，因为此时贵族仍把他视为一个有着“猴子”绰号的成功的农民。当时没有执政的将军，丰臣秀吉也不希望有这样一个职位。相反，他通过取得贵族头衔关白来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关白，或称帝国摄政，是最显贵的天皇朝廷的官职。有这个响亮的名衔作招牌，他逐渐树立起自己的势力地位，到1591年，靠威逼和劝诱，他获得了日本所有大名的宣誓效忠。

新摄政决定在港口大阪而不是京都来实施统治。他在那里建立了与他的地位相称的城堡；护城河几乎宽达百米；城楼林立的城墙用大石块建成，城门用6米乘9米的石块加固；城堡中央最强固的部分有8层楼高，墙上刷白色涂料，屋顶是金色的，呈弯曲状。丰臣秀吉在城堡内过着奢侈的生活，精美的镀金装饰使房间金碧辉煌，所有的墙上都贴了金片。他还在京都保留了一个宫殿，他在那里举行空前宏大的盛宴来款待天皇。

置身于豪华奢靡之中的丰臣秀吉，设法表明他也能够欣赏简朴的日本文化传统，其中最著名的是茶道。茶道最初是从中国传入的，但后来日本人把它变成了一种审美艺术，它要求态度虔诚，对形、神都要有很高的鉴赏力。日本茶道艺术方面最杰出的人物是千利休，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培养摄政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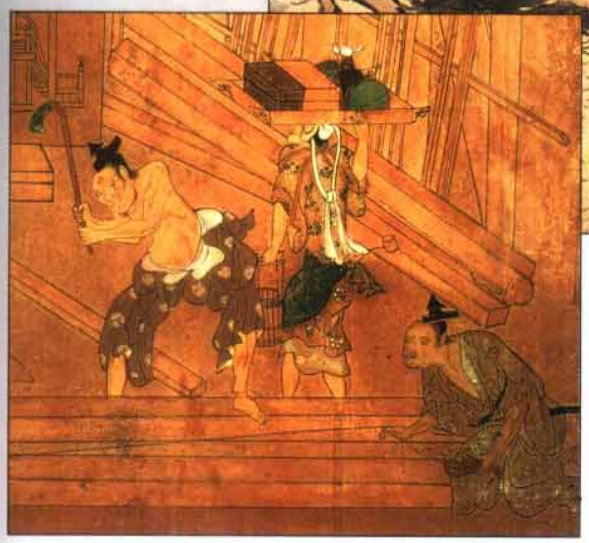
在16世纪内战期间，日本社会的流动性非常大，战争运气垂青于某些向上层流动的武士，他们以“暴发贵族”而闻名；甚至一些农民也有机会获得令人垂涎的武士身份。17世纪，德川家族的将军们建立了一套以儒家忠信、服从为信条的等级制度，加强了统治的稳定性。

按着德川幕府的法规，四个主要社会集团得到承认，武士精英拥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其后是农民、工匠和商人。等级差别是世袭的、不能改变。然而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性仍得以保留，得宠的工匠可能得到远远高于他们地位的特权的奖赏。到了16世纪末，许多商人享有巨额的财富和商业的垄断地位，令那些社会地位高于他们的人羡慕不已。



社会的四个等级







这幅出自当时的绘画说明了德川社会的四个等级。一个武士(上图)手中拿着指挥官的官杖，骑着一匹配有华丽鞍辔的战马。中间，一个农民在锄水稻田。正在加工一座庙宇的大梁的熟练工人是工匠阶级（左下图）。所有等级中地位最低的是商人(右下图)，他挑着货物去市场。

茶道的情趣和鉴赏力。丰臣秀吉的回应是授权建一个可移动的茶室，在茶室中每一处能够得着的地方，包括天花板都镀上金。

这些是丰臣秀吉权势的表象，构成它表象下面的真相是土地使用制度的全面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使日本成为一个内战和反叛很难发生的稳定的国家。怀有这种目的，丰臣秀吉下令在全日本调查土地拥有情况，根据调查结果，实行一个合理和统一的税收制度。他奖励那些选择他作宗主的大名，授予他们土地，土地的多少则要看他的心情。他最危险的对手德川家康，获得了关东的统治权，在江户的东部城堡里忠诚地为丰臣秀吉服务。德川家康缺少做其它打算的机会：在织田信长时期他拥有的介于关东和首都之间的土地都转到了丰臣秀吉信任的支持者手中。

对新秩序的抵抗遍布全国。在长期的内战过程中，许多农民已习惯于不纳税和无人统治。但是，这种抵抗是在没有武器的情形下进行的。1588 年，丰臣秀吉命令农民和在织田信长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那些武士——和尚把全部武器充公。武器上缴后，规定只有武士可以携带武器。丰臣秀吉许诺把没收来的武器熔化，建造一个大佛像，以安慰他的臣民，给那些不情愿的捐献者一点精神补偿。

在城市中，摄政的控制也同样稳固。已建立的地方垄断的同业公会被取消，贸易自由进行；即使是外国人也受到鼓励，一些中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为充裕的贵金属所吸引，前来日本。反之，日本商船也驶向遥远的海外：到 1600 年，一些海盗已在远在地中海的突尼斯港定居。

然而，不断与欧洲人交往也带来了一些丰臣秀吉不完全欢迎的后果。在织田信长统治时期，天主教在宫廷圈子内已变得特别时髦，到 16 世纪 80 年代，皈依天主教的人——主要集中在西部的九州岛、尤其是环绕着长崎港——数量已达 10 万或者更多。丰臣秀吉怀疑他们可能成为不忠行为的源头。1587 年，他发布敕令，将所有基督教传教士驱逐出日本，但外国商人仍处在被欢迎之列。而这两种外国人很容易搞混，由于进行了明智的贿赂，加上山高皇帝远，九州的耶稣会使团在丰臣秀吉将注意力转移时，继续了他们的传教工作。

丰臣秀吉的地位大大升高，他还渴望更加辉煌。他设想使用重新统一的国家军队去侵略和征服朝鲜。1592 年，一支 16 万人组成的日本军队在朝鲜南部登陆，涌入朝鲜半岛，但是到了次年冬天，日本军队陷入苦苦挣扎的境地，天气十分恶劣，与本土的联系也很困难，朝鲜农民使用艰苦的游击战对抗侵略者。更糟糕的是，中国开始支援朝鲜。1594 年夏天，日本军队被驱逐至南部，随后双方进行谈判，但是谈判破裂。丰臣秀吉又大胆地向中国宣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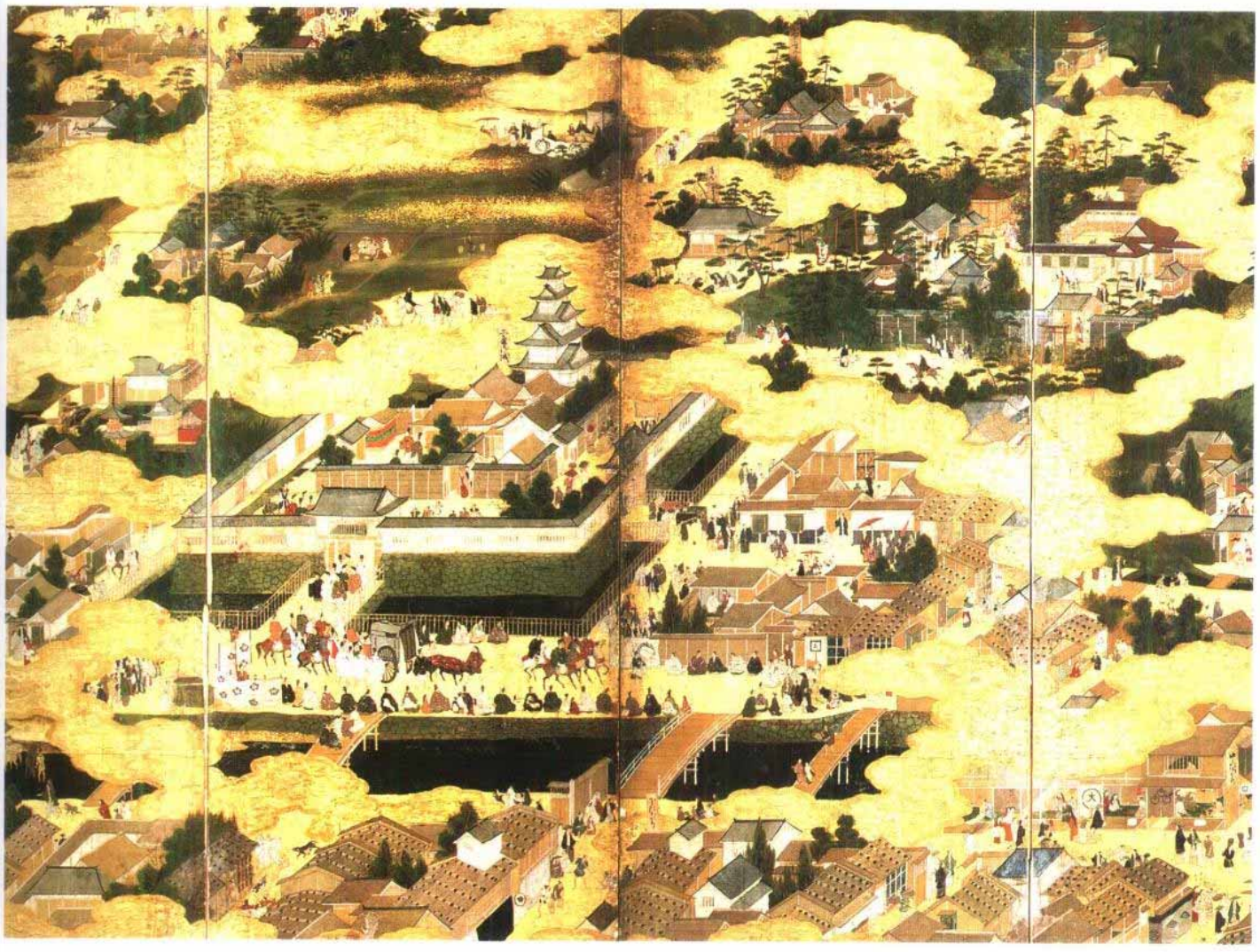
至此，丰臣秀吉不再是那个作为织田信长替角而获得权力的精明、细心

的指挥官。也许是感染了梅毒——伊比利亚水手带到日本同时也带到去过的其他国家的一种疾病，他现在四面受敌。茶师傅千利休被指控为叛逆，被迫自杀。因为他的雕像被置放在丰臣秀吉骑马时需经过的一个大门的上方。许多日本天主教徒和葡萄牙传教士被处决，摄政自己的侄儿全家都被杀，他们被指控阴谋占领大阪城堡。由于惧怕臣属叛逆不忠，丰臣秀吉把精力投向征服中国的计划中，同时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到对幼子丰臣秀赖无尽的爱意中，他不顾那些不值得他信任的大名的阴谋，坚持要丰臣秀赖继位。

也许他有些类似偏执狂，但仍然握住了权力。又有 10 万军人被派加入到与朝鲜的战争中。他们英勇战斗——京都的一座庙宇变成了在一次战役中被杀死的 37 000 名中国人的耳朵和鼻子的坟墓——到了 1598 年秋，胜利似乎就在眼前。然而那时丰臣秀吉知道了他即将撒手人寰。在他神志尚清的时候，任命家康作为他最喜爱的儿子丰臣秀赖的监护人，并设长老会进行统治，直到丰臣秀赖长成足以执政。

1598 年丰臣秀吉去世，长老会立即下令停止与朝鲜的战争并与中国修好。他们深知在未来不可避免的权力争斗中，全部日本军队必须留在国内。

和子是第二代德川将军德川秀忠的女儿，乘坐在一辆挂有窗帘的马车里，从二条（岛根县旧村名）城堡出行，正要去与政仁天皇后水尾成婚（1620 年）。这一场景绘在一副青色屏风上，屏风用金箔装饰，描绘了首都及其周围的景色。这桩婚姻意在加强帝国皇室与德川家族之间的联系，以此加固将军把持的权力。



在这场争斗中，德川家康具备几方面优势：关东使其成为整个日本最富裕的贵族；由于不再向朝鲜派兵，他既有人力又有稻田。由于拥有这一实力，他不久就得到其他大名的支持。但是，丰臣秀吉一个最忠诚的家臣石田三成却不倦地努力以建立一个反对德川家康的同盟。在1600年最初的几个月内，即丰臣秀吉死后两年，石田三成感到自己的力量已足够强大，可以向对手发动全面进攻。战事开始后，双方互有胜负，但最终在关原之战中，石田三成失败并战死。十天后，得胜的德川家康作为全国的军事首脑进驻了大阪。

他迅速着手强化自己的地位，87个大名府全部被消灭，他们的土地被德川家康吞并，随后作为奖励被重新分配给追随者。1603年，德川家康说服皇帝任命他为大将军。他在江户——后来的东京——幕府内，接受了所有残存大名的归顺。

德川家康并不以获得宣誓效忠为满足，他还需要他的臣属为他提供在江户建设新政府需要的人力和物资。在随后的两年内，人们夷平山丘、排干沼泽、挖掘运河、建起了环绕宏伟城堡的高墙。城堡成为高耸的权力象征，它的白色建筑装饰着黑瓦，并衬以金色。

随着日本的大名的驯服，唯一能对德川家康构成威胁的是丰臣秀赖，他仍然龟缩在他父亲所建的大阪城堡内。在最初的几年里，德川家康仍遵守向垂死的丰臣秀吉许下的诺言，也许是他感到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强大到攻击他发誓保护的人，也许是他希望没有必要这样做。丰臣秀赖的监护者们也愿意保持和平，因为丰臣秀赖还年轻，而德川家康已经老了。

1614年，危机终于爆发。当时德川家康已74岁，他的生命不过还有一年的时间，也许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丰臣秀赖一直很谨慎，避免触怒德川家康，但后者仍发现了冒犯行为。在大阪一个重建的庙宇中，一座钟上面刻了中国文字，德川家康假称铭文侮辱了德川幕府，谄媚学者在检查了大钟之后，进一步确认上面的汉文确实是叛逆之言。德川家康的愤怒只有通过彻头彻尾的投降才能平息。当21岁的丰臣秀赖拒绝屈服时，德川家康决定诉诸武力，是年12月，他带领15万大军进攻大阪城堡。

但是进攻者缺少大炮，而且丰臣秀赖防范严密。此外，德川家康有许多宿敌，他们更愿意为丰臣秀赖而战。到了冬末，德川家康损失了许多人马，战绩平平。当德川家康提出有利的媾和条款时，丰臣秀赖似乎已赢得非常令人满意的胜利，他将被允许继续保有城堡及全部土地，所有驻军都不会受到惩罚，作为交换，德川家康只要求索回一些人质，而且，作为挽回面子的姿态，他还要求将大阪城堡的部分外侧护城河填平。

和平降临了，围攻者和守军多半回到家中，一群来自关东的强壮、可靠的劳工到达大阪城堡，为的是象征性地填充护城河。这项工作证明比预期的更繁重，为了到达护城河，工人们不得不拆毁城垛。越来越多的劳工纷至沓

来，随着越多的外侧护城河被填平，部分里面的护城河也被错填；里侧的胸墙也随之被拆毁。丰臣秀赖不顾一切地想维持和平，他设法与德川家康的官员们评理，但官员们回避他的问题，并把他的抗议提交给上级部门，同时破坏夜以继日地进行着。最终他们承认可能出了些错误，却又指出城墙和护城河在和平时代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最后，工人们带着歉意离去了，不久，德川家康带领大军折回来。丰臣秀赖在自杀前，从5月至6月一直在保卫他的城堡。

这场灾祸的后果是，德川家康毫不手软地摧毁了所有反对派残余：整个丰臣秀赖家族被杀，只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幸免；大阪指挥官的后裔被处决；城堡残存的守卫者受到残忍的追杀，数千颗即将腐烂的头颅被陈列在通往京都道路沿线。为避免任何人怀疑德川家康的意图，大名被召集至他的面前，听他讲现在应如何治理国家。

德川家康对这些已屈服的贵族严加限制，所有反对派别马上受到公开谴责；叛徒将被驱逐；禁止建造新城堡，任何修葺都应上报；禁止庄园间的产权转移；武士应过俭朴的生活，不许穿戴与他们的阶层不相符合的服装和饰品；所有大名的婚姻都应得到幕府将军的批准；严格限定贵族私人护卫队的规模。

德川家康把这些准则压缩到一份有13个条款的文件中，它进一步确定了德川家康作为日本无可争议的主人的地位。但是，他没能长时间地品尝胜利之果，因为他于次年(1615年)撒手尘寰。然而他所取得的成果却有着更强的生命力，家康给他的后继者们留下了一个驯服的社会，这一遗产使德川王朝的权柄保持了250余年。

到去世为止，德川家康已使德川家族成为日本最富裕的家族，他的财产超过3 200万蒲式耳稻米，相当于日本国家财富的1/4。他的长子兼继承人德川秀忠通过没收敌对大名的财产，使他的岁入达到5 500万蒲式耳稻米。贵族中也传出一些不满的声音，但不久就被德川秀忠的儿子德川家光压制下去。德川家光于1623年执政。这位新任统治者把大贵族召到江户的宫廷，这些人在护卫的陪伴下赶到时，却无人理会，只好在饥寒交迫中等待，直到黄昏之后，然后，随着突然出现的一束火光，德川家光出现了，并且如是说："我是凭继承权做上幕府将军的，你们今后都将是我的世袭仆从，如果有谁不喜欢这样，可以回到自己的庄园，下定决心；让战争在他与我之间做出决断。"所有人都选择了和平。尽管如此，德川家光后来仍进一步借口叛国罪的指控来没收更多的土地，相当于每年再增加1 900万蒲式耳稻米的收入，此举使德川家族直接控制日本整个财富的一半以上。

在德川秀忠和德川家光的统治下，日本人的生活呈现出新面貌。德川家康以一种成功的将军风格来进行统治，而他的两位继任者把过去的军营变成了官僚政治机构。有效的管理和严格控制成为新统治者的箴言。政府的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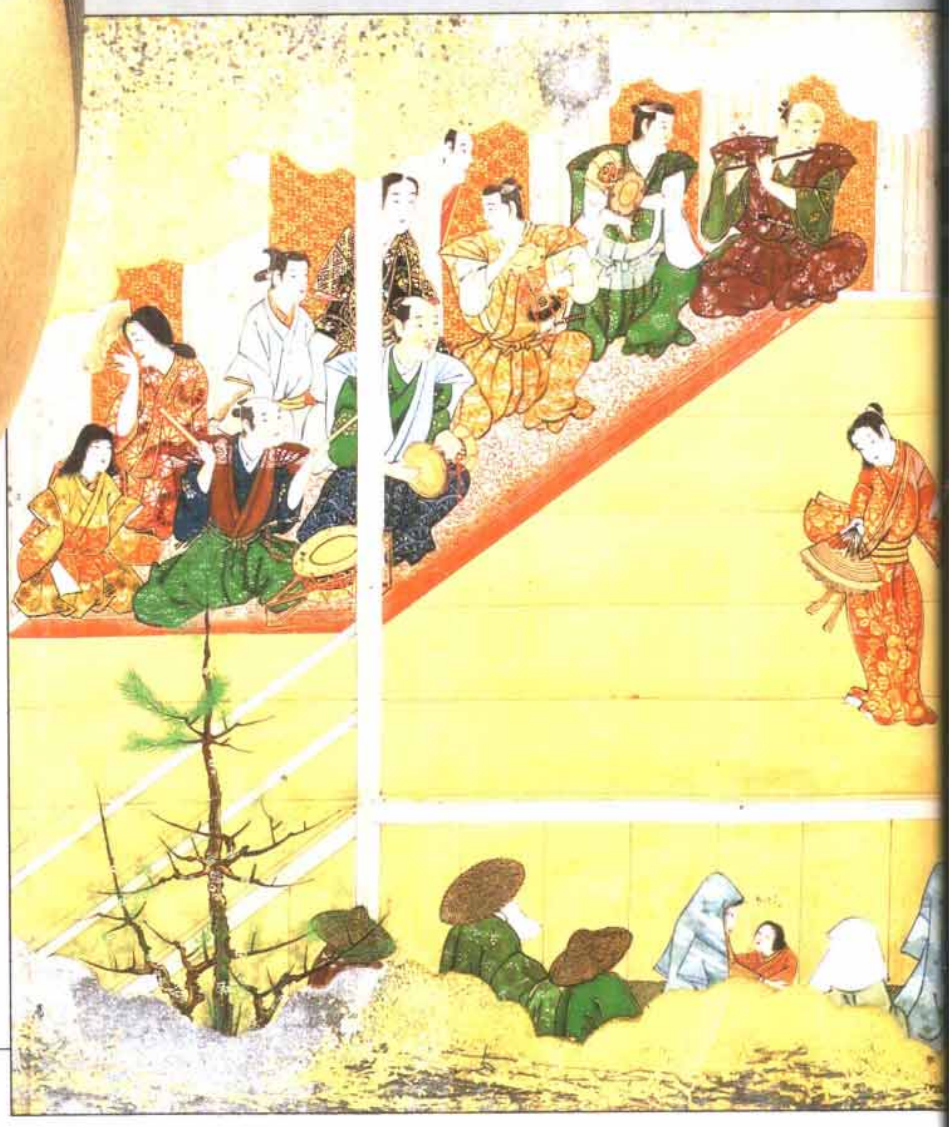
从宗教仪式到狂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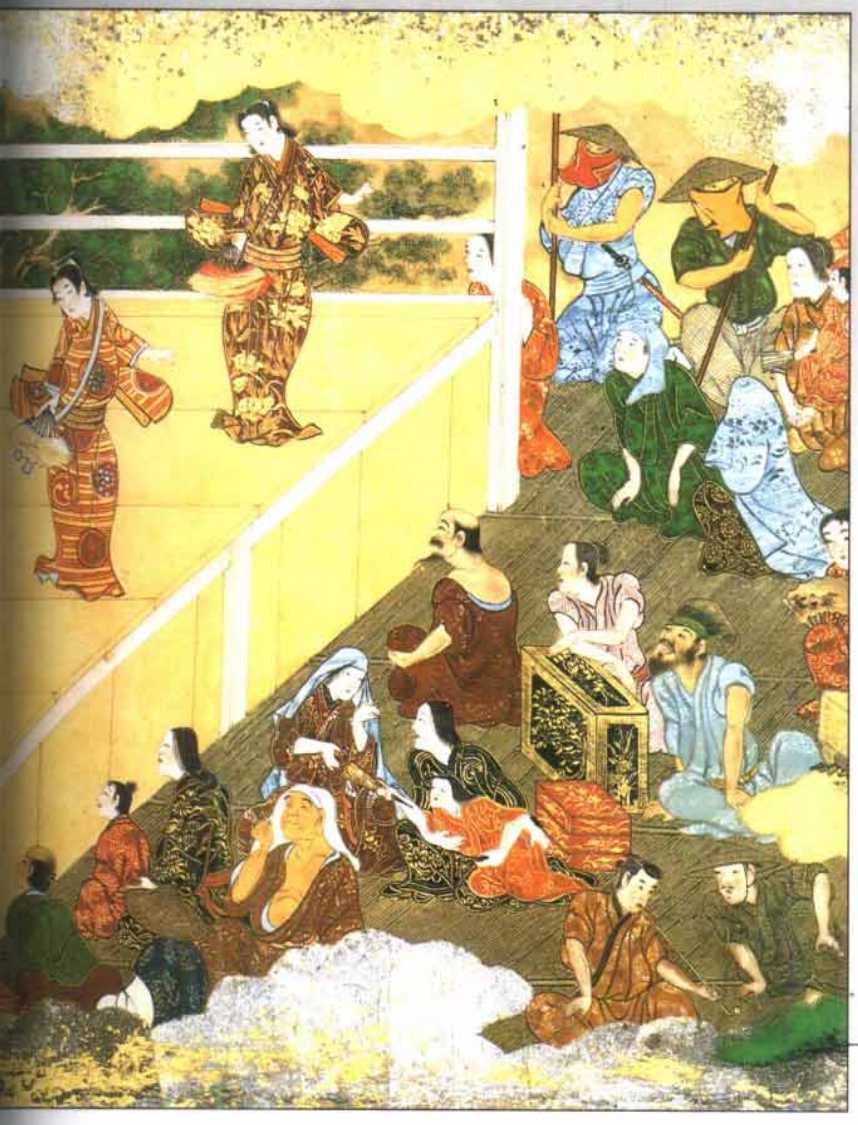
17世纪日本的戏剧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变革，起初在戏剧表演——“能乐”中，民族传统被奉为神圣，它深深根植于宗教仪式，这种风格至少有200年的历史，它高度的风格化表演在某种意义上带有神舞的特点。两三位头戴面具的演员表演一些神圣的历史情节，通常包括幽灵或精灵，同时一个配角对他们表演进行评论。自然主义远远不是目的，例如，皇室的成员——甚至是伟大的武士——都由小男孩来装扮，为的是表明纯洁。

虽然这种古典戏剧在接下来的世纪中持续上演，但16世纪后，日本传统戏剧“能乐”没再创作出新剧目，相反，一种称为歌舞伎的新剧种——字面上解释为“唱歌和跳舞的艺术”——受到欢迎。歌舞伎源于一位名叫阿国的女演员的剧团，她自1596年前后在京都组织舞蹈和戏剧表演。她和她的后继者喜欢的剧本都充满了设计，包括滑稽、追求情节奇异、杂技技艺和现实主义对话，这对于过于讲究的能乐剧作家们是一种谴责。歌舞伎创作者设计复杂情节，有时利用最近发生的大事，肆无忌惮地追求娱乐。批评家抱怨新式戏剧的粗俗，但是歌舞伎在新兴城市受到热烈欢迎。整个德川幕府统治期间，它的领衔主演成为受人爱戴的英雄，被视为不怎么体面的魅力的化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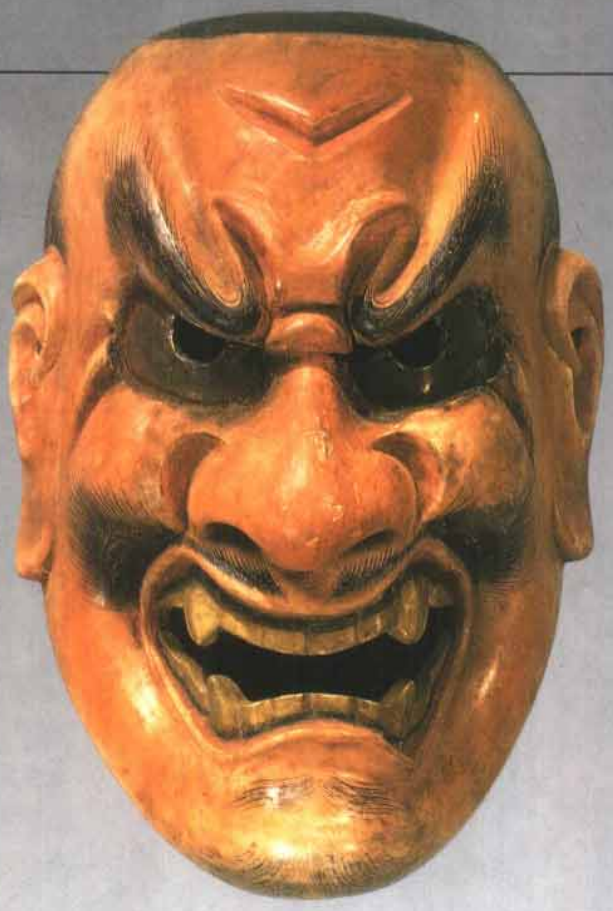


这个“能乐”戏剧面具，制造于18世纪的江户，由一位扮演美丽少女角色的男演员佩戴；在日本古典戏剧中没有女演员。由于无法以面部表情刻划人物的情绪，演员们只好用手势和姿势来表达感情。





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三位歌舞伎女演员为观众表演，画面上有的观众注意力集中在舞台上的情节，有的则在关注自己的事。这幅画是一个画轴中的一部分，是为赞颂一名受人欢迎的女演员的功德而作。17 世纪初她在京都四条地区开办了一座剧院，从前以有害公德为借口，女性被禁止演歌舞伎和"能乐"剧。



"能乐"剧的表演者戴着像这个彩饰木头式样的魔鬼面具，来刻划当代宗教生活中著名的邪恶的幽灵。面具上的小眼洞给演员造成了问题，他们只能看到舞台的一小部分。



这个狐狸面具是为幕间剧而制作的，是一种简短的喜剧性的幕间插入表演，使观众在观看严肃的"能乐"剧后神经得到放松。在这个特例中，一只老狐狸把自己假扮成人，企图说服正在追赶他的猎人放弃打猎生活。

这座彩绘木制小雕像描绘的是一位有影响的佛教僧侣崇传，他坐在宝座上，旁边放着一个拐杖。在德川家康和继任者德川秀忠统治时期，崇传作为京都禅宗的寺院住持，是国家最有实力的人物之一，协助起草了禁止基督教和控制武士精英阶层行为的法令。禅宗强调个人努力，深受日本军事统治者的欢迎，他们经常从禅宗讲解者那里获取忠告。



方面都被严密地控制。任何颠覆活动都受到信息部门的严密调查。信息部门的调查结果十分迅速，而且处理通常是毫不留情的，由警察和司法长官遵令执行。

由于德川家族广泛的控制，日本社会的层次开始僵化，内战期间曾有过的社会流动性现在都不见了，被一种僵硬的等级制度所取代。武士高高在上，占人口的5%左右，在他们之下，依次是农、工、商。此外，在社会的最底层还有一些流动人口——贱民，他们从事诸如屠宰、制革等卑贱的劳动。原则上没有人可以超越他生就所属的阶层，尽管许多农民故意选择降低身份，宁愿做工匠，享受工匠舒适的生活，而不愿意受农耕之苦。地位分等还包括煞费苦心的规则，用来控制衣着打扮、在某种场合中的座位序列和谈吐方式。

为了加强对臣民头脑的控制，幕府将军强调古代儒教孝顺、服从的美德，这些传统渗透到所有日本人的思想中。无论是佛教还是神道教，虽然在内战期间受到了极大的侵犯，得到的都仅仅是口惠。由于儒教强调忠诚和责任，尤其是在统治者和臣民之间，从而为德川幕府的统治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合乎道德的法规。

随着国家最终获得和平，德川幕府的最高权力所受到的唯一威胁来自外部世界。有太多的外国人为了自己统治者的爱好来到了日本，他们不喜欢日本人从他们身上所学的东西。荷兰新教徒和英国商人已使将军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世界各地及至近处的菲律宾的征服行为有所警觉。天主教徒将新教商人的不忠与贪欲四处宣扬。人们不相信外国人会服从将军，他们带入的基督教教义有可能腐蚀掉日本人的顺从。德川家康鼓励与外国通商，几乎没有迫害过基督教徒，哪怕是他们曾站在他的对手一边。但他的继任者们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决定。

对日本基督教徒的大规模迫害始于1618年，在其后的16年里，全部教堂都被夷平，所有被发现的牧师皆被处死或驱逐，许多改变信仰的人被害。最初的目的仅仅是要禁止信仰基督教；数百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或焚死在火刑柱上，有的人被放在木制格子烤器上炙烧，或被抛入火山的硫磺喷气孔中。然而，后来迫害者互相较量，看谁能迫使基督教徒否认自己的信仰。一种通行的办法是把受害者裹在袋子中紧紧捆住，抑制血液循环，再把他头朝下悬在一个坑的上方，松开左手以便能够让他做正式放弃基督教

信仰的手势，一位牧师描述了这一结果："不久血就从口中、鼻子和耳朵里流出来，大多数人在两天、三天甚至是六天后死去，为了使充血不致过快，以延长受害者的痛苦，还小心地在太阳穴为他们放血。"另外一个牧师描写信仰基督教的妇女被迫裸体在街道上爬行，然后当众受辱并被抛入蛇坑。为了避免这一命运，许多人——甚至是耶稣会牧师——放弃了他们的信仰。尽管有这样的规定：如果发现一个基督教徒，除非他们向当局告密，否则距他们住所两边最近的各五个家庭都要被处死，但还有人偷偷地继续信仰基督教。

对基督教的镇压虽然过于极端，但它只是整个根除外国影响运动的一部分。根据一位法国商人的记载，他给德川家光讲授过地理知识。当明白了"世界是多么大，国家是多么多，而日本又是多么小"之后，德川家光感到十分震惊，并从心底里希望任何基督教徒从来都未曾踏上日本国土半步。据此他于1633年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军决心禁止日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表明他要一心致力于内政管理，在其后6年里，又制定了一系列法令，使这一计划付诸实施。

根据这些法令，日本人被禁止出国，所有航海船只都被毁坏，从海外回到日本的市民只要被抓到，就要处死。除了本州的长崎港，外国人不允许进入其它地方，在长崎港内建造了一个人造岛为外国商人的栖身之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因与耶稣会有关而被排拒，英国人自动离开日本。一些荷兰人以其在经商方面的活力给日本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加之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根据西班牙人的口供)，所以被允许继续留在日本。一群中国人留居日本经营大陆丝绸贸易，在这项贸易中将军拥有垄断权，其它唯一被允许的是与朝鲜和南部琉球群岛的对外贸易。

很少有日本人起来反抗，因为德川家光慢慢地把已装入箱中的日本社会封上了顶。只有在基督教徒人数较多、对外贸易繁荣发达的本州，人们进行了反抗。1638年1月，约有2万农民携带火绳枪，在一些基督教武士的领导下，占领了长崎湾岛原的一个城堡，并把他们的家属带到了那里。他们因不幸而变得倔强坚韧，与将军的部队和一艘援助日本政府的荷兰军舰坚持对峙了四个月。然而，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他们的供给被抢，起义者最终被德川家光的十万大军包围，渐渐地防御墙后的枪声沉寂下来，他们耗尽了弹药。4月11日中午，将军的军队成功地攻破了外层护墙，最激烈的战斗开始了。第二天黎明官军到达内部要塞，饥饿的防御者用他们手头能拿到的所有东西做武器，包括石头、木杆，甚至使用他们的饭锅，最后他们全体被杀。只有105名囚犯从岛原的废墟中活了下来。此后，除了荷兰人，日本不再有已知的基督教徒。

岛原的农民起义几乎是对德川幕府统治的最后一次反抗。就大名而论，

他们过于频繁地往来于江户，无暇策划谋反，因为1635年德川家光规定他的主要贵族每隔一年必须在将军府度过四个月，在间歇期内要把家属留在那里作为人质，即使是皇室也不能例外。

但是，1651年德川家光去世、由他10岁的儿子德川家纲继任将军时，不满突然爆发出来。麻烦的根源不是贵族阶层提出了什么要求，而是为数众多的武士和早期战争中的老兵的迫切需求，当他们的主人被将军驱散后他们被迫失业。

这些只适合服兵役的游荡的武士，以浪人而闻名。他们不肯放弃特权，不愿转向土地，成为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办了武器商店或军事学校，这些场所成为心怀不满的武士们发泄怨恨的地方。一个名为丸桥忠弥的力大无比的戟教员怀有特殊的怨恨：他的父亲在大阪围困时被杀，他渴望向德川家族报仇。另一名武士由井重学受到丰臣秀吉迅速攫取权力的鼓舞，希望不仅仅做一个卑微的军械士。当他们合伙经营了一个铁厂时，开始着手实现其梦想。他们制订了野心勃勃的计划：炸掉江户最重要的火药仓库，焚烧城市，直捣幕府，消灭政府。

密谋者在武士同道中寻求支持，并决定了1651年6月举行政变的日期。但是忠弥患了病，在他神志昏迷时说出了计划的细节。政府迅速行动起来，几周内将密谋者、他们的妻儿及父母逮捕、刑讯、处决。但是浪人的阴谋给代表德川家纲进行统治的摄政者敲响了警钟，他们随即采取措施监督游荡的武士群体，并教给他们有用的管理技能。

武士阶层的整个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虽然根据幕府的决定他们仍是武士，但其战斗风格被审慎地废弃了。日本的统治者已经看到持枪的农民能够做出什么事，他们不喜欢这一点。武士被鼓励使用需要长期实践的武器，最重要的有剑、弓和矢，猎狗比赛——骑马和射手疾驰在围场中追赶动作敏捷的目标——成为江户一道流行的景观。武士可以在被判有罪的凶犯或任何表现出不恭的农民身上练习击剑技能。诸如此类的措施有助于支撑武士的自尊，但是因为无仗可打，他们变成了支领薪水的仆人而不是封建骑士。到17世纪中叶，骑士不再因他们的服务而获得能够赋予他们以地方实权的土地，他们分到的是一定份额的稻米，被迫住在主人的城堡或城市中，以便易于被监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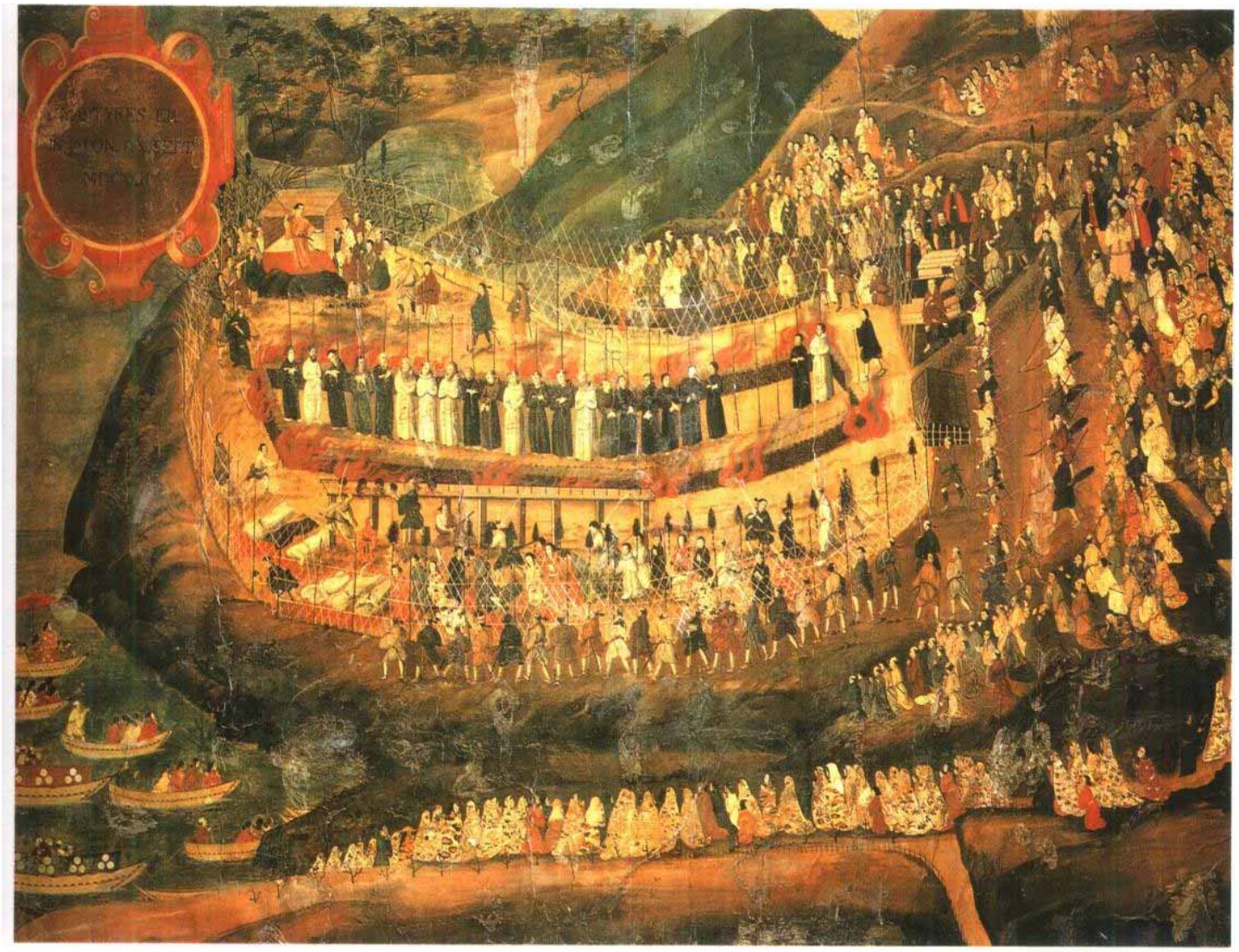
大贵族和武士已被驯服，武士成了一个依赖他人薪水的阶层，但农民仍一如继往地在土地上劳作。然而战争的破坏被德川和平的重税和严密的管辖所取代。除了决定如何在各家庭间分配摊派给村社的税赋外，村庄几乎没有自由，这一决定由地方贵族委任的头目负责，村中长老协助进行，还要负责解决村庄内的任何纠纷并保证所有人服从将军的规定。失职会带来种种可怕

的惩罚，然而，农业产量大大增加，农民人口繁殖很快，到17世纪末日本约有2 600万人口。

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必然有助于满足成长中的城市的要求。日本现在有了3个大城市：日本的新首都江户因幕府而辉煌灿烂；京都是天皇贵族化的优雅的皇室所在地；大阪则是沿海贸易的兴盛中心。沿三个城市的街道出现了蔓延的大批纤弱的木制建筑，皆为两、三层高。地震、台风和大火——由于江户经常发生火灾，火焰被称为“江户之花”——没能阻止城市的发展。脆弱的住所很容易被毁坏，但也同样容易重建。通常灾难都能带来利润：许多有进取心的商人从建筑贸易中致富。

这种机会主义只是激励新的和平国家的正在萌芽的商业精神的一个方面。货物到处在流动，小船——真正适合航海的船仍被禁止——携带货物沿河流和运河航行，并紧靠日本群岛海岸线。贯通全国的上等道路，最初是为了使将军的部队易于到达全国各地，现在则挤满了商人的货车。

稻米仍然是贸易中声望最高的一项，但是，茶叶、丝绸、烟草和棉花也



一位熟悉西洋油画技巧的无名日本艺术家的画描绘了1622年的基督教徒大屠杀，它是日本整个宗教镇压的高潮之一。日本统治者害怕基督教徒不能首先忠诚于国家，加之认为基督教的要旨与他们的军事伦理道德相矛盾，故决定通过折磨和杀害那些不愿意放弃信仰的人来消灭基督教。此处描绘的大屠杀发生于1622年的长崎，30位日本基督教徒被斩首（前景），其他至少22人，包括9名西班牙传教士，死于熊熊燃烧的大坑中的火刑柱上，这个情景表现在画的中央部分。一位目睹这一事件的英国商人描述道：“在他们中，五六岁的小孩被活活烧死在母亲的臂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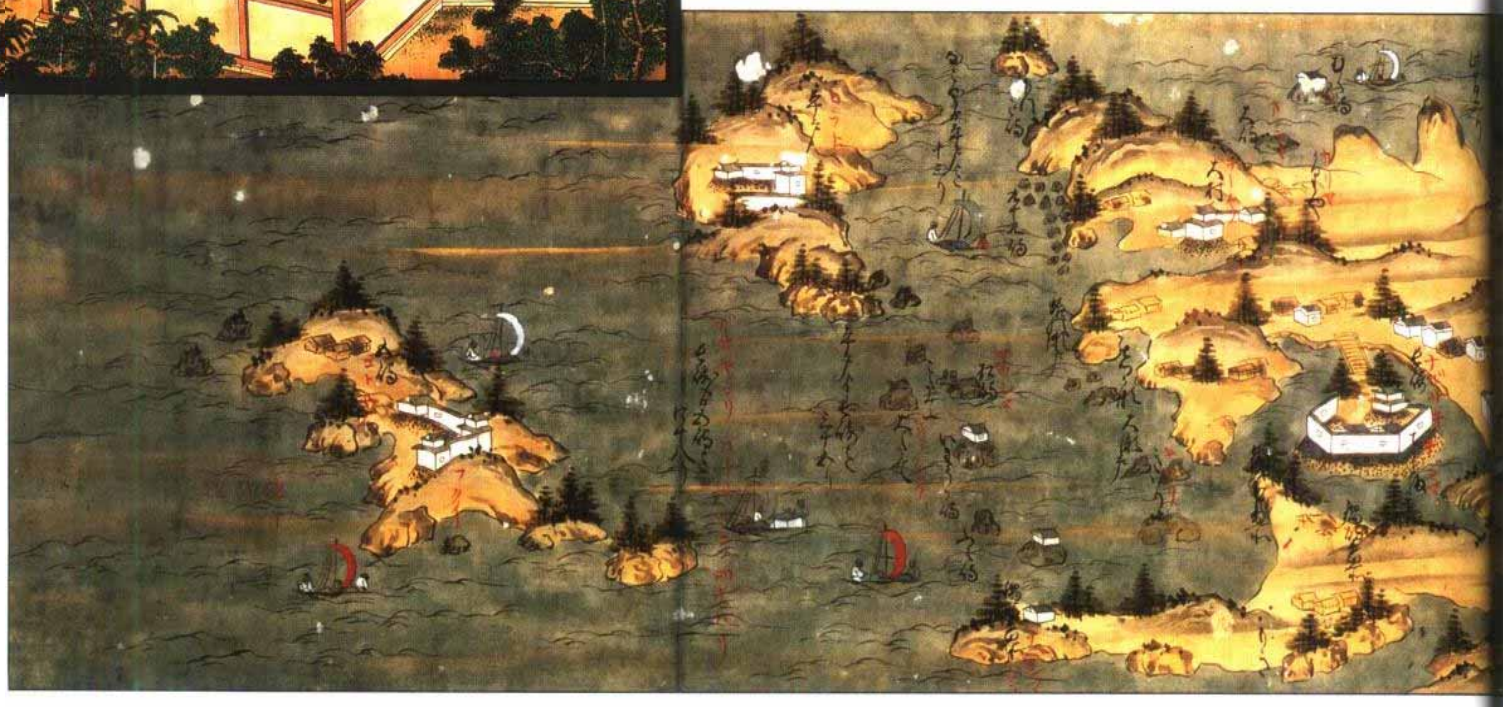
成为广泛交换的商品。来自山区森林中的木材需求是不断上升；渔业繁荣，利润丰厚；虽然随着易于开采的矿脉的枯竭，曾给丰臣秀吉带来令人目眩的财富的金银储量在减少，但是铜矿兴盛起来，铜成为少量对外贸易中的主要商品。工匠们制作出大量技艺复杂、做工精良的工艺品。

由于禁止对外贸易，富有进取心的家族在日本国内寻求机会。例如，最强势的三井家族，其产业最初是靠一个地方族长的努力发展起来的，17 世纪 20 年代他成为一个米酒酿造商。通过涉足金钱借贷和稻米交易，他为儿子积累了足够的财富，50 年后，在江户建立起一个干燥货物仓库，以固定的价格销售棉花和布。10 年间，三井商行在京都和大阪设立了分支，并从商品经纪中获得可观的效益。到 17 世纪 90 年代，商行扮演着将军、天皇和一些主要大名的财政代理人角色。此外，他们还支配着一个大的批发联合网络，由他们的商店负责销售；在江户与大阪之间还经营快递服务；并涉足房地产市场。



对于三井和其它像住友这样的商业家族而言，17 世纪标志着 300 余年商业至上的开端，但是在当时军事统治者眼中，他们是被轻视的对象。他们被隔离在城镇的特殊地区，受限于严格的规定，不许参与政府的任何一项管理。

由于没有繁重的责任，又不受社会义务的束缚，日本商人得以逃脱办公室和算盘的森严管束，有时间享受一系列尘世的快乐。城市为有钱人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满足与喜悦：豪华的服饰和精美的食物，在茶馆和酒店里畅谈，绘画、小说、戏剧、浴池和妓院的乐趣。在商人居住区周围，环绕着无数餐馆和浴室，顾客们享受到艺妓的殷勤接待。她们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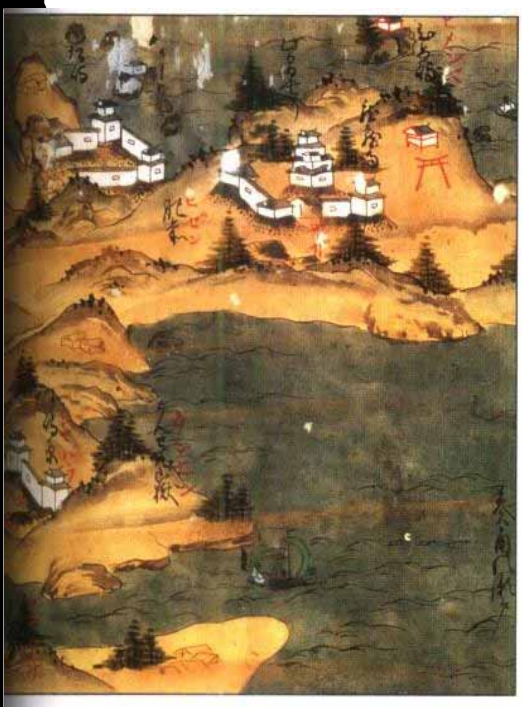
了即存的婚姻，提供了妓院常规的声色服务。常去戏院的人租下私人包厢，包厢的窗帘是用竹片制作的，纱门则是金制的，他们在里面享用美味佳肴，度过一个个逍遥的夜晚。寻欢作乐的人们蜂拥到江户和大阪这类城市中的水面上，富人们自己拥有设施豪华的娱乐船，里面有厨师、乐师和舞女。穷一点的人带着自己的用品，租用简陋一些的小船沿运河狂饮欢宴。

日本人把城市娱乐区称为“浮世”，即“漂浮的世界”，借用了佛教学说中一个表示所有昙花一现的万物的措辞。在这些转瞬即逝的快乐上花费如此慷慨，以至经常招致幕府的斥责。然而，许多武士把他们的刀剑抛在一边，轻而易举地忘记了节俭和自律的准则，去品尝禁果。一个曾违反过准则的武士曾描述了一次剧院之行：“许多人都去了，用毛巾包住脸，只佩短剑使其看起来像普通的人，这些乔装的武士越过剧院的竹篱，而真正的普通观众是付费的，如果剧院经营者试图阻止他们进去，他们就低声恐吓，并大步跨过去占最好的位置。”

艺术迅速将新的都市生活方式反映出来，出现了一种新型散文，这是一种满足城市人冒险口味的英雄传奇文学。其中最伟大的代表是小说家井原西鹤，他的作品中的真实的主人公与传统故事中优雅的情人形成鲜明对比。他坦率地赞美生活的乐趣，他曾经写道：“为什么把钱捐给佛?”“这不是女性天堂之地吗?把金钱送给妇女吧。”

在戏院里颇受欢迎的歌舞伎开始取代曾使织田信长心烦意乱的传统戏剧表演——“能乐”。在供观赏的艺术方面，雕刻师和画家们制作彩色木刻版画，以迎合市场对“浮世”艺术作品的需求：商人们需要他们最喜欢的艺妓的纪念品，戏院需要传单，书籍出版者需要插图。作品从最简单的线条勾划，逐渐变得精细复杂；艺术家们备有一批纹理漂亮的木料，每块只印上单一颜色，用以制作所需的作品。在他们的风格中也结合了欧洲艺术因素，这种因素一是来自日本锁国前学到的西方艺术，一是来自闭关后仍留在长崎的荷兰人，这些因素包括：透视、惹人注目的明暗对照法和诸如普鲁士蓝的现代颜料，这一切使画面更精美。与此相对应，版画的需求加大，传播得更广泛。到了世纪末，几枚小硬币就能够买到色彩鲜艳、描绘受人欢迎的演员、繁忙的都市景象或壮丽景色的作品。

日本本国的鉴赏家认为这种新风格十分庸俗，他们宁愿喜欢起源于中国的、既定的日本艺术风格。但即使对于那些纯粹派艺术家而言，日本诗文艺术的复兴仍提供了某种可以借鉴的东西。在日本，创作错综复杂的、隐喻的诗文一直被视为一项优雅高贵的技艺。这一传统具体体现到俳句这一形式中，俳句是由三句组成的短诗，通过从大自然中获得简洁的比喻来启发一种情感。17 世纪涌现出一位最伟大的俳句作家松尾芭蕉，他原是一位武士的侍从。作为一个云游的隐士，他研习过禅宗教义。禅宗是佛教的分支，禅宗高



一幅 17 世纪末的地图中的一页描绘了出岛（用围墙围住的中心部分）人工岛，它建于长崎港附近，用于接纳荷兰商人，他们是唯一被允许与日本进行贸易的欧洲人。在围栏内商人们过着舒适的生活，在设备完善的场所饮酒、吸烟、打台球（见插画）。但是他们只被允许与日本人有少量接触，那个站在门外的深肤色仆人可能来自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



这个铸铁制成的水壶是茶道中一项重要物品，带有早期拘谨风格，蚀刻有松树、竹子和李子树，它是一种力量的象征。

茶道文雅的乐趣

当日本人接受了中国人饮茶的习惯时，他们不仅输入了饮料，也引进了仪式。自8世纪以来，中国人做了这样的准备，分享一碗饮料象征着内心世界的协调。佛教禅宗强调严厉简朴，放弃对尘世的依恋。在禅宗的影响下，这一实践被精炼成一个以茶道的极致之趣而闻名的仪式。

在一个装饰很少的简单的庭园小屋内，主人迎来他的客人，把壶中的水烧开，将茶叶放在碗中冲搅，然后以谦逊的态度端给客人，这一风格在16世纪茶师千利休时达到顶峰。

但是，在17世纪，茶师们复兴了更加卖弄虚饰的大名礼仪，模仿日本的武士贵族来命名，要求更大的空间、带有华丽装饰的器皿，并为每个大贵族准备独立的座位。在其后的年代里，这种风格经茶道学校确立并编纂成书。在其影响下，该种仪式成为日本新兴中产阶级的消遣娱乐活动。

这个优雅简洁的竹制茶叶勺误传出自小堀远洲之手，他是17世纪的一名茶师，发展了奢侈的大名礼仪。传统上，茶勺由茶师本人刻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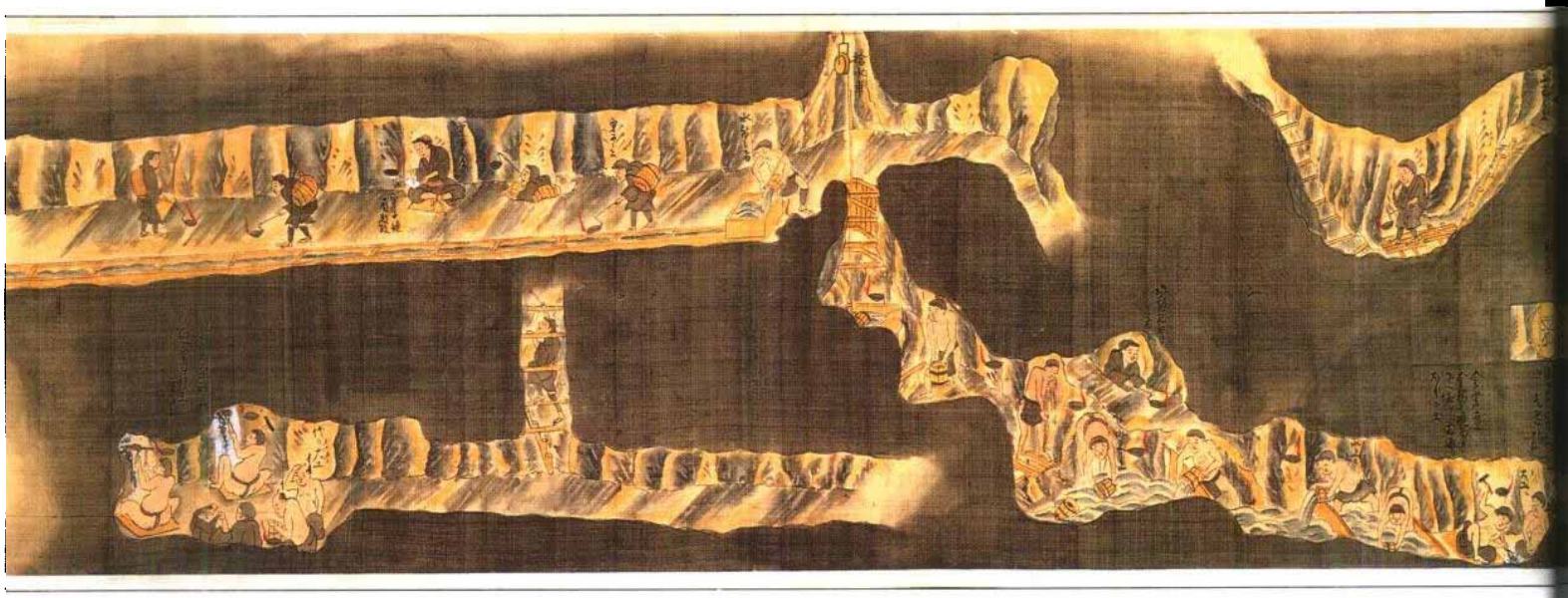
这种风格的茶叶罐，外形像枣子，使用深漆制成，是千利休的最爱之物。这一17世纪的样品装饰着金色的羽毛，体积更大更华丽。



这是一个陶瓷茶叶碗，带有鱼鳞和波浪图案的瓷釉，集中体现了后来大名风格的宏伟富丽。当茶师用勺将热水从壶中盛出倒入客人即将饮用的茶叶碗时，仪式达到了高潮。



最正式的仪式需要两份茶；第一份很“稠”，或者说未搅开；第二份很“稀”，搅至泡沫状。搅茶叶的小笤帚是由一根竹子制成的，从一端将它小心地分叉，在叉的底部用丝线束住。这个样品是出岛一个荷兰商人购买的。



人寻求体验每一个物体、每一时刻的独特性以及把他们联系起来的命运的复杂网络。与“浮世”可用金钱买到一切的时代潮流完全不同，松尾芭蕉文笔精炼、暗含隐喻的诗歌带有深沉的忧郁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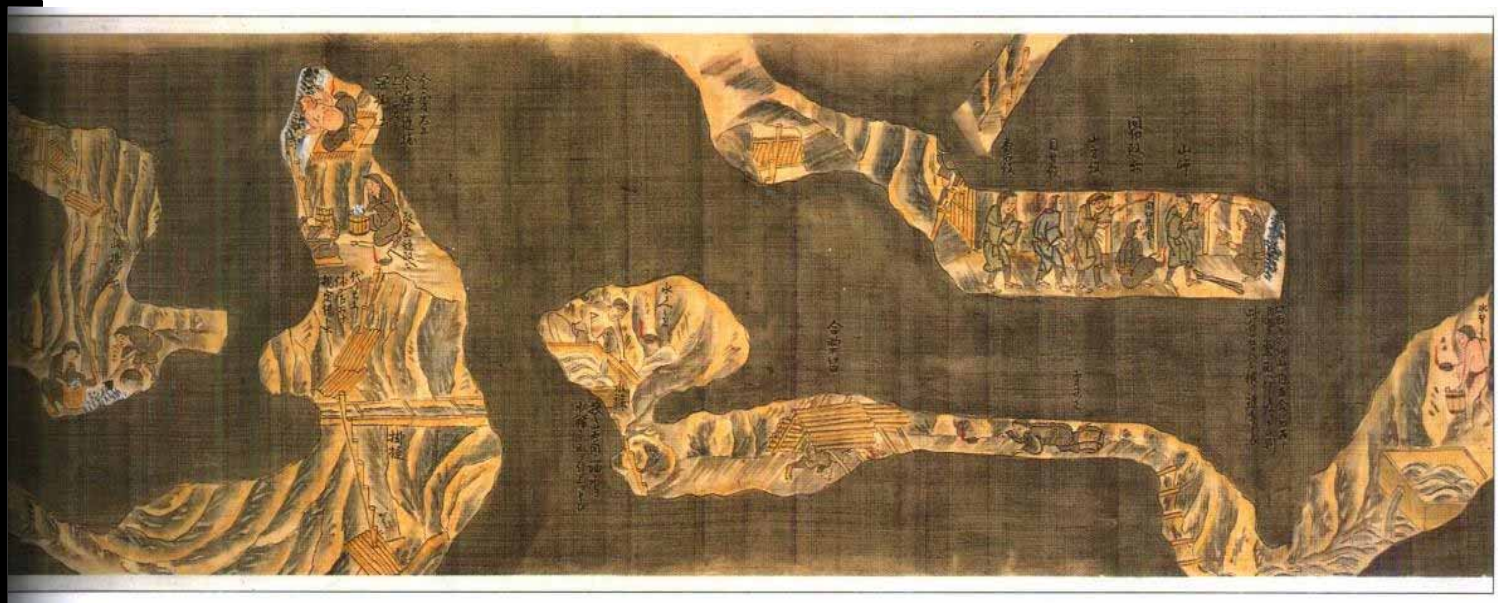
“秋日今向暮，枯枝有乌栖。”

松尾芭蕉于1694年去世，但是其作品影响深远。在后来的岁月里，他被尊为日本最伟大的诗人。当城镇的狂热状态开始使人生厌时，许多人追随松尾芭蕉在大自然中寻求沉思的宁静。在去世前不久，他写下了最后一首俳句：

“卧病天涯人事绝，梦魂长绕枯野旋。”

德川文化在闭关自守中得到发展。德川家光严禁住在出岛上的不多的荷兰商人输入图书。日本翻译家只被允许与他们探讨有关贸易方面的平常话题。然而不久，这种文化孤立被证明是不能忍受的。第八代德川将军德川吉宗具备一些科学知识，他意识到在早年更多的学问来自国外。1744年，他修正了他的前任们的裁决，日本学者被派去学习荷兰语，西方书籍只要不涉及基督教就允许进入日本。

西方的影响开始透过孤立闭锁之墙的狭小缝隙，如涓涓细流般渗入日本。大名收集钟表、望远镜，并用玻璃高脚杯饮酒。日本艺术家采用西方油画技艺作画，同时一些对科学有着特殊爱好的个人开始研究西方医学，试验石棉和电，用望远镜探视天空，并探讨西方在农业和植物领域的先进技术。即使是将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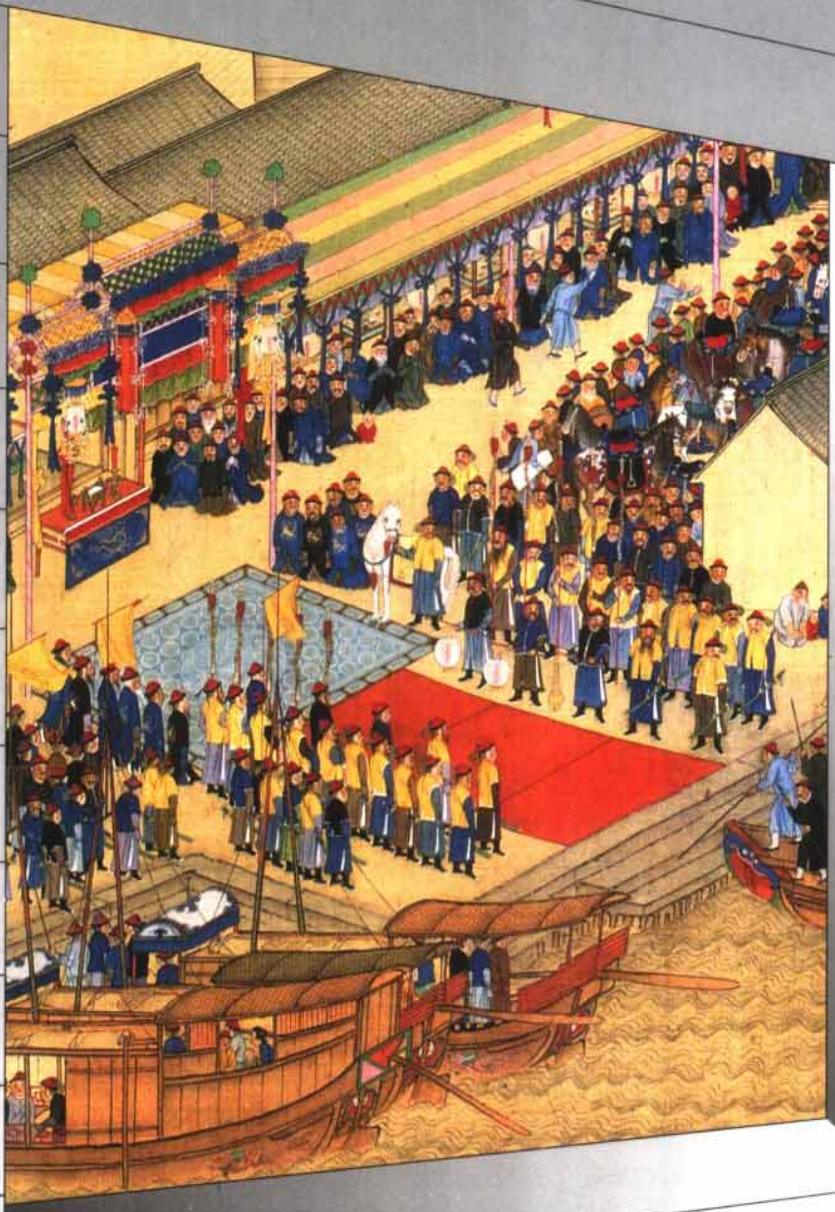
这是18世纪对一幅早期画轴的复制品。画中描绘了日本矿工在本州北部佐渡岛上的矿井下辛勤劳作、挖掘贵金属的场景。一些矿工在岩层表面工作，另外一些人正在修理支撑隧道的架子，还有的人用水桶和滑轮排除地下水。在右侧，一些官员在检查新式挖掘井；在左侧，搬运工人将矿石搬回到矿坑的出口。画中还有一个圆形装置(位于中部)，是个旋转的排气扇，排除矿工携带的煤油灯造成的烟雾，保持空气新鲜。佐渡岛上的矿藏是将军宝贵的财富，岛上出产的金、银和铜是国家主要出口物资。

宅邸也装饰有进口气象仪器。然而，当德川吉宗雄心勃勃地计划用格里历(阳历)，取代传统的中国历法时，他的臣属们却畏缩不前了。

这种兴趣只限于极少数人。然而，怀疑的种子正在播撒。到19世纪，受过教育的日本人逐渐意识到海外先进国家对日本的威胁。1807年，俄国侵略者进攻北部萨哈林岛和虾夷岛(后来命名为北海道)。次年，一支英国战舰驶入长崎，要求提供给养，并威胁否则将炮轰长崎港。

在其后10年中，类似带有警告的侵犯屡次发生，将军们发现自己正在与无法控制的对手作战，他们还发现意在提倡节俭而通过的节约法令——取缔理发师、逮捕妓女、禁止赌博——这一切对于激活一个正在迅速毁掉的经济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农业欠收和饥荒使粮价猛涨，农民中不安定因素日益产生。幕府尝试用货币贬值方法来抑制猖獗的通货膨胀，结果却招来武士的敌意。地方大名日益打破摇摇欲坠的中央政府的控制，开始自行管理自己的事务。

长时期的德川和平因而开始倾覆。1853年，美国海军舰队指挥官马修·佩里将最后一根钉子楔入日本闭关锁国的棺木中，他率领四艘炮舰驶入江户港，不顾日本人的抗议，要求日本赋予美国以贸易权。将军既没有军事力量也不具备经济实力与美国抗衡，对外面临外国人的攻击，对内则遭受傲慢大名的非难，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下，将军的统治又艰难地维持了15年。1868年1月，气泡破灭了。一批来自西部省份的反叛贵族宣布：自此以后，国家将由天皇来统治，名誉扫地的德川政府几乎未做丝毫抵抗就告解体。两个世纪以来，日本滞后于西方强国，现在，借助天皇的名义，日本的武士准备改变这种局面。



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

2

中国的康熙皇帝心里感到十分好笑。在他漫长统治(1662—1722)的晚期，受教皇克莱门特六世派遣的特使曼扎巴拉巴出现在了他的王座前，这位皇帝拿起摆在他面前御案上的三块不同布料，嘲讽地问道："假如有人坚持说这块红的是白的，那块白的是黄的，你会怎样想呢?"曼扎巴拉巴清楚地懂得，中国皇帝是在讥讽前后任教皇在有关中国宗教崇拜的教旨中说法自相矛盾。他试图向康熙皇帝解释教皇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但康熙一点也听不进去。他突然对曼扎巴拉巴说："你们的教皇对不曾见过、也未有一点个人知识的中国礼仪的本质能进行裁判，正如我对欧洲一点也不了解，却要对欧洲人的事进行决断一样，这是可能的吗?"以这样坚定的反诘，康熙打发走了前来求见的教廷者。他开始对游说他的欧洲人失去了耐心，他写道："他们怎敢擅自谈论我们中国的圣教呢?他们所知的只是我知道的一丁点罢了。"

康熙有理由这样自信。他统治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来访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北起满洲的森林，南至东南亚的丛林，西接中亚平原，东邻东海和南海，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与欧洲诸国及毗邻国家都能和平相处，世界上再找不到另一个能让众多的人民过上如此富足的生活了的地方。1.5亿甚至更多的天朝(中国人这样称呼他们的国家)臣民，正经历着一次经济、文化复兴，而这在50年前还是不可设想的事情。

然而，带来和平的那位皇帝——被尊为天子的人——竟不是汉人。他是满族人，其祖先生活在长城以北的荒野上。正是这个"野蛮"民族，在17世纪中叶涌入中原，取代腐败、垂死的明王朝而建立起了清政府。满族人成功地巩固政权，妥善应对西方列强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注意力，以及复兴中华古代文化是17世纪的历史奇迹之一。

1644年满族人从北方横扫到明帝国首都北京时，中国是一个古老、衰弱的国家。大约三个世纪前，在蒙古人统治中国百余年之后，明王朝夺取了政权。但经历了几代皇帝软弱无能的统治后，明王朝却变得越发闭关自守了。

1698年，苏州市的显贵挤在大运河岸边欢迎康熙皇帝。这是当时一幅丝绸卷轴画的一个片段，画中还有一名站在祭坛前的身着黄制服的卫兵和服侍皇帝白马的马夫。清王朝于1644年代替了衰微的明王朝，康熙就是满清王朝的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

明朝官员依赖农业来完成税收，充实国库，他们错误地认为，商人的目的在于用国外的观念来颠覆政府。16 世纪初，明王朝实行了闭关政策。明初，朝廷曾进行过大规模的“下西洋”活动，这是明王朝自信力的标志。但这时，远洋探险已告结束，一度引以为豪的中国舰队成为停泊在沿海的一堆废物。海上贸易逐渐让给了外国人，而土耳其人和蒙古人则继续占据着通往中亚大陆的陆上商路。

尽管官方政策呆板僵化，勤劳的中国人民还是给明朝经济注入了惊人的活力。大片的土地被开垦成了新的可供耕种的良田，农民种上了一季两熟的速生稻，这为农业带来了新的收成。一些特别宜于农作的地区开始从种植粮食作物转向种植能卖钱的经济作物，如茶叶、棉花、柑橘及丝绸业所用的桑树等。大量鱼池中的水产品满足了城市的需求。一些有敢于冒险，敢于创新劲头的农民，甚至成功地种植了从美洲引进的花生、玉蜀黍和甘薯等新的作物。

虽然未能获得中央政府的多少支持，工业仍得以稳步前进。中国的丝绸、棉花、特别是陶瓷，是欧洲人高度重视的商品。直到 18 世纪初期，欧洲





满族兴起于朝鲜以北的一个小地方，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作满洲。他们趁明朝衰落之际，突破了中原与北方蛮荒之地间的防御线——柳条边。他们以骑射手（见上图）为主要的进攻力量，趁明王朝内战之机，于 1644 年攻入北京。满清夺取政权后，迅速控制了整个国家，并开始扩张疆域。在 17 世纪末，清王朝的疆域已包括外蒙古及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土地。17 世纪初，朝鲜已成为中国的附属国。1683 年后，清政府统一了台湾。

人才学会制作陶瓷的技艺，但即使是那个时候，中国陶瓷仍是世界各地收藏家渴望得到的珍品。

在一个基本的工业部门，明王朝并不十分情愿地接受了西方的帮助。虽然中国人从他们自己的技能看，本身就是优秀的冶金专家——某些方面的知识甚至超过欧洲最好的冶金师——但他们承认，在制造火器方面，西方是领先于中国的。毫无疑问，明王朝最先进的大炮和火枪，或者是从欧洲进口的，或者是在西方专家的监督下制造的。事实上，自16世纪以来，明王朝就从澳门的葡萄牙人手里买来火绳毛瑟枪和轻火炮，并开始进行仿制。17世纪时，随着国内叛乱与边境战争的威胁日益增加，明王朝不得不减少了对西方“野蛮人”的戒备，在制造武器上寻求他们的帮助。而最主要的帮助者竟是耶稣会传教士。

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于17世纪初就得到了北京朝廷的承认和接纳。虽然他们出使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人改变信仰，皈依天主教，但是，中国的士大夫们对这些传教士们的信仰没多大兴趣，相反，对他们带来的有关欧洲最新的科技发明的信息却十分关心。这些教士们很快意识到，没有中国皇帝的支持，天主教很难深入中国人的内心。

这样的认识带来的后果是，传教士们开始学习中国话，穿中国服装，准备全面适应中国社会。1629年6月21日，一名精通天文学的传教士成功地预测到一次日食的发生，这令中国皇帝大吃一惊，这次预报产生了魔力般的影响，结果传教士们被任命为帝国钦天监的官员，而且在这个部门呆了近两个世纪。只有当被围困的明王朝迫切需要更多火器击退满人时，这些神父们才被请出来，铸造重型火炮。

然而，单单是枪炮并不能挽救一个衰落的王朝。当经济作物的生产使农业变得有利可图时，土地便日益集中到少数富有的地主手中。而这些势力强大的地方豪强又可以公然逃避政府的赋税，于是越来越重的赋税负担便落到了农民肩上。结果，在帝国的每个省份，都发生了农民起义，有的发展为大规模的地区叛乱，有的逐渐沦为了匪帮。

中国的邻邦也趁机开始侵扰明王朝的边境。日本海盗在沿海地区大肆劫掠。日本入侵中国的附庸国朝鲜，明王朝参战，经过数年苦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西北，蒙古仍是个不安分的敌人。除它之外，还有个更大的威胁——哥萨克冒险者企图在17世纪中叶将俄罗斯的疆域向东北扩张到太平洋。同时，沿明的东北边界，新近建立的后金政权，军事和政治力量也在不断壮大。

尽管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众多的人力资源，明王朝在对付这些挑战时仍显得力不从心，反映迟缓。几十年来统治集团骄奢淫逸，及对经济的漠不关

心，使中国政府根本无力维持一支强大的数量足够的军队。私人武装可以补充国家兵源的不足，但在保卫帝国时，这样的军队往往三心二意，而且并不忠诚，往往有沦为匪兵和叛军的危险。

自然灾害更使中国雪上加霜。16 世纪 20 年代的连年歉收导致贫穷的西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1639 年到 1644 年，瘟疫夺去了数百万百姓的生命，明王朝的军队进一步削弱。

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的心脏北京一片混乱。朝廷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荒淫奢侈，皇帝实际上已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政治责任。1582 年后，他甚至不再处理朝政，拒绝接见朝廷大臣。结果，权力落入宦官手中。两千年来中国宫廷生活的一个常见的现象是，每逢国运衰微之际，这些担任皇帝宫庭服务工作的宦官总会对国家政治发挥重要影响。这也是中国政治的一大显著特征。明代宦官专权期间，利用私人军队和秘密警察，展开了激烈的党争，使政府及其人民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1620 年—1627 年天启皇帝统治时期，明王室的生活腐化到了极点。天启帝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作为帝王，他却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而全心全意投身到木工匠作之中。由于他放弃了朝政，国家的权力落入皇帝的乳母客氏和一个残忍的野心家魏忠贤手里。魏忠贤气焰熏天，权力炙手，以虐杀无辜为乐，使大多数反对者三缄其口，敢怒不敢言。但是，仍有一名勇敢的朝廷官员向无所用心的皇帝上书，列举魏的二十四条罪状，并愤慨地问道："陛下怎能任用一个天下人皆欲食其心肝的人作左膀右臂呢?"两年后，他得了一个赤裸裸的回答：魏忠贤下令逮捕了他，在经历了残酷的折磨后，他冤死在狱中。

天启死后，他 17 岁的弟弟登上帝位，改年号为崇祯。这个年轻人试图重振明王朝的雄威。魏忠贤畏罪自杀，他的同谋客氏被处以凌迟。凌迟是一种酷刑，犯人被一刀一刀地把肉从身上割下来，每割一刀，便用烙铁烧一下伤口，以防犯人因失血过多而很快死去。然而，肃反与改革为时已晚。内部的叛乱迅速使国家分崩离析，而国门口伺机已久的敌人已强大到了势不可挡的地步。

在明王朝政权逐步走向崩溃之际，后金政权靠侵夺衰朽的明王朝而迅速崛起。这个朝气蓬勃的民族生活在朝鲜北面山区，后来这一地区被称为满洲。它是合称为女真的三支通古斯族中的一支，在语言上与西面的蒙古人和突厥人有相对较远的联系。12 世纪中，女真曾征服过中国北方的大部分领土，建立了金朝，从而进入了中国的历史。后来，他们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国征服，又退回到北方的故地旧土。然而，对北方中原的短暂统治在女真人心中留下了自豪的、激动的回忆。

在数个世纪蒙古和明王朝的统治之下，满族人基本上能与明中央政府和

平相处。中国统治者实行古老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汉族居民被限制在柳条边(一条位于东北西南的防御线)以南。尽管如此，一些汉人还是越过柳条边，为满族统治者提供技术专长，并在建立当地的武器工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满族是居住在中国边疆的建州女真的一支，它在它的精力充沛的领导者努尔哈赤的率领之下，从16世纪末期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艰难征程。满族逐渐攫取了柳条边内的明朝领土，并于1625年在沈阳定都，后来他们将其重新命名为盛京。

从建立新都之日起，努尔哈赤实际上已不再承认明朝的管辖，而是公开宣称建立自己的国家金国，欲图重振昔日存在了五个多世纪的金帝国的雄风。他结合汉族和本族的特点，建立了自己的高效统治机构。为了确保政权能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他成立专门机构，控制了珍珠、皮货和人参等贵重商品的贸易。另外，努尔哈赤还让学者简化了满文字母。影响最深远的是，



这个凤冠是为万历皇帝的皇后制作的，它的底部由金子制成，上部缀满了珍珠宝石以及绚丽的翠鸟羽毛。万历皇帝在位时间是从1573年到1620年，已是明朝末期，从他的皇后的凤冠之精美不难想像当时的靡侈。当时明朝正出动大批军队帮助朝鲜驱逐日本侵略者，然而明朝统治者却把大量的金钱用在维修宫殿和维持大批后宫人员的生活上。据统计，当时的后宫竟有70 000名太监、9 000名宫女。另外，还为皇太子的加冕大搞盛大的庆祝活动。

他用旗制代替了原来的部落军事组织，这使得他和他的继承者拥有了全亚洲最骁勇善战的军队。

起初旗制十分简单，努尔哈赤的军队划分为四旗，每一旗分别用黄、白、蓝、红等四种颜色作为自己的标志。然而在不到15年的时间内，每旗都已激增至200牛录，拓展为八旗，它们的旗帜颜色在原来四色的基础之上镶以红色或白色加以区别。最终，努尔哈赤的军队定型为每旗拥有7500名军士，划分为五甲喇，每甲喇由五牛录组成。随着满洲政权的扩展，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加入了八旗系统。在后期，虽然旗内军官的军阶必须由政府确认，但旗主主要还是世袭制。绝大多数的军士都是满族人，基于管理的需要，除了俘虏、奴隶和农奴之外的所有满族人必须隶属于某一旗。

早期八旗官兵服役没有任何报酬，因此他们指望靠自己土地的收益或像历史上的蒙古军队那样劫掠来养活自己。然而在作战方式上，他们却更喜欢汉族而不是蒙古人的战术，大量依靠步兵，他们的前锋部队由穿盔甲的步兵组成。第一列是长矛兵，第二列是刀剑兵，第三列是弓箭手。后面还有少量的骑兵，以待在急需和有利之时，支持步兵给敌方以毁灭性的打击。

这种战术使得满族军队极易遭受火器攻击，而明朝军队大量装备了

耶稣会传教士的风采

对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来说，1600年的中国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国度。因为中国就像中东的以色列一样不存在任何一种占有优势的信仰。因此他们梦想能通过感化中国的统治者而使中国归顺上帝。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满怀希望来到了中国，开始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他的影响之下，其他的传教士接踵而来，其中那些具有渊博知识的传教士受到器重，并且赢得了许多上层人士的信赖。

然而在17世纪末，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惊讶地发现耶稣会传教士竟能忍受中国习气，如在做弥撒时放鞭炮。他们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教皇。教皇谴责了这些行为，康熙皇帝被激怒了，随即驱逐了绝大多数传教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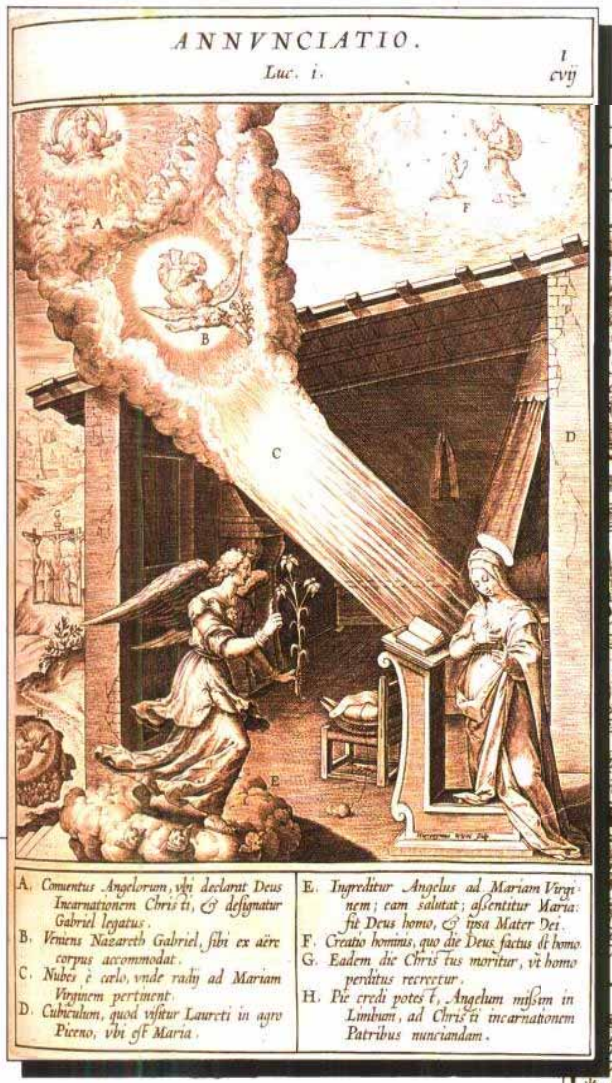
这是利玛窦在中国时的画像，他花了30多年时间试图架起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在他手里拿着的书标题是《天主圣训》，这是中国对天主教教义的称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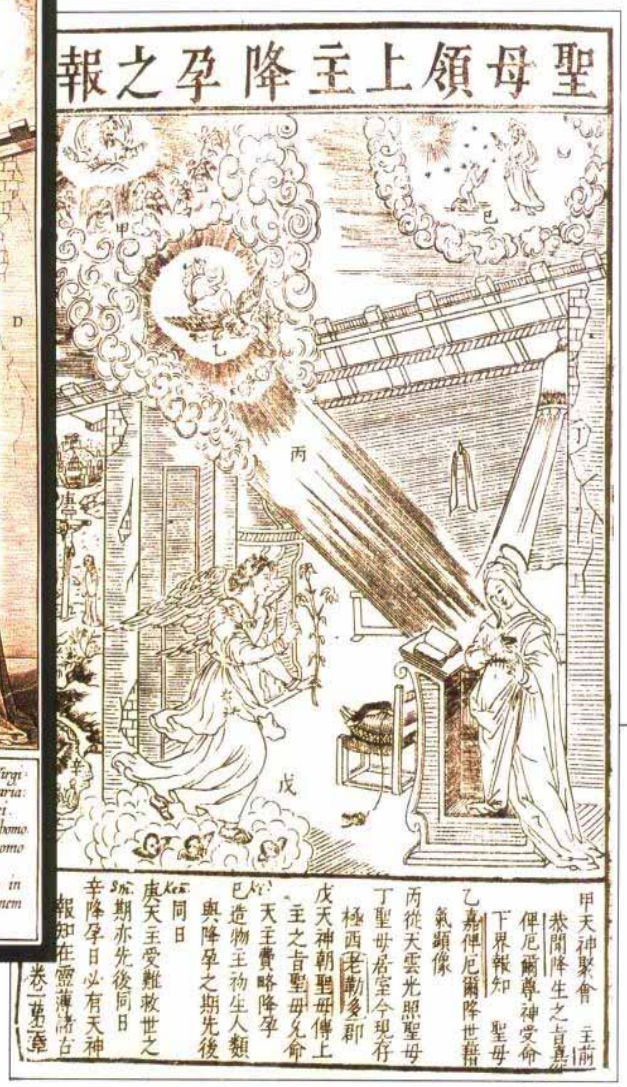
这个铁制的小型日晷仪是汤若望的成果，他是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曾在顺治时期担任过钦天监监正。另外，这个仪器还能用作指南针。

火器。1626 年满族军队在宁远大战中被明军的火炮打得大败，努尔哈赤本人也在这场战役中受重伤，最终不治而亡。但是在随后的短短几年中，满族人也有了自己的火枪，这些火枪是由蒙古人作为贡品献给满人的俄国式火枪。这种原始的滑膛枪的射杀速度比弓箭还慢，而且精确性也不高，但是训练一个合格的弓箭手得花好几年时间，与此相比，操作火枪则不需要娴熟的技巧。

在定都盛京(今沈阳)之前，努尔哈赤就已迫使东蒙古人臣服于自己，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后兼并了大片的蒙古部落，并把他的势力范围向北扩张到黑龙江河谷以北，今天中苏两国就以这条河为界。与此同时，明王朝的日益没落使满人的注意力再次投向南方。中国即使是在她没落腐朽的时候也比满人的地域广袤得多，满族统治者只有在依靠汉人的支持下才敢考虑征服中国的计划。因此，努尔哈赤建立的国号“金”已经过时了，因为金朝曾给汉人带来战争的苦楚回忆。于是皇太极改用“清”为国号，并建立一整套完全不同的国家制度。



A. Comentus Angelorum, vbi declarat Deus Incarnationem Christi, & designatur Gabriel legatus.
B. Veniens Nazareth Gabriel, sibi ex aëre corpus accommodat.
C. Nubes è cælo, vnde radij ad Mariam Virginem pertinent.
D. Cubiculum, quod visitur Laureti in agro Piceno, vbi ẽst Maria.
E. Ingreditur Angelus ad Mariam Virginem; eam salutat; assentitur Maria: fit Deus homo, & ipsa Mater Dei.
F. Creatio hominis, quo die Deus factus ẽt homo.
G. Eadem die Christus moritur, vt homo perditus recreetur.
H. Pie credi potes ẽ, Angelum missum in Lusitaniã, ad Christi incarnationem Patribus nunciandam.



甲天神聚會 主前
恭聞降生之旨喜
俾尼爾尊神受命
下界報知 聖母
乙喜俾尼爾降世報
氣顯像
丙從天雲光照聖母
丁聖母居室今現存
極西老勒多郡
戊天神朝聖母傳上
主之旨聖母允命
己 天主費略降孕
造物主初生人類
與降孕之期先後
庚 同日
天主受難救世之
辛 期亦先後同日
降孕日必有天神
報知在靈薄諸古
卷一第三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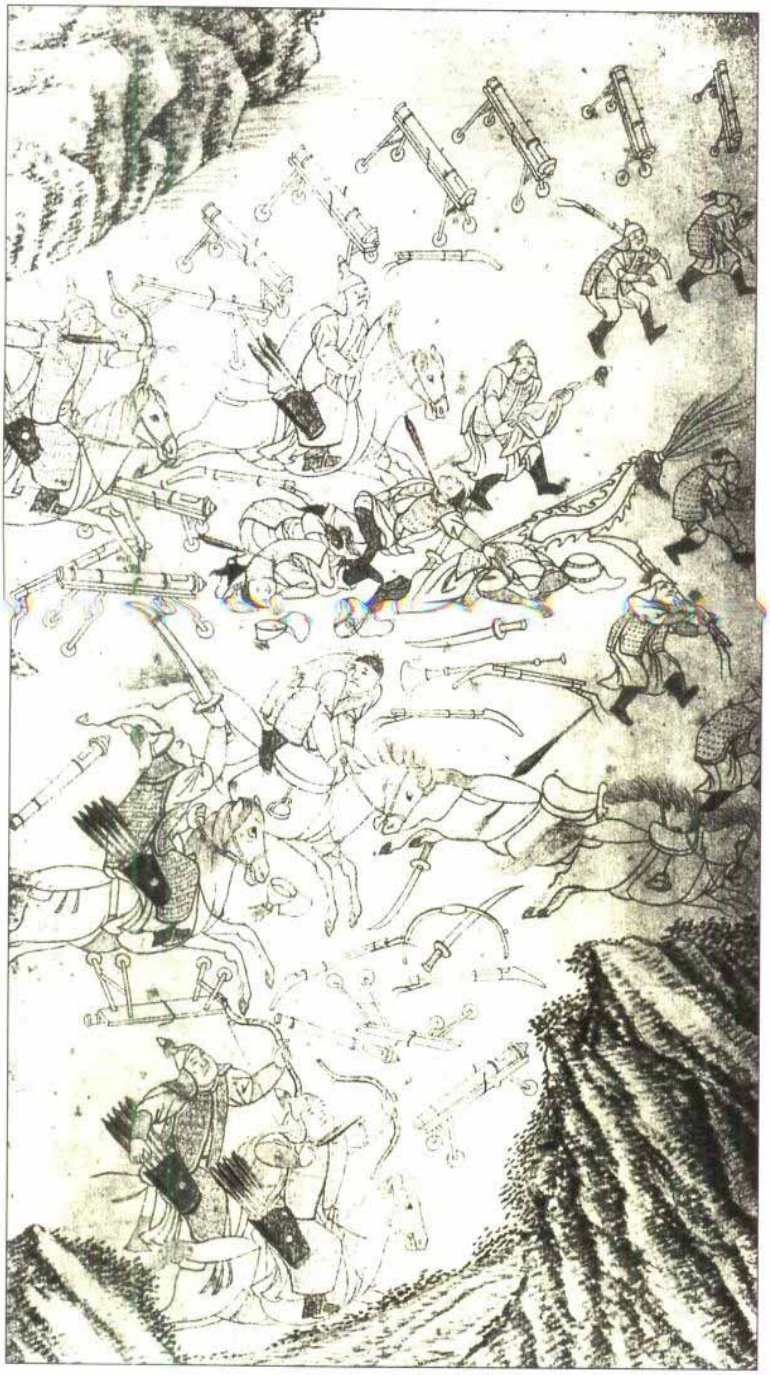
两幅圣母领报图——天使向圣母玛丽亚报喜——展示了耶稣会传教士是如何改编欧洲人的资料以适合中国信众。最早的这种版画是由哈瑞尼玛斯·威尔瑞于 1595 年在安特卫普出版的。左图是由当地的天主教画师吉利欧·安尔尼为《图画中主的生活》一书中文版而作的，他使用了同以前相同的画法，只是在风格上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尽管有时遭遇败绩，皇太极还是逐渐撕裂了明王朝的北方防线。在1629年，满族军队在撤到长城以北之前已兵临北京城下。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使越来越多的汉族官员、士兵和手工业者归顺清朝，转而为这个新政权服务。清政府为他们提供优厚的待遇甚至加官进爵，同时清朝廷是基本上依照儒家思想组建的，并沿用儒家思想，重视教育和公益事业。事实上，满族政权一直都在不断的汉化，皇太极甚至仿效明朝的体制而建立六部。这种方式，为此后满族与汉族260年的联合统治奠定了基础。

但是最终给了摇摇欲坠的明王朝最后一击的，并不是清的军队。在17世纪40年代初，一连串强有力的农民起义使明朝土崩瓦解。在中原地区，一位眇一目的起义军首领吸引了众多的幻想破灭、被饥饿和贫穷逼上绝路的农民来投靠，这位首领就是李自成。李自成雄心勃勃，个性放荡不羁，他坚信过去授予皇帝统治合法性的“天命”已注定要降临到他的身上。因此，他不能容忍任何事情挡住他前进的路，阻挠他的成功。当开封城的市民顽强抵抗他对开封的围困时，他下令扒开黄河大坝，这导致千千万万无辜的市民——其中不乏许多李自成的追随者——死于由此引起的滔滔巨浪中。

1644年春，通向北京城的路终于向李自成的军队敞开了。这座皇城由为数不多的宦官指挥的军队防守，在成群的起义军面前不堪一击，迅速瓦解了。

得知起义军已进入自己的都城这一消息后，崇祯皇帝开始用酒麻痹神经，他命儿子们穿上破烂衣衫以防被人认出，要他们逃出宫去躲避追杀。做完这些后，他把宫中的妃子召集到他们面前，对她们说：“一切都完了，现在你们死期已到。”他打倒了最年长的妃子，并一剑杀了她。当他试图以同样的方法对付15岁的女儿也是帝国的公主时，仅仅砍掉了她的胳膊。然后崇祯皇上穿好正式的朝服，由一名宦官伴随着，跌跌撞撞地来到后宫中的庭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来走去。不久之后，皇上和宦官们的尸首被发现，他们吊死在亭中的悬梁上（此处英文原著有误，崇祯自缢于煤山的一棵树上——译者注），一份别在皇上长袖上的遗书写道：“我死



在满族编年史的一幅插图中插绘了满族骑兵追逐践踏明军步兵的情景，这场战役发生在1619年，即满族的第一位首领努尔哈赤入侵中国的第二年。几个明军士兵扛着火枪逃跑了，却把火炮丢得遍地狼籍。尽管满人开始时不太重视枪械，但他们很快便认识到火器的重要，在他们征服中原之后开始着手在皇族军队中建一支配备滑膛枪的部队。



这种 17 世纪的小人雕像上反映了人体上经络所连结的主要穴位。针灸自从公元前 3 世纪就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当时有人写成了两部这方面的专著。在 1822 年官方禁止针灸传播后，针灸技术就不再流行了，但它仍在秘密地被沿用。

也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也许贼军会撕碎我的身体，杀戮我的大臣，但不能让他们掠夺皇陵，也不能伤害我的子民。”

李自成的起义军毫不理会这最后的皇帝遗嘱。当义军入城时，京城的人们热切地走出家门，拥上街头。“新皇帝万岁”，的标语挂满了街头。然而热烈的欢迎很快就被恐怖所取代，军纪溃散的部队大肆饮酒作乐，烧杀抢掠。“剁手、断腿、剖心、削耳、割发……，无人敢反抗他们。”一位不留名的幸存者说。

现在是清军最后攻打北京的时候了。清军这次未遇到抵抗，因为负责抵抗满洲士兵的明朝大将吴三桂宁愿归顺军纪严明的清军也不愿让凶恶的李自成军队占据北京。面对不可抗拒的清军与吴三桂的联军，义军只好退出北京，满族征服者宣称清朝是明的合法继承者，皇太极已在一年前去世，他的五岁的儿子成为清朝的第一位皇帝，按照汉人的习惯建年号“顺治”。“建立顺服的和良好的统治秩序”这就是他的年号的意义；皇子的叔叔多尔衮，是主要的辅政大臣。

对中国新的统治者来说，最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控制这块毫不费力就落入手中的广阔的疆域。“如果有人胆敢不顺从天意，负隅顽抗圣朝，”摄政王多尔衮在他的第一道布告中宣称，“那么结局将是玉石俱焚，所有反抗的人都会被杀死。”这并不是虚声恫吓，据一位幸存者的记载，当濒临扬子江旁的水城扬州试图抵抗清军的进军时，成千的男人、妇女和孩子。“走入了他们的坟墓”。

残存的明军的抵抗实际上对清军构不成严重的威胁。在随后的十年中，一系列的明皇位觊觎者不断试图召集老臣匡复明的基业，但明朝廷一步步退到西南部，在那里最后一个傀儡皇帝于 1662 年被处死。

对新王朝来说，另外一个更难以应付的挑战来自有一半日本血统的贵族郑成功，这就是当时西方人所知道的国姓爷，尽管清朝向他透露出安抚的言辞和议和的条件，但郑成功坚决拒绝承认满族人的统治。国姓爷组织起了一支十多万人的军队，并率领庞大迅捷的船队控制了东南沿海地区(据说顺治皇帝听到郑成功接连获胜的消息后，大发雷霆，抽出宝剑把皇椅劈碎)。

像许多民间传说的英雄人物一样，国姓爷也因人类所共有的弱点而犯过错误。1659 年，他的军队似乎即将占领帝国的最大城市南京，这一胜利前景使他们兴奋万分，头脑发热，于是国姓爷大张旗鼓，为自己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庆典。庆典穷奢极侈，狂欢通宵达旦。

在“这场不合适宜的仪式”后的次日清晨，——正像一个修道士描述的——“他的军队麻痹大意，沉湎于睡眠和美酒”，在这个不幸的时刻受到攻击，国姓爷的军队一片混乱，狼狈不堪地逃回海上。

即使在经受了这次惨痛的失败之后，郑成功仍据守着厦门、金门等沿海岛屿，坚持他的反抗事业。清政府在围剿无效的情况下，作出了沿海一带居民内撤的决定，试图以此形成隔离带，使郑成功军队失去粮饷来源，从而自动向清政府投降。这一措施导致了数千沿海人民无家可归，饱受苦难。一位清政府官员评论这种形势说：“沿岸除了毁坏、废弃的城镇和村庄，一切都清冷萧条，杳无人迹。”在进击南京失败的两年之后，郑成功的军队成功地击溃了驻守在台湾岛上的荷兰殖民者，并把台湾建成为自己的永久基地。

郑成功第二年就去世了，军队的领导权落到了他儿子的手中，随着两岸战争气氛的缓和，原先迁入内地的居民又陆续迁回到原居地，但台湾郑氏王朝的存在仍是满清政府二十来年的一个潜在威胁。有鉴于此，清政府于1683年发动了对台战争，结束了郑氏王朝的抵抗，统一了台湾，把台湾纳入清帝国的统治之下。

在清政权确保对全国的统治过程中，士绅与农民在文化上和社会地位上的鸿沟帮了清政权的大忙。这一鸿沟使汉族士绅与农民很难联合一致，反抗清统治。当时大多数的士大夫深受儒家关于尊崇权威的信条影响，感到把耿耿忠心转到新统治者身上并不困难。特别是当清政府做出很大努力对中国古代的仁义信条表示尊重时，更是如此。清统治者欢迎前明政府官员回到新的管理阶层，甚至还允许他们保留原来的服饰样式。然而剃发令的颁布却招致了汉族人民普遍的怨恨。一开始清统治者就坚持要求所有的政府官员剃光前额，改梳满式辫子，这一屈从于外族文化的屈辱象征成了汉族人民世代挥之不去的阴影，事实上，割除辫子也就成为了汉族人民反抗清统治的标志。

为了使统治权由明过渡到清变得较为顺利，清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而顺治皇帝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年轻、好学，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积极倡导儒家学术，同时还竭力根除政府中的腐败行为。自少年时起，他就非常幸运地深受汤若望的影响。汤若望是一位德国来华的传教士，曾担任过清政府钦天监监正，并被赐“通玄教师”。作为顺治皇帝的宗教和政治顾问，汤若望深受尊敬，被尊称为“玛法”。一位同时代的耶稣会传教士曾评论说：“汤若望对皇帝的影响远大于王公贵族。”尽管汤若望对皇帝有极大的影响力，然而仍未能说服皇帝接受基督教义。相反的是，顺治皇帝却日益沉迷于佛教伦理。他22岁死于天花，他在短暂一生中，一直是禅宗的虔诚追随者。

顺治年仅7岁的第三个儿子继承了皇位，他之所以被选为皇位继承人，部分归因于他曾生过天花，顺治死于天花，而他却有了对这种疾病的免疫能



图为一位不知名画家画的康熙皇帝盘腿坐着看书的丝绸画像，据推测这名画家可能是一位传教士。康熙皇帝是历代中国皇帝中的最杰出者之一，在他统治的60年中，不但社会生活繁荣稳定，而且由于他的勤于理政，有效地控制着政府，避免了类似晚明政府腐败滋生的现象。虽然日理万机，但康熙皇帝一生都坚持学习，即使是在因操劳过度而生病期间，也没有丝毫松懈。

力。顺治皇帝几乎没有见过这位皇子，因为像所有的其他皇子一样，三阿哥从小就受宫女和太监们的抚养，但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英明的，这位小皇帝精力充沛、聪颖好奇，除了熟习骑马、弓箭外，他还倾心钻研儒家经典和前朝历史。他在“康熙”这一年号下，统治了中国60多年，并成为17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

因为新皇年幼不能亲理政务，因而建立了辅臣制度佐理政务，辅臣之一的鳌拜是当时一个主要的贵族，他骄横跋扈，改变了顺治时期实行的安抚汉人的政策，制定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禁止汉族官员批评政府，被怀疑有反满情绪的人遭到逮捕和严刑拷打，如果鳌拜没有危及皇权，他的这种高压政策仍有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但康熙皇帝在13岁时亲政之后，发觉了自己无法控制这位前辅政大臣，于是在亲政后的第三年，寻找机会处决了鳌拜，根除了鳌党势力。处决鳌拜之事史实记载不详，但据野史描述，康熙皇帝为了剪除鳌拜，以扑击之戏为名训练了一批忠诚可信的少年太监，让他们伺机以玩游戏为掩护擒拿鳌拜。

这次果断的行动实际上标志着康熙漫长专制统治的开始，在他当政期间，中国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社会繁荣稳定、文化成就卓越。同时康熙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一位精细的管理者，一位渊博的学者。他曾亲手制订了十六条道德准则，被后世尊称为“圣训”，它包罗面广，涉及仁义礼信，兄弟友爱，以及规劝臣民团结一致保卫财产等诸多方面。作为一个大帝国的君主，康熙皇帝自己也身体力行、躬行实践，尽可能地遵循自己提出来的这些准则。他还培植了中国自己的精英阶层。使中国与外界的贸易往来有利于中国。在康熙的统治之下，清政权不但统绪合法化，而且还统一了全中国，同时征服蒙古，开始了向外扩张的进程，其疆域远大于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康熙一生都遵循着一套严格的作息规律，他每天于黎明之前即起床，以便挤出时间来研读儒家经典。朝仪在五点钟时就进行。住所离皇宫较远的官员可稍许迟延。康熙按部就班地决议政事，先是与各主要部门主管官员商讨政务，接着召见内阁大学士等高级官员亲信大臣讨论其他问题大策，康熙皇帝曾写到：“经常注意细节才是最重要的。”到了早朝要结束时，他还要接

见内务府官员，各省官员和外国使臣。午后，康熙还得批览较低官职官员送来的奏章，这些官员按他们的官阶，没有资格面见皇帝。在剩下的一点时间里，他还要用来学习、写诗、习练书法，以及处理宫内事务。在传教士们的指导之下，康熙还把他的兴趣拓展到了中国传统的学术之外，包括欧洲科学、数学、天文学、医学和打击排钟，对最后一项他尤为热衷。他学习过欧几里德几何学，会在大键琴上演奏简单的乐曲。一位耶稣会传教士曾赞誉道："每一门自然知识对康熙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显示出学习的意愿。"据说康熙很少在半夜之前就寝休息。

在统治早期，康熙不得不进行艰苦的奋斗以巩固清王朝对这个广袤帝国的统治。康熙发动了首次军事行动是一场激烈的内战，这场内战几乎历时十年才得以结束。在中国南部和西部有三位汉族将军——其中一人就是吴三桂，他在清军占领北京时曾提供过帮助——他们各自控制的省份实际上已成了一个独立的割据地盘。最初他们的任务是帮助清军摧毁明朝的抵抗，到 1674 年时，他们的使命已告完成。然而毫不足奇，当康熙试图把他们控制的省份纳入到帝国的牢固统治之下时，这三位军阀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感到不满。当康熙针对盘踞最南面的广东的一名将军采取行动时，三名军阀全都造了反。他们的队伍由于加入了由台湾国姓爷儿子派来的军队而加强。这场强有力的造反几乎将满洲人的统治推翻，但在忠诚的汉族将领的帮助下，康熙于 1681 年真正获胜。两年后，他攻入台湾，成功地击败了国姓爷的孙子，平息了内战的最后一点余火。

在平定了三位割据的军阀和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后不久，康熙又面临另一个军事问题。即在中国东北沿着黑龙江流域，俄国的势力在迅速渗入和膨胀。东北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在与这块龙兴之地如此之近的黑龙江地带出现了一个对手，清朝皇帝无法忽视，否则就到了愚不可及的程度。俄国方面，哥萨克在占领了冷寂的西伯利亚荒漠后，被黑龙江流域这块相对富饶的土地所吸引，出了黑龙江就是太平洋和极具诱惑力的富裕的亚洲，欧洲的各个海上强国都曾在这里大发横财。

清与俄国对峙的核心点是雅克萨，这是 1655 年由哥萨克在黑龙江北岸建立的一个城堡。这一城堡的出现就是个挑衅，加之哥萨克非常残暴，迫使地方部族不得不向清政府求助。战争时断时续，直到 1680 年后康熙对整个黑龙江地区建立起系统的牢固的控制为止。

康熙沿着从南到北的道路与河流，建立了驿路网络，设立了基地、粮仓、船队和军营。康熙的军队显然能很好地对付欧洲人的军队，到 1686 年，俄国人的据点和哥萨克人的堡垒都已全部被清除，只剩下雅克萨城堡还矗立在河对岸。这时，双方开始进行谈判。康熙派了一支 90 只船的舰队驶入黑龙江以加强清的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地位。1689 年，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与欧洲列强签订了第一份官方协定。谈判中，中俄双方都做

了让步。中国保有黑龙江流域，俄国人的扩张就此止步。但是仍给俄国人留下一处据点，俄国人可以从这里出发，与北京贸易。在过去，清政府是不会给予这种特权的。

虽然从清入主中原以后，八旗制有了一点变化，取得这些胜利的军队依然实行的是八旗制。八旗官兵由政府提供饷金和一定份额的土地，此时八旗又增加了蒙古八旗和汉八旗，但是蒙八旗和汉八旗的饷金要远远低于满族人。驻防八旗分三种类型，大多数来自内府三旗的旗丁驻守在环卫京城的旗营之中；第二类是由下五旗组成的满营，驻扎在边防或战略要路的满汉城中；第三类是绿营，驻扎较为分散。大量但是分散的治安力量由汉人组成，其主要功能是镇压土匪。

满族的骑兵中的弓箭手仍然是军队中的精锐力量，但步兵的作用越来越大，范围也有所增大。绝大多步兵使用盾、短刀或斧状的长戟。弓箭手和火枪手为步兵进攻提供支援，同时一支被称为持盾者的精锐力量充当强悍的突击队。

尽管最初时清政权对使用火器有些保守，但是逐渐开始依赖火器。他们说服了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铸炮，同时还从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商人手中购买大炮。抓住的俄国战俘被安排去试射新的武器，有些甚至被并入了八旗之中。1683 年，皇帝谕令每支八旗队伍中必须要有一支火枪队，这些火枪队很

这是系列画《乐天四喜图》之一，在图中，画家陈洪绶描绘了画中主人公、8 世纪著名的诗人白居易正在思考的形象。在选择这一主题时，画家用白居易的时代来比拟自己所处的时代，因为他与白居易都生活在乱世——白居易生活在晚唐，画家则目睹了明朝的垮台。王朝的更替严重地打乱了士大夫的生活，许多明末士大夫宁可自杀也不愿效力新朝。陈洪绶自己就弃官出家为僧。但他在佛家的出世和儒家的入世之间仍进退两难。这种窘境在他为自己选择的号上表现得很清楚，如他自称“悔僧”、“老迟”等。



明显要由那些骑术糟糕的汉人组成。

火器的采用并不意味立即抛弃铠甲，实际上，中国传统的鱼鳞式护身铠甲可能与欧洲的金属铠甲一样能抵抗17世纪火器的攻击。铠甲的甲片并不总是用金属做的，份量轻而坚韧的绵甲仍然在使用，这种绵甲有10到15层织物，能抗住枪弹以外的任何进攻。

为保持战斗的技能，八旗的主力定期参与大规模的秋狩活动。在秋狩中，士兵围成一个直径好几公里的圆圈，然后逐渐收紧，围住那些逃不出去的鹿、熊、虎和其他倒霉的动物。围猎改进了参加队伍之间的协同与配合，提高了旗兵的骑射技术。1683年，康熙亲率10万骑兵和6万步兵在长城以北进行了一次秋狩。他因能离开北京而兴高采烈，他写道："人一到塞外，空气与泥土便使人精神振奋。"

作为一个能左右开弓的优秀射手，康熙十分自豪。他射死过135只虎、96只狼、132头野猪及不计其数的鹿与麋。同时他也从简单的野外生活中得到了乐趣，他可以在篝火上烧烤鹿肝，可以与当地的牧民自由地交谈。即使是在野外，康熙也能找到方法来实现自己对学习执着的喜好。在一次围猎后他报怨说："许多官员甚至都认不出二十八星宿。"

虽然康熙对学问和狩猎充满了兴趣，但他从未松懈过自己对国家所负的责任。在17世纪90年代，蒙古的准噶尔部在其首领噶尔丹的领导之下叛乱，在西北边境一带大肆骚扰，其前锋已进抵距北京城仅三百公里处。康熙亲自统率精兵追剿噶尔丹的军队，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叛乱。除掉了危及北京安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隐患，使康熙非常自豪。当噶尔丹于1697年自杀时，康熙兴奋异常。他在给亲信内侍的信中说："我的伟大事业终于完成了。在这两年中，我栉风沐雨，三次穿越沙漠追击敌人，在这杳无人烟的荒漠中，为了节省食物，只能每隔一天进食一次，……连续的进击，加之百般的艰辛，才有了今天的胜利。"

这次战争的胜利使清政府巩固了对漠北、漠西蒙古，即现今外蒙古的统治。然而到了18世纪初叶，清政府和蒙古在争夺对西藏的控制时，矛盾又急剧激化起来，发生了长达数年的残酷战争，清政府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到18世纪中叶，清政府最后完成了对漠西蒙古和天山蒙古的征服，彻底解决了西部问题。

清朝的内政管理与它的军事组织一样，复杂而又传统。从建国开始，就着意确保自己的政权被汉族所接受。于是，他们选择了阻力最小的作法，几乎没作什么整顿，就照单接管了明朝机构。满清统治者自己没有什么统治经验，所以他们乐意采用明朝政治制度。政体平稳过渡的益处是，许多汉族人把他们的忠诚毫不疑虑地从明朝君主转到了清朝皇帝身上。所谓的"天命"

不过是从一个统治家族转到另一个统治家族。

虽然清政府完全乐意采用明朝的政治体制，但是，由于满族全部人口仅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满族统治者担心，满族有失去民族特征而被汉族同化的危险。为了避免完全被同化，以保证满族能世代居于统治地位，他们把满汉有别作为法律的中心。有一个专门机构管理满族的精英阶层，这些精英有自己的官阶等级。满族人被禁止经营商业和从事生产劳动，不允许与汉人通婚。汉人移民进入柳条边以外的东北地区仍被禁止。满语和汉语一样被定为官方语言，在官场使用。

在采用明朝政治体制绝大部分内容的同时，清统治者又相应地作了一些他们认为必要的改进。他们把长城以南的行政区域作了新的调整，缩小了明代省辖范围，把这些地方分为新的十八个省区。虽然地方行政体制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区域调整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穷人的税赋负担，并使农奴制度受到了明显削弱。1681年康熙至少在一个省中禁止农奴随土地一起被转买，到了1727年，他的





上图是一幅有关乞丐生活的版画，描述的是三名乞丐分别以在头上点火，用石头砸自己，颈带木枷来赢得怜悯。右图是反映江湖艺人的生活，一名艺人表演站杆顶，一名艺人表演耍鼠。这些画是荷兰旅行家杰·纽尔华夫游记中的插图，他曾于17世纪50年代到过中国。在旅行中，他为乞丐们的生活所吸引，认为他们是既勇敢又令人讨厌，并记录下了他们是如何自残以赢得怜悯的。他还讲述说，他曾遇到一名乞丐，光着身子，拿着一只矛，宣称如不给他钱，他就用矛自杀。

继承人雍正彻底废除了农奴制度，有效地解放了农奴。

在清朝，基本的社会单位仍是家庭，它们又组成为规模更大的家族，家族由一个公认的族长来领导。宗族制度在北方十分脆弱，在南方却极为常见，具有极强的社会影响。在那里，官府很少干预族规的执行。妇女的社会地位仍然没有什么改变，妻子仍被看作是丈夫的附庸，富有人家的女孩仍从小被强迫裹足，使脚成为所谓的“三寸金莲”，这样的脚从脚跟到脚趾不超过 7 厘米。裹足限制了妇女运动，不利身体健康，然而据说能提高她们的魅力。

虽然这些古老的传统风俗仍产生着广泛而有力的影响，然而人民生活已经有所改善，而且有时改善的程度还相当显著。人口又开始增加，农业也在复苏，这使得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颇为受益，大地主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而中等富裕农民——他们的利益得到了国家保护——的重要性增加了。

城市手工业如棉纺织业、制陶业等也已从 17 世纪三四十代经历的萧条阴影中走出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甚至还超过了以前的生产水平。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在 17 世纪末，纺织业、制陶业、制盐业和矿冶业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这些可观的经济变化产生的大量财富使中国迄今为止仍然分化剧烈的社会出现了差距缩小的趋势，也使得仅凭人的着装来判断他的社会地位变得更加困难。

康熙当政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急剧膨胀，有了长足的发展，主要的出口商品被集中在南方的广州口岸，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



漆器经这里运往欧洲销售。然而尽管如此，清政府对与外国人贸易，态度仍显得暧昧。从邻近国家，如朝鲜、越南、泰国、缅甸等国来的商人，仅被看作是进贡的使节。俄国商人被迫以完成某种政治使命的方式来完成他们与中国的商业交易。即使《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理论上已为贸易开放了边界，也未有多大变化。来自西欧的商人更是受尽冷落，因为他们给中国人的印象是鲁莽而又缺乏教养，与野蛮人无异。

伴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士人的古代传统又继续风行起来。达官贵人们又都开始醉心于修建自己的花园亭台，收集古玩，弄诗作画，出资兴修戏院。就像一个世纪前他们所做的一样。这些士绅是智慧库，政府可以从中征召到管理类的官僚。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出现了一种“实学”倾向，它强调尽可能多地从广泛的来源搜集证据，以期能形成新的理论，或者是用以检验新的理论。可惜的是这一极具现代性的学术理论只应用于语言和文学研究，而不是用于科学技术。唯一的例外是曾游历天下的著名学者顾炎武的著作。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地理、疆域防卫、农业、商业等实际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上。这种偏离传统学术规范的转变发生时，欧洲的知识正开始转变中国人对天朝以外的世界的看法。

在新的王朝统治之下，耶稣会传教士更为活跃，他们的活动大大地丰富了清宫廷的文化与知识生活。康熙朝中叶是他们最风光的时期。他们担任皇帝的侍臣，在皇帝的扈从人员中，耶稣会士有很高的官阶。他们按清廷的礼仪行事，丝毫不感到尴尬，因为他们深知他们的地位仅仅取决于皇

这是由画家王翬画的巨幅长画中的一部分，反映了京杭大运河边上的旖旎风光，如旅游胜地虎丘（左侧），桑璜山庄（中间），以及一群江湖艺人在船上表演。这幅长达 20 米的巨画是王翬受命为纪念康熙皇帝 1698 年南巡而作。也许由于是受官方委托的应景之作，在画面上看不到一位乞丐，所有人物都衣着讲究。从其它方面来说，虽然它生动逼真地反映了 17 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但从细节上加以分析，可以发现作者有意贬低商人。另外我们也可以发现当时的商业已极为繁荣，画面上竟有三位中亚商人。临街有许多店肆，经营的范围也十分广泛，有儿童玩具、茶具、盆景等商品，品种齐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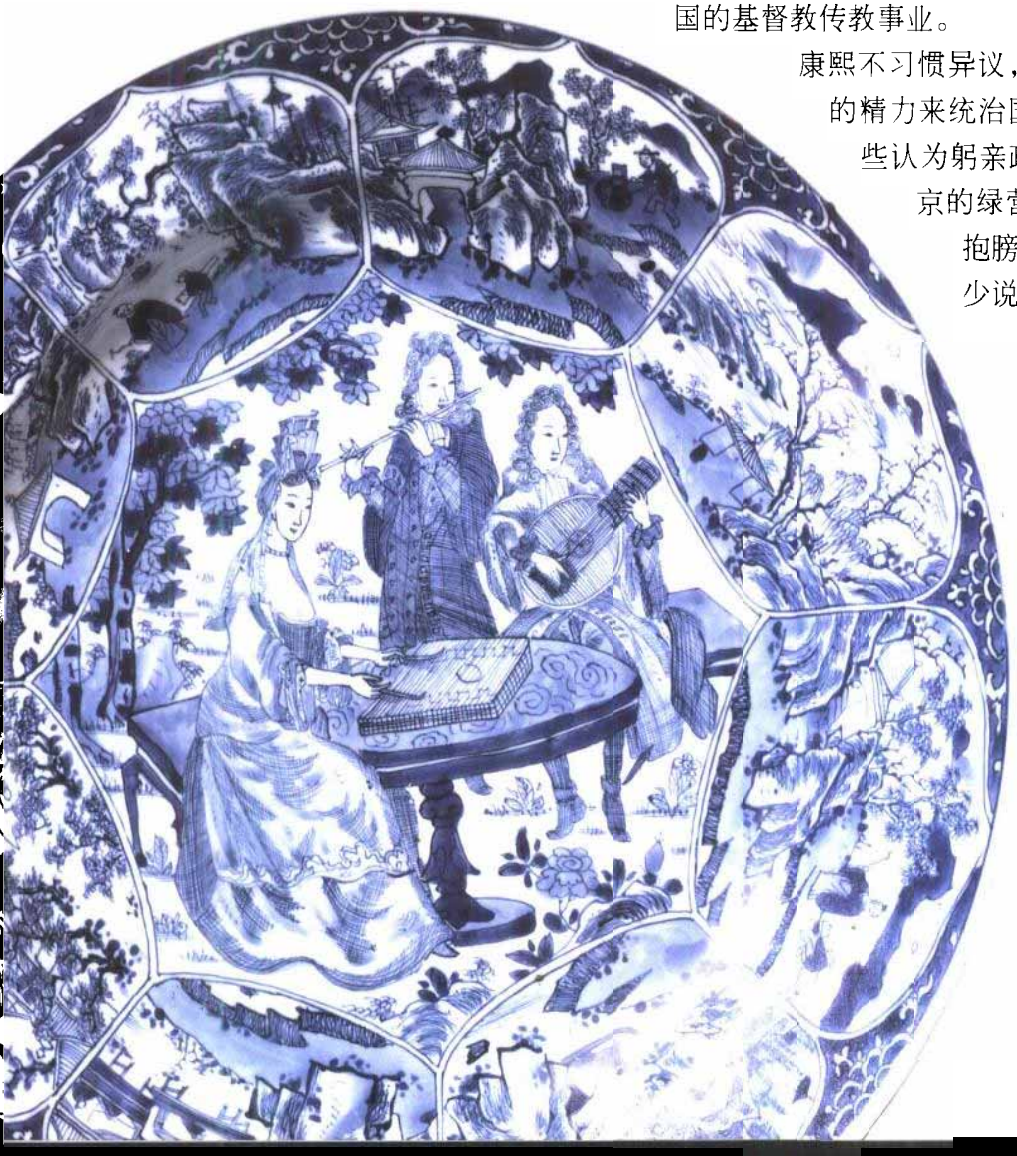
帝个人的好感。他们需要履行的礼仪包括在朝廷上向皇帝叩头。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必须下跪，以额触地，直到皇帝允许平身，才能站起。

尽管经历了这些明显的侮辱，他们仍然乐于充当这一帝国的辩护人。一位热心的传教士写道："如果各国都实行中国法律的话，中国为全世界提供了一幅迷人的发展蓝图。"他们还极力让西方了解中国的陶器、纺织品，以及漆器等，这些以后都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巴洛克式和洛可可式艺术形式。通过他们的介绍，中国文明也引起了包括斯宾诺莎、伏尔泰、歌德、迪德罗、亚当·斯密等伟大思想家、作家的注意。

虽然中国原本可以从欧洲学到更多的东西，然而中国不像许多其它传统文明，当它面临着西方先进技术的冲击时，它并没意识到自己的传统已经过时。事实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贯认为欧洲的成就只代表一种"新学"，它并不高于中国的传统文明，只是对中国文明的补充。因此，他们试图从更高的层面上综合中西传统，创造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体系。

康熙统治后期，基督教阵营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耶稣会教士在中国的影响。来自其它教团的传教士不断批评他们所看到的耶稣会教士迎合、屈从皇帝的行为，他们的抱怨也得到了罗马教廷的积极响应。此后教皇发布的批评中国朝廷的一些信件导致了两者关系的冷却。教皇还公开宣称拥有对全世界的精神裁判权，即使是对天子——皇帝也不例外，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基督教传教事业。

康熙不习惯异议，他乾纲独断，以父亲般的慈祥和充沛的精力来统治国家。作为一个实干家，他不能容忍那些认为躬亲政务有损声誉的官员。他写道，一次北京的绿营营房失火，他发现清官员们竟然抄手抱膀站在一旁，因而勃然大怒："我们最好少说伦理道德的空言，多些身体力行。"



在17、18世纪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为欧洲市场制造的瓷器。这里所要介绍的两件显示出它们的外观设计与传统的中国瓷器确有很大不同，它们在形状和装帧底色等方面都着意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左边盘子的底部印上了法国户外节的花样，但在它的四周仍配以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右边的罐被饰以中、西方的船样。千百万件这样的瓷器从广州运往欧洲，它们和其它的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一起对欧洲的洛可可式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能及时发现帝国内的问题，康熙曾有过几回巡行，他不但视察公共工程、宽赦囚犯、聆听民间疾苦，而且还亲自审阅那些有志向的举子的科考卷子。一位为此而吃惊的教士写道："康熙甚至会召见那些地位低贱的劳工和农夫，并以一种友善可亲的态度和他们交谈，这使他深得人心。"也许是因为经常外出巡行并能亲临下层，康熙学会了识别 18 个省中的 13 个省的方言。外出巡行对康熙来说并不是全部，至少他有时还要展示一下自己的骑射本领。这种能力是前明的皇帝无法想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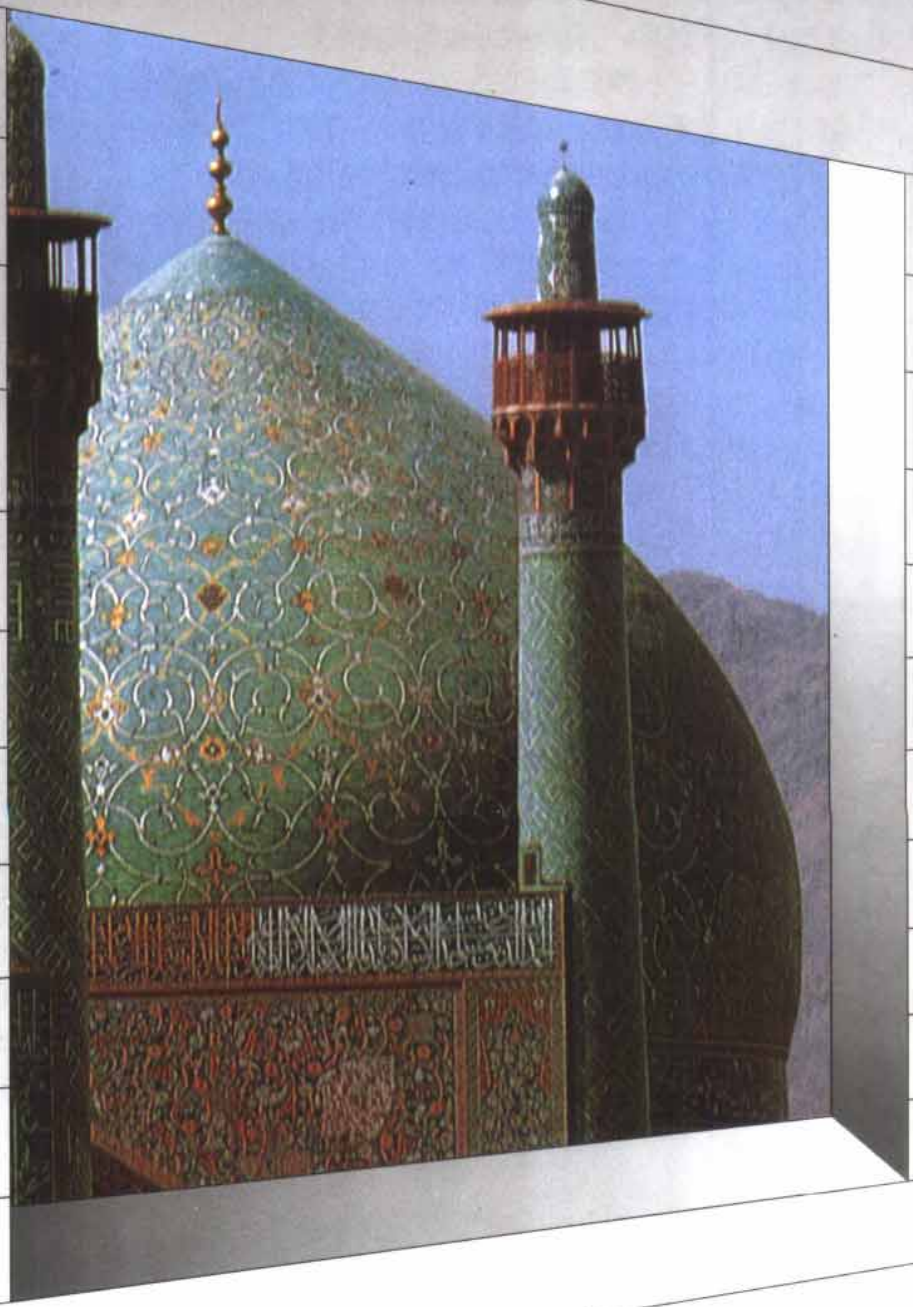
康熙虽然在治理国家时得心应手，然而对于家内事务却不那么成功。康熙长大成年的儿子有 20 个。康熙在第二个儿子允礽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关心和希望。然而允礽给他父亲的回报却是奢侈放荡，经常逆命而为。最糟糕的是，他竟然介入了同性恋事件。康熙对他的行为震怒不已，指责允礽是一个："放荡堕落，残忍暴戾，不孝不仁的逆子"，于是康熙废黜允礽的太子之位。虽然后来重新被立，但又被废。在这种逐渐加强的偏执观念的支配下，康熙处决了几个允礽的党羽，并且还把三个儿子囚禁起来。在危机的高峰时他写道："我无法抑制我的愤怒与悲伤。"这场残酷纷纭的皇族内乱使得痛苦的康熙不再册立太子。

1717 年，康熙预感自己行将离开人世，就在一份作为遗诏的谕旨中袒露了自己疲惫失望的情绪，并对各位儿子和亲信大臣进行了宣读，他伤感地写道："我已准备将这份诏书作为我一生的总结"，"我深恐全国子民并不知道我内心潜藏的痛苦"。55 年的统治耗尽了这位皇帝的精力，"虽然我已步入老年，但仍不能静心地休息一会。因此我认为整个国家只不过是一只弃履，所有的财富都只不过是泥沙而已。如果我死了，没有发生动乱和灾难，那么我也就瞑目了。"



5 年之后，康熙不幸染病逝去。他的第四个儿子继承了皇位，他在康熙去世前的几天一直侍候在床边，康熙被他的继承人谋杀的传说只是猜测而已。

康熙统治时期使中国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时代，这一时代并未因康熙的去世而终结。清帝国还在不断壮大、拓展，并于 1760 年前后达到了鼎盛。那个时期，清帝国的疆域除了现今中国和蒙古国的全部领土外，还包括苏联中亚部分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区。然而到了 18 世纪末期，清帝国已开始渐显衰落趋向，在这短短的 50 年里，又从衰落滑向解体。也就在这时，欧洲列强正处于殖民高峰，它们迅速地利用中国的衰败获取了商业利益，同时为帝制的终结建造了舞台。1912 年清帝退位，最后一位满族皇帝也成了中国最后一位帝王。



波斯大帝

3

1628年的夏天，一群不寻常的访问者来到阿斯赫拉夫宫中，波斯沙(波斯国王的称号)的这座舒适的宫殿在里海以南3公里的茂密森林里。他们是英国派往波斯的第一批使者。在会见前，他们已经等了4天，这可能是由于沙有咨询占星家的习惯，要在有利的日子里才能接见重要的客人。

不列颠使者之一，托马斯·赫伯特爵士，后来写了一篇关于这次会见的记述。据他记载，“宫殿宏大，向里可以看到非常令人赏心悦目的花园，虽然建筑物本身没有什么规则，但却十分令人不解地被分成四个‘莫罗赫’或称宴客厅，而且粉刷得十分华丽”。当访问使团最终被接见时，他们走进一间长长的会客厅，在那里他们从成排的靠墙盘坐的官员中间和左右躲闪的端着酒壶走来走去的仆人中间穿过，最后终于站在了他们早已想见的人——阿拔斯沙面前，他“受人民拥戴，闻名于国外并令他的敌人感到恐惧”。

阿拔斯——赫伯特爵士古怪地称之为“伯特绍”，明显是波斯语“巴迪沙”(Pad－i－shah)即最高统治者的音译——可能是自公元642年萨桑王朝覆亡直到今天取得王位的最有权力和影响的波斯国王，也是萨非王朝最伟大的君主。该王朝自1499年至1736年，某些方面恢复了该国曾有过的那种显赫。对东西两方的敌人，他两面出击：他的军队顶住了可怕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并且击败了中亚草原的乌兹别克部落。与此同时，他在国内促进贸易与艺术的复兴，并留下了伊斯法罕这座华丽的城市作为他的纪念碑。

为了在他繁多的征战中得到外国的帮助，波斯沙才同意接见来自英格兰的使者，但在赫伯特访问时，他已剩下不到8个月的寿命。英国使者祝贺他最近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胜利，沙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祝贺。虽然当时他的门牙已经掉了几颗，但他依然健壮有力，并且威胁与利诱并用，亲自指挥与英国使者的谈判。在讨论了关于英国与波斯之间贸易的前景后，阿拔斯拉过使团团长道摩尔·考顿，让他坐在自己的旁边，当这个英国使者不能以东方人特有的方式盘腿坐下时，他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阿拔斯要了一碗酒，为考顿的君主英王查理一世的健康干杯。提到英王的名字时，道摩尔立即摘下他的帽子以表示尊敬。被这动作所打动，阿拔斯也立即扯掉自己的头巾，十分滑稽地模仿这个外国礼节。阿拔斯喜好玩笑、美酒与奢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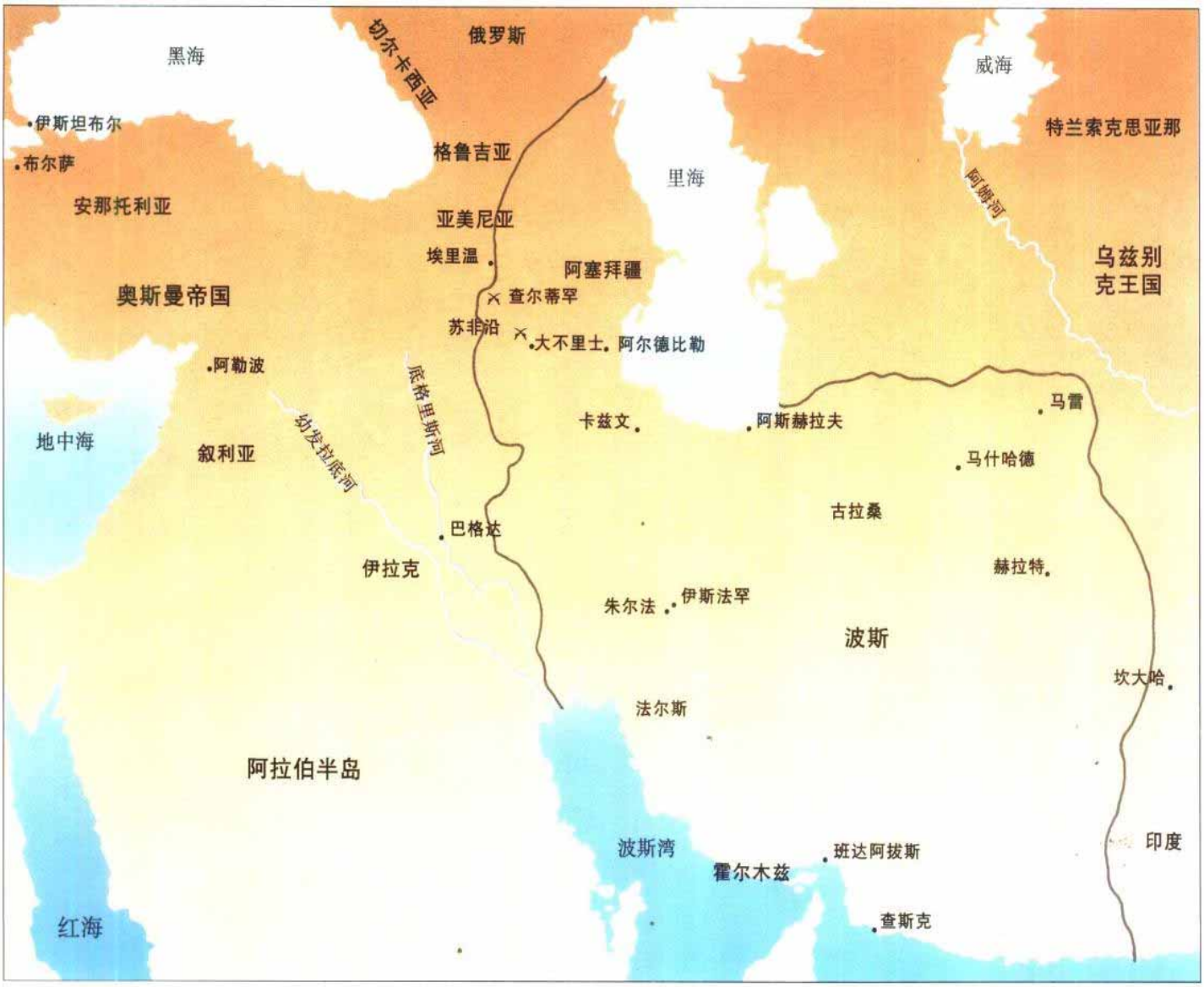
伊斯法罕王家清真寺的圣殿背靠荒山，拱顶上覆盖着琉璃瓦。这座清真寺是按照波斯萨非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阿拔斯一世沙(国王)的命令建造起来的，1587年阿拔斯取得王位时，伊斯法罕已衰落。然而，1598年沙决定把它定为自己的首都，在虔敬与王朝自豪感的混合作用下，他下令修建了许多新的建筑。这些瑰丽的建筑成为他的国民炫耀的话题：“伊斯法罕是半个世界”。

萨非王国是伊斯迈尔沙在16世纪的头20年里建立的，他是以位于波斯西北部的亚达毕尔为根据地的穆斯林一个神秘教团的首领。他率领由部落男子组成的难以驾驭的军队征服了包括全部现代伊朗以及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现位于苏联境内的大片土地。萨非王国后来遭到西方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东方的乌兹别克部落的挑战，在阿拔斯统治早期的困难岁月里，他的领土似乎将要在两线作战的压力下土崩瓦解。然而，沙为了对付乌兹别克人的威胁而同奥斯曼土耳其人保持了和平；然后，在击败乌兹别克人后，他在西线重开战争并夺回了早先被迫让与土耳其的几个省。

他的性情与这个王朝的创立者、他的曾祖父伊斯迈尔大相径庭。1494年，伊斯迈尔七岁时就已经继承了波斯西北部的亚达毕尔的一个圣祠的监护权，并由此成为穆斯林神秘的萨非教团的首领，因为该圣祠是他们的圣地。他也因此得到了从东土耳其、叙利亚北部和波斯西部游牧而来的许多土库曼部落绝对的效忠。这些强悍的战士以“盖札尔巴什”——“红头人”——而闻名。这一称号来自他们都戴着对萨非家族效忠的标志红色的帽子，。

“盖札尔巴什”对伊斯迈尔的感情远超过信徒应给予精神领袖的尊敬。这些部落男子是一度强盛的伊斯兰什叶教派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当时什叶派正处在困难时期，作为什叶派教徒，他们坚信伊斯迈尔属于伊玛目之列，也就是经由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直接从先知那里取得了权力的精神领袖。这一信念使他们与土耳其、埃及、特罕索克西亚那和印度所建立的穆斯林政权产生分歧，所有这些国家都信奉伊斯兰的逊尼教派，该教派从先知那里沿袭了一种不同于什叶派的教义。

在他们漫长历史的一小段时间里，什叶派教徒发展了他们自己的宗教仪式和法律，同时他们也倾向于去信奉那些神秘的、玄妙的、革命的和救世主式的教义。许多什叶派教徒深信，与穆罕默德有直系血缘关系、在874年神秘



失踪的第 12 位也就是最后一位伊玛目，实际上并没有死，而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隐藏了起来。土库曼人把伊斯迈尔就看作是那个人；并且相信他再次降世预示着世界末日的来临，在世界末日，复活的伊玛目将带领真正的信徒取得胜利并建立完美公正的统治。

监护伊斯迈尔的族长凭借人们这样的希冀来调集忠诚献身的军队。这些战士在战斗中左冲右突，坚信自己受到他们的神秘领导者的保护，不会受到伤害。他们早期的胜利得力于伊朗统治者“白羊土库曼人”的支持(之所以这样称呼是为了同他们的竞争对手“黑羊部落”区别开来)。1501 年，伊斯迈尔来到白羊部落的首都大不里士，在那里他被宣布为国王。接着，伊斯迈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对统治中东地区的逊尼派穆斯林政权发动了强有力的进攻：土耳其人、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人和特兰索克思亚那的乌兹别克统治者。尽管不总是胜利——他的军队在 1514 年的查尔地兰战役中被奥斯曼人打得一塌糊涂——但他在 1524 年去世时，已经创建了包括现代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的部分地区、以及现在位于苏联境内的南高加索一部分的萨非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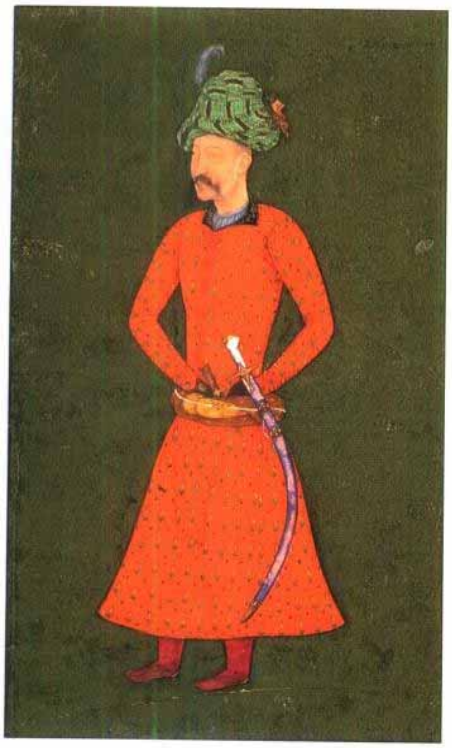
而且，伊斯迈尔所建立的王国实际上属于强硬的什叶派。尽管 15 世纪末波斯的逊尼派已经占据优势，但强迫改变信仰与疯狂迫害使许多人信奉“盖扎尔巴什”宗教教义——一项将持续几个世纪的遗产。

尽管萨非沙的绝大多数臣民都是波斯人，保卫他们的军队却仍然主要由从土耳其和叙利亚迁徙而来的土库曼人组成，他们最初与所保护的平民极少有共同之处。靠部落同盟聚集在一起的盖札尔巴什讲土耳其语而不是波斯语，并过着一种游牧式的生活。

宗教差别也一样存在。尽管盖札尔巴什是坚定的、甚至狂热的什叶派教徒，他们对信仰的解释有时接近异教，其中还掺杂着从土耳其萨满教民间故事中借用的错误理解。他们具有泛神论的倾向，认为在自然形态和自然预兆中都能看到神的存在，因而被称为“青草崇拜者”。他们的“迭迭斯”(dedes)，即精神领袖，受到无比的崇拜以致于信徒们非常虔诚地从他们的马蹄踏出的凹坑中把尘土扫净并保存起来。“迭迭斯”有权选择部落中的年轻女子，并通过按照宗教仪式与之发生性关系来庇佑她们。部落男子们也提倡把杀死的敌人尸体吃掉的习俗。每个“盖札尔巴什”部落男子的左耳上都带着一个小耳环，作为他热爱贞洁的外在标志；不过，敌对的历史记录者却指责他们参与有同性恋、乱伦和纵酒等内容的神秘宗教仪式。

尽管“盖札尔巴什”军队非常野蛮，但对萨非统治者而言，却是无价之宝。沙需要军队去保卫他们帝国不断扩展的边界免遭敌人的攻击，毫无疑问，“盖札尔巴什”是极为出色的战士。他们作战时，装备着包括弓箭、刀、匕首、战斧等一整套武器，16 世纪末的时候，他们还装备了骑在马上发射的火绳枪。热情和锐气经常使他们能战胜数量比自己多的敌人。

从这幅印度人绘制的肖像中可以看出，阿拔斯身材比常人短小，在晚年已不能引人注目。但他强壮有力——打猎是他非常喜爱的活动——观察者可以看出他犀利的眼神和敏锐的头脑。他很赶时髦地让自己的胡须垂下，在当时胡须指向天空被认为是专横的表现。以当时的标准而言，他的宫廷装显得简单；他把反对奢华作为一个原则性问题，并总是做出平易近人的姿态。



沙把部落男子驻防在有危险的边疆省份，并把给他们的首领地方统治权作为犒赏。尽管波斯人在萨非王朝的官僚体制中占据优势，但“盖札尔巴什”的族长们仍近乎垄断地掌握着军队和宫廷的宫职。到了沙垂死之时，土库曼人便有了干政的机会。他们其中一部分甚至想要成为有权拥立国王的人，这一野心来自于习俗的刺激，按着习俗，萨非王朝年幼的王子必须在监护他的土库曼族长教导下管理王国。

1524 年伊斯迈尔死后，他 10 岁的儿子塔赫玛斯普成为沙，整整 10 年时间，王国成为相互争斗的“盖札尔巴什”族长们的野心的牺牲品。但塔赫玛斯普长大后，成了一个合格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能够把他难以驾驭的国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然而，当 1576 年他死后，土库曼的部落男子们围绕太美斯普的两个儿子海德尔和小伊斯迈尔形成不同的派别。先是海德尔被谋杀；随后，在一段短暂而血腥的统治之后，吸毒并饮酒成瘾的小伊斯迈尔也死掉了，可能也是被暗杀的。他的另一个兄弟，没精打采且半盲的穆罕默德·古达班达在 1577 年登上了王位，但真正的权力仍然把持在争夺控制国家的竞争的“盖札尔巴什”派系手里。不但穆罕默德·古达班达是一个无能的统治者，而且对于他的许多臣民来讲，他半盲的视力差不多相当于正式取消了他继承王位的资格，因为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统治者的感官必须健全，不能残损。

因此，当担任穆罕默·古达班达 16 岁的儿子阿拔斯·米尔扎监护人的“盖札尔巴什”族长在 1587 年打起反叛的旗帜时，暴乱的势力急剧膨胀。阿拔斯生于 1571 年 2 月，在塔赫玛斯普死后的困难岁月里度过了他充满危险的童年生活。他的母亲因干涉朝政而被心怀不满的部落男人暗杀。他 5 岁时，他的第一个监护人土库曼族长赫拉特(现位于阿富汗境内)的行政长官被暗杀。他的叔父伊斯迈尔二世派另一名土库曼族长赴赫拉特，使命就是处死他，因为叔父把他视为危险的竞争者。但使者没有按命令行事，而是图谋趁着混乱接管赫拉特的统治权和阿拔斯的监护权。此后，他又把阿拔斯作为战争失败的部分赔偿品送给了一个与之竞争的族长、胜利者穆什得·古里汗，他正是 1587 年叛乱的煽动者。

当时所有的人都看得出，穆罕默德·古达班达根本不适合作统治者。奥斯曼军队已侵入伊朗西部，国家的其它部分也在部落之间的冲突中饱受折磨。当穆什德·古里汗和受他保护的王室穿越国家不断向西时，他们的行动很快变成一场凯旋式的前进。1587 年夏，王子最后到达位于波斯西北的城镇卡兹文，这是塔赫玛斯普选定的萨非王朝的首都。10 月 1 日，王子被立为波斯统治者，即沙阿拔斯一世。

如果穆什德原指望阿拔斯仅仅是一个顺从的傀儡统治者的话，那他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仅仅在登基 9 个月之后，这个年轻的国王就安排了刺杀



这是17世纪波斯史诗《沙赫那玛》手稿上的一幅彩画，描绘了传说中的战士战斗的情景。这些战士穿着阿拔斯时代常见的服饰，士兵在他们的盔甲外面穿着棉制的罩袍，抵御寒冷；前臂铠甲或称护臂，被缚在衣袖外面，用以保护前臂。虽然画中的战士仅带着剑和弓，但他们的原型早已装备有火器，阿拔斯也鼓励他们使用火器。骑兵戴着中东地区常见的尖头盔；像右图所示，头盔带有较长的帘布；更像被指定用于仪式而非战斗。

行动来加强权力。依照中东地区一个普遍的风俗，他弄瞎了他的兄弟的眼睛以消除他对王位的威胁。这位年轻的沙还对那些在他的母亲的死上负有责任的部落男子中进行了一次清洗。一些省份爆发了叛乱，但却遭到无情地镇压。

在如此血腥的统治之下，阿拔斯仍感到不安全。1593 年 8 月，他的占星师告诉他说星象预示着波斯统治者将有疾病，因为火星与土星的星位正处于方照状态。阿拔斯从王位上退下来，让一个被叛罪的异教徒，一个规模很小，已被宣布为不合法的宗教派别的信徒来坐他的王位。异教徒在严密的监视下统治了 3 天。到第 4 天，当黄道带的方位被判定已经变得有利时，沙的替代品被处死，阿拔斯又一次收回他的权力。

波斯外部的敌人令人忧虑，这个问题不易解决。来自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和乌兹别克人的威胁，自老伊斯迈尔统治时代就一直存在，而在塔赫玛斯普死后的混乱时期变得更加严重。奥斯曼土耳其人扮演着更加危险的角色：阿拔斯继



承了一场在他登基前10年就已开始的反抗土耳其人的战争。有争议的领土包括伊拉克、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高加索，在后两地发生了大量的冲突。在多数情况下，土耳其军队占有优势。他们的实力来自于他们庞大的纪律严明的步兵团、他们的炮兵部队和他们细致的后勤支援。土耳其通常的战术是把炮兵和火枪兵放在用链条横向连接起来的马车的后面，冲击萨菲的骑兵。1587年，奥斯曼人夺取巴格达。

受自己军队的限制，阿拔斯对于收复失地几乎无计可施。为了赢得时间，他在1590年同意缔结一项耻辱的和平条约。在签定的《伊斯坦布尔条约》中，他承认土耳其控制伊拉克、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大部。为了安抚逊尼派奥斯曼人，他也保证禁止他的国民咒骂欧默尔、艾布·伯克尔和鄂斯曼。这是最早的三个在先知穆罕默德死后领导穆斯林国家的哈里发；在什叶派教德眼中他们是篡位者，处死他们是对自己宗教虔诚态度的最好说明。

阿拔斯需要同奥斯曼人保持和平以对抗在波斯东部省份呼罗珊残酷压榨的乌兹别克人。乌兹别克军队洗劫了赫拉特和摩尔乌城，并蹂躏了什叶派圣地马什哈德。但是，与奥斯曼人不同，乌兹别克人拥有一支相对纯粹的从游牧部落男子中征集的军队。在阿拔斯的领导下，他的盖札尔巴什骑兵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马什哈德、赫拉特和摩尔乌在1595至1596年间被全部收复，萨菲骑兵继续穿过奥可叙斯河，把战争延伸到乌兹别克的特兰索克西亚那。乌兹别克汗阿布杜拉二世于1598年死去；一年之后一支庞大的乌兹别克军队在赫拉特附近发生的一场战役中被击败。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双方小规模的冲突不断，并且乌兹别克的突袭始终给吉拉那的城镇和农业造成威胁。但这种骚扰并没有危及到王国的安全。阿拔斯觉得可以放心地把注意力重新对准奥斯曼土耳其人。

意识到他的军队早期的失败，阿拔斯沙试图补救它的弱点。为实现这一目的，他把目光投向了北方格鲁吉亚的基督徒领地，该地在《伊斯坦布尔条约》签定后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土耳其。格鲁吉亚与它的基督教邻国切尔卡西亚和亚美尼亚一道，长期是白人奴隶贩子十分中意的猎取奴隶的场所。他们从中挑出俊美的青年卖给伊斯兰宫廷。女子因为美丽而受重视，并且成为沙内室里的宠爱。男子们至少从塔赫玛斯普沙统治时代就被编到军队里，他们当中最优秀的被挑选出来，到宫廷里服务。

这些人是阿拔斯求助的对象。尽管他们名义上归奥斯曼人统治，半独立的格鲁吉亚基督教统治者恢复了他们在16世纪90年代把奴隶作为贡品献给波斯的传统作法。虽然这些奴隶出身低贱，但格鲁吉亚人由此进入了阿拔斯的统治阶层，并在统治精英集团里构成了另一个种族集团成分，他们为公职同土库曼人和波斯人竞争。

格鲁吉亚人最杰出的作用是在军队中。阿拔斯也许不是第一个使用格鲁吉亚军队的统治者，但他却是第一个倚重这么庞大规模的格鲁吉亚军队的统治

一个手中紧握酒壶的贵夫人在一个开满鲜花的花园里悠然自得，她在考虑是否接受她的爱慕者递给她的一条围巾。经过描绘和抛光的带有这幅图案的瓦饰可能曾经是阿拔斯沙在伊斯法罕宫殿里的一处楼阁的装饰物。17世纪波斯严谨的穆斯林斥责混乱的性生活和饮酒，他们认为艺术中的人物肖像也是《古兰经》所禁止的。然而不管他们如何申斥，漂亮的青年男女、野餐、梦幻、在葱郁的果园中开怀畅饮，始终是那些力求迎合萨菲宫廷享乐主义口味的画家和诗人们的描写对象之一。

者。迄今为止，历代波斯国王都是以较小规模的正规军作为有威慑力但却缺乏训练的盖札尔巴什部落武装的补充，而这支正规军也是从盖札尔巴什中征召但按非部族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现在，阿拔斯开始组建由来自格鲁吉亚和其他高加索地区的军事奴隶组成的军队，其中，最精锐强悍的是 10 000 名骑兵，他们仅仅忠于国王，而不是哪一个部族。阿拔斯还组建了一支由 3 000 名奴隶士兵组成的团队。

阿拔斯还创建了大批的火枪兵和成队的炮兵来深化对军队的改造。他召募波斯人进入这些步兵团中。因为采取这种办法，他成为萨非王朝中第一个给与本国人民一个保卫自己国家任务的沙。最初，他们用购枪或在战争中掠自与奥斯曼人和乌兹别克人，或购自葡萄牙人之手，这些人在波斯湾中的霍尔木兹岛上保有海军和商业的据点。后来阿拔斯建起了自己的枪支制造厂。

阿拔斯按照奥斯曼土耳其的模式进行军事改革，既使用奴隶士兵，又加强火器力量。这一改革同时带来了波斯内部重要的政治变化。拥有一支约 37 000 人的常备军，阿拔斯不再那么依靠土库曼人去抵抗外族入侵和镇压内部叛乱。盖札尔巴什在宫廷和地方的权力很自然地下降了。尽管盖札尔巴什族长握有大多数省份的领导权，阿拔斯现在觉得已强大到足以派他们到那些远离他们自己的部落的省份去任职。国家的重要职位逐渐转移到宫廷侍者和格鲁吉亚官员手中，一些出色的格鲁吉亚人还担任了地方长官。

被委以此任的格鲁吉亚人阿拉倭尔迪汗把他官居高位归功于参加了 1588 年对穆什德·古里汗的谋杀。他起初只被任命为一个小城镇的头头，但到 1595 年他已成为奴隶军团的统帅及重要省份法尔斯的行政长官。后来他又被任命为整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指挥官，由此他又成了阿拔斯军队改革的主要设计师。阿拔斯高度评价阿拉倭尔迪汗的军事才能，非常赏识他在对付沙的敌人时多次表现出来的敏锐。

尽管常备军具有军事的和政治方面的优点，但它也存在着一个主要的缺点：必须定期付给他们报酬。为了凑足这笔巨大的支出，阿拔斯大概增加了税收，尽管没有关于这方面细节的记录。他确实扩大了领地的范围，在他的前任统治时，波斯土地上的大部分税收由富可敌省的部落首领征收，然后他们把收上来的一部分钱上交到中央政府。然而，阿拔斯在许多地方废除了这些中介人，把那些土地直接划归到自己的名下。

在王位上度过 10 年之后，阿拔斯感到有足够的信心去开始一项与他的统治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伟大工程。他决定建设一个新的首都来取代旧都卡兹文，旧都所在地被盖札尔巴什军阀和他们的部落成员控制，而且也与同奥斯曼土耳其发生战争的地带相距太近。

为了找到一个新的、更接近王国心脏的位置，阿拔斯在位于伊朗中部高原上的伊斯法罕的一个小城镇驻扎下来。这个地点早在穆罕默德以前的时代

就被占用，在 11 世纪和 12 世纪被短暂地作为国家的首都，尽管随后变得无足轻重。现在阿拔斯计划把它扩展和改造成一座花园城市，以宣扬他的统治和他的王朝的昌盛。

黎巴嫩诗人和工程师巴哈·阿尔丁·阿拉米里提供了关于城市布局的建议。（据说阿拉米里曾设计了一个只用一支蜡烛的火焰在水池下面燃烧，就能使水池保持热度的浴室。）皇室占星家也推算出了开工的时间。施工最终在 1598 年 10 月开始；工程从阿拔斯在位期间一直进行到他死后。

由沙和诗人创造的城市的确非常华丽。它的主轴是查哈尔巴夫大街，这是沿运河建造的一条 50 米宽的大街，运河上有一些小桥，在它的侧面有喷泉和水池。大街被松树和白杨树遮蔽，排列着宫殿、清真寺、商店和花园。每一天结束的时候，王子和平民们或骑马或步行，在林阴道上散步，享受着傍晚宁静祥和的气氛。阿拔斯沙喜欢加入到人群中，与街头小贩开着玩笑，或者看看货摊上将要卖出的物品。

查哈尔巴夫大街东面是拥挤的楼阁、庭院、寓所、会客室、行政办公处、仓库、马厩、皇家作坊和服务部门，这些在一起共同组成了皇家宫殿。这些建筑物并非是高大宏伟的欧洲风格；倒像是一个小村庄，荫凉的花园里散布着许多各自分离的建筑物，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的托波卡比宫非常相似。

宫殿之外是“麦登”，即市镇广场，占地 8 公顷，这是市内主要的公共场所。当没有特殊的重大活动举行时，那里就摆满了货摊，到了晚上，则变成挂满灯笼的露天游乐场。在其它时间，它可能按照沙的训谕用作阅兵，或公开处死罪犯的刑场，或者进行诸如斗狼等运动，斗狼是把一匹活狼放进广场，然后那些急于表现自己勇气的年轻男子将狼团团围住，进行搏斗。尽管一两个人可能被咬伤，但参与者不会受到比狼更严重的伤害。

在广场上举行的活动没有比马球更能令沙开心的了，这是萨菲宫廷和军队中一种杰出的游戏，既可以用来消遣又可以训练骑马竞争。一名法国访问者观察到“他们的马被训练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他们能像猫一样追逐球”，他认为这是统治者和他的家臣们很好的练习方法。皇家乐队为游戏伴奏，每当阿拔斯击到球，他们便奏出响亮的音乐。

广场北端尽头的突出特征是有一个通向大集市的拱道，集市包括商店和工场，方圆几乎超过 4 平方公里，像一个迷宫。在集市里面，手艺人被集中在不同的场所里面，有地毯编织工、纺织工、金属加工技工等等。皇家作坊和皇家旅舍（向交易奢侈品的商人提供住宿和保护）被安置在距集市出口很近的地方。其它地方的小作坊也很繁荣，因为尽管沙自己是全国最富有的人，除了享受税额增长的果实，他还近乎垄断地扩展丝绸贸易。在他统治期间百业兴旺，财富激增。

最大的受益者是在沙的鼓励下定居在朱尔发郊外基督教居住区的亚美尼

亚商人和技工，该地位于伊斯法罕正南，享有税务特权和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在阿拔斯的允许下，亚美尼亚人开始控制了奢侈商品的陆路贸易，尤其是生丝。以朱尔发为基地的商人们派出商队穿越叙利亚沙漠或安纳托利亚高原到达阿勒坡、布耳沙、伊斯坦布尔这些城市，在这里，奥斯曼苏丹的亚美尼亚臣民们经营商品的销售。除了精制商品，大众贸易货物还包括天然物品，诸如鸦片，麝猫香(麝猫富含香气的分泌物)和毛粪石，一种野山羊的胃所分泌的石状物，当时被认为是毒物的解药。

国王的宽容政策促使来自西欧的基督教的传教团将朱尔发作为基地。奥古斯丁教义的信仰者、天主教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士、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托钵僧都在那里修建房舍。根据沙对欧洲人和他们的宗教信仰的友好态度，许多传教士确信这位统治者本人几乎要皈依基督教了。这种错误是由阿拔斯不当的幽默感所产生的。有一次，他与一帮葡萄牙奥古斯丁教义信仰者聚在帐篷中，在琵琶的伴奏下，他与这些人一起唱赞美诗，并对这些人唱小夜曲。但事实是阿拔斯并没有要放弃伊斯兰教的倾向；他看重欧洲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可以给他援助，反对共同的敌人奥斯曼人。

从阿拔斯统治的国内和平中获益的并非只是商人，艺术也得以复兴。尤其是微型绘画，在皇家赞助下十分繁荣。一些最伟大的波斯画家在萨非皇家图书馆里供职，因为在17世纪的波斯，一个管理人员不只是去照顾图书和帮助读者找到要读的书，他也被期待着创作出原始作品以增加图书的数量。

阿拔斯的第一个这种皇家图书管理员是萨迪奇·贝格，他没有故作谦虚，称自己为“时代贤人”。同时代的人认为他脾气暴躁，自私自利，更糟的是自高自大，但同时又承认他有许多可高傲之处。萨迪奇·贝格生于一个主要的盖札尔巴什部落，起初他曾从军，别人对此也寄以厚望，他靠匹夫之勇，颇有建树。后来在他30多岁的时候，他采取前所未有的举动放弃军旅生涯，改学绘画。他在诗人兼书法家萨尼的指导下学习，后来被伊斯迈尔二世聘为宫廷艺术家。在伊斯迈尔死后的混乱年代里，他开始了云游四方的托钵僧生涯，之后，他再入行伍。阿拔斯登基为王后，萨迪奇·贝格成为皇家图书管理员，重新开始绘画和写作，用波斯语创作诗歌，用土耳其查戈台方言写散文。在这些作品中，使他名流千古的是《杰出人物集》，这是一部他花费了大量心血的传记词典，这本书使他成为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

多年来，萨迪奇·贝格的才华在波斯画家中即便有些不情愿，但还是得到广泛认可。但后来一位名叫阿里·礼萨的新人在伊斯法罕出现，用当时一位评论家的话说，“从前辈手中夺得优先权”。有一段时间贝格和礼萨一起在宫廷工作，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紧张的，因为沙变得更喜欢这位年轻人的精制毛笔画风格。阿拔斯如此尊敬礼萨的工作，据说，当他作画时，阿拔斯会为其秉烛。然而后来，礼萨混迹于不良伙伴之中。他成为一个狂热的

角力爱好者，并把很多时间花在这些练习和欣赏这种运动的下层社会朋友身上。他开始放荡不羁，自夸自大，失宠于沙。到那时萨迪奇·贝格已死去；他被更年轻的对手超过，他被解除了在藏书室的职位，很明显是因为偷窃了一本有插图的珍贵书籍。

诸如微型绘画之类的奢侈品的需求是由阿拔斯宫廷的频繁外交活动所刺激起来的。的确，与欧洲和印度君主的外交礼品交流规模如此之大，以致于实质上成了一个独立的进出口贸易。各国使者们聚集在伊斯法罕，希望打动沙以扩大他们的国家利益。来自莫斯科的使节徒劳地想要从沙手中获得金钱；德里的莫卧儿宫廷使团带来了奢侈的礼物；罗马教皇的使者热情而模糊地谈到一个反奥斯曼土耳其的大联盟；来自西班牙的使节试图保护葡萄牙位于波斯湾霍尔木兹岛的基地(从1580年到164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被一个国王共同统治)。

聚集在阿拔斯宫廷的外交使节中，有两个英国人，他们对阿拔斯后期统治有重要影响。尽管不是被伊丽莎白女王正式任命，但安东尼·谢利和罗伯特·谢利却是受女王宠臣埃塞克斯伯爵的派遣，去非正式地探察与波斯建立反奥斯曼土耳其联盟的可能性。两兄弟于1598年11月到达卡兹文。在这之前不久，沙战胜了乌兹别克人，凯旋的盖札尔巴什骑兵戴着用乌兹别克人耳朵做的项圈，用长矛高高挑起无耳的头颅，浩浩荡荡地回到卡兹文。这两个英国人仔细地观察了这一场面，然后赶去庆祝沙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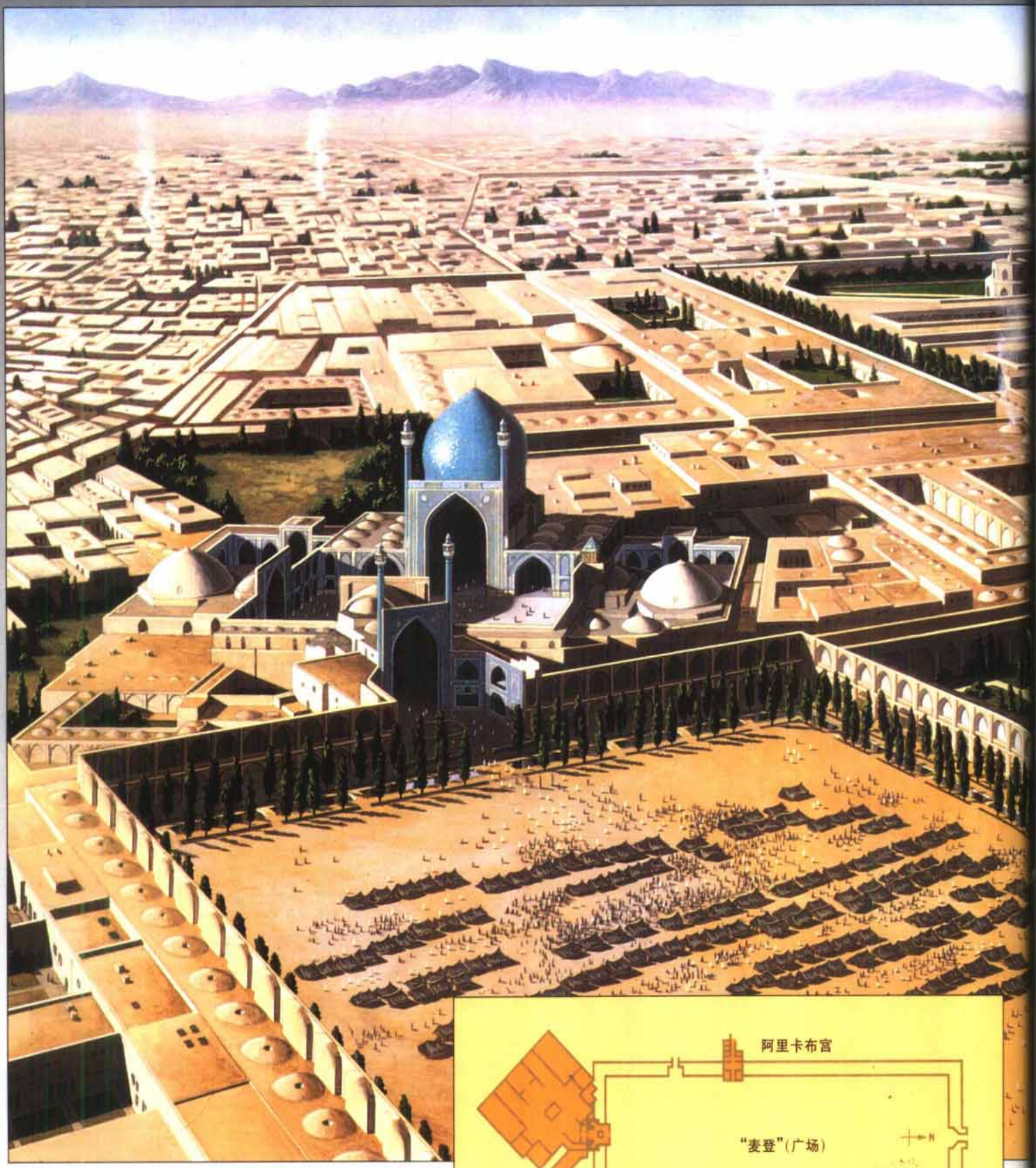
他们受到热情的款待。安东尼·谢利被沙派回欧洲，并带有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罗马教皇以及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在内的其他君主的信件。谢利对这一使命大肆炫耀招摇，但大联盟并没有出现。

罗伯特·谢利在他兄弟返欧期间实际上是作为人质留下的，后来表明，如此对待他对沙更有益处。阿拔斯很快发现可将罗伯特用作军事顾问，这个英国人有关火炮和战术的知识成为无价之宝。在罗伯特的协助下，阿拔斯成功地改编了波斯军队。谢利成了一名军官并为自己赢得“反土耳其大将”的头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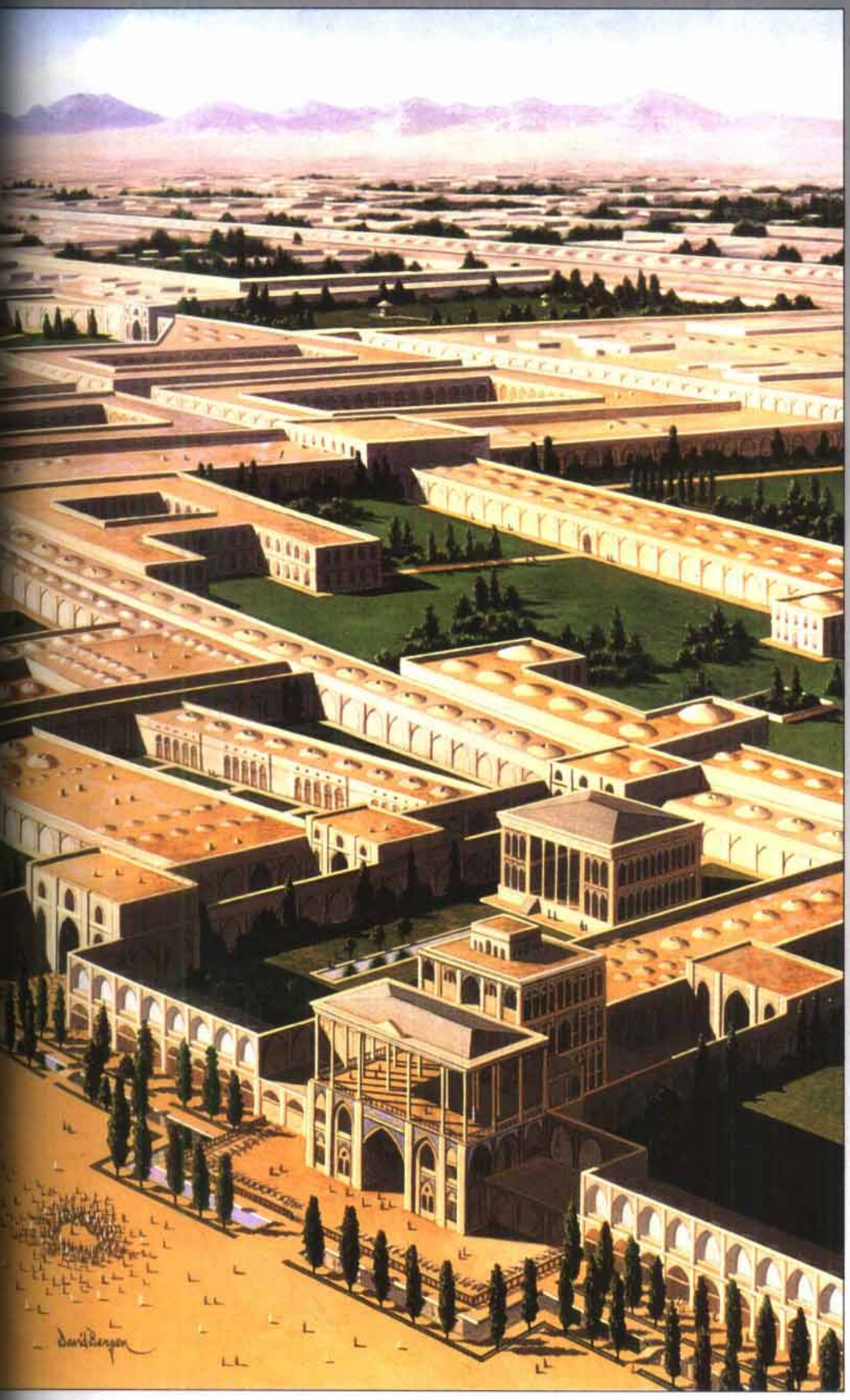
1611年，罗伯特·谢利被派回英国，去看看是否可以说动伊丽莎白的继承者国王詹姆斯一世，同意开通经



作于1626年的这幅画描绘了一个云游托钵僧通过吹响号角表明自己的到来。这些信教之人立誓过贫穷的生活。托钵僧们依靠乞讨食物生存，就像图中之人所示那样，他们将食物装在篮子中。此类人帮助第一个萨非国王伊斯迈尔夺取了权力，16世纪，他们的支持是萨非王朝的一个重要后盾。然而，阿拔斯不信任跟随他的托钵僧，在他统治期间，这些云游僧有时也受到迫害。


阿里卡布宫
“麦登”(广场)
皇家清真寺
卢特法拉赫清真寺

宽广的新首都



背后是朝着札格洛斯山脉向西南延伸的居民区的“麦登”，即广场——如插页中图解所示——是阿拔斯秩序井然的伊斯法罕城的中央地带。它长 512 米，宽 159 米，被商店和作坊低矮的连拱走廊及树木和水渠所环绕。高耸于南部的有巨大圆顶和四个尖塔的皇家清真寺，是公共朝拜的中心。阿里卡布宫殿高耸的阳台——位于主画页右前方——给沙和他的心腹们一个居高临下的视野，下面发生的一切都尽收眼底。皇宫的门被视为神圣的场所，任何努力到达它并亲吻大门的罪犯都可免于被逮捕。宫殿后面是宽阔的皇家花园。

大量的伊斯法罕公共生活在广场中进行。大部分时间里，广场被用作公共市场。除了紧邻宫殿的地方外，整个广场布满了货摊。但这个巨大的公共场所也交替作为游行场所、刑场、用于马球比赛、赛马、射箭锦标赛和角力的运动竞技场。日出和日落时，帝国管弦乐队吹起协奏曲。

一到晚上，50 000 盏灯将广场照得通明，广场变为一个拥挤的娱乐场，其中有小贩、卖水者、妓女、传道士、魔术师、杂技演员和驯兽人。阿拔斯本人瞧不起欧洲君主，按他的话来说，这些人“总呆在室内”。他喜欢在傍晚四处走走，浏览一下陈列的货物并观赏各种演出。

来自丝绸的利益

如果没有来自于丝绸生产和出口及其人工制品，特别是地毯和纺织品的税收，阿拔斯宫廷的豪华就无法支撑。传统上地毯编织一直是家庭手工业，但阿拔斯为地毯生产建立了皇家作坊，用来增加岁入。他早已受益于丝绸生产的垄断。这些地毯所以著名不仅因为设计复杂，而且因为编织得细密。由于使用了细丝线，能够使地毯织得更紧密。一个大略而迅速的判断地毯质量的方法是把拇指压在地毯边缘上，看看一拇指的宽度内，有多少根线。

主要的丝绸产地在南高加索地区和靠近里海的地区。两个地区成了萨非王朝的国王们和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争夺的焦点，尽管有战争，但丝绸生产仍然有发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穿越大陆的地毯贸易也是如此，骆驼商队把地毯运到奥斯曼领地内，然后装船运往欧洲。在那里，这些地毯被称为"土耳其地毯"。但阿拔斯也鼓励英国和荷兰商人直接从波斯湾的班达阿拔斯港购买和出口丝绸。

波斯湾与波斯的直接贸易，这样，丝绸贸易就可以绕开宿敌土耳其。尽管控制着英国与东地中海贸易的利文特公司不愿因与波斯做买卖而破坏了它与土耳其人的贸易，以印度为基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还是表现出了对这一想法的兴趣。后来，东印度公司在波斯湾的贾斯克建起了一个基地，大不列颠最终逐步取代了葡萄牙而成为波斯主要的欧洲贸易伙伴。1622 年，一支英波联合部队袭击并占领了葡萄牙在霍尔木兹的基地。这个岛屿贸易中心后来沦为一片废墟——寻宝者为了找到子虚乌有的所谓埋藏在地下的珍宝，将街道掘得乱七八糟——它作为商业中心的地位被大陆上一个新港口所取代，这个新港口被沙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班达阿拔斯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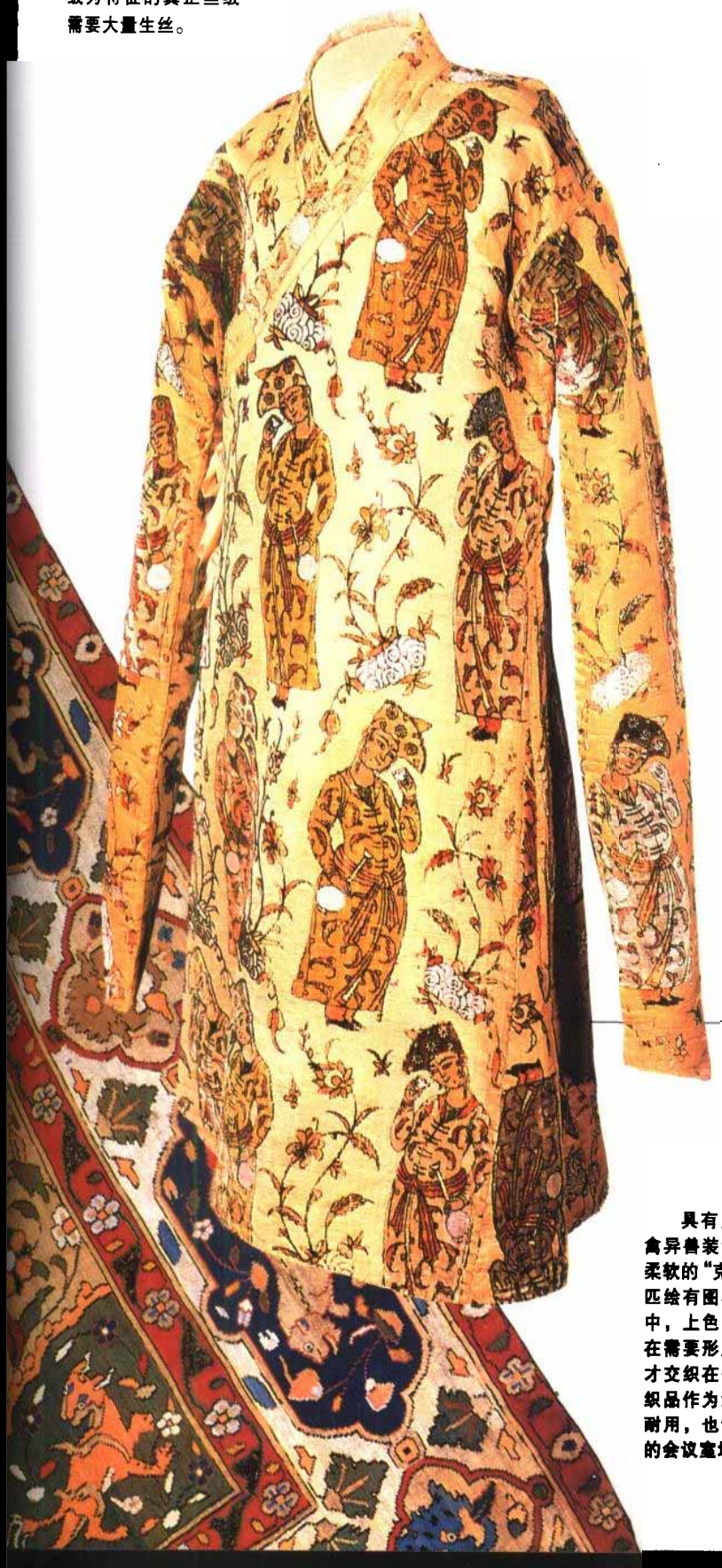
沙的改革试验始于 17 世纪初，那时，为了改写耻辱的《伊斯坦布尔条约》，他重新挑起了对奥斯曼人的战争。时机对阿拔斯有利，因为其间不断增长的内部矛盾削弱了奥斯曼帝国。从 16 世纪 90 年代开始，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土地转入了反叛的部落和被伊斯坦布尔政府诬蔑为匪徒的失业军人之手。当奥斯曼人挣扎着重申他们的统治时，数以万计的难民潮水般涌入波斯去为阿拔斯效



劳。许多反叛者同情什叶派，因为奥斯曼到处都是宗教异端团体，他们赞同萨非国王的信仰。

1603 年秋季，沙宣称要狩猎出征。他的随员人数远超过此目的的需要。他出其不意地突袭了大布里士，从奥斯曼人手中重新夺回了萨非王朝最早的首都。经过长时间的冬季围城，亚美尼亚的战略要塞埃里温被攻克。1605 年，土耳其人试图重新夺回大布里士，但他们在苏费耶战役中遭到惨败。苏费耶的溃败使安纳托利亚的叛乱进一步发展。在被迫撤退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波斯军队甚至挺进到了土耳其东部。1612 年，以 16 世纪中期已确定的划界为基础，两国最后议和。尽管后来双方都试图通过突袭和小规模战斗改变已定条款，事实上，现状已经形成，6 年后，这一点在对 1612 年的条约进行的正式的再次确认时，得到了承认。

这件波斯丝绒外衣上装饰有慵懒的青年人饮酒的图案。1644 年，俄国沙皇将此外衣赠与瑞典女皇。要做成这种以平滑柔软的软绒为特征的真正丝绒需要大量生丝。



具有民族特色的珍禽异兽装饰的这种光滑柔软的“克里姆”——一匹绘有图案的布，在其中，上色的经纬线只有在需要形成图案的地方才交织在一起。这种丝织品作为地毯使用太不耐用，也许一度为波斯的会议室增光。

然而阿拔斯与土耳其人的冲突并未结束，1622 年，巴格达的奥斯曼地方长官反叛苏丹。此事连同发生于安纳托利亚的另一起叛乱事件，促使阿拔斯重燃反奥斯曼的战火。1623 年，他入侵伊拉克，于是年 11 月重新占领巴格达。苏丹随后派遣一支军队围困该城。虽然沙不敢出击奥斯曼军队，但他采取反封锁的行为。在双层封锁下，饥饿的居民被迫以棕榈叶子充饥。这座被困之城看起来必然陷落，但就在此时，阿拔斯的占星师预言此城守卫者一定会成功地坚持到底，阿拔斯一度对此表示怀疑。但预言却被证明是正确的。土耳其人由于长期供给短缺被迫放弃围城。阿拔斯的军队允许土耳其人返回土耳其，却把火炮和伤病员丢下。虽然在他统治的余下岁月中及其以后，战争之火仍在燃烧，但重占巴格达无疑是阿拔斯最后的巨大军事胜利。

与此同时，另一些麻烦使阿拔斯更担心国内情况。在他统治期间，他生育了有五个儿子。起初，他效法先王的做法，把孩子们送到省会居住，在盖札尔巴什首领

的监护下学习有关行政管理的知识。然而，1589 年，马斯哈德的长官，即阿拔斯次子的监护人，试图效法国王拥立者穆什德·古里汗，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

阿拔斯平息了这场叛乱，但从此将他的儿子们关进王宫，在那里他的儿子们被关在后宫由太监监管。阿拔斯总是担心王位的安全——他害怕有人对他行刺，经常从王宫中的一个卧室搬到另一个卧室以迷惑潜在的行刺者——他派人密切监视他的几个儿子。1615 年，一些朝臣指控其长子密谋反对他，于是他授意别人将自己的长子杀死。但后来阿拔斯受到良心的谴责，又迫使那个执行他的命令的人杀死自己的儿子。6 年后，阿拔斯病重，他的次子犯了一个危险的错误，过早地庆祝自己即将到来的继位。当阿拔斯康复时，他让人弄瞎次子的双眼。五六年之后，他以同样手段处置了他最后一个体格健全的儿子伊玛姆·古里·米尔扎，原因依然是怀疑其密谋造反。一个天主教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士传教士记述说，阿拔斯常说哪怕仅仅为了多统治一天，他可以杀死上百个孩子。

伊玛姆·古里·米尔扎双目失明不久，阿拔斯开始梦见自己的死亡。随后他患了热病。他不顾疾病，继续出猎，直到虚弱得不能离开病床。显然这位沙已垂死，此时他的朝臣们将注意力转到寻找一位接班人的任务上。阿拔斯所有儿子不是死去就是因失明而没有资格称王，但他有几个孙子。阿拔斯死于 1629 年 1 月 19 日，9 天后，他的长孙萨菲·米尔扎登基称王。

阿拔斯对儿子们的残忍做法暴露了他性格中更阴暗的一面。在他任内，他有效地使恐怖成为统治的工具之一。他的崇拜者、史书作者伊斯坎达尔门什记载说，没人敢于违背沙的旨意，“例如，假设他命令父亲杀死自己的儿子，这判决要立即执行，如若父亲为亲子之情所动而稍有耽搁，他就命令儿子杀死父亲；如若儿子再拖延，则另一个人将杀死父子二人。通过此种可怕的残酷，他的命令得到了高效充分的执行。没人敢对他那像命运一样不可避免的判决的执行迟疑片刻。”托马斯·赫伯特在他有关波斯人的记述中记载了“各种被吃人的地狱妖魔和嗜血小人使用的酷刑，……他们发出的死亡之声令人撕心裂肺——除了令人作呕、不堪回想外，还能有什么效果呢?”尽管实行恐怖统治，这个君王总是能得到民众和外国访问者的喜爱。其中的外国访问者就有赫伯特。

在其它的方面，阿拔斯却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国王的典范。他很少使用或干脆不用曾使他的曾祖父伊斯迈尔拥有权力的宗教把戏。相反他更喜欢作为一个世俗的君主进行统治，他雇佣了武装部队，他运用金钱的诱惑力和对宏大场面与恐怖的过度使用来使臣民顺从。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但是一个明智的改革者，他许多最好的行动都是他祖父塔赫玛斯普最初创立政策的发展。在其它方面，阿拔斯仿效了他的邻国奥斯曼和莫卧儿苏丹的制度和做



图为阿拔斯二世正接见莫卧儿印度的使节，他在道义和智力水平上不如与其同名的阿拔斯一世。阿拔斯一世死后13年即1642年，这个男孩登上王位，在24年的统治期间，他放任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下降。沉溺于鸦片和酒，他可能死于梅毒，时年33岁。他的继任者们碌碌无为。但正是阿拔斯一世遗产的力量使得萨非王朝一直到18世纪仍保持了大国地位。

法。他同样充分利用了欧洲在波斯不断增长的利益，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技术和经济机遇。

阿拔斯的继任者们，在后宫的狭小天地中养大，缺乏现实世界的经验，往往成为派系倾轧的人质。没有人拥有阿拔斯的天资和浮华，然而他遗留的力量使得萨非王朝仍然是一个大国。在他死后几乎一个世纪中，萨非王朝遵循的仍主要是他所确立的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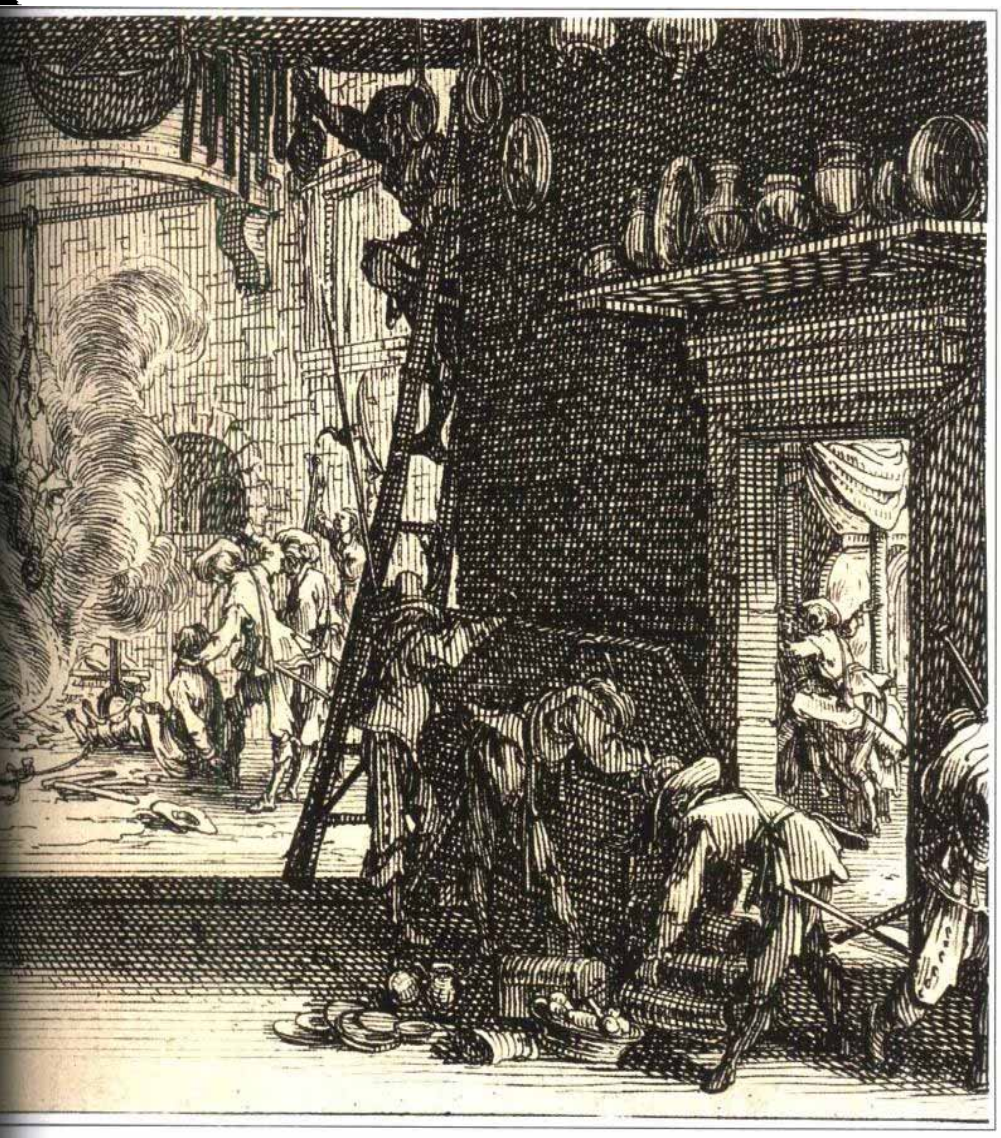
18世纪初，缺乏果断的领导能力终于带来了恶果。最后的萨非君主侯赛因苏丹纵欲酗酒，不关心国事。邻近的俾路支人和阿富汗人利用他对政事的荒疏，入侵并占领了一些边疆省份。这些地区由于侯赛因试图在全国实行严格的什叶派正教而早已与中央离心离德。

最后，一个萨非家族早年的封臣，来自阿富汗的马哈麦德把侯赛因围困在金碧辉煌的伊斯法罕。饥饿的居民被迫同类相食，最后向这个反叛的阀投降，马哈穆德自封为“沙”。侯赛因则在以其母亲的名字命名的清真学校里被杀。什叶派信仰虽得以保留，但伊朗又一次论于异族统治之下。



士兵在抢劫农舍

创深痛巨的三十年战争



“战争，能够孕育出什么?”当诗人约翰·米尔顿在1648年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指的是正在摧毁他的祖国英格兰的那场内战。然而他发现用这句格言去注释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另外一场冲突则更恰当，这场战争正在摧毁欧洲的一些国家，它比人们以前所知道的任何一场战争都历时更久、波及范围更广，也更野蛮。这场冲突史称“三十年战争”。战争虽然历时30年，但对那些田舍变为废墟，孩子被残杀的人来讲，战争的创痛一直存在。这是一场自我毁灭的战争：农业遭到破坏，农民沦为乞丐。他们要想生存，只有加入使他们遭受巨大损失的掠夺者队伍之中。这是一场完完全全的战争，它使这块大陆上的一些富庶省份变得一片荒芜。

这场战争始于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一场内部冲突，它逐渐扩展，席卷了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它的结果无法令人忽视：它在欧洲造成的状态存在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但这场战争被以后的几代人记起，与其说是战争胜负的结果，不如说暴力的泛滥，而人类正是通过这场战争，瞥见了自己制造的地狱。

这场战争目睹了人类破坏手段的可怕发展和巨大的毁灭力量。步枪和加农炮不那么笨重了，但威力更可怕。新的队列将更多的士兵暴露在火力下，投入白刃战，直至战死。前所未有的大量士兵参与战斗，在这30年间，大约有100多万的士兵战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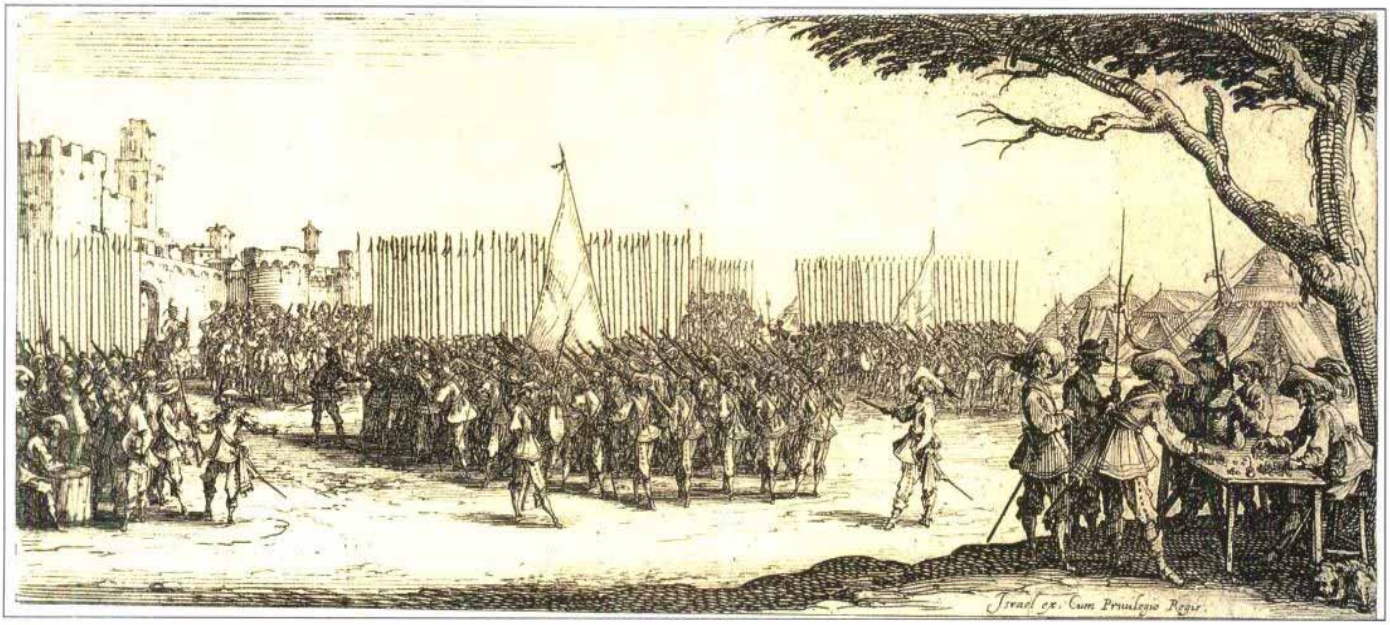
苦难并不仅限于军队，大量士兵战死，使他们为之战斗的乡村土地丧失了劳动力，造成了与400年前蒙古人入侵结果相同的巨大灾难。当时最著名的德国诗人马丁·欧佩茨对此这样描叙：

树木不再站立
花园变得荒凉
镰刀与犁现在变成
冰冷锋利的剑

战争的残忍激发了法国艺术家雅克·凯洛特创作了一系列著名的雕版画——战争的苦难，本文的图版即复制了其中的一部分。

尽管三十年战争有许多国家参战，但主要战场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由大约一千个半独立的诸侯国组成的较松散的联合体，名义上受维也纳斐迪南二世皇帝统治。斐迪南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控制着近半个欧洲，包括西班牙、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和尼德兰。斐迪南的领地包括现在的德国、捷克、奥地利、匈牙利的一部分、波兰及南斯拉夫，从北方的波罗的海延伸到南部的亚的里亚海，从西部的莱茵河到东部的喀尔巴阡山脉。

引发这场灾难的主要力量是宗教。基督教是西欧团结的根源，但是经16世纪的新教改革，基督教却成了国与国之间、一国之内冲突的起因。神圣罗马帝国的一



阅兵式

部分，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一些国家，英格兰，苏格兰，瑞士的大部分，都转而信仰新教。新教主要分为路德教和加尔文教。意大利、西班牙和大部分法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余部分，包括国王本身仍信奉天主教，仍然效忠教皇。这种新格局打破了国家间外交上的联结，传统的联盟如西班牙和英格兰现在发现彼此置身于宗教纷争之中。而且，宗教的冲突并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所有主要的国家都发现他们正面对一个敌人——在国家内部，存在一个少数教派，他们首先是对自己的信仰忠诚。

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宗教矛盾已经将诸侯间很脆弱的平衡打破，维也纳的统治地位也因之动摇。1618 年，当斐迪南试图通过从波西米亚的公职岗位上排挤走新教徒、同时关闭两座新教教堂来巩固他的皇权时，平衡不但被打破，而且被摧毁了。一场反王权的起义在波西米亚的首都——布拉格爆发。这不但在德国引起一系列的反应，而且许多邻近国家也被卷入了冲突。

最初，各个国家主要根据宗教来决定加入哪个阵营，信仰新教的英格兰、瑞典、丹麦和荷兰共和国站在波西米亚一方。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波兰和教皇则属斐迪南这一阵营。但各个参战者的动机并不相同——特别是德国——在教会与一般社区之间，激进与保守之间，在主动出击和自我保护势力之间，想法千差万别。德国各诸侯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相邻的各个民族国家的主要现实问题，是愿意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的多国统治权。

这场战争分为两个阶段。最初几年，本土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而这其中最核心的又是宗教问题。但从 1635 年以后，就只剩下纯粹的政治问题了。参战者主要的目的是改变欧洲权力的平衡。这场战争创造了自身的面貌。由于全部欧洲被分为两个阵营，所以外交方面初步的交涉都是很困难的，没有中立方担任调停者，战争是解决冲突的唯一方式。由于无有结果，战争进程缓慢疲沓，没完没了。

由于各个国家无法征收到足够的税收来支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各国统治者不得不求助于野蛮但最终无效的手段：使用雇佣军。在中世纪末期时，欧洲的各个封建贵族为其君主征战的传统义务减弱，战争的目的演变为单纯为了财政收益。因此，雇用军的使用变得稳定，到 17 世纪，他们已变得必不可少了。

对这些临时军队的雇佣工作落到私人商业者手中，例如野心勃勃的无耻的伯



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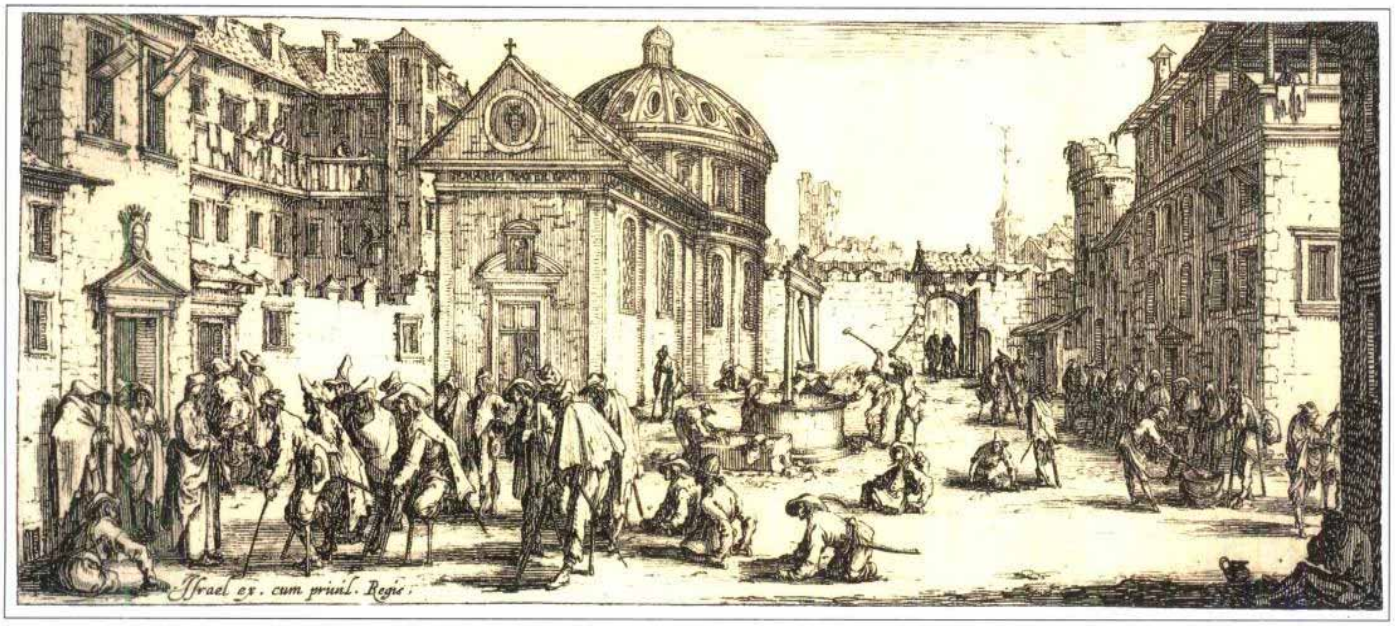
爵恩斯特·翁·曼斯菲尔德。作为一个天主教小诸侯的私生子，他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军队里开创他的事业。因为他出生的耻辱阻碍了他的发展，所以这场战争一开始时，他就转而效忠哈布斯堡家族的敌人——新教势力。在这场冲突的头八年，他率领的军队代表着萨伏依、法国、英国、尼德兰和德国的一些州，当时的一幅版画显示：曼斯菲尔德正准备洗蒸气浴，而德国被描绘成流汗的钱币。

由曼斯菲尔德之类的人率领的士兵中，有些人对他们的事业怀有政治或宗教的虔诚，但大多数人不比他们的领导者更具理想，多数士兵都是强征入伍的，另外一些人则是为了逃避贫穷和绞刑。然而，对于那些极少数认为参加军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的人来讲，他们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他们穿着长满虱子的军服，一直生活在疾病与战争带来的死亡的威胁下，在这样环境中，叛变和逃跑会受到残酷的惩罚。

在雇佣军的体制中，由军团的指挥官分配全部的薪俸，士兵通常效忠他们的指挥官，而不是他们所为之拼命的事业。如果一个指挥官倒戈，他手下的士兵也将追随他。但是他们的忠诚只获得可怜的回报，指挥官以及他手下的军官常常扣留一部分本已少得可怜的雇主付给的酬金。甚至经常有全部酬金被停发的情况。“他们（士兵）和他们的马不能只靠空气生存吧！”曼斯菲尔德发现佣金被他的雇主萨伏依的一个公爵全部扣留时，这样抱怨道。

如果在战役进行当中，军饷消耗尽了，统治者就会命令指挥官去从当地的百姓中筹集费用，或以征税的形式，或免费食宿。这样的征收由于雇佣军中还随行有仆人、妻子儿女、掠夺者、妓女以及伴随各个部队的商人而更加沉重。每个士兵贪婪的本性令农民更加不堪。士兵生涯能够提供的吸引力之一是可以获得战利品，每一个士兵都变成一个小的获取财产的行当，这种行当是以掠夺当地百姓为代价的。

当时的一部小说《辛姆普利西斯的辛姆普利西斯缪》，由德国作家汉斯·梵·格瑞麦尔绍森创作，书中描绘了一个王室军队的步兵，一个没有英雄气概的人物，如何把从当地农民家里的偷窃行为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我不巡逻”，辛姆普利西斯缪说，“我就出去抢劫，我突然袭击大约几里远的马厩，无论马或羊看到我，都会感到危险。为了避免被跟踪，我知道如何把靴子和鞋挂到牛或马身上，直到我把他们带到一条人迹杂乱的路上。”至于猪，“我拌好盐肉掺水的麦片粥，然后用一块拴有一根结实绳子的海绵吸饱粥，再让猪吞下这块海绵，手中抓住绳子，于是，它



伤残士兵在一所医院里避难。

乖乖跟着我走，最后我用它的腿和肠支付了帐单。”

当辛姆普利西斯缪父亲的农庄被抢劫后，他被迫参加军队。那些侵入者残杀了当地的一些居民，用拇指夹刑折磨另外一些人，或一把火烧光整个村子。这样的事情远非格瑞麦尔绍森的想象。这些兵匪及其同伙一项证明确凿的暴行是强迫农民喝液体的粪便。这既是出于肆意的残忍，也是为了让农民吐露出值钱物品藏在什么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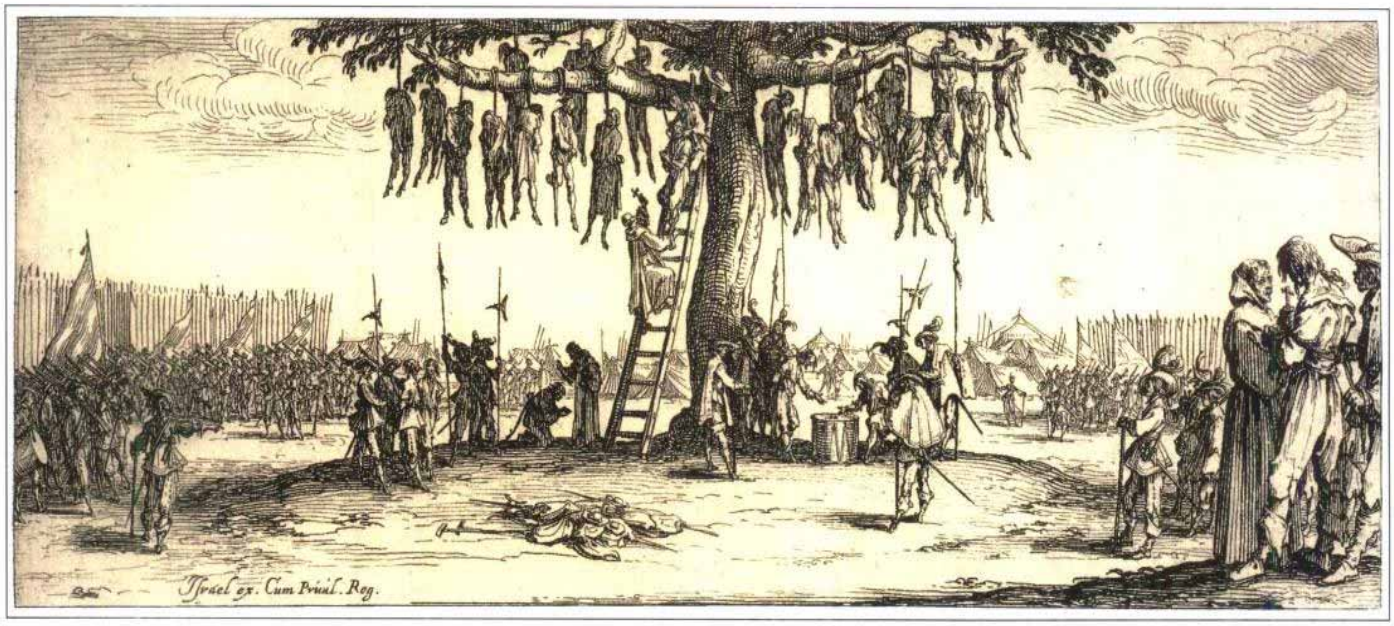
德国的一些地区，尤其是沿河交通要道，经常遭到士兵的毁坏。汉斯·赫伯勒，一个鞋匠保存了战争中的日记，描绘了他和家人怎样被那些抢劫的军队从村子里驱逐出来，躲到乌尔姆附近的村子中。类似的情况发生过 30 多次。尽管活着逃了出来，但赫伯勒一家人常常身无分文，居住的村子也被搜刮一空，一个叫威廉·考恩的英国人，在 1636 年作为一个外交团的成员曾游历德国。他以见证人的身份，叙述了德国人正经历的痛苦。他写道：“在纽斯泰特的爱斯克河边，坐在自家门边的可怜的孩子几乎饿死了。”他又描写了在莱茵河附近柏查瑞池村里，“我们发现了那些已经死去了的可怜的人。他们嘴里塞满了青草。”看来最终人们的绝望战胜了想逃脱饥饿的愿望。

毫不奇怪，村民们经常向他们的压迫者复仇。“流浪的农民残忍地对付我们的士兵，”一个斯考茨军官指出，“砍掉他们的鼻子和耳朵、手和脚，挖出他们的眼睛，或使用其他更残忍的手段。士兵们在行军时烧毁农民村庄，也是如此残暴地行事，把发现的农民就地处死。”

农民和士兵就这样被卷入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中，当国内的、国际的敌对的每一种形式都精疲力竭时，当大规模的破坏已经使人们的情感变得枯竭、和平成为唯一的愿望时，这种流血才能结束。

1643 年，战争正在进行时，德国的人口减少了 20%。在一些直接受战争影响的地区，由于疾病、战争和向城市的迁移（在一些城市里，城墙和保护费阻止了军队的入侵）等因素，数字还要更高些，高达四分之三的人口消失了。在战争多发的符腾堡的南方公爵领地，居民的人数从 1620 年的 45 万降到 1639 年的 10 万。

人口减少并不只限于德国，在瑞典，男人一旦入伍，就被剥夺了土地。一个人一旦渡海对德作战，就不可能活着回来。许多人在入伍头一年就战死了。“我们确实可以说我们从别国夺取了土地，但结果却毁坏了我们自己的土地。”瑞典政府的



绞架树

一位悲观人士这样感叹。

17 世纪 40 年代，公众的情绪都趋向和平。然而，和平的实现，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国际间的会谈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举行，并持续了四年。法国和它的天主教同盟国在闵斯特与皇帝谈判，而瑞典及其新教代表在 50 公里外的奥斯纳布鲁克同皇帝面谈。代表们履行了职责，1648 年 12 月 24 日，双方签订了令人振奋的条约，即人们盼望已久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

为了保证长期和平，谈判者决定使各方都同意这条和约，而不是几个国家。就像颇有见地的瑞典大使约翰·沙尔维斯伯爵指出的那样："全部政治的第一条原则就是：整体的安全依靠个体间的制衡。"全部的独立国家的确从和平条约中得到了新平衡的足够保证。

瑞典获得经济补偿的同时，还得到德国北部的一块战略要地，而法国也在东部边界获得大面积土地，这样解除了被哈布斯堡家族包围的危险，皇帝（现在是斐迪南三世）仍保留皇位，并统治德国的大部分领土，但德国本土的诸侯被承认在其领地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德国各诸侯的妥协让步不仅减小其它国家对哈布斯堡家族强权的防范，而且也缓解了德国内部的紧张，此时人们一般都认为，稳定的欧洲局势依赖于稳定的德国。

这个协约包括一些特殊的宗教条款，但它们已无足轻重。从 1555 年起，各诸侯国的君主有权决定自己国家信仰天主教还是信仰路德教。现在，加尔文教成为另一选择。这个条约还规定，德国内部的宗教争端应该在国家会议或议会天主教与新教的议员中通过"友善"协议给予解决，这个条约也是一个尺度，表明宗教的优先权已下降到何种程度，即宗教再也不会成为欧洲战争的导火线了。

现在，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的威胁已经减弱，该轮到其它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被激起扩张领土的野心了。此后不到二个世纪，普鲁士的威廉一世把德国的诸侯国统一成为一个强大国家，对欧洲大陆的稳定形成了威胁。

在 17 世纪余下的最好的一段时间里，饱经战乱的德国人大部分活了下来，在和平环境中重建生活的家园。他们重建的速度惊人，到 17 世纪末，某些地区已经恢复了战前的住房和人口水平，但战争的记忆不能轻易抹去，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三十年战争仍将作为一场灾难的话题铭刻在欧洲人的心中。



英国内战

4

1642 年 2 月 23 日，“狮”号军舰由英国驶向荷兰。军舰上最尊贵的乘客是亨里埃塔·玛丽亚——英王查理一世的妻子。她出生在法国，这一年 33 岁。从表面上看，王后是带着 10 岁的公主玛丽去见奥兰治王子威廉，大约 10 个多月之前玛丽嫁给了年方 15 的威廉。而事实上，王后陛下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她的行李里装有英王御宝以及她的大部分私人珠宝，她要去欧洲大陆典当这些珠宝以筹钱购买武器——英国国王正准备与他的国民进行一场战争。

即将爆发的冲突，是改变英国均势状况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最早、也是最关键的一幕。当欧洲大陆大多国家越来越臣服于专制君主的意志时，英国人却强有力地抵制国王“承上帝之意独揽大权”之说。就在 17 世纪，斯图亚特王朝有两位国王被赶下台，其中一位被处以死刑，另一位流亡于国外。此后英国便坚定地踏上立宪君主的道路，迈向了下一世纪。同时在世界其他国家限制专制王权的斗争中，英国提供了一个检验与谐调的成功范例。

1603 年都铎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伊丽莎白一世去世，死时无子嗣。根据继承法，王位应传给她的侄子詹姆斯·斯图亚特——统治苏格兰已长达 20 余年的国王詹姆斯六世，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代开始。身高肩宽的詹姆斯虽然双腿略细，舌头很大，但仍享有知识分子之誉。在抵达英国之前，他出版了一篇虽没有创意但学术性较强的政论文《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则》，其中阐述了君权神授论。詹姆斯自大而且懒惰，更糟糕的是，他是一个两性人，他对一些品质极恶劣的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例如他曾称他最后恩宠的乔治·维利亚斯为“甜心”、“夫人”。在他的性格中好与坏相混杂，以至于法国专制国王亨利四世形容詹姆斯为“基督教世界最聪明的傻瓜”。

然而，詹姆斯必须首先让 1603 年的英国人接纳他。他捐助前任国王的新教教会，并努力为自己赢得统治者的声誉。尽管苏格兰依旧保持独立国的地位并有自己的宪法，但从此一个国王同时统治爱丁堡和伦敦，似乎预示了两国之间的和平，在此之前双方则经常处于敌对状态。尽管他有喜欢满

英王查理一世身着盔甲，自豪地向前凝望着。这幅肖像画是国王的宫廷画家——弗雷米什（Flemish）派大师安东尼·范·迪克所作。画面中查理一世的帝王姿态比现实生活中更形象、更生动（现实中的他又矮又瘦而且说话时略带口吃）。但这幅画像却真实地反映出他高高在上的王权观念：他坚信他的权力是由上帝所赋予，因此除了上帝，他不对任何人负责。正是这种观点使他与议会中的人民代表发生冲突，并最终走向内战。

洒英俊的年青男子的爱好，詹姆斯还是娶了丹麦国王的女儿为妻。这位丹麦公主为她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使王位的继承问题有了着落。1603年4月，当他来到英国时，他未来的臣民成群结队地走上街道，对他表示欢迎。

英国王位的继承使詹姆斯同时成为爱尔兰国王。爱尔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在伊丽莎白的父亲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成为英国专制统治下的一个王国。詹姆斯继承英国王位之后所得财产及特权并非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多，而且王室要“靠自己生活”，这意味着大部分的日常开销要依靠王室土地收入及强加的罚金。按英国惯例，每逢新王即位之时，国会要授权国王终身征收吨税与镑税，詹姆斯也享受了这种待遇。这些资金来源在一段时间里曾能满足王室的开支，但其价值后来就有所减低，难以满足王室的需求了。加之前任英王伊丽莎白在除衣饰之外各方面都极为节俭，但她仍不得不依靠大量出卖王室土地的方式来支付西班牙战争的费用。这种作法势必减少继承人詹姆斯所得。

即便詹姆斯开支一如伊丽莎白一般仔细，他仍难以做到收支相抵。事



1642年内战之初，忠于查理一世的王党武装控制了英国北部、中西部以及威尔士、康瓦尔。议会一方所控制的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及东部地区（黄色阴影所示）。由于伦敦处于议会控制之中，大学城牛津成为王党的大本营。从1642年的埃吉山战役到1645年的纳西比战役，冲突中的主要战役大多在敌对双方势力范围有争端的边界地区进行。

实上，他依旧毫无顾忌地挥霍。他大量建造新殿堂，慷慨地向侍臣赠送礼物，常常举行盛大的舞会，并为当时杰出的剧作家本·约翰逊和建筑师伊尼格·琼斯的作品大量投资。他的王后——丹麦公主安妮也同样挥金如土。她在珠宝首饰和服饰方面花钱多得惊人，有一次她竟装扮得如同一只巧果馅饼去参加圣诞舞会。

为了偿还债务，詹姆斯动用王室特权，他出卖爵位，强征新的进口税，把专卖权赐给他的侍臣，这一切使百姓吃尽苦头。詹姆斯无视其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处于和平时代的事实，大量甩卖王室土地。

此外，詹姆斯能够聚敛额外钱财的唯一途径，是取得议会的同意以征收附加税。此举播下未来冲突的种子。与其它主要西欧国家的议会相似，英国的议会也是由中世纪国王从臣民中召集的咨询会议演变而来。最初，咨询会议的成员只包括大贵族和教会中的高级僧侣，后来有少数地主和城市的代表也成为该会议的成员。从 14 世纪以来，英王授予这个机构有批准增加税收的权力。

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议会分成两院：代表主教和世袭贵族利益的上议院和代表城市和各郡利益的下议院。在议会里，议员们取得了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力。后来，国王不再亲自加入议会的争论，而由下议院选举一位议长来领导议会的讨论，并作国王的代言人。

尽管最初上议院成为议会的主体，但在 16 世纪，由于下院靠忠诚支持王权而加强了自身的影响，下院逐渐丧失了在议会中的主体地位。都铎王朝时代，下院取得了一些职权和特权，尽管这十分有限却货真价实。它有权对君主提出请愿和抗议，从而成为诉说冤情的重要政治舞台。下院负责讨论由国王提出的办法，下院的同意成为某项新法令制定与通过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无论是下院还是上院都无权就政策问题下命令或参加国王的政府，当然，批准增税之外。

然而，詹姆斯一世所继承下来的议会并非如都铎王朝时代早期召集的议会那般驯服温顺。构成下院主体的是农村乡绅。在前一个世纪使英国富裕起来的以羊毛织品为基础的经济扩张中，这些乡绅们捞到不少好处。同时经济的繁荣也使地价上升，佃农们因之向地主所交纳的地租也有所增加。新财富的受益者并不是政治上的得利者，但他们坚决果敢而富于野心，他们渴望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些绅士中很多人持与国王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自从亨利八世于 16 世纪 30 年代与罗马天主教廷决裂并在英国建立了独立的英国国教会以来，英国就陷入神学冲突的混乱中。亨利的教会拥护英王而非罗马教皇，但在其余方面，新的英国国教与原来的天主教会差别很小。然而由英国宗教改革所引起的动荡，以及由此产生的反对天主教会的各色言辞，必然鼓舞这时

马丁·路德在大陆上宣扬的新教教义。16 世纪 50 年代，女王玛丽·都铎曾试图恢复天主教地位，但也未能挽回天主教在英国的颓局。

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国教会最终成为各种教义冲突的折衷产物。国教持有新教的教义，但其礼拜式依旧使人联想起天主教，而且新教仍然沿袭主教为首的教士等级划分制度。英国严格规定国民信仰国教，剥夺了罗马天主教信仰，所有天主教教士都遭到了可怕的处罚：被送上绞刑架。事实上，在英国仍然残存着一些天主教教徒，其中还有一些是在英国很有影响的家族，但现在他们只能秘密地坚持他们的信仰。

天主教的死敌是被称为“清教徒”的一些诚笃的新教人物。这些思想虔诚而严肃的人想要“净化”英国国教会，清除所有残存的天主教痕迹。他们许多人的思想来源于法国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加尔文坚持苦行、通过宗教信仰来拯救灵魂的学说已在苏格兰教会占统治地位。17 世纪逐渐壮大的激进的清教派别，属反对或不信仰国教的派别之一，所有这些派别共同反对基督教虚伪的表现或任何种卖弄行为。由于清教徒坚信对上帝的崇拜行为最重要莫过于聆听或诵读上帝的语言——纯洁、毫无装饰的教导，他们越来越喜欢在空旷的房间进行宗教集会，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不受任何干扰而集中精力地诵读和解释《圣经》。这些清教徒在英国下院占有很大一部分席位。

苏格兰在对教会的改革方面走得比英国远许多。其教会实行长老制，由清教神职人员和年老的长老来管理教会，不再由主教管理。有鉴于此，英国的清教徒也希望詹姆斯按照长老会派的主张改革国教教会。但鉴于以往痛苦的经历(他曾被苏格兰清教会干预国务的行为激怒)，詹姆斯一世不愿再在他新的王国内滋长类似行为，于是他毫不含糊地拒绝了清教徒的要求。尽管他很不情愿地同意向罗马天主教廷征收罚金，但他的姿态非但没有平息清教徒的怨气，反而使他在天主教会中多了一些敌人，以至于天主教会一些人采取了极端行动：雇用一个狂热的炸药专家盖·佛克伊斯，在 1605 年的“炸药图谋”中，这个人差点结果了国王和议会。

失望的清教徒议员当然不会在他们的败家子国王要求多拨些款项之时予以同情，下院提出了交换条件：颁布法令禁止强征更多关税，废止一些封建特权，如监护权——国王对未成年封建采邑承租继承人的人身和财产的监护权；征购权，王室要求得到物质供应的权利。1610 年下院与国王关于这些问题的谈判破裂，1614 年又未谈拢。从那时候起，议会与国王之间的对抗态势形成了，并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逐步升级，最终导致内战的爆发。

1621 年，国王召集的另一届议会的议员甚至试图干涉国王的对外政策。为弥合与基督教世界的裂痕，詹姆斯一世打算让他的儿子查理娶西班牙信仰天主教的国王之女为妻。为阻止此事的发生，议会拒绝拨给詹姆斯一世他所

需要的款项，除非他保证向西班牙宣战并让他的儿子娶一名新教徒为妻。

盛怒之下，詹姆斯一世解散了议会，以结束这种犯上行为。然而当他作媒的计划告吹后，他又不得不再次求助于议会。这一次尽管议员们就钱怎么花的问题作了一些特殊的规定，他们还是给国王拨了足够的款项，来支持国王为新教事业而参加三十年战争。但那时，国王詹姆斯在人世间只有一年的光阴了。

次年，24 岁的查理王子继承王位，即查理一世。在其统治之下，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关系更糟。查理一世继承了他父亲的懒惰性情与君权神授思想，但在其他方面他与其父迥然相异。他身材矮小，禀性虚伪而刁滑，又有些优柔寡断。为掩盖他深深的不安全感，他表现出一种认真的姿态，并常常显得古板。正像大多数缺乏安全感的人一样，他常常言而无信。

除了继承其父亲的王国、债务以反对西班牙的战争外，查理还不得不继承他父亲最后也是最宠爱的并使他声名狼藉的宠臣——乔治·维利亚斯，这时乔治已是白金汉公爵。这个令人厌恶的傲慢的公爵，现在竟然有权力制定英国的对外政策。在上一次与西班牙公主联姻的尝试失败之后，这位爱交际的公爵依然热情不减，这次又安排查理一世与法国国王之妹、热情的天主教徒亨里埃塔·玛丽亚结下姻缘。婚姻由代理人执行。芳龄 16 的新王后长着一双大眼睛，但上牙很突出。她带着包括一些天主教牧师在内的随从来到英国。当她第一眼见到自己的丈夫时，禁不住失声痛哭，感到彻底的失望，找一个如意郎君的美梦倾刻间破灭，因而她痛恨白金汉公爵。她瞧不起她丈夫的缺点，正如她丈夫厌恶她的轻浮一样。他们婚姻的前 3 年(直到白金汉公爵去世)，两人一直都处于深深的敌对状态，以至于有人说这三年他们根本就没有同房。

从这幅那个时代的版画中可以看出，阴谋家们正在谋划后来失败了的 1605 年政变——“炸药图谋”。英国颁布的排斥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法令使罗马天主教会愤怒至极，于是决定在 1605 年 11 月 5 日国王与议员参加议会庆祝仪式时炸毁议会。教会得到一位士兵、炸药专家盖·佛克伊斯的帮助。他们租了议会地下室，佛克伊斯在此放置了装有近两吨炸药的桶，并用木柴和铁条覆盖于其上。但阴谋家中有一人警告他的姐夫不要参加当天的仪式，这引起了怀疑。地下室被搜查，佛克伊斯被捕。就刑之前，在严刑逼迫下，佛克伊斯交代了他的同谋者名称。“炸药图谋”就此告终。



奥立佛·克伦威尔的像画。塞缪尔·古伯所作。克伦威尔是英国最伟大的军人和政治家之一。在1642年之前，克伦威尔一直是议会里一位具有清教信仰的乡绅，他曾不止一次考虑移民美国。然而内战爆发后，他成为议会军中最优秀的骑兵指挥官。他指挥的军队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有"铁军"之称，这支军队在赢得内战的胜利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按照婚约规定，查理一世答应放松对罗马天主教会严酷的刑罚规定，并借给法国国王一些船，这些船后来用于镇压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派教徒。议会对国王的意图心存疑虑，未给国王拨发他所需的足够款项。事实上，国王原本打算按照白金汉公爵的设想用一笔钱远征卡迪兹，继续对西班牙的战争。最后这次征讨以失败告终。对查理一世来说更糟糕的是：议会拒绝同意国王征收例行的吨税和镑税。他走投无路，只有自己寻找办法筹钱。他所采取的手段之卑鄙较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

查理一世不经议会同意即征收吨税和镑税，此举惹恼了商人。他向地产持有人强行借款，对那些拒绝借贷者予以监禁，这又使有大量土地的绅士们怒不可遏。由于与其内兄法国国王发生矛盾，查理一世派远征军援助法国的胡格诺教叛乱。他把军队驻扎在英国东南沿海居民的家里，加之向军队和百姓强加战时法，又引起当地人民的怨恨。

1628年，查理一世再次召集国会。此时议会中已几乎找不到一个其家庭未受国王滥用特权之苦的议员。尽管查理一世的对外政策有反对天主教的倾向，上院和下院都拒绝再给他任何钱，直到他十分不情愿地同意了《权力请愿书》。这份文件规定：强迫借贷、军队驻进民居、实行军事法、无故捕人等为非法行为。

几个月之后，令人深恶痛绝的白金汉公爵遭到暗杀。凶手是一位清教徒海军军官，曾参加过公爵最后失败了的对外远征军，由于心存不满，便对公爵行刺。然而，白金汉公爵之死并没有缓和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斗争。经过长达6个月之久的休会之后，再次召开的议会依旧怨恨满怀。因为，首先，国王依旧不经议会同意而征收吨税和镑税。其次，由于国王委派主教职位，尤其是任命威廉·劳德为伦敦新大主教以改善英国国教与罗马教会的关系，议会对英国国教的前途深感担忧。对于一些热衷于改革的议员来说，英国国教和罗马教会之间的差别几近于零。

对抗很快发生了。1629年3月2日，来自于康瓦尔的约翰·艾略特爵士提出了强烈非难王权的一项动议。国王就此下令解散议会，议员们挡在门口不许任何人通过。他们把议长按在椅子上以保持议会议程合法。这一次议会通过决议，声明以国家公敌罪处死所有收缴或交纳吨税与镑税者，以及坚持教皇制度者。

次日，议会最终被解散，艾略特和其他参与辩论的议会领袖都被逮捕并关押在伦敦塔监狱里，后来艾略特死于这里。此后的11年为无议会的国王个

人统治时期。劳德大主教不断扩张权力，他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他的统治下，教堂里恢复了祭坛。詹姆斯时代推行的用来安慰清教徒的严厉法规如禁止在礼拜日举行跳舞、射箭及其它娱乐活动等，都被劳德主教废除。许多失望已极的清教徒移民去了美洲。

查理一世尽量避免战争，而且过着俭朴的生活，他希望以此将开支压缩到最低的程度。但他也像其父詹姆斯一世一样，依靠出卖专利权、征收新的捐税来搜刮钱财，并重新启用罚金制度。可是这11年行将结束之时，他所需要的金钱数目却骤然增加。

根据劳德大主教的建议，查理一世强迫苏格兰人接受新的英国国教会祈祷书，这引起苏格兰人大规模反抗。1640年春，查理召开了所谓的“短期议会”，要求议会同意拨款以组成一支军队。正如人们所料，上下两院表示除非查理为议员们申冤昭雪，否则一个便士也不付。5月5日，在一段严肃而吃力的谈判后，查理一世再次解散议会，并开始大量召集国民自卫队——为保卫国土而要求英国所有农村都组织的自愿兵团。这些军队装备很差、战备松懈，每年所受的训练很少超过几个时。

这些死气沉沉的士兵中很多人是被强拉入伍的。这样的军队当然无法与士气担旺盛、装备精良的苏格兰军队相比，更何况苏格兰军队还有曾在大陆军中服过役的专职军官担任指挥。英国人在战争中丢尽脸面。在不得不同苏格兰人签订的停战协定中，查理一世允许苏格兰占领英国北部，在真正的和平到来之前支付其驻军费用。

是年秋，查理再次召集议会。这届议会持续20多年之久，史称“长期议会”。长期议会颁布法令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无权解散议会。

威信扫地的国王不得不承认议会的条件。苏格兰人在等待，伦敦市民也不断因抗议国王的主教们所进行的天主教式的改革而发生骚乱。查理一世温顺地服从议会对他的特权，特别是收税权力的削减。在对苏格兰的赔款已偿还完毕之时，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大主教被捕并囚禁于伦敦塔监狱，而在他的宠臣斯特拉福伯爵被议会宣布犯有叛国罪时，他心痛而无奈地在其死刑判决书上签字。

尽管如此，大部分两院议员仍倾向改革而不是革命。但是一个由议员约翰·皮姆领导的清教徒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不仅反对主教和新祈祷书，更尖锐地批判了国王对行政权的专断。一待对苏格兰战争的燃眉之急得到解决，他们便开始呼吁限制王室特权。当激烈的争辩达到白热化时，命运直接转到了他们的手中：又一次叛乱的消息传到伦敦。

这次叛乱发生在爱尔兰。尽管名义上爱尔兰效忠于英国国王，以英国国王作为爱尔兰的君主，但爱尔兰绝大多数最贫穷的人民都痛恨他们头上的外国统治者。为便于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英王詹姆斯一世曾剥夺了北爱尔兰

爱尔斯特省大量持天主教信仰的地主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拨给苏格兰新教徒移民使用。这次被称为“爱尔斯特移民地”的事件留下的痛恨情绪日益增长，终于造成暴动。暴动中有四五千新教移民被屠杀，很多人逃到山上忍受着饥饿的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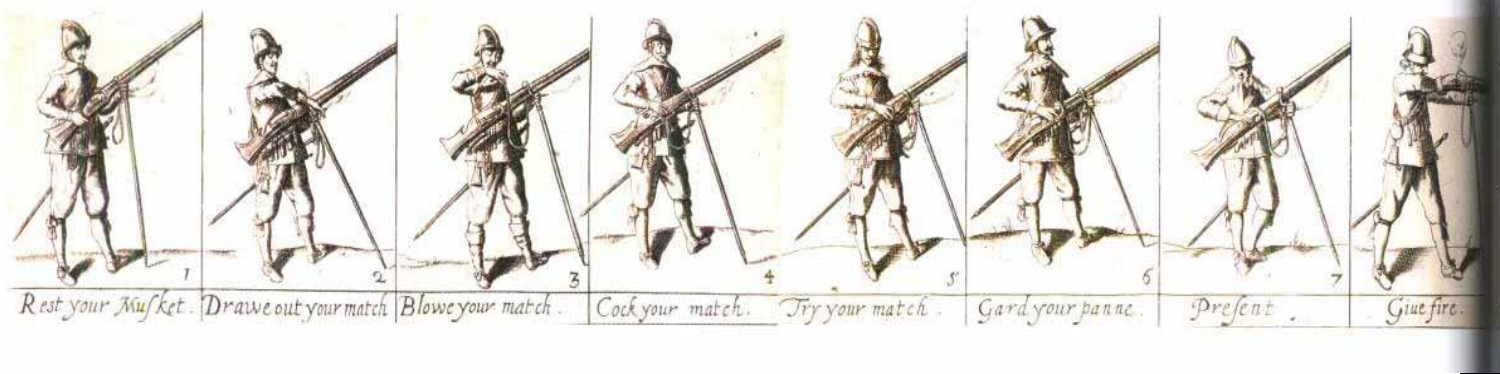
议会再也找不到好的理由拒绝为军队拨款。然而一旦国王掌握了一支有效的军队，他很可能不再照原计划用它来镇压爱尔兰人的反抗，而是用来打败他在下议院中的对手。关于王室图谋的传言使很多议员警醒，激进的议员约翰·皮姆建议两院议员向国王要求取得任命军队高级军官的权利，以此来保护他们自己。国王坚决拒绝向议会出让任何君权，皮姆和他的支持者便提出了《大抗议书》。

这份《大抗议书》列举了长长一串在国王的统治下英国国教会和国家所干的坏事，然后对议会成就作了总结，并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议，其中一项是建立一个教会法院以监督英国宗教改革，另一项是将来国王对所有内阁大臣的任命须经议会同意。

下院议员对《大抗议书》态度不一，因而产生了政治分化。很多议员无法接受关于激进的宗教改革的提议。经过两周的激烈争辩，《大抗议书》终于以 159 票对 148 票的微弱多数通过，有三分之一议员弃权。

如果国王稍作等待，当时不在场的议员也许会团结起来支持他，这样《大抗议书》也许就无法通过。然而相反，他的表现却过于激烈。在王后轻蔑的嘲讽下，查理一世不胜其怒，他命令他的总代理人控告议会两院中他的主要对手。1642 年 1 月 4 日，查理一世亲自率领一个武装队伍来到下议院。他要逮捕五名下院议员。国君亲自光临议院在英国历史上还属首例。他端坐在议长的位置上环顾被震惊的国会，却发现他要逮捕的人已经离开了——王后的一位宫女已经警告他们提防国王的突袭。

国王明目张胆地破坏议会的权利，使伦敦人民义愤填膺。由 6 000 人组成的强健的被称为“训练团”的民兵队伍已经动员起来保护议会。这支队伍与英国其他志愿军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支队伍中士兵的军事生涯严格认真，在富有经验的专职军官的指挥之下接受了正规的训练。此外，皇家海军中的



17 世纪一本军事指南中的一组图画介绍了滑膛枪的正确使用方法。这本指南帮助军官们熟悉新式武器的操作和新的战术。而且不久即在三十年战争中传入欧洲大陆。战略上的革新首先是通过使用火药武器以取得最大的胜利。这种火药武器日益广泛地被使用，但总的来说缺乏正确的策略。图上的滑膛枪很重，而且不安全。它需用醋浸泡过的绳子做成的引火线来点燃，而不是用火石产生的火花来点燃。引火线要保证一直在燃烧。

一部分人长期以来对薪饷和境况不满，也从港口赶来投入斗争的洪流中。由于担心自身的安全，1 月 10 日，国王查理一世仓皇逃出伦敦。从此他再也未能以自由人的身份回到伦敦。

谈判继续进行了一阵。但国王不愿接受议会所提出的条款，议会也无法相信国王的言辞。1642 年的一个夏日，空气潮湿，风势很猛。这一天查理一世在诺丁山升起王党的旗帜，并宣布讨伐议会叛乱分子。由于国王经常修改宣战书，就连他的使者也搞不清宣战书上到底讲些什么。夜晚，风刮得更加猛烈。王党的旗帜被刮倒在地。英国内战就在对王党事业的不祥征兆中爆发了。

在内战中，英国人并未按等级划分。他们按照自己的是非观、个人的忠诚和自我保护的需要来选择支持哪一方。然而，多数大地主“为国王和国家”而战，在迅速发展的织布业中富裕起来的人们支持“上帝与议会”。大体上说，王党在北部和西部力量最为强大，而议会则控制了富有的南部和东部。在每个镇与每个郡内(甚至在一些人家里)都同时存在着支持战斗各方的不同意见。同时也有很多人希望保持中立，战争离他们越远越好。根据克兰顿爵士撰写的关于这场内战的历史名著记载，“开始，持观望态度的人比参加战斗各方的人数目大得多。”然而，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加入战争的一方，因为他们要使自己免受掠夺者、强行征兵者及迫害者的骚扰。

即使在议会内部，支持哪一方的界限也不明确。尽管上议院中大部分议员是保皇主义者，但大约四分之一以上的上院议员(30 人左右)支持议会并向议会提供了首批将领。而在下议院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议员(约 170 多人)依旧忠于国王。自长期议会召开以来，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就一直与国王作对，但战争爆发后，他们却不愿投身于反对国王的战斗中。眼看着家人因冲突而分裂，曾经是国王旗手的埃德蒙·维尔尼沮丧中的一番言语道出了这些人的心声：“我吃皇帝的，也为他干了将近 30 年。我不能做出背离他的不光彩的事儿。我宁愿死(我坚信我应该这样做)也不愿去做那些违背我良心的事儿。”



议会军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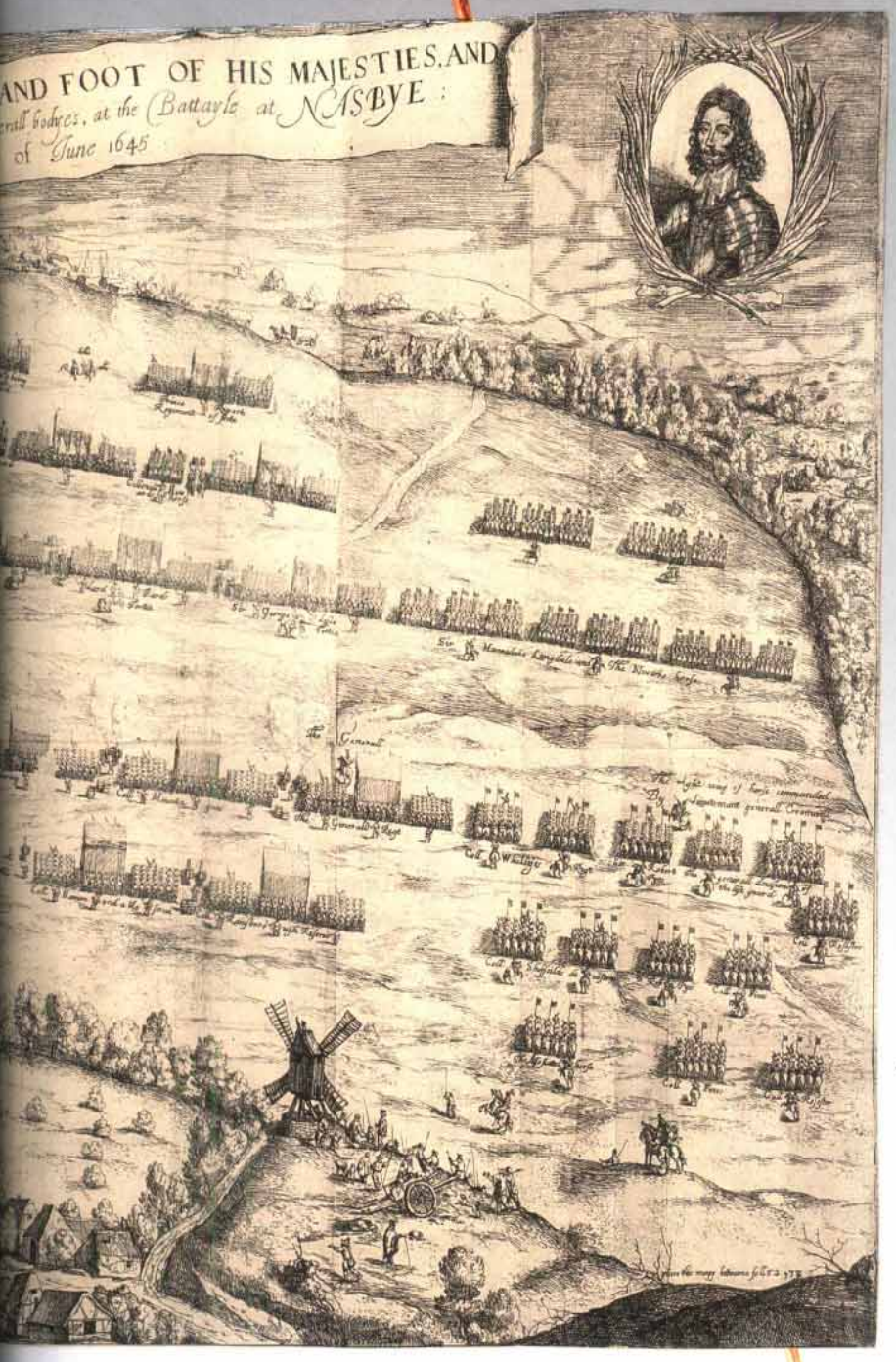
1645 年 6 月 14 日的纳西比战役是内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役。战斗之初军队的部署情况可以从这幅战役结束两年后出版的版画中看出。版画的前部是诺桑普顿郡的纳西比村。村左边是议会的运输队伍，右边是山上的观望者。观望者之下，在议会新模范军的右侧是奥立佛·克伦威尔的骑兵队伍，面对着马玛杜克·兰达尔爵士率领的王党军队。在另一边，克伦威尔的女婿亨利·爱尔顿所带领的骑兵与查理一世之侄德国的鲁珀特亲王士气高昂的部队遭遇。画家描绘的国王位于他的步兵之前方，事实上，查理一世位于队伍的后部指挥他的军队，离山顶很近。

战斗以鲁珀特骑兵队伍的猛攻拉开帷幕。尽管前方有藏在树篱中的议会军枪林弹雨的猛烈射击，鲁珀特的队伍依旧紧追落荒而逃的爱尔顿骑兵并几乎追上其运输队。在他们后边，双方行进中的步兵厮杀在了一起。但克伦威尔军取得了这天战斗的胜利。议会军的前列击退兰达尔的骑兵之时，最后边的队伍转过来攻打王党步兵的侧翼和后部，议会军的重骑兵也从树篱中冲出攻打王党军。王党军被彻底包围了。当鲁珀特军一小时后返回战场时已于事无补，眼睁睁地丢掉了那天的战役。





纳西比战役中指挥王党军队的查理一世的旗帜。该旗将英国、爱尔兰、法国和苏格兰的象征组合到一起。查理一世是个勇敢者，但他并不是一位优秀的将才。踏上战场时，他的军队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尽管他有机会挽救他的步兵，但由于他未能将后备队投入战斗，国王最终失掉了纳西比战役。





议会军总指挥官托马斯·法尔法克斯爵士司令部上空飘扬的旗帜。作为一个学者兼士兵，法尔法克斯从一开始即为议会而战。他并非一个激进分子，对查理一世施行的死刑使他震惊。在查理二世的王政复辟中，法尔法克斯起了重要作用。

最先加入议会军的志愿者是伦敦的学徒，他们都剪着短发，因而这支纪律严明、意志坚决的议会军得到了“圆颅党”的雅号。逍遥又鲁莽的王党分子被称作“骑士党”，这个称号是把王党分子比附为在荷兰独立运动中残酷镇压尼德兰清教徒的西班牙骑兵。尽管“骑士党”一词有弦外之音，但国王正式批准了这个名称的使用，并声明它“除了表示一位绅士骑在马上为国王效忠外别无它意。”

最初，敌对双方征兵和为军队支付薪饷的方式相同。富有的支持者(包括王后亨里埃塔·玛丽亚在内)卖掉了他们的银盘及其它财宝，以提供用以劝诱人们参军的薪饷。一些大地主甚至从自己的佃户中拼凑了整整一个团的兵力来支援战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富有者也财穷力竭，无以为继了。议会一方的经济优势变得日益明显。议会可以从伦敦的银行借贷，并可以推

这幅那个时代的图画描绘了查理一世死刑之后，当刽子手拿着国王的头颅示众时，一位妇女昏厥的场面。查理一世的死刑于 1649 年 1 月 30 日执行，地点在查理一世王宫白厅的大宴会厅之外。尽管图上显示国王跪在一块大大的垫头砧前，事实上应把他的头颅放在更低一些的垫头砧上，因为这样可以便于在国王一旦反抗时捆住他。围观者在士兵的维持下秩序井然。然而斧头刚刚落下，一些人就拥上前去，用手帕蘸上国王的鲜血，以作神圣的留念。



行核定付款额和征收土地财产税制度，这种制度比以往王室所实行的制度更有效。由于议会不仅仅控制了海军，而且几乎把国家全部的港口掌握在手中，因此它可以征收进口税。

现在，可供国王任意使用的港口已微乎其微，而且这些港口还处于国王的前海军的封锁之下，国王要想从大陆得到足够的物资供应已很困难，更不要说通过征税来向他的军队支付已到期的薪饷了。但是，至少在战争之初，国王在新兵的质量上曾有很大的优势。威尔士和康瓦尔沼泽的险恶环境为国王提供了不怕吃苦、意志坚决的步兵；大地主及其追随者们为国王一流的骑兵队伍提供了极好的来源：猎场上的长期训练使他们成为高超的骑手。这些人在国王 22 岁的侄子——德国莱茵亲王鲁珀特的训练与领导下在战争中成为效率极高的突击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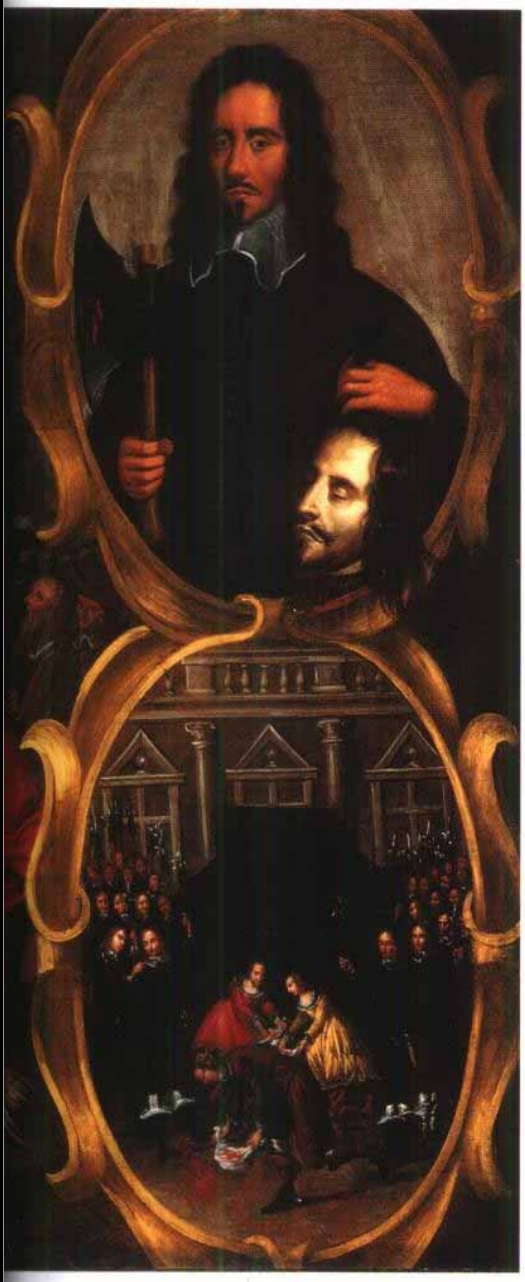
1642 年 8 月底，在埃塞克斯伯爵的指挥下，议会军从伦敦向诺丁汉进军。然而那时国王已西去征调他的威尔士新军。当埃塞克斯军赶上国王军队时，国王军已开始向伦敦进军。10 月 23 日，国王暂停进军。转而掉过头来在英国中部班伯雷附近的埃吉山山顶与议会军相对峙。当双方军队正准备于这场内战的第一次重大战役时，王党步兵总指挥、63 岁的雅各布·阿斯特利爵士作了一次著名的祈祷："噢，上帝！你最了解这一天我该有多忙！如果我(忙得)忘了你，请你不要忘记我。"

双方军队人数相似，大约各 13 000 人。已布好相同的阵势，严阵以待。一组组的骑兵头戴钢盔准备向对方发动进攻。战场中央是头戴大毡帽的枪手和手持长矛、头戴头盔的矛手。他们的矛有 3—5 米长。双方各有一些大炮，但事实证明，在围攻时大炮更有用，而在战场上则不是如此。因为开火后还需要约 5 分钟时间等待火药桶冷却后再装进火药，而骑兵可以在这五分钟之内冲上去，布满战场。

圆颅党的士兵系着橙色的腰带，而骑士党系着红色的腰带。除了这点差异之外，双方服装大致相同。例如，国王近卫骑兵团所穿的红色上衣被圆颅党罗伯提斯勋爵和丹兹尔·霍尔斯军团所模仿。由于军服的相似(尤其是军官的服装很相似)，内战中有几次指挥官竟可以不被注意地穿过敌军的防线。这常常导致致命的错误。

战斗以双方迅猛却效果不佳的炮击开始。鲁珀特亲王率领骑士党向圆颅党左翼展开大规模进攻。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他终于说服王党指挥官放弃了传统的作战方式，这种方式是先以骑兵纵队冲向敌军，继而队列停止前进，用枪射击之后再骑马离开。而他则采用了瑞典国王阿道尔弗斯·盖斯塔法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对德作战时采用的战术：他的骑兵排成一线横队，并肩飞奔直入敌阵，用剑与敌人搏杀。

这种战术收到了神奇的效果。圆颅党骑兵被打得丢盔卸甲，四散而逃，



紧随其后的步兵也落荒而逃。不久，王党又一翼部队的进攻收到了同样的效果。可是尽管鲁珀特教会了他的士兵如何打仗，他却没有致力于教导他们如何保持严明的纪律。胜利之后的王党士兵并未重新回到战斗中，而是去追赶逃兵并攻击圆颅党的运输队。

当最后他们再重新集合回到战场上时，他们仅是避免了彻底的失败。由于缺乏其他骑兵队的支援，在圆颅党步兵与骑兵配合的强攻之下，王党军被迫后撤，他们的枪械也被缴获。敌人与国王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以至于国王的旗手——可怜的埃德蒙·维尔尼死于议会军之手。对王党来说，原本可以以绝对胜利结束的战役，最终却变成了血淋淋的对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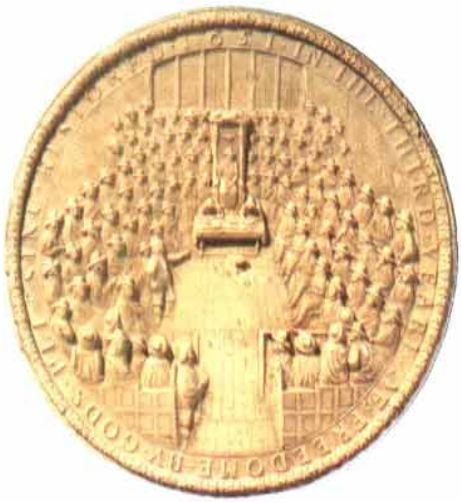
埃塞克斯和议会军向西撤退，国王现在可以向伦敦进军了，可是王党军指挥官们坚信伦敦对王党军队有充分的防备，所以他们无视鲁珀特亲王的反对与恳求，到了位于伦敦西北 80 公里的大学城牛津便不再前行，牛津成为战争期间王党的大本营。

牛津大学各学院此刻变成了王室的官廷、会议室、兵营、武器库和马厩。大学的方形庭院变成了羊圈、游戏室和决斗场。古老的学术中心所应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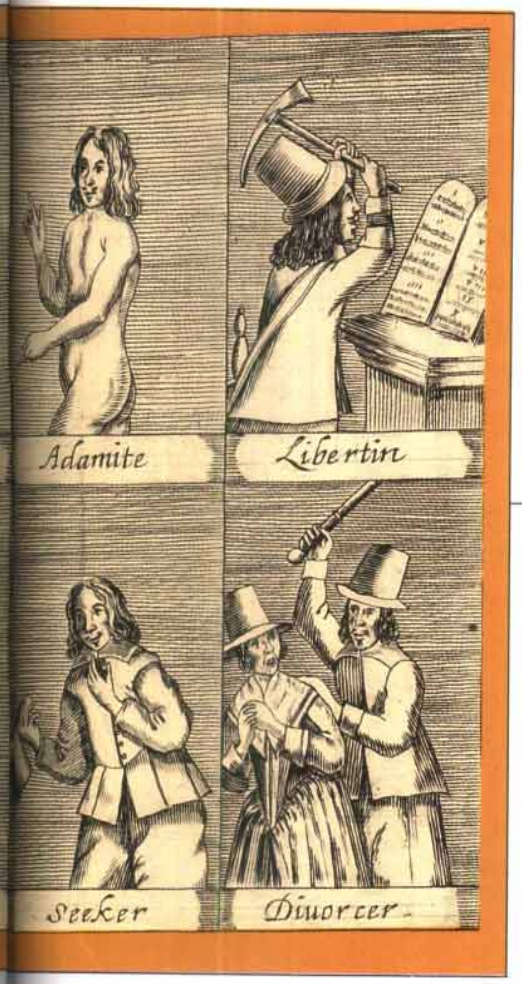
宗教激进分子

在内战的动荡年代里，英国出现了许多与正统教会相异的派别，这给占议会大多数的温和的清教徒敲响了警钟。这本小册子以讽刺手法对这些派别作了描绘：阿里乌派，反对教会三位一体的说教；灵魂安息派，否认来世之说；爱之家派，不再守安息日；寻找者派，寻求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提倡离婚不再受多重干涉。这一派的著名人物有诗人约翰·弥尔顿。此外，小册子的作者还加进去两个支持王党事业的议会的老敌手：耶稣会会士和支持查理一世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的国教会。





英国大印章。该印章用来印在官方文件上以证实其真实性，它显示了 1651 年议长主持议会时的情况。三年之前(1648 年)，议会中一些较温和的、反对对国王处以死刑的议员被清洗，清洗后的议会称“残缺议会”。“残缺议会”设立了特殊法庭，该法庭宣判国王的死罪，取消了上院，摆脱了长老派的控制，废除了君主制，宣布实行共和，即众所周知的英联邦。



的气氛已荡然无存。因为城市中遍布着装时髦的妇女与薪饷少得可怜、靠抢劫维持生计的士兵，他们千方百计挖掘自己能力中的最优秀之处，以显示自己是那些虚伪的敌人的有力对手。

在双方展开武装冲突的同时，文字上的斗争也激烈地展开。清教徒的小册子指责王党分子的种种罪行，其中一条竟称鲁珀特亲王是一位女巫，而他的狗波依是供他差遣的精灵。还有一些人通过印刷伪造的王党军队伤亡名单破坏王党军队的士气。对此王党在自己的报纸上作出反应，如：“最近在格劳塞斯特被害的雅各布·阿斯特利爵士想知道他是被滑膛枪射死还是被大炮射死的?”

当圆颅党将领正致力于围攻或进行无目的的演习时，骑士党计划从北、西南、牛津三个方向对伦敦发动攻势。这时，议会军领导人也正在制定他们自己的计划。1643 年 9 月 25 日，约翰·皮姆(此后约 6 周左右他死于癌症)成功地与国王的苏格兰反对派结成具有战略意义的同盟，双方缔结了《神圣盟约》，议会允诺把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教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统一的宗教”，并允诺向苏格兰每月付 3 万英镑的费用。作为回报，苏格兰同意派军队到英国支援议会军。

即使在英格兰东部，议会军前景也大为看好。高大、睿智、又有些忧郁的奥立佛·克伦威尔是代表剑桥的议员，他参加过埃吉山战斗，而且看到了被他形容为“老掉牙的士兵和酒保”的议会军骑兵在面对鲁珀特骑兵进攻时仓皇溃逃的情形。战场归来后，他下决心建立一支英国最优秀的骑兵队伍。他从当地一些不信奉国教的自耕农(他认为这些人“比普通士兵的悟性还要高”)中招募士兵。他写道：“我宁愿要一位身穿褐色普通农民衣服的上尉，他知道为什么而战，他热爱他的事业。我却不愿要那些被你们称作‘绅士’却什么也不是的上尉。”

他让他的这支军队穿红色上衣，为他们配备了最好的盔甲和武器。克伦威尔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上帝的忠贞，因而他允许他的士兵有不同的甚至是非正统的清教徒信仰。同时，他以士兵的宗教热情为基础建立了严格的军纪。他以王党早已掌握的瑞典战术训练他的军队。

1644 年 6 月底，克伦威尔率领新军与苏格兰军和圆颅党军队汇合。由于鲁珀特亲王带领一支军队赶来支援被围的约克郡，苏格兰军与圆颅党队伍不得不放弃围攻。7 月 2 日，清教联军与鲁珀特军在约克以西 10 公里的马斯顿荒原遭遇。圆颅党和苏格兰联军共 27 000 人，而骑士党只有 18 000 人。但鲁珀特得到国王要他作战的命令，他只有硬着头皮参战。

整个一天，两军处于对垒状态。晚上，鲁珀特命令军队解除戒备状态之后便去吃晚餐。奥立佛·克伦威尔趁机命令他的部队进攻王党右翼。最初取得一些胜利，当鲁珀特集结起他的后备军时，克伦威尔军退了下来。此时，王党军已被从侧翼出现的苏格兰骑兵击溃。鲁珀特的骑兵部队首次在战场上

退却，苏格兰军乘胜追击。克伦威尔训练有素的军队转回头去营救处于重压之下的圆颅党步兵。

到夜幕降临之时，议会军的胜利已不可扭转。王党骑兵坚不可摧的神话已告破产，大约有 4 000 名王党士兵死于战场。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克伦威尔本人也受了伤。就连鲁珀特亲王也为对手的英勇顽强的气魄所感动，他称克伦威尔为“老铁甲统帅”，从此克伦威尔军队也被称为“铁甲军”。

英国北部现已处于议会控制之下。但这个胜利却被议会在西南方的失败所抵销。在西南，埃塞克斯伯爵孤军深入王党控制的康瓦尔，结果在洛斯特维斯尔地区被王党军击溃，全军投降。现在到了克伦威尔的褐色上衣的上尉们从绅士们手里接管权力的时候了。

在克伦威尔的敦促下，下院同意重组军队。1644 年到 1645 年期间，由个人雇佣的旧军队全部解散，士兵重新归入新的、训练严格、纪律严明的团队中。议会还在地方招兵买马，以扩充兵源。由法尔法克斯担任总司令，克伦威尔任骑兵司令。

1645 年 6 月 14 日，最后的大决战在莱斯特郡的纳西比进行。国王率领的王党军队 7 000 人，议会的“新模范军” 11 000 人。

鲁珀特的骑兵在战场上再一次攻击议会军左翼。虽然在人数上不敌议会军，但还是把议会军赶出了阵地。然而处于议会军右翼的克伦威尔军从侧面攻击，突破了王党军左翼。由于有数量上的优势，他能把参与追击敌人的后备力量召回攻打王党部队的腹部和后部，当鲁珀特率部返回战场营救王军时已无法挽回败局。

纳西比战役并没有马斯顿荒原战役那般血腥残酷。王党只有 1 000 人战死，但约 4 000 多人、8 000 多支滑膛枪、大炮若干及所有弹药被议会军俘获。此外，以正义著称的“新模范军”屠杀了在国王军营中俘虏的上百名妇女，而把其余几百名妇女视为“娼妓”，割去她们的鼻子或划破她们的脸。

纳西比战役之后，新模范军致力于扫清王党分子残余势力，并以炮轰和突袭方式取得了王党所控制的地区。就连被派去守住王党重要的西海岸港口布里斯托的鲁珀特也相信，英王唯一的希望就是与议会议和。到 9 月初，鲁珀特手下的兵力已仅存千余人，而且城内传播着瘟疫，于是，鲁珀特同意向法尔法克斯投降，交出城市。法尔法克斯允许骑上党士兵保持原来的标志并自由离开。

不久，国王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内战中的失败。1646 年 4 月，王党最后一支军队在格罗斯特郡的斯托昂泽沃尔德溃败。查理一世不愿向议会投降，却向苏格兰人投诚，鲁珀特王子如何劝阻也无济于事。1646 年 4 月 27 日，查理一世把他的侄子鲁珀特一人留在牛津，自己乔装改扮逃向苏格兰人的大本营——纽瓦克。抵抗了 8 个星期之后，牛津城正式向法尔法克斯投降。“新模



这幅荷兰油画作于1660年。为庆祝查理·斯图亚特之子、王位继承人查理二世复辟，王室在海牙举行了盛大的舞会。这幅油画就是为纪念这次舞会而作。奥立佛·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军队领袖和其他有影响的人物都认为恢复君主统治是避免英国大规模内乱的唯一出路。画中，查理二世正同他的姐姐——奥兰治亲王夫人玛丽跳舞。两位未来的英国国王也出现在画面中：查理二世身后穿着斗篷的是他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斯，他在查理二世之后继位，即詹姆斯二世；在跳舞者之后与荷兰宫廷中的女士们在一起的是玛丽9岁的儿子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威廉后来与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结婚，二者共同管理她父亲的国家。

范军”的指挥官再次表现出了骑士风度，允许鲁珀特和他的兄弟莫里斯带着随从离开英国。

在纽瓦马克，惊诧中的苏格兰人囚禁了国王。但查理一世仍表现出一副尊贵的客人的架式，他趾高气扬地同议会进行谈判。8月，议会提出允许国王恢复王位，前提是要国王在英国实行长老制，惩罚王党的主要支持者及王军主要将领。国王拒绝了议会的要求，但议会的建议被苏格兰采纳，他们向英国议会交出国王，并从英国议会那里得到400 000镑议会所欠的定金。当苏格兰军撤回后，这位嘲笑苏格兰人把他卖得太贱了的国王又成了议会的阶下囚，被关在诺桑普顿郡的赫姆比城堡中。内战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

在斯托昂泽沃尔德战役中成为战俘的王党军队指挥官雅各布·阿斯特利爵士曾端坐在一只大鼓上对周围的议会军说：“孩子们，你们已经完成了你们的任务。如果你们之间不发生争端的话，那么你们就轻松了。”他的话不幸被言中，议会很快分裂为两派势力。长期议会议员们认为自己应成为因战争结束而形成的新社会的领导，而在创建新模范军的过程中形成了又一个新的权力集团。这个集团的观点与长期议会截然不同，新模范军领导人在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上更为激进，很多人(包括普通士兵在内)都是种种不遵循社会常规派别的狂热追随者。1646年9月，控制议会的长老派没有认真考虑后果，就颁布了好几个法案，规定：凡支持一些特殊教派(包括反对“三位一体”说的唯神教派)者处以死刑；悖离正统的异端分子，如提倡成年后洗礼的



关于伦敦生活的编年史

出身于伦敦成衣匠家庭的塞缪尔·皮普斯是一位重要的公众人物。他是一名议员，又任英国皇家学会（促进科学发展的组织）会长。作为海军部长，他成倍地扩展了英国海军力量并使英国舰队与法、荷舰队总量相当，从而使英国恢复了海上霸权。但他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日记。他的日记生动详实地再现了17世纪60年代的伦敦社会生活。

皮普斯采用了速记方式。他坦率地将自身的缺点记录下来，并不厌其烦地叙述了他一日三餐、他去剧院看剧，去音乐会听音乐、以及多次的性奇遇的经历。但他的日记中也有对时局的分析和对公职人员腐败的抨击，还记载了十年间给伦敦以毁灭性打击的两大灾难：大瘟疫和大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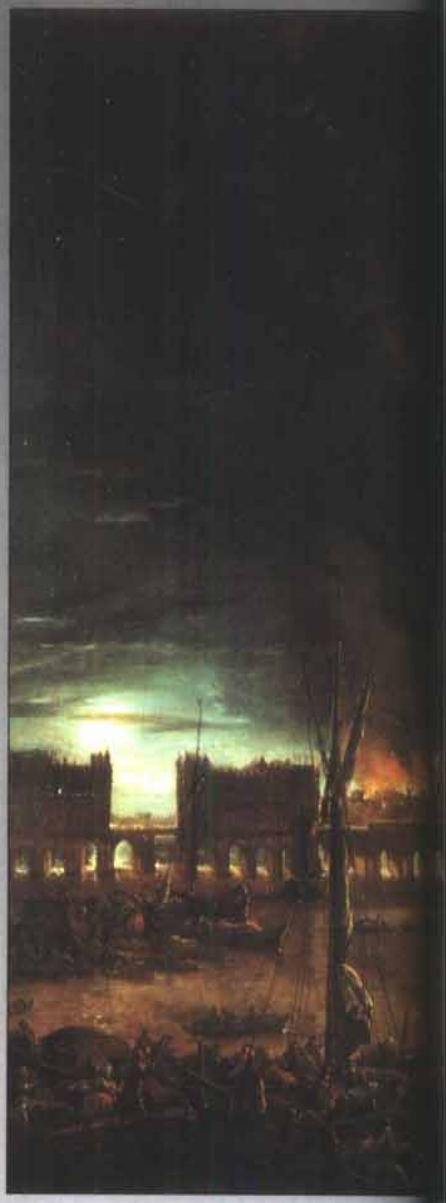
1665年，一场腺鼠疫（其特征是感染者身上青肿）的爆发夺去了几乎80 000人的生命。第二年，一场大火肆虐于伦敦城，直到查理二世下命炸毁所有大火可能到达的房屋后火势才得以控制。13 000座房屋和87座教堂变成了废墟。但灾难却为皮普斯的许多朋友提供了机遇。如建筑家克里斯托弗·雷恩负责监管灾后城市重建，他又为伦敦造了53座教堂和一座宏伟的总教堂。



日记作者塞缪尔·皮普斯穿着这件特地租来的印第安长袍，摆好姿势让画师为他画了这幅像。画中他手持他最喜爱的、由他谱曲的歌《美丽离去了》（其词作者为诗人威廉·戴维南特）。这幅画像画于他33岁时（1666年）。在看到自己的这幅画像之后，他在日记里记了这么一句："我非常满意！"







“在这寒冷凄苦的霜日里，泰晤士河身穿一件厚厚的灰袍伸向远方。”

1666 年 1 月 1 日

这幅 17 世纪晚期的油画描绘的是：由于古桥之拱挡住了去路，泰晤士河在严寒之冬结成厚厚的冰，居民在冰上举行“霜日集市”。但这 1665 年到 1666 年初的严寒有助于剿止在漫长而炎热的夏天里由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瘟疫。



“暮色渐深，我们看见炽烈的大火正如跨越城市上空的桥之火拱。在山上，覆盖着大约一英里长的拱形火焰。看到这些，我不禁流泪。教堂、住宅、一切的一切都被熊熊烈火吞噬，在团团的火焰中传出阵阵可怖的巨响，那是房屋在烈火中倒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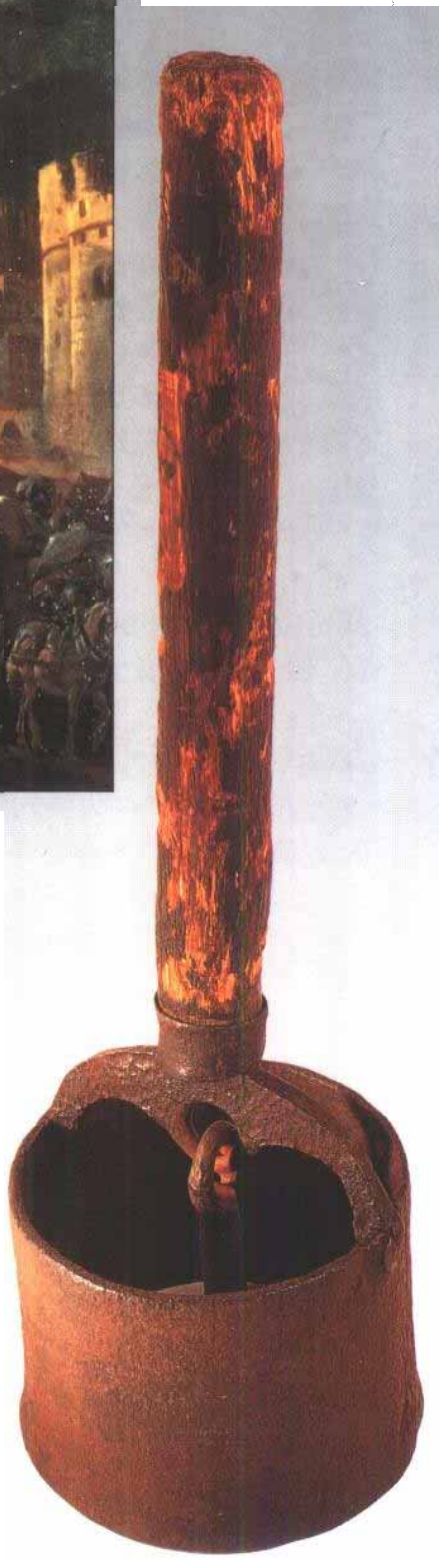
1666 年 9 月 2 日

这是一副由亲眼见到伦敦大火的荷兰画家所描绘的火势最猛的场面。大火最先发端于泰晤士河边一家面包店，之后迅速蔓延，在 3 天之内吞没大约 160 公顷有木质结构房屋的地区，使约 200 000 人无家可归。

“死于瘟疫的人不计其数，以致于人们忙于运送即将掩埋的尸体。夜晚时间不够用而天亮之前又必须干完，所以市长大人命令伦敦城所有人在夜晚 9 点以后必须留在家里，而所有那些（正如他们所说）染上瘟疫的人才可以有自由到外边去。”

1665 年 8 月 12 日

右图所示的手铃是驾驶“运尸车”的人用来告诉人们他的到来。他们的车上装运的都是死于瘟疫之中而又带有传染源的尸体。这些尸体都被用石灰掩埋在大“疫坑”里。掩埋工作由常常喝的烂醉的勇敢的挖墓者来完成。



浸礼会教徒终身监禁。12 月，他们又颁布了不准普通教徒布道的规定。军队领袖表示强烈抗议，但议会却依旧在这条自我毁灭的路上盲目前行。8 个月后，作为宗派迫害的序幕，议会下令新模范军或解散，或作为志愿军去镇压爱尔兰天主教叛乱。因议会欠饷而几近叛乱的军队没有接受议会的任何命令，相反，他们召回了设在剑桥以东的纽马凯特的司令部。作为议会议员之一的克伦威尔奉命去与军队谈判，但当他看到军队坚不可摧的决心后，便留下来加入士兵这一方。

几天后，年青的军官乔治·乔伊斯主动率领 500 骑兵来到赫姆比城堡，把国王劫持到纽马凯特，使之成为军队的俘虏。当国王要求见他的委员会时，乔伊斯只是指了指皇帝身后的人，国王看见同样成为阶下囚的委员会，沮丧地说："事实上，一切都已经很明白了。"

克伦威尔和其他一些官员提出如果国王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并让议会掌握政府官员的任命权，国王可以恢复王位。这些是国王的反对者中所提的最为宽容的要求，然而国王拒绝了，他相信他能挑起敌人之间的相互冲突。

在一段时间内国王的算盘是如意的。军队为保卫自身利益而开进伦敦，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军队内部因意见分歧而出现裂痕。为解决双方的分歧，这年秋天，一个推选出的军队委员会在普特尼教堂召开会议，以部署下一步行动。一些人发言仍希望与国王达成一项合法的协议，另一些人，特别是士兵代表，希望取消君主制和上院，建立共和制，实行普选制。当双方激烈争论之时，国王却趁看守不备悄悄地逃到怀特岛，并开始秘密地与苏格兰封建主谈判。

于是突然间，早已精疲力竭的英国再次卷入内战的旋涡。查理一世通过承诺三年之内承认长老会教会，议会可以控制军队十年等条件，成功地在一年前还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几方之间结成了奇妙的联盟。在苏格兰军队在北方跨过边界时，威尔士以及英国南部、西部都发生了王党叛乱；曾在内战中与国王敌对的长老派此时也因国王有利于他们的承诺而倾向于国王；半数的海军也发生叛乱，投向保王党一边。

与王党相对峙的只有"新模范军"，但其军事力量远远胜过王党军。法尔法克斯率部击溃了南部和西部的王党势力。克伦威尔继而在平定了威尔士王党叛乱之后，率军转战北方战场，在普雷斯顿、维甘、沃灵顿等地进行了持续的激战之后，终于击退了苏格兰人。士兵们回到伦敦后，激烈地要求惩治国王。因为在他们眼里，国王表面上议和，背地里却准备重新对议会开战，手段卑鄙。他们的这种看法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军队首领的赞同。

要求处决国王的呼声高涨。但处决国王这样的大事不能没有议会的同意，然而议会中的大多数多数议员对军队中激进分子的惧怕远甚于对残余的王党势力的惧怕，不肯采取这样的决定。僵局靠武力打破。1648 年 12 月

6日，托马斯·普莱德上校带领军队包围了议会，逮捕了下院96名成员。这次行动即历史上的“普莱德清洗”。清洗后的议会只剩下约60位不信奉国教的议员，他们支持军队。

“残缺议会”执行了军队寄期望于它的任务，设立了特别任命的审判国王的最高法庭。国王被押送至伦敦并以叛国罪在议会大厅接受审判。他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死刑。而英国有少数一些政治色彩较淡的人依旧坚信国王是由上帝派来统治人间，因而当国王被宣布判决的消息传来时，他们目瞪口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事实上，在军队之外很少有人不认为审判本身即是犯罪，但无人能阻止判决的作出。

1649年1月30日，国王从窗口迈出，踏上设立于宏伟的宴会厅之外的刑场。这座宴会厅是由伊尼格·琼斯为查理一世的父亲詹姆斯设计的，位于王宫“白厅”之内。尽管查理一世种种过错，但他表现得倒很勇敢。那一天很冷，查理一世坚持要穿两件衬衫，因为这样他就不会冷得发抖以致于让围观的人误以为他是在害怕。他先跪下祈祷，然后把头放在垫头砧上并伸出一只手以示意他已准备好了。巨斧落了下来，一下子就切断了查理一世的脖子，当刽子手拿着国王的头颅向周围的人群展示时，四周一片唏嘘。

对外决国王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这成了内战最后阶段的推动力。爱尔兰依旧存在的天主教王党分子把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全部转移到查理一世19岁的继承人——查理王子的身上。苏格兰人许诺向查理王子提供军队，前提是查理掌权后在英国实行长老制。但“新模范军”的力量此时已达到巅峰，克伦威尔亲自领导了“新模范军”对王党势力的最后决战。

在以令人难以忘记的残酷屠杀镇压了爱尔兰的反英起义之后，克伦威尔回师北上，在顿巴将苏格兰军队彻底击败。之后，查理王子率领一支新的苏格兰军队攻入英国境内，一路上又不断地集结王党势力。在乌斯特一役中，克伦威尔全歼了查理王子的军队。在此后整整六个星期中，查理王子躲避着克伦威尔军队的搜捕，先化妆成伐木工人躲在橡树丛中，之后化妆成一位贵妇人的女仆越过克伦威尔的防线，直到在南海岸的布赖顿发现一只船后，他才得以安全驶回法国。

1651年8月24日发生的伍塞斯特战役将英国新政府在“大不列颠”领土范围内的统治权固定下来。1652年夏，英国的海上地位也得以巩固。在莱茵亲王鲁珀特指挥下，一支王家海军舰队开进地中海，建立了巴贝多斯、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等王家殖民地。此后几年中，英国为了商业利益与荷兰进行了激烈的海战。荷兰的商船常常满载货物往返于英国及其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之间。英国通过了《航海条例》，规定所有此类贸易必须使用英国制造并由英国人驾驶的船只。为推行该法案，英国战舰宣称英吉利海峡由英国控制，此举显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海军的威力。从此，

这尊上釉的陶制威廉三世半身塑像制于荷兰的达尔福特——威廉继承英国王位之前任16年军事指挥官之所在。由于对信仰天主教的国君詹姆斯二世的统治不满，英国的清教徒邀请威廉入主英国。经过一场未流血的政变，威廉接过英国王权，詹姆斯二世逃往法国。威廉与其妻玛丽——詹姆斯二世的女儿共同执掌政权。1694年玛丽去世之后，威廉三世又单独统治了8年。对威廉来说，获得英国王位的代价是要求承认《权利法案》——限制王权、维护政府中议会的重要地位的一项议案。



英国在欧洲声望达到了都铎王朝以来的最高点。

但英国国内却是另一种情况。新模范军所取得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民主的胜利。处死国王之后，上议院被取消，英国宣布为联邦。但“残缺议会”和军队之间的敌意却日益加深。军队对议会中的很多律师议员十分反感，他们抨击英国对荷战争，希望推行更激进的宗教改革并要求修宪。1653 年 4 月 20 日，克伦威尔用强力解散了“残缺议会”，关闭了争论不停的议会大厅的门。不久，召开了一个清除了那些反对他的议员的新议会，这个新议会宣布克伦威尔为“护国公”。不久克伦威尔的统治就与军事独裁没多少差别了。克伦威尔所追求的并不是职位，当他的支持者建议他作国王时，他拒绝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人在无任何目标的情况下就能爬上这么高的位置。”

到 1658 年克伦威尔死时，英国已遍布清教徒式的艰苦朴素气氛。克伦威尔死后，旧怨再次滋生。在新的王权主义浪潮中查理王子复位——前提是实行大赦免，宗教上采取宽容政策，付给军队欠薪。1660 年 5 月 29 日，复辟的查理二世回到伦敦，在这里他受到伦敦市民极为热情的欢迎。不久鲁伯特亲王也回到英国，并在此度过了他的余生，他被任命为海军中将和英国在北美的哈德逊湾公司首任总督。

在查理二世统治之下，清教徒在文化生活上遗留下的真空被注入新的力量。戏剧重兴，曾跟随国王流离于欧洲的建筑师又开始建造新的精美的古典建筑。由于有首席大臣克兰顿建议的指导，查理二世在与议会的关系上，虽然不总是友好，还能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

但查理二世的复辟绝非国王与议会之间冲突的结束。尽管查理有很多孩子，但其中无一位法定继承人。王位由查理二世的弟弟、信仰罗马天主教的詹姆斯继承，詹姆斯二世上任即任命他的天主教随从担任政界和军界的要职。当他的臣民反对时，他仅是模仿乃父，援引王室特权。于是，在詹姆斯二世继位才两年左右，议员们又计划推翻他。议员们暗中策划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奥兰治的威廉共同入主英国。

1688 年 11 月 5 日，威廉登陆英国，开始了所谓的“光荣革命”。在众叛亲离的窘境中，詹姆斯二世越过英吉利海峡逃往法国。6 个月后，威廉和妻子共登王位。议会提出《权力法案》作为支持他们入主英国的代价。《权力法案》规定：禁止天主教徒担任英国国王；国王无权中止法律，也无权征收赋税；和平时期不得维持常备军；应有常设议会，并有自由选举权。

查理二世的复辟再次为君主和议会之间造成了权力的均衡。而“光荣革命”中《权力法案》的颁布确立了议会的地位。斗争与暴力从此告终。英国确立了立宪君主制度。后来，英国的男男女女带着这些基本自由穿越浩瀚的大西洋来到一个新世界，他们把这些自由制度深深根植于新世界的土壤里，一如他们所离开的那个沾满血迹的国度那般根深蒂固。



在“太阳王”的宫廷中

在17世纪，整个欧洲目睹了统治权落在握有差不多完全是暴虐的权力的统治者手中这一过程。这种集权趋势的理论表述是一种专制主义的信条——即认为授给国家统治者的统治权是排他性的，不能与他人或团体分享。

虽然专制君主不受任何一个国家机构的制约，但在当时的政治思想中，这种新型的君主制被认为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者。理论家辩称：国王从政权的核心位置运用无限制的权力，对于地方贵族与官僚互相冲突的影响力来说，是个进步。集中的权力更有效、更有控制力，当这些优势带来经济和军事的成功时，这种制度就会被证明是合理的。

17世纪的法国就是如此。在法国，绝对专制达到了一个最完善的状态。这个国家年轻的国王路易十四，成了整个欧洲专制君主的典型。1643年他登基时只有4岁，但一直到1661年他的首相马札然死后，他才得以控制了政权的各个方面，政府才成为他观念中的王国的中心。在他统治的漫长岁月中——他死于1715年——他赋以政治一个充分的发展。他相信，国王的职业是伟大的、高贵的，是快乐的源泉。“为王要凭借工作，也为了工作。”他给新王的忠告是：“神使你为王，也会给你必要的指引。”

1662年，路易十四以太阳作为他的个人标志（如上图），称颂太阳“唯一发光的品质……它放射光明照亮了其他星球，它为各地带去了幸运。”这时，他已经决定建设一座宫殿，这座宫殿必须与他关于国王的概念相配。他在凡尔赛建造的这座宫殿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成了法国政权的中心。在它的大厅里、花园中就如在公共舞台上一样，每日却在上演着王权的精彩剧目。

与绝对王权相配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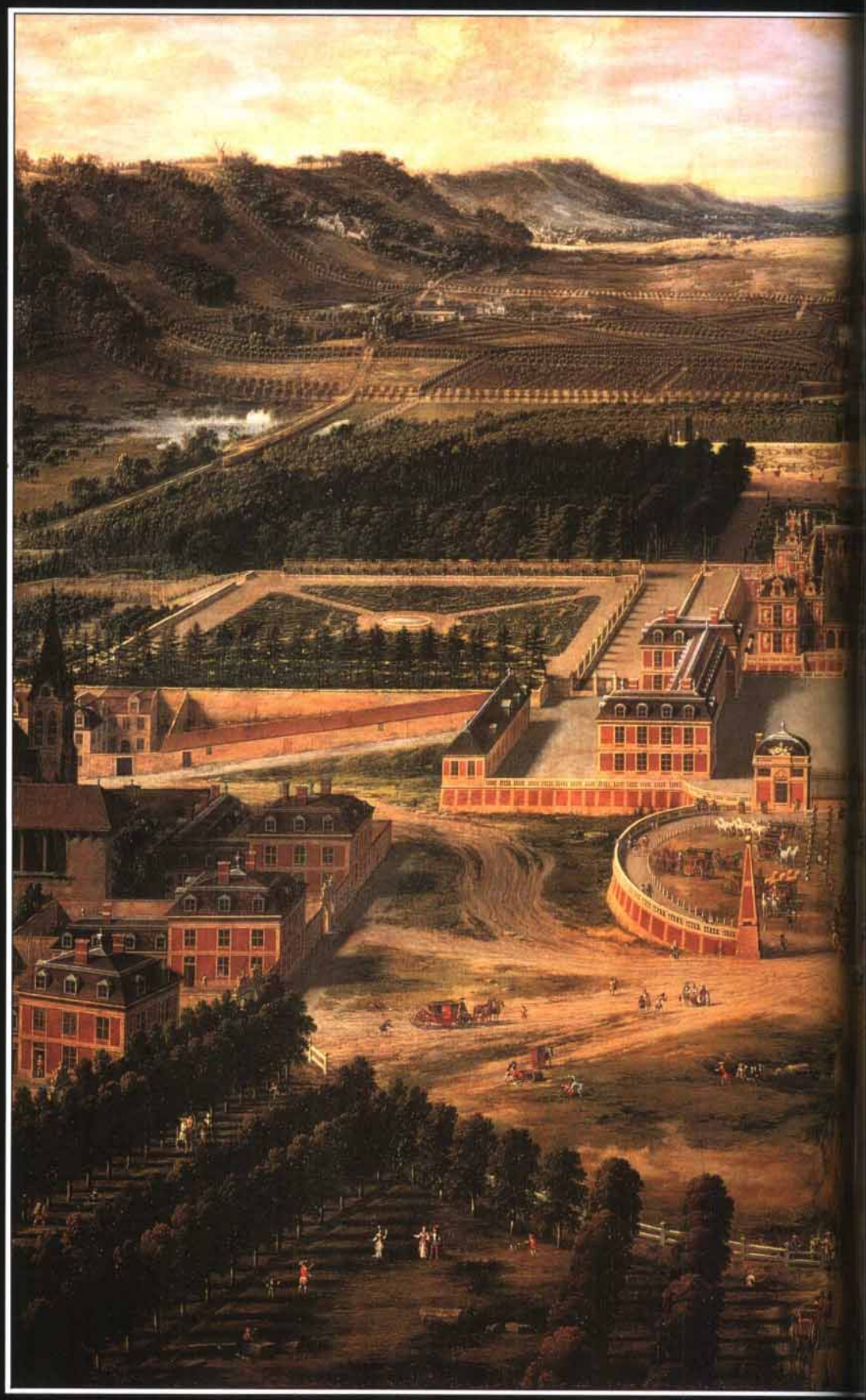
路易十四的宏伟宫殿坐落在巴黎西南 20 公里的凡尔赛，原是他的父亲在 1624 年开始修建的用于打猎的行宫。经过 60 年的不间断的扩建和修缮，这片建筑群由供给喜好享乐的年轻国王与他的宫廷圈子进行休憩的乡间休养胜地，变成了王国行政管理的神经中枢，同时也成了欧洲绝对专制的象征性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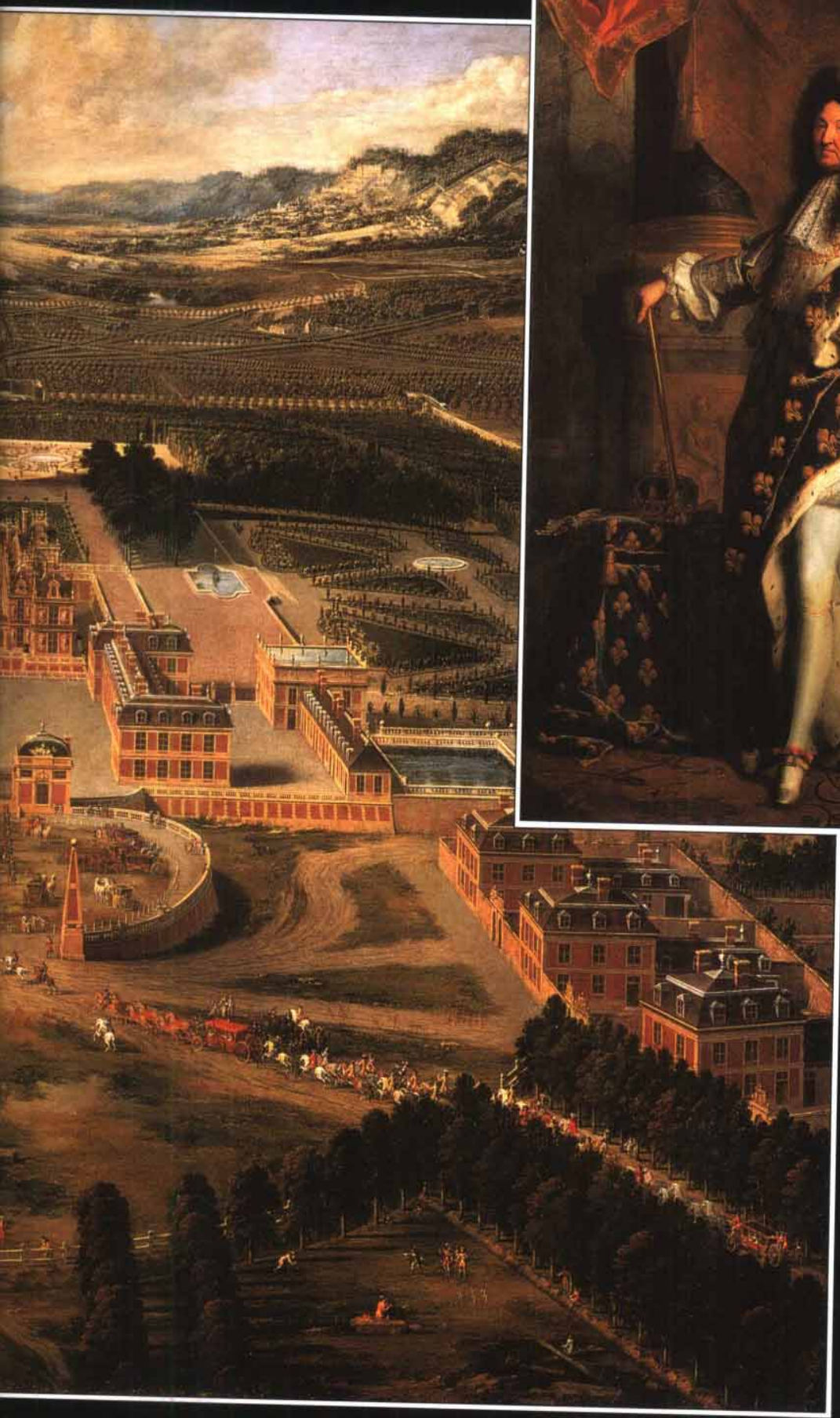
凡尔赛宫的规模巨大无比，17 世纪 80 年代，每天有 36 000 名泥瓦匠在工地上工作。花费的金钱虽然从未详细地披露过，但肯定数目是惊人的。17 世纪 70 年代中期，路易十四在凡尔赛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伴随他的是宫女和几名政府大臣。1682 年，宫廷连同它的管理人员及仆从全部从巴黎搬到这里。

宏大而且舒适方便是凡尔赛宫建筑的指导性原则。这座宫殿是明确地作为国王的艺术的代表物来构思规划的，它有大量的具有寓意的雕塑，以及象征性的物件。但还有不少报怨，空气不健康，生活区域受到限制，大片的地面冬天泥泞难行，夏日则热得烫人。

在奢华的表面下，却有着精明的政治考虑。王廷从巴黎迁到这里，强调的是国王神授的绝对权力高于外部力量。那些勾心斗角争夺国王身旁的位置，乞求不落在宫廷生活之外的朝臣们依然在路易十四的视线之内，既没时间、也没资财去挑战他的位置。

凡尔赛宫同时又充当了一个国际展台，其它专制君主参观后对此十分惊异，并且回国后刻意模仿。它的玻璃制品、挂毯、大理石的花边饰物都产自当地。所有这些都牢固地确立了法国欧洲艺术风格的大师地位。





这是汉森斯·瑞根德所作的肖像画。画中路易十四穿着他的加冕袍，凝望前方，国王外表优雅引人注目，他是一个舞技高超的舞者，用圣·西蒙的话来说他的“微小的手势，他的步伐，他的举止都显得高贵……此外，也很自然。”

一长队骑马的侍从涌入凡尔赛宫界域内的前部庭院。国王和王后分乘四轮马车抵达宫殿，由皮埃尔·帕特尔绘制的这个场面展示了1668年的凡尔赛宫。原来的狩猎小屋——处在突出的四周建筑物的中心的一排——在宏伟的附加建筑中仍然清晰可辨。



路易·德·拉·瓦莉埃



德·蒙特斯潘夫人



德·曼特农夫人

路易十四的三位情妇中，第一位是路易·德·拉·瓦莉埃，她是一个官员的女儿，和国王一样擅于骑术。她的继任是德·蒙特斯潘，有智慧，野心勃勃，她使宫中充满活力，富有情趣。48岁的德·曼特农在玛丽·蒂埃丝王后1683年去世之后成为与他社会地位相差悬殊的妻子。



由让·诺克瑞特创作的一幅寓意画作品。路易十四被绘成希腊神阿波罗，他的家庭成员也被绘做陪伴其身边的众神。被画作地球之母的西布莉是国王的母亲——奥地利安妮，虽然她死于1666年，即这幅作品完成的前3年，但她仍被画家设计在中间位置上。在她右侧，是国王的弟弟——“先生”，他的妻子被绘成普洛托和福罗拉。王后玛丽·蒂埃丝，坐在国王左手边上，代表朱诺，神的王后。

王家戏剧中的奥林匹亚角色



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创建的天地里住着朝臣、公务人员、政府官员、管家、厨师、狩猎者、女仆、女家庭教师——一个小市镇的全部居民。1682 年以后，据说有 10 000 人居住在王宫里，大约 50 000 其他的随从和仆人居住在附近。

但是，所有的眼睛都追随的主角是国王和王室。受到路易的恩泽和慷慨统治的宫廷充满阴谋，甚至国王自己的家庭成员也为争夺职位相互欺诈。路易的弟弟被称作“先生”，是王室圈内的一个最重要人物之一。“先生”的妻子，即“夫人”，路易的表妹“小姐”，也居于很高的王室地位。路易的王后，是她的西班牙表妹玛丽·蒂埃丝，给路易生了 6 个孩子，但只有一个——道芬活到成年。此外，某些被路易宠幸的其他女子也享有很高的荣誉，并被作为其正式的情妇。三个最受宠的情妇中的二位（上左）又给他增添几个孩子，并都被授与爵位，成为王室中的重要成员，并最终立为嫡嗣。

尽管宫廷是特殊的特权领域，但对公众而言，目睹国王日常生活的情景，是很容易的。巴黎市民把驱车到凡尔赛参观皇室宴会当做很流行的户外活动。这些冗长的宴会所用的食物几乎是从一公里以外的厨房送过来的。

宫廷日常生活大观

在凡尔赛宫的早期日子里，这个新扩展的王宫被当做极度奢侈的户外游乐的地点。但当王室搬迁进宫殿，路易十四进入中年后，这种众朝臣们费尽心机才能参与的一连串的娱乐和消遣活动，呈现出如钟表般的规律性。达克·得圣西蒙评论说，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历书中，精确计算出路易日常的任何一个时刻的行为是很可能的。

宫廷的生活安排以及随从们都完全围绕着国王和他的日程。路易精力充沛，每天投入 8 到 9 个小时的时间处理国务，有规律地骑马、打猎。他有非常好的食欲，同时还强制围在他身边的大臣们与他保持一致。他的嫂子伊丽莎白·查勒特向一个朋友叙述了王室内典型的一天活动："我们一上午都在打猎，大约下午 3 点时回来，换衣服。然后去看表演，这样的表演从没在 10 点半之前结束过。接着吃晚饭，之后玩球，一直到早晨 3 点……所以你看，我能有多少时间用来写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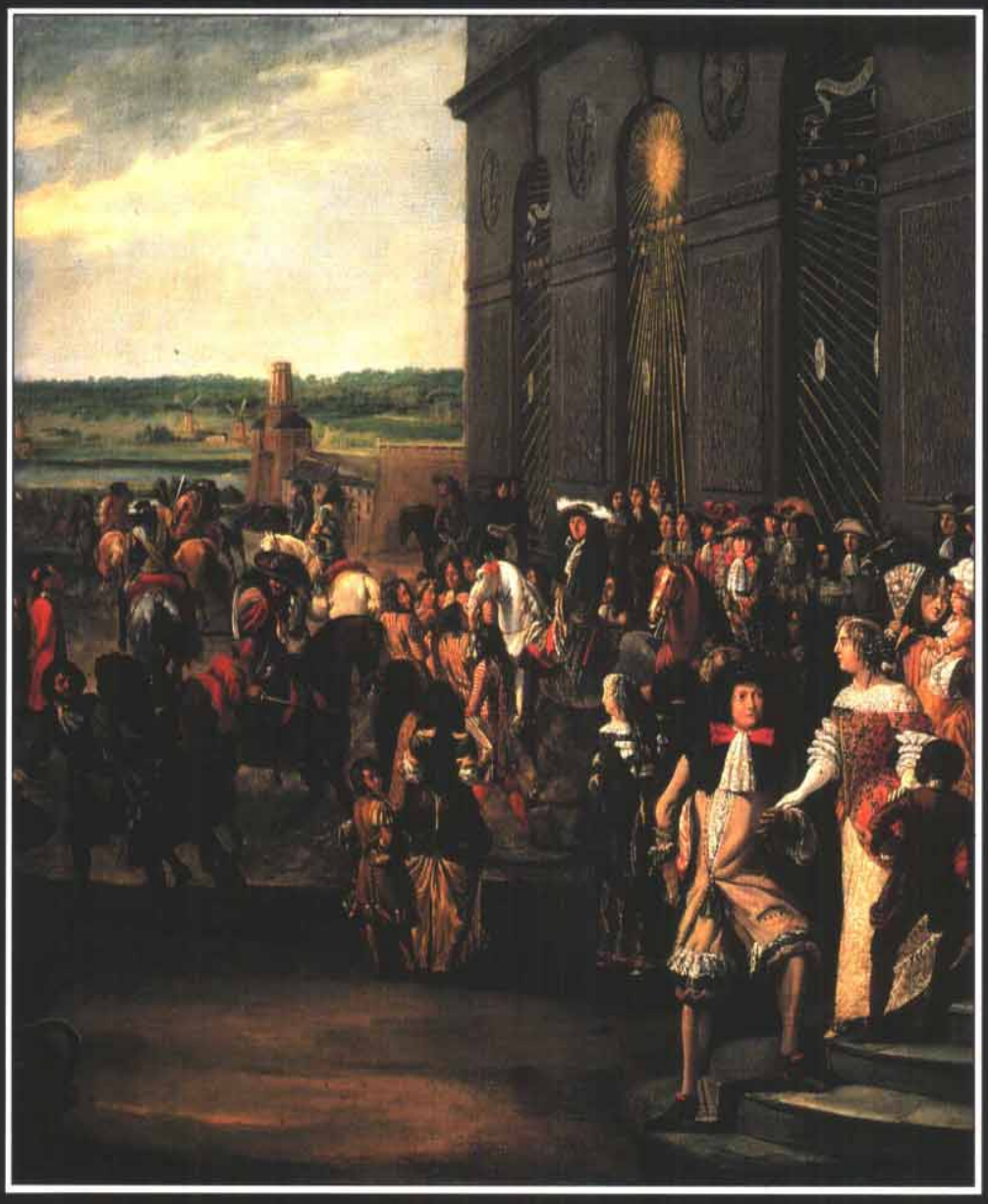
在这幅 1695 年的版画中，玩纸牌的人有路易十四的女儿——杜查丝·波旁，以及路易十四的情妇戴·蒙特斯潘，和她的丈夫（坐在左侧者）。在一套气派的房间内，每周一、周三、周五晚上举行聚会，大赌注的赌博是司空见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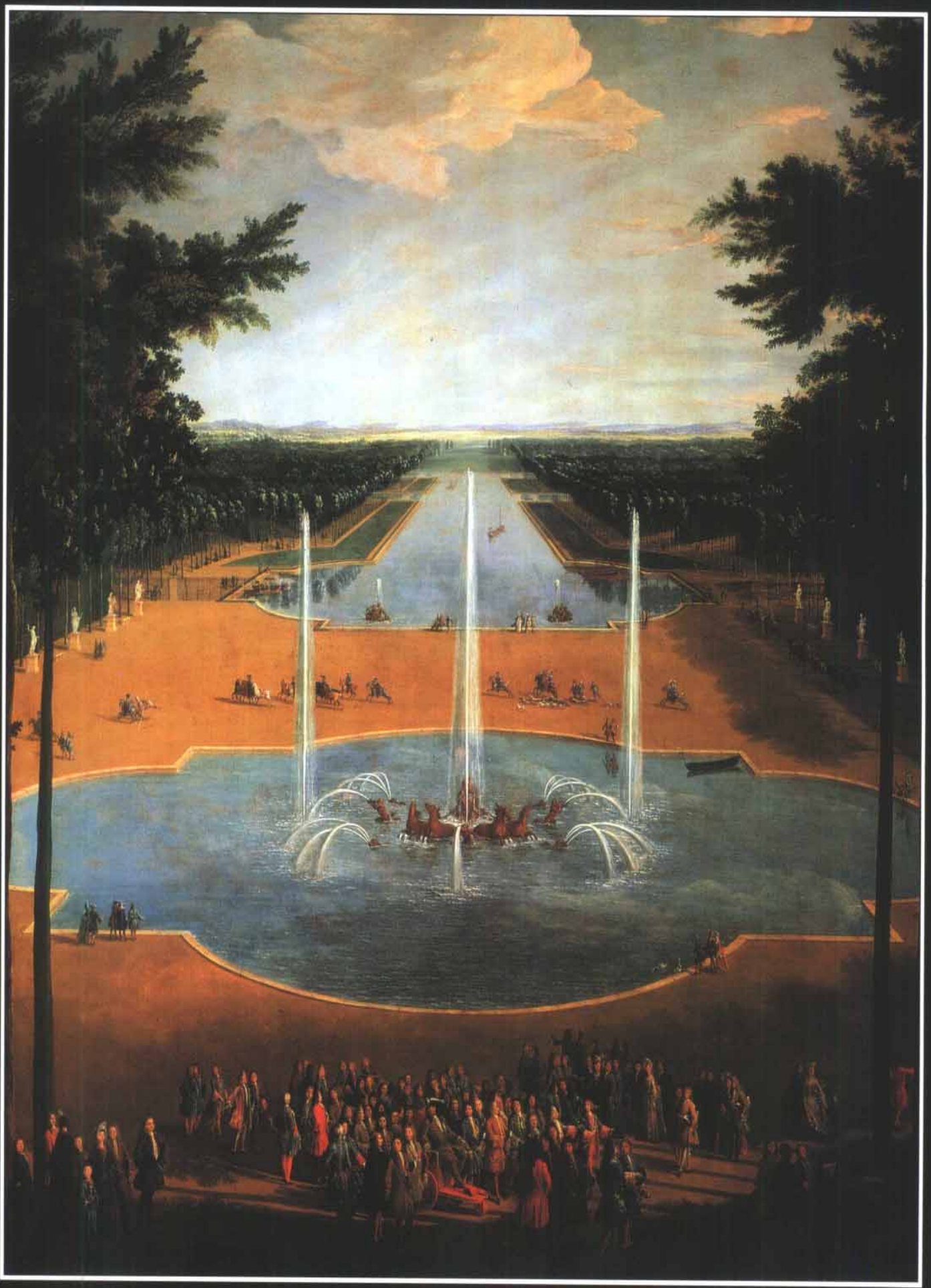
路易十四头戴绚丽夺目的羽毛帽，正在排列击球，这是在打一种早期的弹子游戏。与他一起打球的伙伴包括他的弟弟“先生”（左边最远者）和他的王室随从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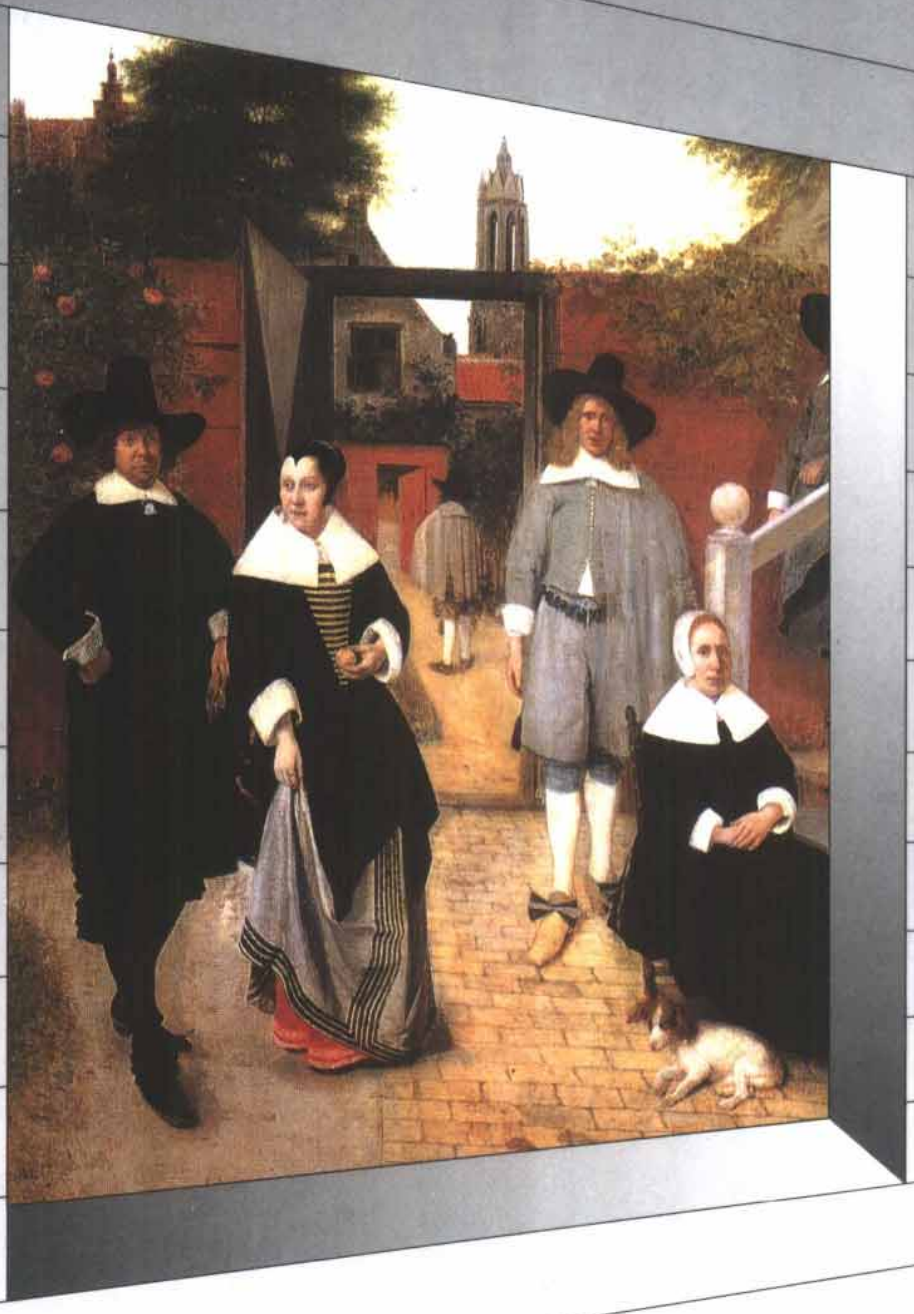
由克劳德·干·海利创作的这幅画描绘了路易十四 1685 年在凡尔赛宫的镜子大厅中欢迎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热那亚总督。

尽管晚年时被束缚在轮椅上，路易十四仍是众大臣的关注焦点。正如这幅由皮埃尔·丹尼斯·马丁创作的油画所描绘的那样：在他身后，展示了凡尔赛宫全景的宏大效果，包括阿波罗盆地的喷泉——由安迪·勒·诺特设计的景观中的轴心一景。



这张 17 世纪晚期的绘画作品显示穿着华丽的大臣们拥挤的场景——男人、女人和孩子围在骑马通过塞地斯洞室的年青国王身边。塞地斯洞室是凡尔赛宫的庭园中无用的怪异建筑，路易一生都喜爱打猎和户外活动——甚至在晚年，他逐渐强烈的宗教虔诚使他毁掉了这个洞室，在其原址上建起一座基督教礼拜堂。





荷兰共和国的兴起

5

四艘满载货物的船只从须德海驶向拥挤的阿姆斯特丹码头，从表面上看，这并不引人注目。像祖辈们一度从海运贸易中获利一样，1599 年的阿姆斯特丹也从海运中获取物质财富。在纵横交错的河渠上，砖砌的高高的货仓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欧洲货物：谷物和鱼类、木材、酒。港口上时常被运输工具所充斥——桅樯和船帆如浮动着的密林。

但是，7 月里的一天，当这些船只回到阿姆斯特丹时，故乡以庆祝战功的仪式欢迎他们。教堂的钟声发出凯旋与感恩的消息，回声穿越了城外的沼泽荒野。伴随着隆重的欢迎仪式，船长及其商业赞助人还受到了官方盛宴的款待。与此同时，下层船员们准备在臭名昭著的妓院和小酒馆里挥霍掉他们的赏钱。

当市长发表他精彩的演说时，码头上的装运工人已经出发并开始卸下船上的贵重物品，在刺鼻的港口空气中，这些物品散发着浓郁的芳香。从船舱深处抬出来的布袋里装满了丁香和肉豆蔻粉，它们来自于神秘的、远在天边的东印度群岛。那些暗色的小颗粒可能就是红宝石。船务人员估计这次远征探险的财务资助人将从这些已抵达的船只中获取相当于他们投资额的百分之四百的利润，这还不包括另四支整装待发的船队。当时的一位史学家赞叹道："荷兰自有史以来，还从未有过如许满载财富的船只"。

然而，远洋公司舰队的安全返航带给一批投资者的是更为丰富的收益。对于一个以贸易为生的地区来说，对远方的东印度群岛的首次掠夺成功意味着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意味着对不可数计的财富的承诺和一份上天的恩赐。这个积极的征兆，对于一个正为生存而进行长期且艰苦斗争的国家来说，可谓天赐良机。

因为当时的荷兰还处于国家的形成过程之中。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和海员、泥炭制造者、干酪制工以及乡村和内地的市场操纵者、北海的渔民以及莱茵河上的驳船工人，都聚居在结成松散同盟的乡镇和城市中，这些联合在一起的城乡为人们提供了政治上的便利。在荷兰的 1500 万人口中，加尔文教教徒及持异议的新教教徒与天主教徒和几乎没有加入任何宗教组织的人混杂在一起。如果加尔文教徒与清教徒现在联合起来，那仅是因为他们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反抗共同的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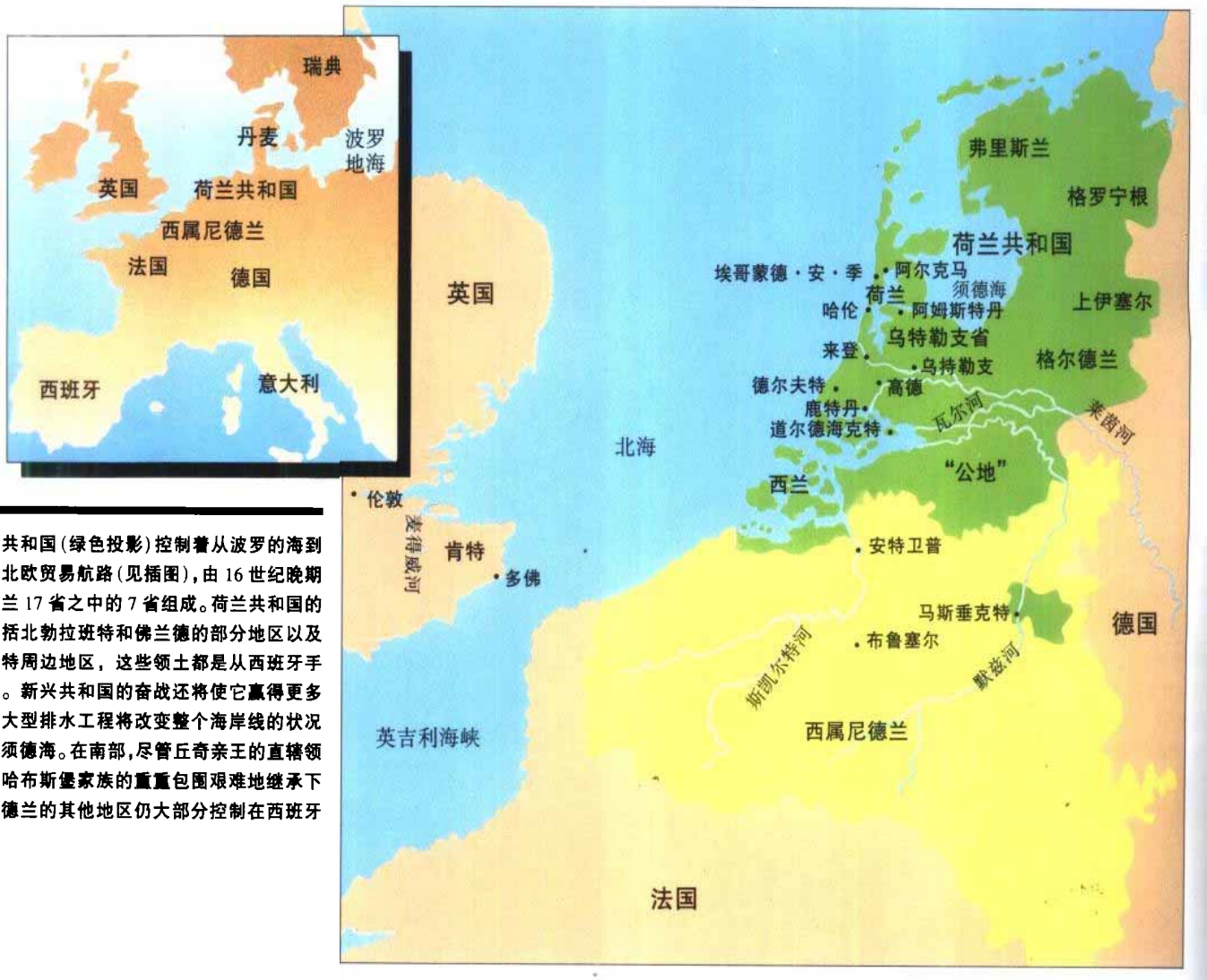
16 世纪早期，欧洲最强大的王朝之间的荣誉转换及战略性的婚姻已将尼

在皮埃特·德·胡克所绘制的一幅 17 世纪中叶的画像中，德尔夫特市一个荷兰家族穿着严整，从他们清洁的庭院中可以感受到安全、殷实。荷兰共和国在 17 世纪早期摆脱了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赢得了独立后，中产阶级商人成了共和国的中坚力量。荷兰共和国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贸易国家。

德兰——北海沿岸及其附近 17 个地势较低的、法语或荷兰语裔的省份——置于西班牙统治之下。到这个世纪的后半叶，这些省份中已累积起一系列令人忿懑的反抗：在无能而专横的暴政下，宗教迫害和经济剥削引发了大量流血事件。为此，北尼德兰荷兰语系的人民单方面地宣布独立，他们投身的这场战争，直到 1648 年才最终结束。

像往常一样，在战争期间，荷兰人民还要同另一个比西班牙人更难以对付的敌人进行斗争：那就是他们不稳定的地况。由于荷兰位于海平面上，有些地区甚至低于海平面，因此荷兰人时常要借助于堤坝以阻挡北海水患。

一片水涝成灾以供养其居民的土地，一个没有共同历史、认同不同甚至敌对的基督教派的民族，一场殃及了几代人的独立战争：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都不能称其为一个有希望的开端。然而，就在几十年内，水患和西班牙人都将被击败，荷兰竟然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力量。荷兰人的财富引起世界的嫉妒，荷兰人对欧洲陆地及海上贸易的控制激起邻国的忿恨。他们将在没有任何一个国王实现这一切统治的情况下，在专制的、帝国君主制的时代，出现一个自治的共和国，权力更多地由选民所在



荷兰共和国（绿色投影）控制着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北欧贸易航路（见插图），由 16 世纪晚期西属尼德兰 17 省之中的 7 省组成。荷兰共和国的领土还包括北勃拉班特和佛兰德的部分地区以及马斯垂克特周边地区，这些领土都是从西班牙手中夺得的。新兴共和国的奋战还将使它赢得更多的土地：大型排水工程将改变整个海岸线的状况并缩小了须德海。在南部，尽管丘奇亲王的直辖领地突破了哈布斯堡家族的重重包围艰难地继承下来，但尼德兰的其他地区仍大部分控制在西班牙手里。

的乡镇和城市控制，而不是集中在国家机关里，这的确令人费解。

1548 年，作为奥地利、西班牙、勃艮地以及其他一些散布于欧洲各地的较小领地的统治者，查理五世将 17 省合并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一个行政区。在查理五世的统治下，这些省份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一些城市，像阿姆斯特丹及更大的南部港口城市安特卫普，被富裕的商业家族统治着，他们小心谨慎地守护着他们享有的市政权和特权。在农村，当地贵族操纵着民众生活。但是 17 个省份都有自己的代议机构——议会；反过来，各省议会也向设于布鲁塞尔——哈布斯堡王朝的北方省府——的联省议会派出派代表。

1556 年，查理五世退位，在随后对其领地的瓜分中，他的儿子、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获得了尼德兰的统治权。腓力试图将他的意志强加于这个遥远的辖地，没有充分考虑他的行为是否侵犯了这些地区的自由。他竭力控制它们的内政，干涉这些地区主教的任命；他还许可查理五世建立的天主教监察机关迫害在南部广泛传播的加尔文新教教徒。更糟糕的是，他为了弥补对外战争所造成的财政赤字，又增收了新的重税。

在上帝和金钱的感召下，尼德兰人民奋起反抗他们的西班牙领主，荷兰独立战争由此开始。在起义领导者中，反叛者们盛赞了一位卓越的领袖，他就是奥兰治亲王，沉默者威廉，一位清教徒贵族。威廉除了在低地国家拥有广阔的领地外，在德国以及法国南部的奥兰治也拥有大片领地。尽管有很大困难，他却能在意见分歧的，甚至敌对的团体之间缔造起同盟体，赢得农村贵族、城市官僚、中产阶级商人以及最广泛的民众的支持。他的支持率在南部最高，这里也是加尔文主义最盛行的地区。1579 年，在威廉的领导下，北部七省单独联合成为乌特勒支联盟。两年后，这些联合起来的城市单方面宣告它们脱离西班牙而独立。

接下来的是双方的僵持。腓力不稳定的财政由于战争而日益恶化。他的军队军饷不足、装备落后，濒于倒戈兵变的境地。带领着这样一支军队，腓力从未成功地消灭过反叛势力——尽管他的部下最后曾谋划在 1584 年暗杀了威廉亲王。在此期间，奥兰治人民在反抗西班牙的斗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缺少欧洲其他新教国家的财政和军事支持以巩固他们的既得成果。

威廉死后不久，英王伊丽莎白担心她的宿敌西班牙重新控制英吉利海峡，认为以支持反叛者的名义进行干涉的时机已到，这样荷兰当时至少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

1588 年，西班牙无敌舰队为侵入英国而对英吉利海峡进行的扫荡在英国人、荷兰人及天气状况的联合狙击下完全溃败。西班牙的财产，连同它的自尊，被一扫而光。随后，腓力将他的注意力转向法国王位继承的斗争。直到 1598 年腓力去世，西班牙才最终被驱逐出他们在尼德兰北部地区的最后堡垒。西班牙本土上发生的毁灭性的瘟疫和饥荒使腓力的继承者们除了在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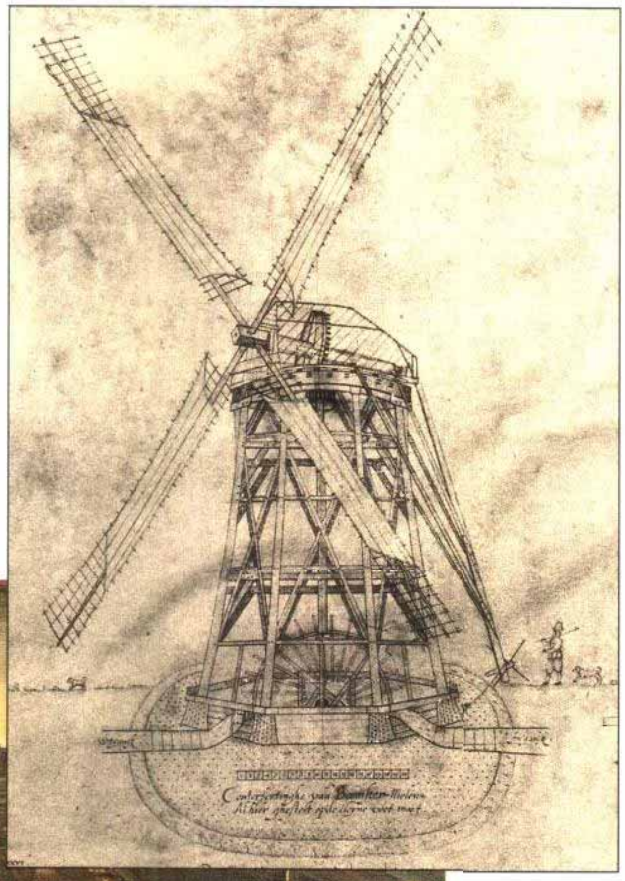
苍海变桑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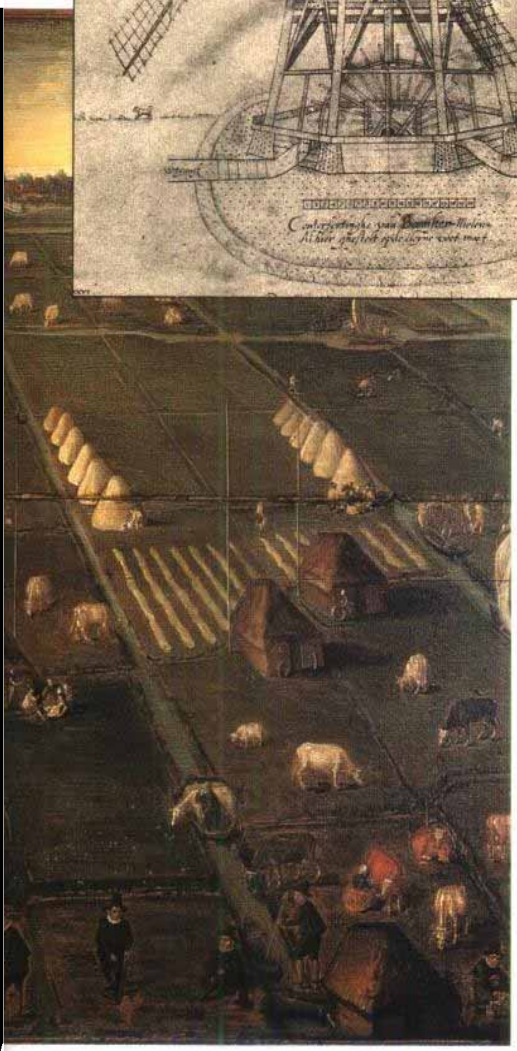
"上帝创造了世界"，接下来的话是，"但是，荷兰人造就了荷兰"。至少从15世纪开始，随着人口的日益增长，对排水系统的需要也在增加，这套系统将苍海变成了可供农耕的良田。像下面这幅1590年的图画所显示的那样，被开垦的土地，叫作堤围泽地，既提供用于稼穑的田地，也提供饲养牲畜的牧场。

到17世纪，荷兰人已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液压技师，他们每年能用风车开垦出1 800公顷的土地（见插图）。为了排水，人们在广阔的浅水区旁围起堤坝，在它的周围开凿出环形的河渠。风车抽出来的水排入河渠，河渠里的水又注入大海。一排排的抽水机顺次排列，每一台抽水机都把它的能量传递给下一个，这样能排干深达4.5米的水。

但是，海水总能再流回来。尽管维护谨慎，堤坝系统有时也会失灵，时常发生的灾难性洪涝灾害不断地推动着排水工程的改进。







省份仅存的据点中进行一场防御性的战争外，已无能为力。即便是这样，西班牙直到1609年才最后同意签订停战协定。12年之后，战火又起。西班牙最后于1648年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终正式确认了北部7省的独立。（南部省份，在地理意义上近似于现在的比利时，继续处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之下，作为西班牙——后来的奥地利——尼德兰的属地，直到1794年。）

尽管没有西班牙官方承认的庇护，但联合省份自1579年乌特勒支联盟成立以来，几乎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行使权力的。新生的政府是共和制，没有任何超级权力的存在。在联盟的形式下，每个省份都有权通过自己的省议会处理其内部事务，同时像曾在西班牙王室统治下那样，向中央的联省议会派出代表以协商有关联合省集体利益的事宜。在参议院里，来自于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荷兰的贵族与自治市民享有最有力的发言权。

联合省任命了一位军事领袖即执政者，他毫无疑问是奥兰治家族或与其联姻的纳索家族的王室成员。早在反叛初期，奥兰治家族的威廉当政时，这个职位就已经被确定下来。执政者的贵族出身使其享有这个职位所必需的军事训练和崇高威望，但是他的贵族血统并不能提供给他超级的地位。主权仍然牢固地掌握在省议院的手里。

联省执政者和行政机关们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不是能轻易获得的。奥兰治家族的威廉去世后，他的儿子，纳索的莫里斯，被任命为荷兰和西兰岛的省长。他的行政搭挡约翰·范·奥登本尼维尔特是荷兰参议院的主要负责人，还兼任共和国的首席大臣。最初在前几年反对西班牙及前些时日的独立战争中，他们两人的合作是颇有成效的：莫里斯的军事才能使西班牙人走投无路，而奥登本尼维尔特这个完美的政客创制了一系列政策，使联盟有牢固的基础，并同友好的外国政府协商合作。

但是两位领导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深藏不露。奥登本尼维尔特代表的是荷兰的金融寡头，他们不需要任何更高的统治力量；莫里斯王子更接近于荷兰贵族，他们中的一些人则希望新政府能成为一个奥兰治家族统治下的君主国。当然他也是普通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的保皇倾向，如果有的话，就存在于他们对那些控制着城镇、操纵着地方官员、并且攫取着巨额财富的贵族的忿恨之中。

莫里斯一直对1609年与西班牙签定的协约不满，他更希望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敌人也被迫退出南部诸省，从而使整个尼德兰都获得自由。他的支

持者是最狂热的加尔文教派的牧师们，这些牧师当时把冲突看作是一场反对天主教仇敌的圣战。但是，奥登本尼维尔特与他的拥护者持同样的实用主义观点，支持停战协定：该是通过贸易重新积累财富的时候了。

结果表明，宗教酿成了奥登本尼维尔特的失败。随着为了生存而反罗马的战争的胜利，内部的分裂威胁着新生的改革教会。在荷兰的加尔文教派中，有两种倾向纷争不已；最突出的分歧在于是否一个人的罪孽使他或她从此远离天堂。根据严格的加尔文教教义，上帝的选民数目和名字在创世之初就已经被确定下来了，所以个人的德行无足轻重。

奥登本尼维尔特所在的宗派团体阿美尼乌斯代表一个更为自由的教派，该派对于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赋予更高的价值。他们崇尚更大的宗教宽容，反对那些主张将天主教徒、犹太人和持异议的新教教徒清除出国土的极端分子。他们的信条是："在本质上一致，在有疑问的事情上自由，对一切事物宽大为怀"；这一信条被极端的加尔文教徒所蔑视，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占有着真理。

1618年，麻烦来了。一个冬天的早晨，海牙大街上堆起了五个和真人大小的雪人，代表着奥登本尼维尔特和四个领头的自由主义同党。成群的顽童向雪人投掷石块和雪球，一边像唱圣歌般地叫着，"阿美尼乌斯教徒是地球上的瘟疫，他们的房屋是火精的巢穴！他们该上绞架！"之后不久，许多城镇发生了暴乱。奥登本尼维尔特代表荷兰省议会方发布命令，允许省内的社团召集特种民兵去恢复秩序。荷兰议会受反阿美尼乌斯教派和莫里斯的操纵，命令所有因此而集结的部队遣散。奥登本尼维尔特本人被指控蔑视荷兰议会的意志，被逮捕入狱，草草审判后，被判为卖国贼而处以斩刑。其他一些杰出的阿米尼乌斯教徒，包括一些著名的荷兰学者和教师，被斩首、入狱，或流放。

然而，奥登本尼维尔特的死对于宗教宽忍的主张者来说只是一个暂时的倒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政权来行使检察权，无论是公众意愿还是政治机器都无法制止异端观念的传播。各市政机关都或多或少地钳制着言论自由；一个城市的出版者所害怕触及的，往往成为另一个城市所乐于出版的。

在那个时代的欧洲能从法定的宗教传统获得自由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在其他国家里，信仰与国教不同的宗教意味着即使不受迫害，也会被剥夺公民权。得益于宽容的宗教政策，荷兰共和国拥有了与欧洲不同的良好的信仰自由的氛围。法国哲学家雷内·笛卡尔在荷兰呆了30年，发表了他的名著《方法论》及其他重要论文。人们到荷兰来寻找人间天堂。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由于其"危险"的观点被驱逐出英国后，在荷兰度过了他的流亡生涯；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因否认《圣经》是出自上帝之口而被他的犹太教友们逐出教门，他是这样赞颂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在这个繁荣的国度里，这个城市没有贵族，任何等级，任何教派的人都和睦相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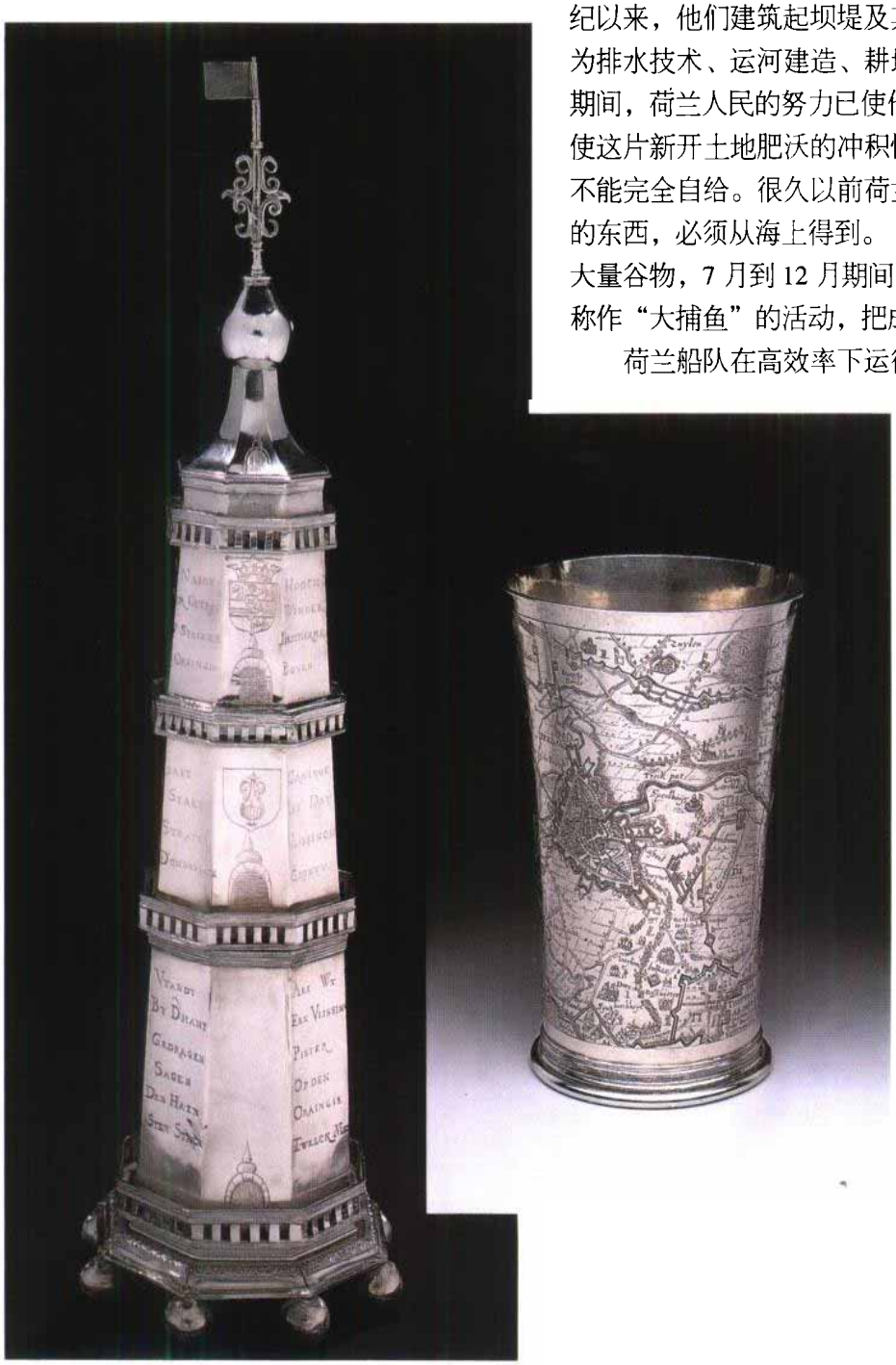
荷兰人将从执著与竞争中汲取的活力用于对财富的寻求上。新兴共和国最繁荣的地区是三个西面向海的港口省份，这里的居民以渔业和海运贸易为生。更富庶、人口更稠密的荷兰省，包括了大多数的大城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德尔夫特、高德、来登、哈伦都集中在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北面的弗里斯兰岛控制着兴旺的波罗的海贸易的大部分，以及更大份额的挪威木材生意。南面的西兰有一大片多沼泽的平原和岛屿位于宜于交易的贸易航路上，它从欧洲的心脏——莱茵河、默兹河及斯凯尔特河——流入北海。

对于荷兰人和西兰人来说，大海，既是敌人，也是朋友。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建筑起坝堤及其他防御设施以阻挡海水。荷兰人已经成为排水技术、运河建造、耕地开垦方面的专家；在1590年至1640年期间，荷兰人民的努力已使他们赢得了80 000公顷新的农耕土地。即使这片新开土地肥沃的冲积性土壤能大丰收，荷兰人在食物方面还是不能完全自给。很久以前荷兰人就已认识到，他们的土地不能提供给的东西，必须从海上得到。每年他们都要从波罗的海区域的国家进口大量谷物，7月到12月期间，从荷兰和西兰出发的船只都从事一项被称作“大捕鱼”的活动，把成群的鲱鱼从波罗的海赶入北海。

荷兰船队在高效率下运行。他们的船是特殊设计的，船员可以在船上长达6个月，期间捕捉的鱼用盐腌好也放置在船内。这些船并不返回港口，而是依靠一个规模较小的服务性船队送来新鲜的食品并把桶装的鱼运走。在内地，捕渔业受其他行业支持：造船商、蜡烛制造商、批发商、绳索和帆的制造商、桶匠以及代理商。

渔业贸易也带来外国的利润，因为这些为防腐而用盐腌保存下来的鲱鱼，富含油脂，是珍贵的蛋白质来源，并不仅是在那些有许多斋戒日里禁止吃肉的天主教国家里才有市场。银光闪闪的鱼几乎成为货币的一种形式。运送到法国和德国去的鲱鱼换回奢侈品；那些被运往波罗的海地区的鲱鱼换来的是谷物。

这种船仅是引起欧洲其他海员妒忌的船队的一部分。荷兰的制船工人还发明了那个时代最好的载货船，它



一个塔形的银制盐瓶和一樽雕刻精致的大酒杯记载了在同西班牙人长期作战时荷兰的几次胜利情况。在停战12年以后，西班牙人重整军备，收复在1621年战争中失去的几省。袭击一个还未联合起来的敌人的初期胜利果实还包括对南方要塞布拉达的占领。但是，荷兰人在一位新领袖亨利·弗雷德里克亲王的领导下重整旗鼓。他于1629年占领了赫陶吉波斯克，后来他将这个盐瓶授予一个官员，作为鼓励他在围攻期间的勇猛表现的奖赏。亨利亲王继续为攻取堡垒城市马斯垂克特而努力，此后，根据大酒杯上的记载，他在一场战役中最终重新夺得了布拉达。

造价低——在船场里。大批的生产技术和升降机以及风力锯木机的使用降低了劳动成本——并且易于操纵。由于船具简单，配备了绞盘和滑车装卸货物，使用的船员要比其他船少：船上10个水手所做的工作相当于同等规模的英国船只上30名水手的工作。低额的工资和廉价的食品供应意味着荷兰船主要比他的竞争者少花一半的货运费用。这使国外的商人产生了一种商业意识，买或租用荷兰的船只，而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船只。

荷兰贸易活动的根基是阿姆斯特丹。该城一度是波罗的海贸易的先驱，但是它在17世纪初惊人的增长，实际上是得益于战祸。它的主要竞争对手鹿特丹港口，在战乱期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部分贸易落到了阿姆斯特丹之手。与此同时，阿姆斯特丹还从那些移居到北部城镇的成群的南方难民身上获益。有些难民是加尔文教徒，因宗教的原因而北迁；其他难民则希望到这块已经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自由的土地上来碰碰运气。这些逃亡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带来了商业上的精明、资金、活力、智慧以及众多的商业天赋。

得益于新的重要地位，阿姆斯特丹逐渐成为所有原料中最有价值的原料——金钱——的中心。1609年，也就是与西班牙签定停战协定的那一年，该城的投资者建成了交易银行以帮助荷兰商人们互相通商。同年证券交易所也建成，交易所的柱廊及其石制的回廊庇护着每一个金融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在一个柱子的阴影下，波罗的海的谷物商人聚集在一起；另一个柱子附近，新兴的东印度贸易的投资者们交流着他们旅途中的信息。这是一个令人发狂的市场，在吵闹的讨价还价声中，交易成交了，股票买卖完成，冒险的伙伴也找到了。

荷兰很早以前就主张联合起种种金融力量，而不是靠单个的创业人去蛮干。为了集中资源、减少冒险，投资者们在每一项海运计划中都结成财团。1599年具有先导性的东印度香料船队就是这一联合事业的成功范例。丁香和肉豆蔻粉的原产地是摩鹿加群岛——爪哇东北面的小群岛——在16世纪时独此一地出产。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香料经由一批各自承担一部分航程的商人之手传到了欧洲。数不清的财富等待着那些不需要任何中介人的贸易者。这是阿姆斯特丹9名最有钱的商业巨子的目标。他们在一个隐蔽的酒馆里进行了多次秘密会晤，筹划成立远方公司。

1602年3月，他们首次成功的探险已经过去3年了，远方公司的老板们建立了一个更大的联合财团——东印度联合公司。该公司的目标是减少荷兰探险者之间的竞争，集中力量，确立在香料及任何其他商品方面的越洋贸易垄断。像排挤已经在东方很活跃的葡萄牙人和英国人一样，荷兰人也计划着在亚洲击败当地的商人。

东印度公司并不是简单地期望通过提供更优惠的条件和商品来达到目的。国家政治首脑授权东印度公司可以发动战争，缔结和约，建立据点和招募文职、军职和海职人员，所有这些人都要宣誓效忠公司。正像公司在东印

度的掌管者简·皮特斯祖恩·库恩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从事贸易，也不能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进行战争。”

首先感受到这一政策的压力的是葡萄牙人。他们已经在东印度驻足了一个世纪，但是葡萄牙人在这些地区的统治现在正被削弱。他们的精力被国内的战争消耗殆尽，他们的航海技术也不如他们的荷兰对手。当两国的武装商人在海战中角逐时，荷兰取得了胜利。

葡萄牙人相对容易对付，但英国又带来了更大的问题。一段时期内，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试图合作。但是，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出台的这一政策，并不能使远在巴达维亚的简·皮特斯祖恩·库恩满意，他的公司新建的贸易基地在爪哇岛。每一次表示合作，他都提出一个富有野心的合作计划，因为他深知他们所要求的财政支出远超出英国人准备提供的数量。当这样的花招失败后，他下令对英国商船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捕获了好几艘船只。对于英国人来说，最后的挑衅是1623年，库恩的部属逮捕了蔷薇岛上的8名英国人，严刑拷打后，又以捏造的罪名处决了他们。自此，英荷的伙伴关系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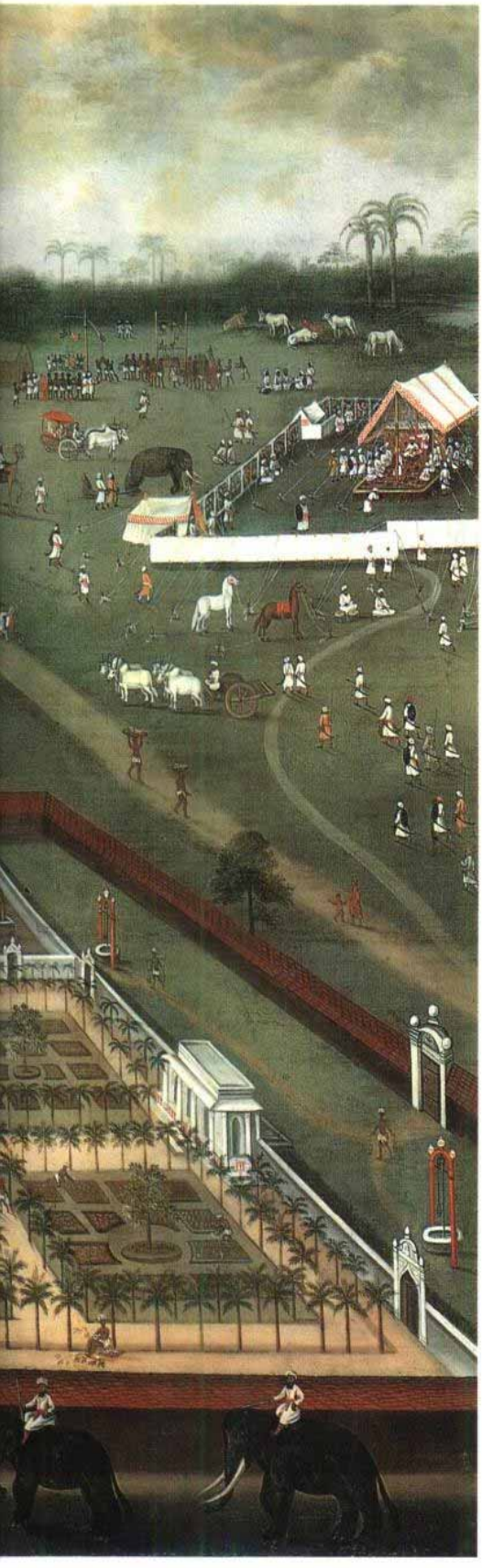
荷兰货船的模型，用英语化的语言形容作“飞船”，它是为未来的真船的主人建造的。这样的船只横梁宽阔、结实而适于航海，是欧洲载运大批货物的最好船只。荷兰的先进船厂用风力锯木机和标准的部件建造出来的船只既坚固又便宜；巧妙运用绞盘的船具设计使对船员的水平要求降低。他们的商业竞争对手们的船只因防御装备而负荷过重，荷兰的飞船并不装备大炮，如果需要防卫，他们有战船护航，节省的空间用来多装货物。这样荷兰的船主就能通过削价与他的竞争对手抢生意，于是，荷兰人在欧洲大型货运贸易方面形成了难以匹敌的优势。



除了清除他们的所有欧洲竞争者外，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决心阻止任何大规模的内地公司对其贸易垄断的削弱。全面控制整个东印度是不可能的；成千座岛屿散布于一块东西长4 500公里，南北达2 000公里的地区。但是库恩和他的同伴建立了一些战略据点，一些人员和船只驻扎在这里以堵住通往群岛的入口。至少，被扣押的未经授权的船只的货物遭到没收。通常情况下，那些向荷兰人挑衅的人的命运更为悲惨；当班达群岛的居民违抗荷兰东印度公司禁止向爪哇人供应粮食的命令时，荷兰人发动了一场突袭，15 000班达人被屠杀或被卖为奴隶。

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没有荷兰航海者的足迹。与世隔绝的日本统治者也被这些黄头发的外国人所震动，以至于给了他们在日本领土上建立一个贸易站的特殊权利，这一权利一直延续至1853年。在好望角，荷兰人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以新鲜的生活物资供给东印度船只。几年之内，被称为布尔人的具有独立意识的殖民者，到内地去寻找新的牧场。北美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于1611年在曼哈顿岛上建立。一些居民，如农场主亨利·哈德森，靠耕种以英国探险者命名的沿河肥沃的土地而欣欣向荣。其他人作为走私者也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他们向附近的英国殖民地提供削价的商品，这些买主也无视他们自己的国家禁止与任何国





一幅1665年的图画展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胡弗里河上的贸易站，它防守严密的货栈以几何学的精确度展现出来。仓库是成就荷兰东方贸易霸业的基础网络中的关键环节。通过这些贸易站，荷兰的船只在摩洛哥、巴达维亚——现在的雅加达——甚至远至东方的中国和日本之间川流不息，带回来香料和上等丝绸等有价值的物品。到17世纪末期，荷兰已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锡兰岛和南印度的重要地区。

外商人作交易的命令，愿意购买。

1616年荷兰人又在南美、西圭亚那赢得了据点。荷兰西印度公司不久就建立起来向加勒比海地区的西班牙的葡萄牙的统治发起了挑战。东印度公司从西非掠夺奴隶，卖往劳动力短缺的美洲殖民地，藐视了西班牙对此的垄断企图。像支持贩卖奴隶这一冒险活动一样，公司还提供资金给私掠船船员，去抢劫西班牙居民和他们的商船。最能增加公司士气和财富的，是1628年爱德华·皮尔特·海恩对载满珠宝的西班牙船队的劫掠，该船队装载着从墨西哥矿井开采的银子。这些战利品价值1100万荷兰盾，足以支付正与西班牙再次交战的荷兰军队当年开销的三分之二。

当皮尔特·海恩和他的同伙驱走西班牙船只后，他们的许多同胞都同意跟他们的敌人作交易。在长达80年的公开或私下的敌对后，荷兰商人继续谨慎地或大胆地与西班牙人进行贸易活动。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赞成这种做法。但是当执政者向这样一位商人提出忠告时，这个商人抗议说，如果能获利的话，他甚至愿意把他的船开往地狱或冒着把他的船只烧焦的危险。

到17世纪中叶，年轻的共和国的商业霸权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从西伯利亚到好望角都有荷兰商人活动。在离荷兰较近的地方，通过波罗的海海峡的荷兰船只的数量是英国船只的13倍之多，运送着波罗的海国家的谷物和木材的四分之三，以及瑞士出口的金属的二分之一。没有哪一个西欧消费者不与荷兰的活动发生联系。在一个富裕的伦敦或巴黎的市民家中，来访者很可能是在一个有佛兰德挂毡的房间中受到接待，主人拿出装在中国瓷碗里的西印度糖果，邀请客人点燃一支北美的香烟，品尝斟在秘鲁的银酒杯中的德国酒：荷兰的商人和海员提供了这一切。

据一些观察家所言，这些令人喜欢的东西只是用于出口的。其中的一位英国人威廉·坦普尔说道："他们是印度香料及波斯丝绸的最大货主，但自己却穿着粗呢衣服，吃着本国的鱼和根菜……他们能提供极端的奢侈品，但他们自身从未拥有过；也从未体验过旅行的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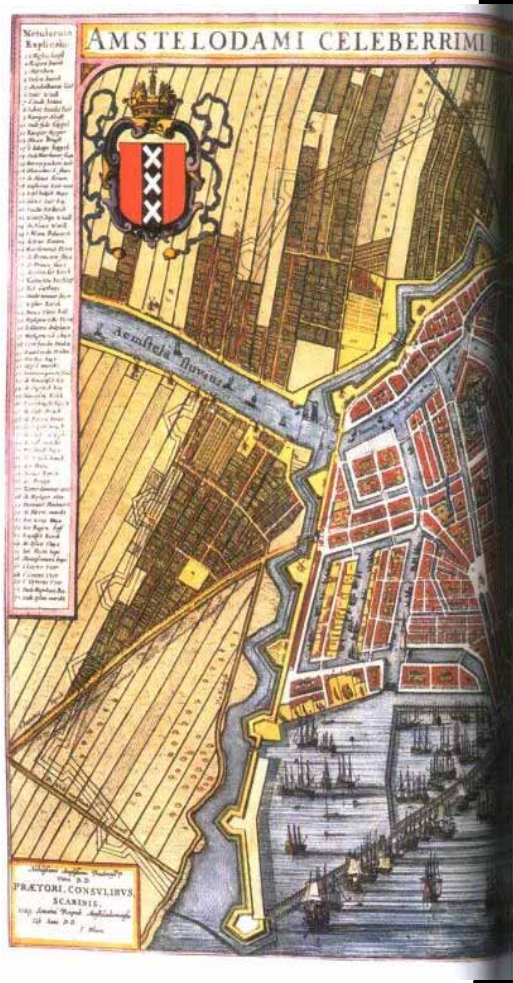
坦普尔的断言只对了一部分。荷兰和西兰的加尔文教徒或许有节约简朴的名声，但是他们远不是苦行僧。为了保守私家的秘密，他们对日益升高的收入很少露出欢喜。即便是中等收入的家庭，也都有安放陶器的壁橱，装满家用亚麻织物的深柜或装饰华丽的箱子，其质量和数量都表明着富裕程度。

所有这些衣物和餐巾的洗涤和家内的清扫成了全国关心的事儿。荷兰的家庭主妇们相信这个世界应该纤尘不染，尘埃永远也别想玷污到神圣的

家庭。道卓克特的校长，皮尔特·范·戈德威克在一首诗中写道，一位行政官员的女儿宣称："我的刷子是我的剑；我的扫帚是我的武器。"

在她们精心照管的屋子里面——从高高的窗户射进来的一束阳光照耀着宁静的房间，嵌着光滑瓷砖的墙壁，映射着铜器的光亮；整洁的后院铺着砖块，通向一个狭窄的有围墙的花园——都是他们值得骄傲的事物，像画中细致描绘的那样，富裕的市民争先恐后去装饰他们的墙壁，并不只是富人才喜欢墙上的图画。一位1640年抵达的英国旅行者赞叹道："就连铁匠、鞋匠等也会在他们的屋子里或棚店里装饰上一些画或他们自己制造的东西。这些城市居民最普遍的观念、倾向和喜好就是绘画。"

热情的公众对颜色、现实主义的细节和他们自己生活的映象十分热衷，使绘画艺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任何规模的城镇都有它自己的专业画家团体，这些男人和女人被看成是普通的商人，倒更像木匠和瓦匠。他们努力迎合各种绘画的大量需求，从平常生活、圣经的故事、到乡村风景、海战、酒馆和赌场的下层生活，来者不拒。这些画通常是最廉价的，是为社会下层而创作出来的，但即使是最精致和矫饰的作品，相对来说，价格也不很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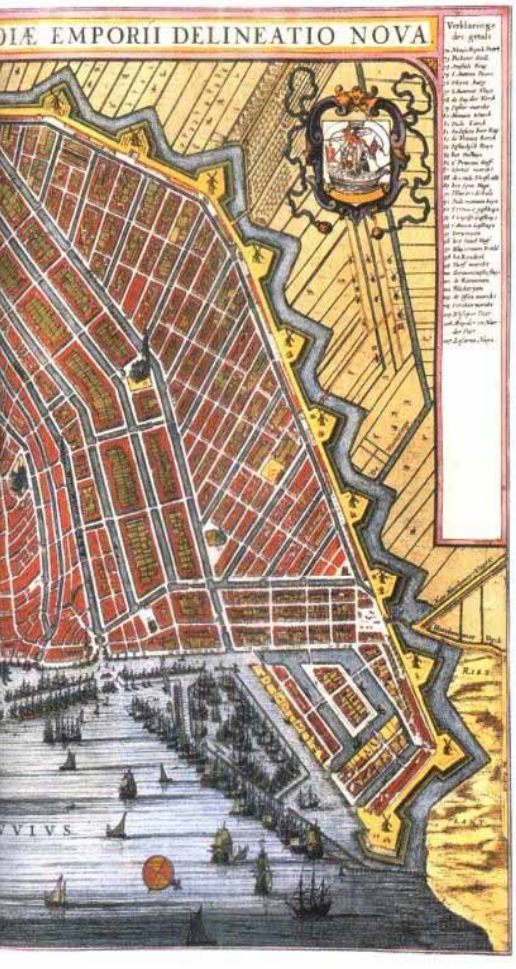


当个人和公共组织一样开始收藏时，许多绘画被卖到国外。在东印度贸易货栈的荷兰商人为他们的海外居民订购绘画。本地的亲王为布置宫殿而购买。随着荷兰画家声名远扬，英格兰、法国和苏格兰偏好此道的绅士则通过代理商来获得这些艺术品，或者在他们旅行时收集。聪明的荷兰收藏家认识到，世界其他地方极其渴望得到的东西可能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尽管伟大的艺术家不断地死于贫困，但他们的绘画作品的价格却渐渐上涨。

原因之一是一个受束缚和拥挤的国家，缺少灵变的投资机会。游历了荷兰共和国的英国人约翰·伊夫林在日记中写道："绘画的收藏和价格的低廉源自土地的缺乏，无法运用他们的财富。所以一个普通农夫在一幅画上投资2 000或3 000英镑是很平常的事。"

伊夫林的判断可能低估了荷兰市民

正如这张 1649 年的地图所描绘的，到 17 世纪中叶，正在膨胀的阿姆斯特丹已发展成一个有 15 万人口的大城市。它已超过了护城的堡垒，安在通风良好的城堡上的风车正在磨碎居民的谷物；一条新的要塞线（在画的左边）为适应进一步扩张的需要正在计划中。有 1 000 艘以上的远洋轮船以阿姆斯特丹为母港，它以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而自豪，从这里出发，运河网可以把货物运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有一系列的闸和大坝，这些水路也有助于保护阿姆斯特丹免于洪水袭击：这座城市平均低于海平面 3 米多。



的美学观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寻找时间享受精神生活。在被称作辩论会的地方文化团体中，智慧争辩的乐趣成为一种社会时尚。这些进行诗歌竞赛、组织业余戏剧社和正式讨论的社团组织遍及整个共和国。每一个社团都制定了自己的仪式和标志，通常选择一种植物或花作为它的名字。来登以有三个团体而自豪——棕榈树、百褛斗菜和桔黄百合；阿克玛是绿月桂树的故乡，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以白薰衣草和蔷薇为标志的社团。社团通常在周日礼拜后聚会，成员们用一轮一轮地喝啤酒或烈酒来刺激灵感。社规各不相同，但大多数社团要求他们的集会完全以诗的形式进行——甚至喝酒的规则也要按韵律作出。

文学修养较低的市民在娱乐性的俱乐部和贸易组织中找寻友谊。音乐社团提供音乐会和社区演唱会；地方民兵的社会意义超过了军事的意义。思想近似的外向性格的人的每一次集会都为每隔一段时间举行的庞大的宴会提供了理由。阿姆斯特丹商人的一个社团，圣马丁行会，组织了一个持续了两整天的宴会。

在这种美好的生活中，穷人没有被遗忘。慈善事业是公众的责任，有许多商家参与，合作进行。男女贵族会议监督由城市资金和个人遗赠所支持的济贫院、孤儿院及其他机构。地方长官或自愿团体，包括辩论会以令人眩目的奖励发起了大规模的公众抽奖活动，来为公益事业筹款。金链、银餐具和花边裙子这些物品以抽彩方式出售以帮助哈伦的年老贫民修建新家，或为埃哥蒙德·安·季遭受洪水袭击的渔村里贫穷的寡妇集资。彩票卖出了成百上千张，钱不多的潜在参与者就以物换票：成袋的泥碳、干酪饼、酒、丝绸和绘画都可以生利。

不论共和国更有修养的居民的希望是什么，共和国仍然远未达到理想境界。大部分人口没有享受到新发现的繁荣。在弗里斯兰及遥远的乡村省份上伊塞尔，构成人口百分之一的贵族家庭的一个小圈子掌握着这个地区几乎一半的财富。在荷兰和西兰更富裕的商业省份，乞讨者仍然流浪街头，而工人和工匠则需拼命工作以养家糊口。整个共和国内，如果收成不好、通货膨胀，就能把不太富裕的地区带向贫困的边缘，因为一种依赖对外贸易的经济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

国家也不能逃脱政治风暴。到 17 世纪中叶，荷兰城市贵族与奥兰治家族之间的关系已经日趋恶化。1647 年，威廉（沉默者）的孙子奥兰治的威廉二世就因荷兰省议会拒绝同意其向西班牙发动又一次军事行动而与议会发生争吵。议会打算结束使财力耗尽并有碍贸易的战争，并希望看到执政者过于庞大的军队——大部分为外国雇佣兵——能削减成规模适中的国内防御力量。

联省执政者与省长之间，省议会与联省议会之间的力量平衡仍然很微妙。当威廉就职时，紧张局势达到了顶点。他在其他六省都得到了大力支持，只有荷兰一省反对他。1650 年，荷兰省议会解散了驻扎在荷兰省的军

队，并用其资金偿付了损失，以此来藐视威廉。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的威廉对于这种干涉其权力的行径非常愤怒，在联省议会不太同意的情况下，他以叛国为由逮捕了6名荷兰省的代表，并派出10 000人的部队突袭了阿姆斯特丹。

但是，士兵们在一个浓雾笼罩的夜晚在城市附近的沼泽地中迷了路。他们被一个来自汉堡的带着信件的信使发现了，他向阿姆斯特丹报告：某外国部队正向该城开进。黄昏时分，当奥兰治的部队到达城墙时，发现城门紧闭。双方都感到很诧异。军官惊讶的是他们的夜行军竟被发觉，阿姆斯特丹人惊讶的是入侵者竟然是荷兰人。

几天内，双方达成了暂时妥协，阿姆斯特丹当局同意将最好斗的反奥兰治家族分子驱逐出市政府；威廉则保证无条件释放6名被捕代表。联省议会决定从此以后，在有关集体事宜的决定中，应征得所有七省的一致同意。然后开始与威廉谈判削减军队的问题，议会坚持首先应削除外国雇佣兵。

几星期里，双方陷入僵持阶段。威廉继续发出反西班牙的战争喧嚣，传闻说他正与法国密谋发动一次政变。全体国民都屏住呼吸，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这时，上帝出面干预了。年仅23岁的威廉染上了致命的天花，几星期后死去了。他的寡妻，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之女，在几个月后生下了一个男孩。

联省议会没有选举继任者，结果是为期22年的政府空白期，在一些人眼中，这是“无执政时期”，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真正自由”的时代。在这段空位期，荷兰省政治首领、省议会议长，成为共和国最有权力的人物。最高军事权掌握在联省议会手里，其成员有权在战争期间任命陆军元帅或其他主要官员。

不可避免地，要求动员的呼声越来越高。1651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航海条例》，该条例禁止荷兰从本土以外的其他地区向英国或英国殖民地运送货物，这是对荷兰商业的直接打击。荷兰派出代表与英国进行谈判，但是，当双方代表来到谈判桌前时，两国的海军司令，荷兰海军上将托姆普和英国海军上将布莱克，都接到了作战命令。

布莱克受命摧毁荷兰共和国最重要的波罗的海贸易。他同时受命逮捕从东方返回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人，并全力进攻英国和苏格兰沿岸的荷兰鲱鱼捕捞队，将他们所俘获的船只和捕获物全部没收充公。托姆普的使命是击败英国人，保护所有这些易受攻击的运输工具。他在接受任务时烦躁不安。他向联省议会抱怨道：“我本应得到两项任命中的一项：或搜寻敌人或给船队护航，双管齐下有极大的困难。”他的国内上司要求他主要侧重于保全贸易、船只和财富，他则想采取攻势，他问道，当一个国家能享受全部胜利果实时，为什么要停下来采取守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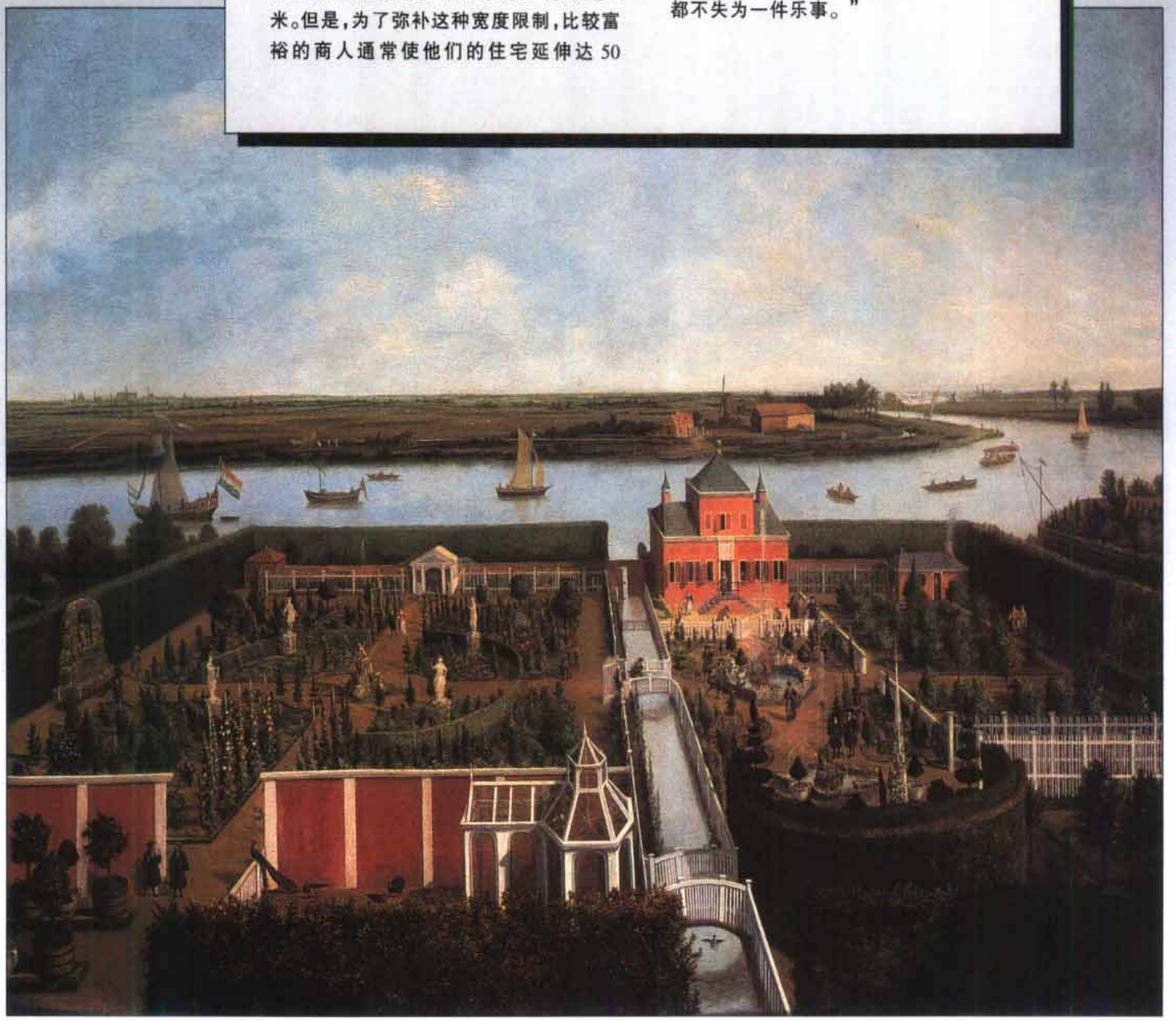
荷兰拥有更多的船只和更好的海员，而且英国的海港又较易轰炸和封锁。英国人——拥有更好的战舰和更猛烈的火力——尽管其上兵在巡查联省

井然有序的家庭世界

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贸易共和国，17 世纪的荷兰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巨额财富不体现在王公贵族的豪奢的宫殿，而是在中产阶级商人的房屋上。花费在这些建筑上的荷兰盾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城镇住宅通常较狭窄，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在该市，人人都想住在前面有河渠的房屋里，那里的法律规定住宅的宽度不得超过 8 米。但是，为了弥补这种宽度限制，比较富裕的商人通常使他们的住宅延伸达 50 米，把住宅装饰得金碧辉煌，在其中摆满上等的家具。

屋里屋外都不允许有纤尘出现：房前、台阶甚至他们自己的街道都打扫得令外国游人吃惊的程度，这些外国人已经习惯于那个时代大多数城镇的肮脏与污秽了。街道是如此干净，以至一个前来参观的英国人赞叹道："就连走在（街道）上面都不失为一件乐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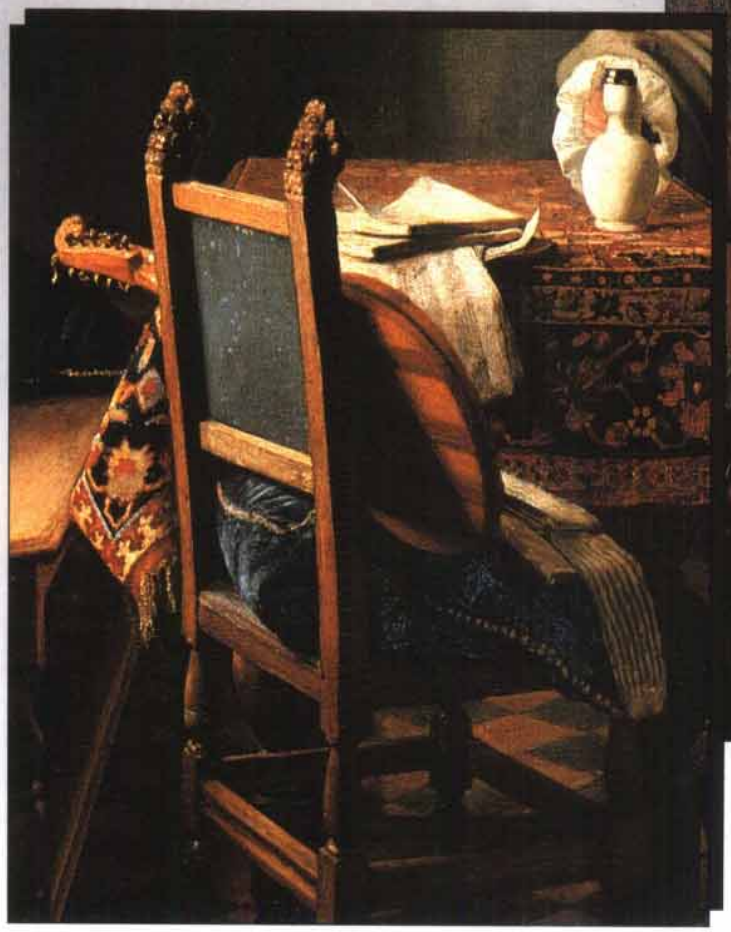
木制的高墙和修剪整齐的篱笆使荷兰堤围圩地的景色免受海风的侵袭，哈伦附近荷兰商人的乡间别墅以有精心管理的花园而著称，花园里长满了果树和装饰性的灌木丛。当时的一幅图画显示，他们通过一条暗渠进行排水并用船把水输入河中。





这幅图画描绘的是一个典型的清晨图景：一个女佣在收拾房间以前，帮助她的女主人梳妆打扮。在四柱式的床后——或许是这房间里最昂贵的家具——这一个洗手间，带有封闭式的马桶——内有便壶的木制桶。





荷兰画家维尔美的《拿着酒杯的女孩》这幅画的局部细节所描绘的是：一块土耳其皮毡被用作桌布，在一把有皮制靠背的椅子上有上等的丝制坐垫，上面放着古琵琶。东方制的地毯通常是如此细致、如此昂贵，以至于很难把它用作地毯。

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进口来的东方地毯，是奢侈的物品，只有有钱人才用得起。

黄铜制的吊灯从尼德兰出口到许多欧洲国家。吊灯挂得较低以利于采光。

17 世纪的镜子变得更大、更富于装饰性了，这是平板玻璃出现的直接结果使然。





维尔美尔在另一幅画中细致地描绘了 17 世纪的一种流行趋势，那就是在彩色玻璃上展示代表家庭的盾形纹章。薄玻璃板制作带来的问题是窗子必须由许多小窗格玻璃组成，而荷兰的工匠通常用他们高超的技术设法把不利因素变为有利因素。

在依曼纽尔·德·怀特《有妇人弹键琴的居室》这幅画中，家庭条件优越的荷兰女主人找时间进行音乐训练，而她的丈夫还在床上悠闲地躺着。穿进两道门廊，一个女佣正在做着大多数荷兰家庭妇女的日常工作：打扫房间。

键琴仍旧是一种新奇的东西；许多人们认为键琴所提供的在室内进行音乐表演的机会是美妙绝伦的。

共和国的海岸线时在狭窄的船舱内发生了叛乱，还是实施的封锁。托姆普上将在试图突破封锁时死去。尽管英国人是名义上的胜利者，第一次英荷战争实际上以双方均未真正满意而告终。

17 世纪 60 年代末，双方再次发生战争。英国人并不掩饰他们的企图。统帅英国舰队的艾尔伯马力司令官说道："我们要得到的就是比荷兰现在拥有的更多的贸易。"但是这一次荷兰的士气更振奋，它的海军战略也更清晰。战争没被限制在国内水域；双方在东、西印度、美洲海岸、以及非洲西部地区展开了激战。

在一次大胆的进攻中，德·鲁特上将率领荷兰突击队到达麦得威河，这条河的港湾深入到英国的肯特城内。突破穿越水道的重重阻碍，上将的勇士们猛扑向停泊在那里的舰队。他们焚毁了部分船只，其他的被掳作战利品，英国的主力舰皇家查理号也在其中。拖着这些战利品，在英国人愤怒的惊视中，入侵者安全返航。1667 年 7 月，两国政府协议停战，这次是按照共和国的条件签订的协议。

由于海战几乎不停，因此联合省被一些威胁到它们作为一个共和国的身份的事件震憾了。整个 17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政治的延续性和稳定性都有赖于荷兰省议会议长，约翰·德·怀特。德·怀特以令人钦佩的说服力和政治敏锐感使共和国的财政井然有序，加强和重组了海军，并在第二次对英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他还以自从奥登本尼维尔特时代再未出现过的技巧和方式指导了内外政策的制定。但他也树立了敌人，尤其是在奥兰治派分子中，他们希望有一天年青的威廉三世能继任他已故父亲的职位，成为联省执政。

在联省议会内部，德·怀特和他的支持者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共和国在没有联省执政者的情况下充满生机，国家所欠沉默者威廉及其奥兰治继承人的债务现在已全部偿还，他们再也不认为那个被夸张的职务是必不可少的了。然而，当联省议会负责对王子的教育时，德·怀特赞同以治国方策来教导他。作为英国国王的孙子和另一位国王的侄子，小王子对他的王室血统有着敏锐的意识。但是他对德·怀特非常尊敬，他后来承认德·怀特比起其他的监护人给了他更多的有关这个世界的知识。

周边国家对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继承人上的争斗也颇感兴趣。因为现在的荷兰是欧洲权力政治棋盘上一个重要的角色。英格兰的查理二世最近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他希望英国与荷兰的战争能削弱荷兰的共和制政府，以便为他的奥兰治侄子登上王位开辟道路。

法王路易十四世则渴望阻挠奥兰治派掌权，他担心荷兰与英国关系的任何改善都不可避免地会对法国造成威胁。同时，法国本身正陷于反西班牙的战争中，1667 年 5 月，法国军队开进西属尼德兰。荷兰和英国意识到，法国对于它们任何一方的威胁都要比它们彼此之间的威胁更大更危险。于是他们

很快达成和平协议并与瑞典组成三方联盟以结束法西战争。

为了打破这一联盟，路易十四开始向查理二世献殷勤。他建议说，如果英国与法国联合对荷兰作战，对英国的财政和政治将大有裨益。1670 年，两国君主签订了多佛尔协议，决定铲除德·怀特，颠覆荷兰共和国，把荷兰变成查理与路易联合操纵威廉执政的傀儡君主国。

尽管英国国王与年青的奥兰治王子之间有着亲密的个人关系，威廉头脑清醒，而非一味相信他的叔叔，他不愿以牺牲荷兰的独立换取王位。他也是一名虔诚的清教徒，这位王位继承人长期以来一直是新教教规的忠实执行者；他的英王叔叔把他的喜好置于威廉的喜好之上，表现得过于像天主教徒，而路易首先是一个坚定的信仰天主教的国王。

多佛尔协议签订后两年，危机降临了。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没有一个军事领袖，荷兰就无法行动。威廉被任命为总司令，与他年长的导师合力组建军队，这一任务迅速完成。20 年来，德·怀特使国家的财政运行良好，因此有足够的资金及良好的信誉，从而组织起必要的军队、武装和供给。

4 月，法国宣战。两个月后，法国军队沿西属尼德兰边界开进，穿过德国的莱茵河，从东面进入荷兰联合省。法国部队在中途强行通过乌特勒支地区时，荷兰人放开闸门，使洪水流向低地地区以延缓入侵者前进的速度。

面对共同的敌人荷兰人不但没能团结一致，反而发生了内讧。共和国到处发生叛乱；目击者看到叛乱分子中既有相当地位的市民，也有与公共秩序混乱有关的无赖。在一些肇事者背后可能有国外的煽动者，谣传也是如此。

在经过阿姆斯特丹的街道时，德·怀特遭到了四名身份不明、穿着讲究的年青人的袭击。他被打得半死，不断流血的伤口好几个星期后才愈合。当德·怀特养伤时，联省议会马上派出使者去见宿营在乌特勒支省的路易十四，答应在赔款和领土方面作出巨大让步，以换取和平。掌握着优势的路易十四等待着更好的时机，拒绝和谈。

奥兰治派坚持认为，如果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来指挥，共和国就不能击退敌人，要求再次任命威廉为权力更大的荷兰联合省执政者。威廉上任后不久，一项败露的丑闻表明了威廉毫无服众之力。

约翰·德·怀特的弟弟科恩利斯，作为荷兰省的行政长官和政府的资深成员，被控告密谋刺杀亲王。这一指控是伪造的，提出者是一位声明狼藉的外科医生兼理发师，曾因抢劫罪被科恩利斯审判过。即便在严刑拷打下，科恩利斯也没承认他根本就没干过的罪行。但是他哥哥的强大的奥兰治派政敌抓住机会，说服或是强制法官进行了不公正的审判。在这一期间，德·怀特已经伤愈并辞去了公共职务。

尽管科恩利斯·德·怀特的敌手竭尽全力，法庭仍然不能断定其谋反的罪名成立。然而，法官剥夺了他所有的公共职务并宣布禁止他在荷兰省生活。

审判结束的那一天，约翰·德·怀特得到消息，说他的弟弟希望能把他从现在所在的监狱护送回家。当约翰·德·怀特到达监狱时，他发现监狱已被愤怒的人群包围，骑兵正在努力维持秩序。他进去不久，那些从郊区调遣来的前来镇压农民暴动的士兵突然消失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骗局。与此同时，德·怀特兄弟发现他们被包围在监狱里。请求威廉调派部队前来维持秩序没效果，执政者宣称，由于法国人入侵和遍布各地的民众骚动，他已无兵可调。

午后，暴动的群众冲进监狱，把德·怀特兄弟拖出来杀死，并把他们的尸体倒挂在绞架上。袭击者中包括杰出的奥兰治公民和国民卫队的成员。当这些当地要人离开那里时，人们把尸体放下来撕得粉碎。后来据小道消息说部分尸体被拍卖到很高的价格，在仇恨的狂欢中被煮熟吃掉。

在荷兰的城镇中，群众几近疯狂。一本小册子评论道："国王与暴民一同做主人"。来自人口中贫困阶层的许多人一直憎恶作为城市贵族集团代表的德·怀特兄弟，在他们眼里，贵族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管理国家的。暴乱者要求对共和国的政要和地方官员进行一番清洗。尽管威廉不比德·怀特更受欢迎，但他利用了奥兰治派这种狂热的激情。威廉恢复了秩序，他用自己的皇家支持者重新充实了公共职位并派他们管理国内事务，而他本人则享有最高特权：向法国开战。

执政者发动了对路易的大胆进攻。在宁静的隆冬，当敌手们暂停行动时，他率领一支部队越过莱茵河向波恩的法国主要军火库发

郁金香狂热

17世纪30年代，对于荷兰的风险投资者来说最理想的商品莫过于郁金香了。这种花卉是刚刚从土耳其引进的，在欧洲王室中非常流行，园艺家为了培养出新的品种而竞争，郁金香花的售价也很高。结果导致郁金香花和花籽以令人狂乱的盘旋上升的价格在市场上售出。在开花的盛期，花房是由武装起来的人守卫着的，哈伦的一整座房屋只能换取三株郁金香球茎。

在日益上升的市场上，每个人看起来都不甘落伍。但是，当价格达到再也找不到一个购买者的水平时，肥皂泡破灭了，许多购买者发现他们自己处于毁灭性的债务危机中——对于像小科里斯皮恩·范·德·帕斯这样的讽刺艺术家来说，这是最适合的讽刺对象，他画了佛罗拉圣母的胜利之车作为愚蠢之舟的象征。（见右图）



起了突袭。平衡被打破，法国人开始退却。荷兰人逐渐将战争扩大为整个欧洲的战争。英国人最终退了出来，法国人尽管放弃战争较晚，最后也于1678年与威廉签订了协议，归还了荷兰领土并同意降低他们用以削弱荷兰外贸而设置的限制性关税。

战争期间，威廉亲王通过与英国国王的侄女玛丽结婚加强了与英国王室的联系，玛丽是约克公爵的女儿，也是排在他父亲之后的王位继承人。婚礼使玛丽在英国成为一个比她父亲约克更受欢迎的人物，约克的天主教信仰已经警示了他未来的臣民。1685年公爵作为英王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时，威廉感受到英国新教徒要他跨海进行干涉的压力。1688年，威廉带着一支荷兰军队登上战舰，应邀前往英国。詹姆斯二世离开了英国，威廉和玛丽被宣告联合继承王位，奥兰治派得意洋洋：他们的王子现在已在欧洲众王之中找到了他合适的位置，那怕是外国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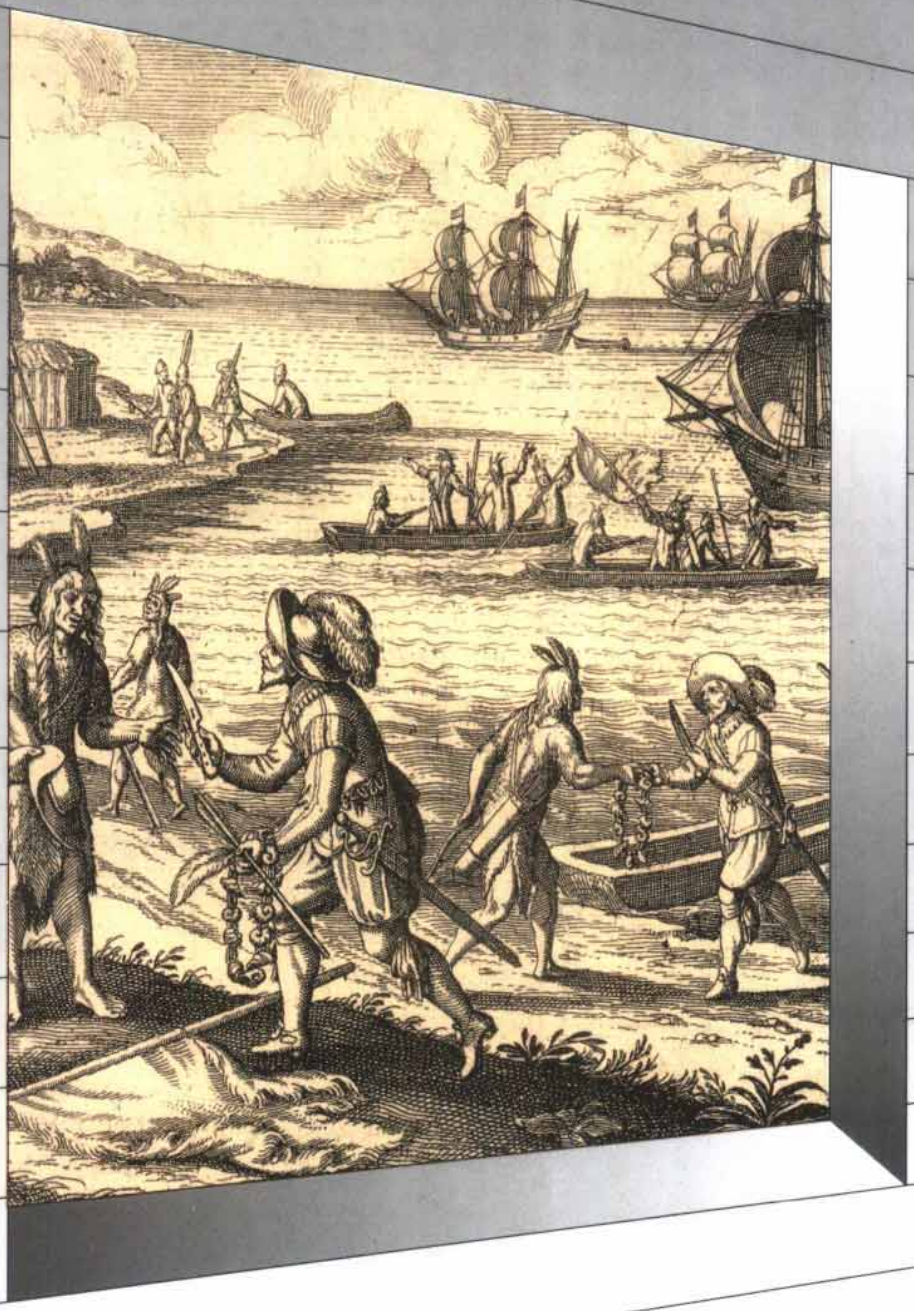
在共和国内部，他将继续担任执政者、联省议会的官方公仆，在实际上操纵着相当大的权力。由于现在其他地方也正需要他的精力，联省议会及其领导人通常有自由管理其内部事务的权力。

联省执政者变为君主是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事情，然而，在其居民眼里，荷兰共和国的金色时代看起来已接近尾声了。经济发展尽管比较稳定，但已经停止增长了。重税剥削下已使技工和企业家到外面去寻找更适于发展的环境；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逐渐能自给，较少依赖于荷兰商人；共和国所获得的重要性使它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欧洲的政治纷争，这种纷争已更为混乱。18世纪留给后人的是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上的长年争战，法国不止一次卷入其中，而且还与英国闹得不可开交。

如果穷人们因高额赋税盘剥而饱受折磨的话，那么至少贵族们还有钱可花。然而，商人们把利润再投资于新的冒险事业并过着舒适然而相对简朴生活的旧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些人有钱就建造城镇或乡村别墅，挥霍他们的财产，远离了过去使他们首先致富的那段仓库里装满波罗的海木材和咸鱼的日子。

昔日使荷兰赢得成功的那些美德正在为他们所摒弃。人们对此痛惜。一些人指责法国人通过鼓励低劣的时尚、追求奢侈的时髦而腐蚀了荷兰的活力。当然，联合省的贵族们也不再像他们共和国先辈们那样穿着严肃的清教徒黑衣，而是穿着带褶边的衣服、戴着假发了。荷兰人，像他们自己意识到的那样，正越来越接近于其他西方国民。

但如果说荷兰人正转变成传统的欧洲人的话，那么他们会表现得很满意：因为他们在处于转变的欧洲里充当了角色。他们不仅向世人提供了像黄油、乳酪和鲱鱼这样的天然物品，他们还向世人昭示了一种令人向上的价值和观念：他们证明人们可以做到既虔诚又宽容，既富有又慈善，既讲究实际又敢于幻想。他们也向世人表明一个自治的、非宗教性质的共和制政体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能够超乎想象地繁荣。



新大陆的新移民

6

在几乎不能与海面相区分的地平线上，低矮的条状土地的轮廓毫无可观之处。因为在小船甲板上，虔诚的旅客们对新大陆第一印象的描绘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幻想。在充满疾病和恐惧的67天里，他们被关在充斥着恶臭和沉闷空气的禁闭室里，内心充满了对任何陆地不可抗拒的渴望。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号在上帝指引的地方——科德角北部多沙的河湾抛锚，以躲避大西洋风暴。对102名男人、妇女和儿童来说，长时间苦难的折磨终于结束了。用他们的记录者和未来的领导人威廉·布莱德福德的一句话说就是“他们万分高兴”。

按布莱德福特的记述，在干燥的地上，新移民最终饱尝了挥动他们酸痛四肢的舒适滋味。男人们为了食物、水和居住地沿着海岸寻找森林；女人们在海滩附近含盐的水池里为集体洗衣服，而孩子们——被突然间得到的土地惊呆了——攀越长满青草的土丘，在平坦的沙滩上赛跑。

这伙人中有头脑的人都意识到眼前的一段时间里除了苦难之外什么也没有。冬季即将来临，布莱德福德注意到“知道这里冬天的人意识到他们将面对苛刻和狂暴的冬季”。他们除了狭窄且充满恶臭的船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避难之处；除了他们所带来的日益减少的食物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存粮。“除了可怕而荒凉的野地之外，他们能看到什么？”毫不报怨、客观地面对形势的布莱德福德这样问道。布莱德福德和他伙伴们在最坏的设想中，也没有预见到正在到来的冬天的恐怖。几个月后，疾病和营养不良夺走了殖民者中近一半人的生命。

在这些不幸发生的过程中，为了在不欢迎他们的大陆的边缘争取获得立足之地，他们开始修建他们称为新普利茅斯的村子。这个脆弱的定居地幸存下来并最终繁荣起来都是信心、勇气和清教徒共同的信念带来的礼物，他们也以清教徒而为人所知。经过五年不停的奋斗之后，布莱德福德给家中的一封信谦虚地写道：“高兴的是上帝赐给了种植园和平。”仅仅过了十年，布莱德福德的清教徒们环视四周就可以看到，在普利茅斯周围新崛起的相邻殖民地上空袅袅升起的炊烟。新英格兰“荒凉的野地”在迅速消退。

1620年的时候，对欧洲来说新大陆并不新。一个多世纪以来，小册子、民谣、历史书和戏剧已经使人知道，在大西洋西边有一片辽阔的大陆。16世纪，西班牙人已经牢固地盘踞在墨西哥阿兹台克人古老的土地上，并移民到

一幅佛兰芒艺术家狄奥多·德·布里的雕版画表现了1602年英国探险家巴托罗缪·高斯诺德船长在新英格兰海岸外的马撒威尼亚德岛屿登陆的情景。德·布里在欧洲发表的报道在很多细节上都是错误的：高斯诺德只有一条单船，当地居民热情地接待他等都是凭空编造的。不过，他和他所遇到的印第安人进行了成功的皮毛交易，并且回来后撰写了不少被后来的探险所证实的地区的热情报告。4年之后，他命令一艘船把移民送到了南边700公里以外位于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英国在美洲的第一个永久定居地。

在17世纪前10年，欧洲大多数的沿海国家，包括瑞典、荷兰、法国和不列颠都宣布对北美洲东部的一些地区拥有主权。但到了17世纪末，法国和不列颠在力量对比中占了优势地位；已经横穿大陆开辟了许多通路和在墨西哥建立了殖民地的西班牙，局限在佛罗里达半岛的东岸。英国和法国殖民地的格局——在地图上分别涂着绿色和黄色——反映了殖民主义者不同的发展点。英国殖民者主要是农民，他们的立足地在有肥沃土地的新英格兰、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法国人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皮毛贸易上，这使他们沿着大陆的主航道深入内陆。

南美大部分土地上，把巴西让给了葡萄牙人，但北美被相对忽视了。

伊比利亚的探险家们并不缺乏努力。他们的探险队穿过和围绕大陆进行的探寻更深更广。在16世纪20年代，葡萄牙人也已经勘察了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并尝试在新斯科夏半岛的布里顿角岛上修建定居点——从北欧海盗时代以来，这是欧洲人首次在北美洲修建定居点。西班牙人在1525年来了圣劳伦斯河，并在卡罗来纳建立了暂时的殖民地。在海上，他们到达了太平洋沿岸，也许远达今天俄勒冈州的南部边境地区。在陆地上，一支探险队从墨西哥出发抵达了亚利桑那州，遇到了大峡谷并且在落基山东面发现了大平原。另一支探险队在1539年从佛罗里达出发，到达了现在的阿肯色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包含的距离是巨



大的，花费的费用是庞大的，但是回报看上去是微薄的；没有迹象表明北美洲存在值得夸耀的银资源可以吸引欧洲人到南方的土地上。此外，土著人对他们是敌视的。因此，西班牙人对北面土地的兴趣降低了。圣胡安和圣菲，两个历尽艰辛建立的殖民地（今天的新墨西哥），是17世纪西班牙在西南孤独的前哨，圣奥古斯丁，1565年建立于佛罗里达沿岸，体现了西班牙在大陆东部的影响。

其他国家的探险家们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在北欧，新大陆主要是被当作欧亚之间主要的荒凉的障碍物。约翰·卡波特，一位意大利水手，他带领一支英国探险队在17世纪后期穿越了北大西洋，他相信越过纽芬兰就可以到达日本。他带了一封亨利七世写给中国大汗的信——当然并没有送到。卡波特在纽芬兰和新斯科夏半岛之间的浅海里发现了巨大的鳕鱼繁殖区——他声称，这里的鱼多得可以用篮子来舀。但鳕鱼缺乏黄金和香料的魅力，同时，卡波特在世时，从未评价过自己发现的重要性。

法国探险家杰克·卡提尔按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的命令："去发现盛产黄金或其他可以找到宝贝的岛屿和陆地"，于40年后深入同样的海域。然而他未能完成使命。他得意洋洋地带回法国的黄金其实是黄铁矿，钻石是毫无价值的石英。但他深入航行到圣劳伦斯湾，发现了皮毛和森林，他描述为"这些令人兴奋的不错的土地和我们事先希望的一样"。

很明显，随着第一个探险世纪的消逝，北美所提供的主要是皮毛和森林。覆盖整个大西洋沿岸平原的森林，在从劳伦斯湾到墨西哥湾的土地上形成了几乎连绵不断的20米厚的树叶地毯。山核桃树、栎树、椴树、樱桃树和其他硬木组成了南方的温带森林。在北部地区白松树和铁杉与山羊槭、槭树以及桦树混生在一起。这些并没有提供现成的财富，但对有商业头脑的欧洲人来说，很快就会想到这是储藏圆木杆、圆材和木板的巨大仓库。这里也是世界上皮毛有很高商业价值的动物的大繁殖区之一，这些动物有熊、鹿、水獭、貂——所有动物中最重要的——和海狸（见第146页）。

但英法探险家大失所望的是，没有迹象表明当地的土著人——称他们为印第安人是长久的亚洲式的错误——已经建立如西班牙人在南部开发的相当有利可图的居住区。欧洲人开始探险以前，在北美已经有了1000万土著居民。这些人分布在东海岸，以紧密联系的部落方式生活，主要属于奥尔根奎恩或依洛郭尔族语系。尽管他们耕种庄稼，有复杂的农业技术，但他们依然生活在石器时代，他们的小铜饰品对渴望得到宝藏的欧洲人没有吸引力。

由于没有易得的利益，英国人和法国人都不急于修建定居点。当他们在16世纪下半叶进行努力时，第一个实验就失败了。法国新教徒试图在佛罗里达的圣约翰河岸边定居，但他们被西班牙远征军制造的残忍杀戮驱逐走了。在今天北卡罗来纳附近的罗阿诺克岛上，沃尔特·雷利曾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他以英格兰圣洁的皇后伊丽莎白一世的名字命名为弗吉尼亚。但该殖民地100多名

所发现的白人图画中大部分都是这个印第安人的画像。右边的一组图显示一个印第安人为了打猎或者节日庆祝，用在身体上绘画的方式进行装饰；一个“飞行者”或者萨满教巫师；一个为了御寒而身穿鹿皮披风的老者。下图妇女身上装饰的文身也许是为了显示她是首领或者巫师妻子的身份。













一幅白人的图画中显示了一名印第安男子和一名妇女正在分一顿饭的玉米片——通过浸泡和煮而膨胀起来的玉米粒。玉米是主要的农作物，可以种植三次。在9月末收割完农作物以后，大多数印第安人都会离开村子去捕鱼、打猎和布置陷阱，或者去采集水果、浆果或坚果。

印第安人生活的初步印象

在欧洲人发现北美大陆前的几千前以前，亚洲来的旧石器时代的移民已经统治了这块大陆。在首批白人殖民者到达这里以前，他们称之为印第安人的人口数量已经有1000万之巨。这些印第安人分为几十个语言群和几百个部落。

与阿兹台克人和印加人不同的是，北美的印第安人没有建立起城市文明。无论是农民还是猎人，他们的生活都与他们能够得到的自然资源息息相关。这使得他们的生活不得不去适应自然界，并且对土地和野外生命充满了深深的敬畏。

欧洲殖民者首先遇到的是说奥尔根奎恩语的印第安人，他们生活在现在的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打鱼、狩猎和刀耕火种式的农业为生。

接触这些印第安人时所留下的印象是从约翰·怀特的作品中得到的。在1584年到1590年间的一系列探险活动中，这位官方画家屡次被英国大臣沃尔特·雷利爵士提升。

怀特的坡梅克印第安人村落示意图显示，这些房子的横向结构和捆绑的支架上都覆盖着草席或着树皮。这些住宅区分散在海滨和河流的两岸。每个村子都至少要容纳200户居民。这些村子中一些是没有防御措施的，而另一些包括坡梅克都由栅栏防护着。



英国男子和妇女却此后无有消息，移民团的命运依然是美洲大陆历史的谜案之一。这个插曲并没有让其他计划移民的人丧失信心，尽管直到17世纪早期第一次这样的探险活动才刚刚开始。1620年，当威廉·布莱德福特期待着新英格兰独立的时候，在北美洲，有很多人同样都持有这种想法。在距普利茅斯西南大约750公里的地方，英国人在詹姆斯敦的周围，沿着弗吉尼亚富饶的河谷，已经开始砍伐森林，种植烟草。经济作物给南方的殖民地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在远离北部的地方，有比新英格兰更为广阔的荒地。法国的皮毛商和传教士在这里进行着海狸皮的交易，人们活动的中心是今天的新斯科夏和圣劳伦斯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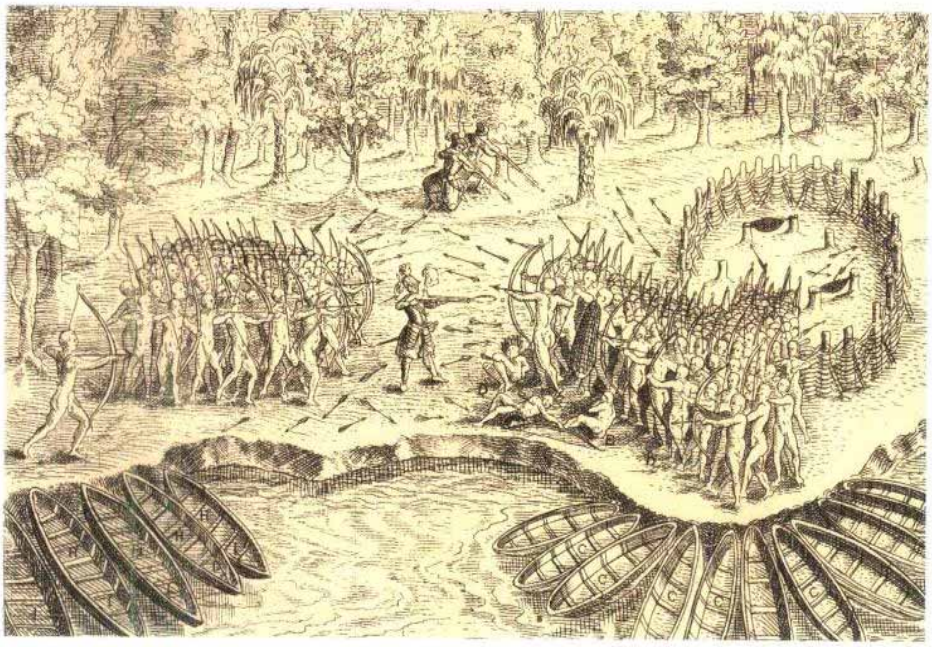
“没有任何英国人留在外国像我们留在新发现的弗吉尼亚那样悲惨”。1607年詹姆斯敦悲惨的夏季的幸存者乔治·珀西写道。在开头的几年里，饥饿、疾病和战争不断威胁着美国第一批在新世界的永久移民。

17世纪开端时，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建立给英国的政治家和贸易商带来了好消息。这块巨大的领地从今天的北卡罗来纳延伸到北部的缅因。西班牙和法国都宣布对这块土地拥有主权，但英国争辩说占领才有所有权。在与好战的西班牙殖民地保持一个安全距离的同时，在富饶的切萨皮克湾海滨建立的殖民地会提醒西班牙，英国并不怕它。

对于资助探险活动的伦敦生意人来说，詹姆斯敦同样有积极的意义。许多人都一直认为，美洲大陆只不过是把大西洋同亚洲所有财富隔离开的一条狭长的陆地。现在，弗吉尼亚的殖民地可以用作交易的地点。除此之外，一些乐观的人们还希望在北美的森林里找到大印第安王国的金银矿。更现实的是，英国商人开始意识到那里鱼类、皮毛、木材的价值，满怀着对极有诱惑力的回报的渴望，他们组成了股份联合公司。为分享更多的利益，股东们同意为新殖民地提供资金。弗吉尼亚公司的许多人将会为那天向詹姆斯敦投资而感到懊悔。

为詹姆斯敦探险队招募志愿者并不困难。年轻的英国人已经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鲁伊塔根据16世纪航海资料汇编撰写而成的生动的报道，或托马斯·哈瑞特撰写的《关于弗吉尼亚新拓土地简略而真实的报告》，这本书描写了新大陆奇异的自然景观。北美洲似乎为冒险者提供了一次过好日子的机会。

4个多月漫长惊验的旅程，或许已耗掉了冒险家的部分热情，但没有几个人能抵挡4月间弗吉尼亚美丽风光的诱惑。宽阔的河流蜿蜒穿过树林和草原，奔向大海。“这种景色让我深深地陶



图中战场中间穿盔甲的人是塞缪尔·德·山普伦，一位探险家和法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地的斗士。这场印第安部落之间的冲突发生在1609年。早些年，山普伦在较为友好的印第安人的帮助下，建立了魁北克，作为法国同印第安人之间交易皮毛的市场。为了把这种交易延伸到敌对的印第安人所控制的领地，他同三位全副武装的同伴加入了休伦族的一个战斗队，去袭击他们的敌人——易洛魁人。当印第安人被他们所不知道的武器——火枪杀死三个人后，由于害怕受到更沉重的打击，易洛魁人溃退了。这场战斗极大地增加了法国人在休伦族及其同盟者中的威望，但同时带来了一位易洛魁族这样的仇敌。最终，易洛魁人在英国人反对新法兰西的法国殖民者的斗争中站在了英国一边。

醉了”，乔治·珀西写道，他也惊异于这里所产的草莓竟然比英国的大四倍，而且更可口。还有躺在沙滩上的贻贝和牡蛎竟然“厚得像石头一样”。

随后是一系列悲剧性的错误。首先是他们的定居点——以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名字命名——建在了詹姆斯河的一个潮湿且蚊虫遍布的半岛上，这里的盐碱水几乎不能饮用，岛上最高的地方仅比水面高出 3 米。然后是无穷无尽的争吵和天生的懒散。在詹姆斯敦从事农业生产的年轻绅士们的手上很少没有磨出水泡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甚至一点劳动技术都没有。结果开垦出以供第一个春天播种、获取足够收成的土地不多。到了仲夏，储藏的咸牛肉、奶酪和硬饼干几乎已经要用完了。这个夏天许多人甚至已经在挨饿。

整个夏天和秋天詹姆斯敦的定居者中都有人死去。因疟疾以及同印第安人之间断断续续地战斗——主要是帕斯帕赫各人，定居点就在帕斯帕赫人的狩猎地上——而致死的人很少，“他们大部分死于饥饿”，乔治·珀西写道，“每天早上，他们的尸体像狗一样从小屋里被拽出来，然后埋掉”。在 6 月份还有 104 名殖民者活着，到第二年的 1 月份就只剩下 38 个人。幸存者得利于他们的机智、强壮的体魄以及印第安人施舍给他们的救济品。

更多的悲剧接踵而来。随后到达的既没有训练、也没有准备的英国绅士们和一些妇女一起在詹姆斯敦登陆了。移民团的头头约翰·史密斯徒劳地恳求母公司派来木匠、园丁、渔夫、铁匠和“伐木工”。1609 年 8 月，疾病和饥饿突然降临到大约 400 人的头上，这场危机被称为“饥饿时代”。吃人肉成了唯一的生存之道：男人们为了活命，把自己的妻子杀死腌成腊肉后吃掉。只有 60 人活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最终，一种野生植物烟草挽救了弗吉尼亚的殖民地。尽管詹姆斯国王谴责吸烟“对大脑和肺有害”，但是在 17 世纪早期吸烟已成为欧洲很普通的消遣。据时人记载，弗吉尼亚的土著人和其他吸烟的印第安人是“贫穷的和虚弱的，并且浑身充满恶臭的”。1612 年，一位有魄力的名叫约翰·罗尔夫的殖民者引进了这种珍贵的、高价的西印度植物。两年中，他在烟草种植和加工方面的实验如此成功，改变了殖民地的命运。于是每个人都在每寸可以得到的土地上种植烟草，甚至詹姆斯敦的大街上都种上了烟草。

这种经济作物的成功发现给弗吉尼亚增加了一条生活的出路。因为烟草大规模种植效益更大。英国富人也开始插手这个有利可图的行业。他们的种植园开始迅速向外扩张，超过了詹姆斯敦边界，沿着詹姆斯河滩到达内陆。英国的船长们在私人河码头收集值钱的、加工好的烟草装船运往欧洲。

地里和烟草仓库里的大多数工作都由合同雇工完成。这些英国移民同“购买”他们“劳动力”的雇主签订 3 到 7 年的工作合同。合同期满后，理论上说，一个雇工应该得到种子、工具，经常还有土地，但实际上很少有人会这么幸运。招募对象主要是欧洲的流浪汉和失业者。一些人实际上是由被人们称为“魔鬼”的代理机构骗来的。代理人从这种人类灵魂的贸易中获得

图中身着伊丽莎白式服装的女子叫梅多卡——以其昵称波卡汉纳斯意即“小玩闹”而闻名于世——她是弗吉尼亚强大的印第安部落联盟首领波哈坦的女儿。1608 年，她 13 岁时，就曾挽救过约翰·史密斯船长的性命，他是为弗吉尼亚饥饿的殖民者来寻找她父亲的帮助的。1612 年，她被引诱到英国后改信了基督教，洗礼之后所取的教名叫丽贝卡，随后她与一位名叫约翰·罗尔夫的人结了婚，这位罗尔夫因为首先在殖民地种植烟草而获得了声誉和财富。1616 年，她和丈夫一起来到了伦敦。在以后的日子，她得了天花并且因此而死掉了。五年以后，她父亲的继任者惊恐于詹姆斯敦镇殖民地的向外扩张，导致了 347 名殖民者被屠杀。从此后，殖民主义者对印第安人也施行了种族灭绝政策。





艏楼

厨房里的砖式火箱上可以烹饪食物，其后的小房供普通的水手在稻草床上睡觉。这里兼做 4 小时轮换一次的值班人员的休息室，当一个人休息时，其他人可以继续在甲板上观察。

主货舱

成袋的面粉、种子和干豆子以及装满咸牛肉和猪肉的木桶、整桶的水和啤酒占据了这里的主要空间。这里还有殖民者们在新大陆所需要的工具和武器。水手们的任务就是用滑车组从这里吊运所需的东西。

甲板间

102 名旅客和他们的行李都在这里。这里住处狭窄，头顶离甲板才 1.7 米。要依靠蜡烛和油灯提供照明，舱盖栅和射击孔只有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才会打开。为了隐藏秘密，旅客们往往在两个月的旅程中都不换衣服。



船长室

克里斯托弗·琼斯，五月花号的船长，在这里睡觉，制定这艘船的航线。

大房子

这里供船上的五位官员使用，他们和船长一起在铺着亚麻台布的空桌上，使用铁制的刀叉餐具和锡制盘子进餐。这里同时也是船上医生和大副睡觉的地方。

压舱石

1620 年 9 月 6 日，当五月花号载着移民新大陆的清教徒们离开英格兰的时候，这已经是它第三次启航去美洲了。船上的清教徒们原来打算乘两条小船进行航行，但是叫“斯必德威尔”的小船两次漏水，迫使这两条船返回了英格兰。大约有 20 名士气低落的清教徒放弃了这次冒险的计划。102 名男人、妇女和孩子勇敢地继续了这次横渡大西洋的危险行动。

五月花号是长约 32 米的三桅杆商船，有 25 名船员。大约从 1609 年起，它就已经在英法之间从事酒类贸易，这使它获得了“芳香之船”的美称，但是由货物产生并排向船底的大量污水都是有害的。

船上的生活对旅客来说是非常不舒服和不卫生的。每个人在船舱里只有 1 平方米的容身之地，一些人选择救生船当作睡觉的地方。在船上没有厕所等卫生设施；船员们还可以到甲板上的厨房去做饭，而清教徒们只有使用火盆来做饭了。

晚出发的后果是，五月花号很快就遇上了猛烈的风暴，这造成了船板上缝隙的破裂，渗进的水浸泡了旅客们睡觉的地方。在暴风期间，船上的一条主缝破裂了。此外，一名年轻的清教徒还被风吹到了水里，万幸的是他抓住了一根缆绳，被拽到了安全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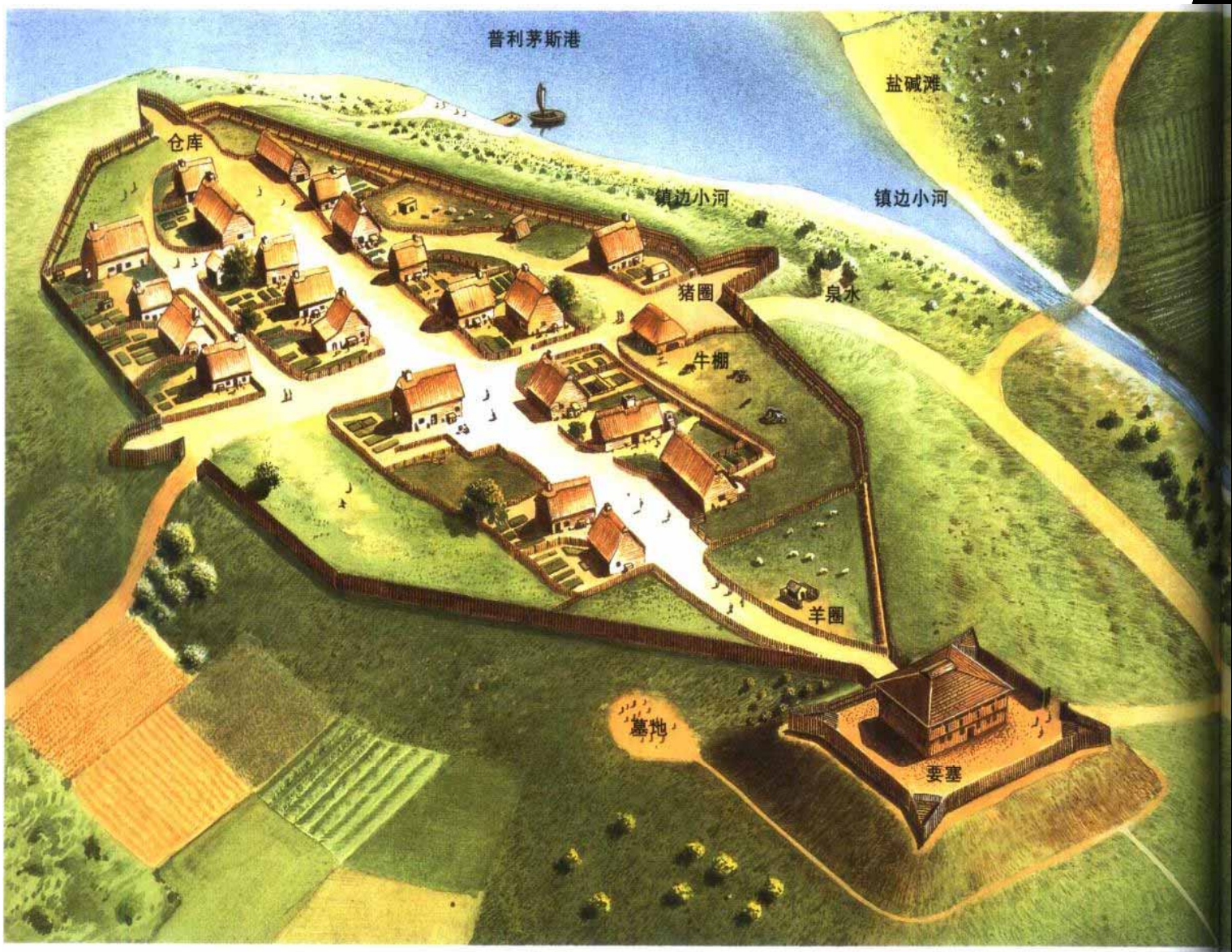
早期移民的“囚舱”

了可观的利益。女人们也被非法地买卖，或者“出卖灵魂”，向男人们提供性服务。

男人们和女人们发现他们与奴隶一般无二。他们的活动受到限制；逃跑者被判体罚甚至被处死。他们可以像奴隶一样被卖掉；会因很小的错误而被毒打致昏。一些男人逃跑后变成了强盗；一些人和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采用印第安人的服饰和习惯。有约五分之一的人比较幸运，服役期满后，或许会因为从事过繁重的劳动而变成工匠或农夫。

与其他相比，不平等现象更为严重。1619 年，一般荷兰船运来 20 名奴隶，一场悲剧性的社会变革随之开始。从此黑奴制在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完全确立。最初在弗吉尼亚雇佣黑人与雇佣白人条件相同，后来黑人丧失了所有的权利。18 世纪初，黑奴已占马里兰州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此外，在南方有活跃的印第安人奴隶贸易。在卡罗来纳，殖民者给当地部落提供武器和酒，挑动部落之间的冲突。在世纪交替之际，这种冲突最南可发生在西属佛罗里达。冲突中被抓住的俘虏被送到卡罗来纳作奴隶——1708 年，在其首府查理斯顿有 1400 名印第安人——或者被带到西印度群岛、



纽约和新英格兰。奴隶制决不限于南方。在世纪末的时候，一位波士顿的女教师抱怨康涅狄格的农场主对他们的奴隶太宽容了："允许奴隶坐在桌子边和他们一起吃饭……黑人的蹄子像白人的手一样自由地伸向盘子"。

弗吉尼亚的新经济需要新的政治秩序和可靠的劳动力。最初殖民地由伦敦任命的地方议会管理，在詹姆斯敦头两个灾难季节之后，人们发现他们处于一位独裁者的军法管制之下。1619 年，一个新时代随着弗吉尼亚的——和美洲的——首次选举议会的召集开始了。弗吉尼亚议会给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制定了法律，从种地一直到教堂礼拜。当詹姆斯一世 1624 年解散弗吉尼亚公司、由他直接控制弗吉尼亚时，这个议会被作为低一级的立法机关继续存在。这个早期自治机构的成立是美国政治独立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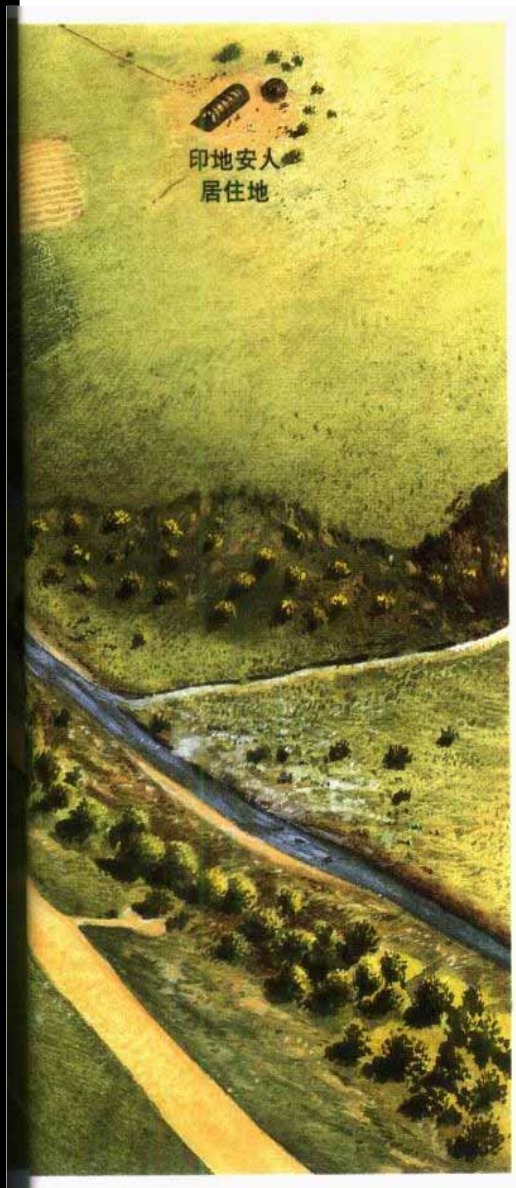
弗吉尼亚公司终止之后，殖民地的悲惨命运接踵而至：1622 年印第安人暴动。詹姆斯敦的殖民者无意中定居在了由 30 个部落组成的强大的印第安部落联盟之中，其联盟首领叫波哈坦。开始时，双方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后来由小冲突转向合作。当约翰·罗尔夫这个发动了弗吉尼亚农业革命的人，娶了波哈坦聪明美丽的女儿——波卡汉纳斯之后，和平看起来得到了保证。13 岁的时候，这位非凡的波卡汉纳斯阻止刽子手动手，挽救了殖民者头头约翰·史密斯——她父亲的囚犯——的性命。当她作为罗尔夫的妻子旅行到伦敦的时候，英国宫廷被她一身皇后般的装束惊呆了。

1617 年，波卡汉纳斯英年早逝，一年之后，她父亲也与世长辞。她父亲的逝世释放了被殖民者蚕食土地的印第安人久已积郁的忿恨。印第安人为了这次出人意料的袭击精心地制定了计划。直到最后时刻，攻击者还很随便友好地与白人定居者呆在一起。史密斯在《弗吉尼亚通史》中写道，但是随后，在 1622 年的耶稣受难日，"他们赤手空拳地进入我们的房子，带着鹿肉、火鸡、鱼、水果和其他食物来卖给我们；而且有的人坐下来和我们共进早餐，但是他们突然使用最原始的工具进行屠杀"。共有 347 名英国男人、妇女和儿童那天早晨被杀，几乎占了殖民地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如果印第安人把他们的优势发挥到底，他们或许可以把移民们赶出大陆。然而他们仅带着征服了白人对外扩张欲望所带来的满意，返回了村落。这给了殖民者时间去组织更为凶猛的复仇行动，来系统地摧毁印第安人的村落和庄稼。这场战争持续了近 10 年之久。弗吉尼亚总督弗朗西斯·瓦特爵士说："最好是清除这些异教徒，而不是与他们和平共处或结盟。这些异教徒只不过是一群害人的东西。"他的政策被有力的执行了。到了 17 世纪中叶，印第安人已经退到了他们隐居的森林的边缘。海边的殖民者们已经和直到最近还是这块土地唯一主人的印地安人完全失去了联系。

与弗吉尼亚的英国人不同，北美洲的法国殖民者很快地显示了他们处理同印第安人之间关系的技巧。根据 1627 年签订的协议，新法兰西从佛罗里达一直延伸到北极圈。在早期日子里，居民中的大部分居住在现在加拿大东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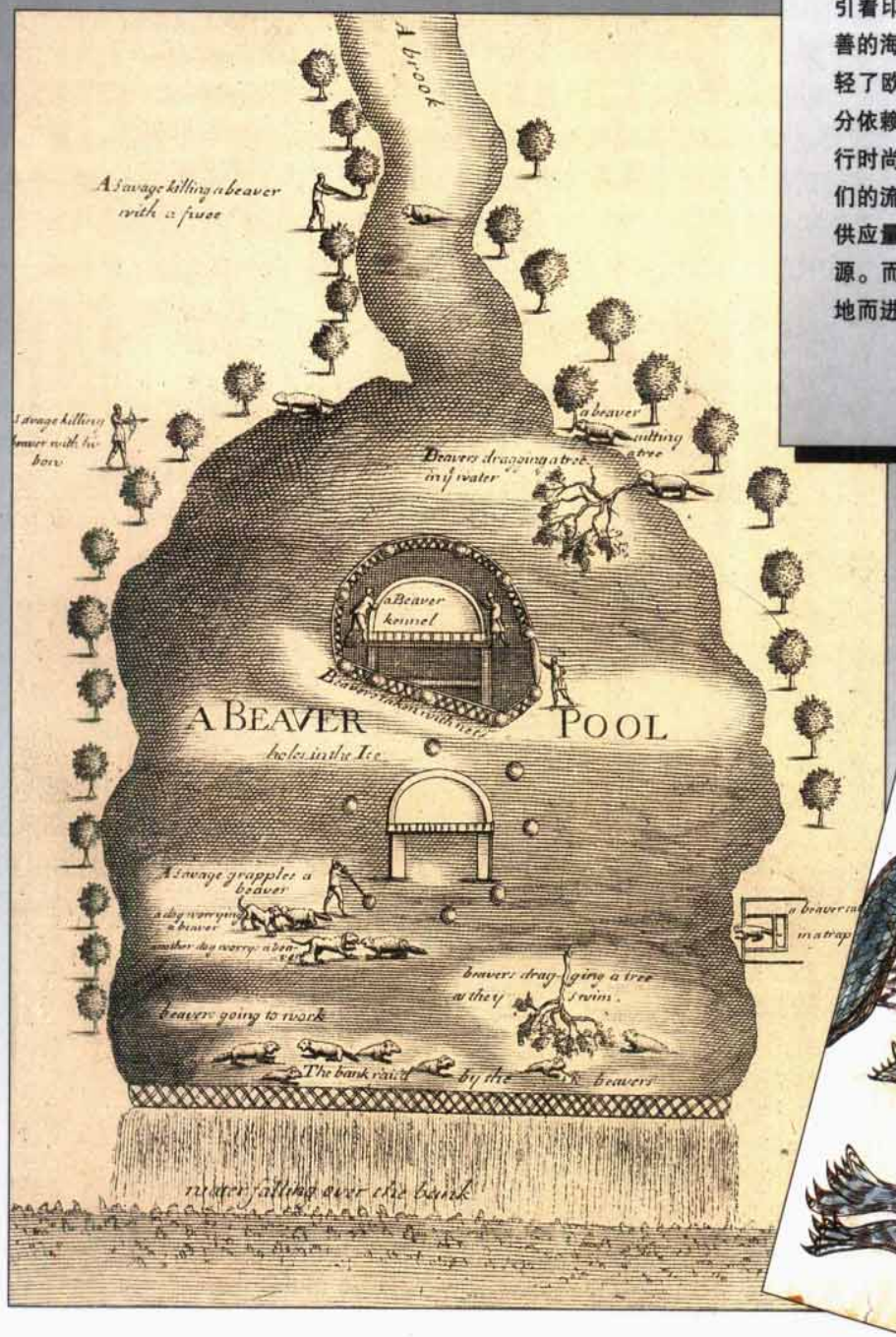
1620 年 12 月，由五月花号上的英国清教徒在马萨诸塞海滨兴建的普利茅斯定居点，经过 7 年的发展，成为拥有 200 多人，自给自足的人们的活动中心。木屋沿着道路一直排列到一座用作堡垒和会议室的二层建筑物前。移民团的繁荣兴旺是来之不易的。第一个冬天，半数的移民就死于疾病或饥寒。殖民者如果不是得到当地印第安人的帮助的话，就不会幸存下来。印第安人教会他们如何播种玉米和给玉米施肥。但是定居者们保持着相当高的警惕来防范印第安人的袭击。1622 年，当得到弗吉尼亚印第安人制造大屠杀的消息之后，他们用 800 多米长的木栅圈住了种植园。



一副 18 世纪的版画表现了海狸用伐倒的树给自己筑窝的情景。这张草图揭示了印第安人捕猎海狸的方法——使用陷阱、枪、弓箭和猎狗。在冬天，用网在冰上罩住海狸所打的洞。

皮毛的财富

在新大陆的森林里，被猎人们看到的所有动物中，没有任何一种可以比海狸给人的回报更多。在 17 世纪的一张素描当中，如果从头排的话，海狸皮可以排在水獭皮和两种海豹皮之间。海狸光滑、厚实的皮毛长久地吸引着印第安的猎手们。在欧洲有一个很完善的海狸皮市场，北美海狸皮的涌入同时减轻了欧洲对无法相信的俄罗斯供应商的过分依赖。“海狸”帽一时成为上流社会的流行时尚，当海狸皮手筒和海狸披肩成为妇女们的流行装饰时，英法两国的商人为了扩大供应量，不断冒险深入内陆寻找新的皮毛资源。而且这种行为比其他为了开发北美荒地而进行的探险更多。





的边境地区：沿海各省，圣劳伦斯湾和安大略森林。首批法国殖民点在今天的加拿大新斯科夏省。尽管这个要塞一个世纪里在英法之间易手五次，但它除了象征意义处，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新法兰西发展的中心是由著名的塞缪尔·德·山普伦于1608年在圣劳伦斯河上建立的魁北克。

山普伦，新法兰西创建过程中一名坚韧的斗士和多面手——战士、航海家、作家、探险家、皮毛商和总督，"他肩上担负了所有的管理重任"，同时代的人这样评价他。山普伦解释他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渴望为新法兰西创造更多的幸福和利益，为家族增添荣誉，同时为穷人带去神的知识"。所谓"穷人"，当然是指印第安人。在法国人与印第安人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没有谁比山普伦更有潜力。

他不但在新法兰西创建了一个成功的殖民地，而且他相信，通过尽可能远地沿加拿大水路的勘察，就能"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道路"。通过不懈努力，他获得了圣劳伦斯河和渥太华河沿岸印第安部落的支持。为了回报他们的支持，法国将在他们同可怕的易洛魁人的冲突中援助他们，这些易洛魁人的据点在今天的纽约北部。1609年，在另外一个法国人的陪同下，山普伦乘独木舟和60名休伦族和阿尔根坤族战士组成的战斗队出发了。在纽约州和佛蒙特州的北部边界地区的一个长湖（现在叫山普伦湖）岸边，他们和200多名易洛魁人组成的战斗队遭遇了。山普伦用单发火绳枪杀死了两名易洛魁人头目。由于害怕这种未熟悉的武器的威力，易洛魁的勇士们落荒而逃。这种轻松得来的胜利，使山普伦的印第安盟友对他永久感激。但是易洛魁人却成了他的危险的敌人，他们经常袭击法国人并且后来同新英格兰的英国人结成了同盟。这后来证明是新法兰西的心腹之患。

山普伦从未发现到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但他的许多同胞在新法兰西的森林里发现了大量宝藏。友好的印第安人在独木舟里装满冬季捕猎所积攒的皮毛，沿圣劳伦斯河顺流而下，用来交换刀、斧、枪、毛毯和鞋。传教士和皮毛商1642年在蒙特利尔兴起的春季交易会，是一次重要的贸易盛会——也是一次狂欢节，直到新法兰西大主教禁止向印第安人提供酒为止。然而他聪明地宣布，"长途的、劳累的和特殊航行"的印第安人买酒可以例外。

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满足于等待购买皮毛。一队叫做"森林人"的团伙到野外去非法狩猎，他们在穿着雪鞋进行追踪及在桦木舟中速射方面的本领同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印第安人不分高下。他们通晓印第安人的语言和社会，这使他们在战争时期成为宝贵的信息来源。

或许移民到新法兰西的最著名的团体是耶稣会。1626年，这些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传教士首次到达魁北克之后就开始在印第安人中间传教——不是在相对舒适的白人定居区，而是亲自深入印第安人的村落。一些人被奇怪的同类吓坏了：吃人肉的习性、严酷的刑罚、乱伦、多妻制和无法控制的害虫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可以这样说，他们都是野蛮的"，一位传教士这样写道；"从早到晚他们什么都不想，只想填饱自己的肚子"。然而，很多人深深地同情新教区

的居民们。“印第安人和法国人一样”，一位深受赞美的乌尔苏拉会修女写道，“但说真的，他们比法国人虔诚多了。”

在新法兰西和弗吉尼亚之间的海岸，一个新的社会形成了。哈得逊河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的男人和女人们来到新大陆不是去教化野蛮人或者去发掘金子，他们移民的目的是为了宗教信仰自由。这些人是清教徒，英国一些认为信仰应该朴素，或者说“纯洁”的新教徒。他们认为宗教所有的繁文缛节都应该取消，主教们不应在教会的管理中扮演贵族的角色。他们的知识、道德和政治立场将对美洲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620 年，五月花号上清教徒当中的一些激进分子，追求从英国圣公会中完全独立出来，因而这部分人被认为是脱离论者。然而，晚到达的大多数移民都准备宣誓效忠英国教会和政府。

五月花号到达美洲 10 年之后，英国开始了新一轮的移民浪潮。这些人带着皇家特许状在一个名叫马萨诸塞湾的地方兴建殖民地。虽然这些新移民自称不是脱离论者，但是在新大陆，他们所建立的殖民地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是最不受管束的。尽管殖民地的兴建过程伴随着苦难——有 200 名移民在第一个冬天死于疾病——但马萨诸塞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有两万移民到达殖民地，这个数字超过了头 10 年的总和。许多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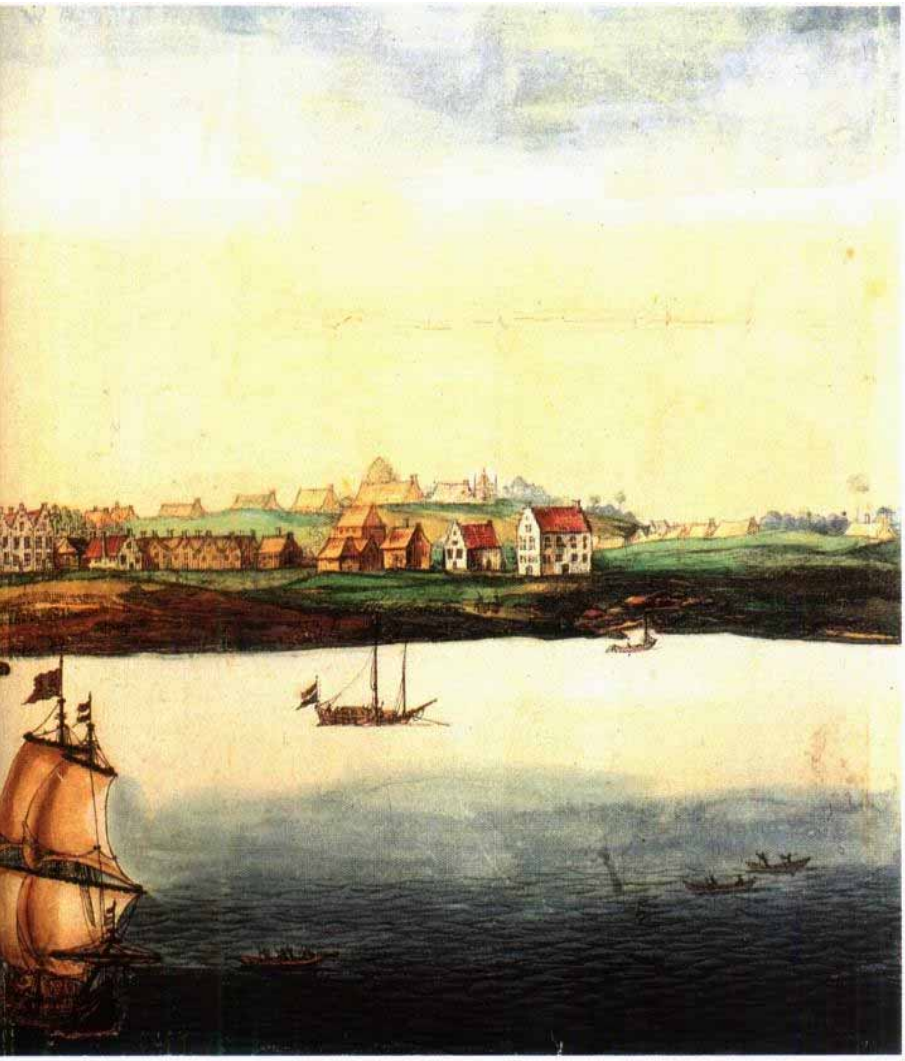
这是 17 世纪 50 年代的一张速写，但新阿姆斯特丹的这种景象到 1664 年它被英国占领、更名为纽约之后，才最终定型。位于小码头中心的地方可供旅客登陆和装卸货物，在码头后面有一个重量秤和一架起重机。背景左边的大建筑物是一座堡垒，它包括一个教堂、一个兵营和一个监狱。新阿姆斯特丹兴建于 17 世纪 20 年代，用来作为荷兰人的皮毛交易中心。这座城市迅速地繁荣了起来：在 1626 年，一个港口就向荷兰输送了 7 000 多张海狸皮。此外新尼德兰还用 60 荷兰盾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了曼哈顿岛，这个价钱仅相当一名工匠一个月的工资。随着城市的丢失，荷兰殖民者在北美渐渐消失了。

所有的人都单纯地想献身于建立一个纯洁的社会。殖民地沿着海岸和查尔斯河岸迅速发展，包括殖民地精神和经济的中心波士顿。

在商业上，这些努力工作的英国人绝不会迈错步。相对五月花号上那批穷困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批人是非常富有的。此外，他们是从英格兰明确限定的地区——特别是东英吉利成队来的，因此，这些人可以迅速在一个地区构建起一个社会结构。在他们到来的五年中，清教徒们一直在考察西印度群岛当地生长的小麦。很快这种植物让清教徒们明白，农业不是迅速致富之路。一个男人要花60天才能清除掉新英格兰一英亩地中冰川时期留下巨石，在随后的年份里，每当冬季的严寒来临的时候，地里刚长出的庄稼就要冬眠。

于是波士顿的清教徒们把目光投向海洋，在这里鳕鱼成为收入的可靠来源（后来这成为马萨诸塞的象征）。海洋为新英格兰精明的进出口贸易商打开了通向财富的宽广道路。17世纪下半叶，波士顿已经开始控制北美洲的贸易，把新英格兰的鱼类和木材、弗吉尼亚的烟草以及西印度群岛的糖运往欧洲，在返程中给东海岸的殖民地运去英国制造的商品。马萨诸塞湾作为贸易中心的成功，很快就恶化了伦敦的进出口贸易，对英国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马萨诸塞湾的头等大事，教会才是殖民地生活的中心。清教徒们对外宣扬的目标是建立新的锡安山，一个法律源于《圣经》的社会。“我们将会像山顶上的城市一样，受到万众景仰”，马萨诸塞的首任总督约翰·文斯劳普在1630年这样宣称。



在他们努力去建立一个神的国度的时候，清教徒们享受到了彻底的自由。像早期的詹姆斯敦一样，马萨诸塞湾的资金也是由股份联合公司提供的。但是当弗吉尼亚公司被伦敦控制的时候，马萨诸塞湾已经成功地把董事会整个儿移到了在新英格兰的殖民地。远远地离开了英国教会和政府的监视。

宗教信仰自由对清教徒移民来说，意味着从英国教会那里获得了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新定居地个人生活作风上的完全自由。尽管清教牧师没有保留管理单位，但宗教元老会议成为最有权威的律法解释者。这造成了政府由教会支配的神权政治。礼拜日必须严格遵守；在波士顿地区，所有的工作、娱乐、旅行在星期六晚上六点必须停止。教堂是议会房子的两倍；没有参加礼拜的人要冒着被处罚金的危险，并且只有教会里的人员——挑选出的一伙男人，由牧师认可适合接受

圣餐的人——有投票权。一位新教牧师在同一些被限制了投票权的人答辩时问道："如果人人都是统治者，那么谁被统治呢？"

法律变得更加严厉。为了扑灭"关心道德心自由的可怕喧嚣"，宗教和政治的异端立即被扼杀。小过即遭惩罚。一位叫乌尔苏拉·高勒的倔强的移民被判罚金或鞭笞，只因为说了一句"她喜欢听舍法德先生猫叫一样的说教"。这些被当作异教徒的言论而遭到严厉的惩诫。贵格会教徒的遭遇最为严酷，贵格会是17世纪中叶英国激进宗教运动中成立的一个团体，认为通过传授，上帝可以直接与普通人联系。这些古怪的局外人有削弱清教徒领导人权威的危险。放逐是贵格会教徒所受到的最轻的惩罚。如果他返回殖民地，就会失去一只耳朵，第二次就会失去另一只耳朵。如果他傻得第三次返回的话，政府当局会用火红的烙铁在他舌头上穿个洞。这条法律后来得到简化：从流放地返回的贵格教徒将被绞死。在大众的愤恨迫使这种残酷的法令废除之前，已经有几名贵格会教徒因此而丧命。

最著名的政权反对者是罗杰·威廉姆斯。虽然在最有关教义的事情上，他是一名正统的清教徒，但这位杰出的布道者敢于坚持政教分离，宣称殖民地的土地是非法拥有的，因为这些土地不是向印第安人购买的。威廉姆斯因此而在隆冬遭流放。他兴建的普罗维登斯，后来成为罗德岛州的首府。这块由威廉姆斯管辖的小殖民地，成为新英格兰爱吵闹、不适应环境的人的避难所。敌视他的人嘲笑地称其为"无赖岛"，但是罗德岛在北美洲保留了这样一块地方，在这里任何信仰——或者无信仰——的人都可以公开存在。

被康涅狄格大河谷丰富的土地资源所吸引，一些殖民主义者也离开了马萨诸塞湾。康涅狄格1639年获得自治权，不久并入纽黑文独立的殖民地。

尽管有元老的伪善和官方的不宽容，但马萨诸塞并不像后人描绘的那样死气沉沉。清教徒们衣着鲜亮，喜爱运动，并且远非绝对戒酒。在波士顿也有小酒馆供男人们喝酒、吸烟和聊天。"酒本身是上帝创造的好东西"，波士顿教会的顶梁柱因可瑞斯·马瑟写道。清教徒非常重视教育，作为神学研究机构的哈佛学院于1636年成立。哈佛学院毕业典礼日是马萨诸塞每年的假日。这个典礼以布道开始，以庆祝结束。因可瑞斯的儿子克顿说，哈佛是"新英格兰曾经想出的最伟大的事"。

在早些年，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对印第安人比对异端的基督徒更友善。实际上，普利茅斯的清教徒已经和当地的万帕诺亚格部落首领马萨索伊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他们第一个饥饿的冬季的末期，一位说英语、名叫斯堪图的印第安人仿佛上帝使者一样访问了普里茅斯，教会了清教徒渔猎和种田。1621年，第一个快乐的感恩节——3天的食物丰收庆祝会是与友好的马萨索伊特带来的90名男子一起度过的——是真正自发的种族和谐的表达。

不久，双方的关系恶化了。17世纪30年代，当仇恨在康涅狄格殖民者同佩科特印第安人之间爆发的时候，毫无疑问那里移民的忠诚被埋葬了。清教徒们毫不怜悯地包围了梅斯第堡垒里的佩科特人，"在一个多小时里，这些

野蛮人中的500～600名从负载他们的地方消失了”，波士顿神学学者科顿·马瑟这样写道。当面临着印第安人更大的威胁的时候，马萨诸塞湾、康涅狄格、普利茅斯和纽黑文于1643年组成了新英格兰联盟，这是殖民地的首次同盟。

当相距750公里的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正在发展它们独特的社会时，沿海湾和河流谷地兴建的其他殖民地也在崛起。其中最有希望的实验之一是由塞西留斯·卡尔弗特和巴尔的摩勋爵进行的，后者的家族在波托马克河的北面拥有的400万公顷土地已得到查理一世的承认。为此，巴尔的摩每年献给国王两支印第安箭另加所发现金银的十五分之一。

新殖民地地理位置优越。对英国人来说气候既不太热也不太冷，野味丰富，并且森林没有下层灌木。“甚至这里的豌豆十天就可以长10英寸(25厘米)，”一个英国人惊奇地说。更重要的是，印第安人热情地欢迎这些移民的到来，给予他们所有的帮助。

田园诗一样的生活是短暂的。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卡尔弗特计划在他称为马里兰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作为同他一样受迫害的志同道合的人的避难所。从一开始，他就坚持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宗教信仰自由。然而，刚开始时，马里兰的大种植园主——主要是天主教徒——同迅速成为人口主体的新教徒雇农之间的冲突就发生了。殖民地经济上繁荣了，但是巴尔的摩勋爵宗教和谐的梦想却变成了政治上的争吵和突发的内乱。甚至巴尔的摩勋爵构想的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1649年制定的《宗教法》也被这些偏执的行为破坏了。

一幅描绘妓女被强迫前往新法兰西的版画配有这样一段解说词：“1687年12月，一群从事卖笑的巴黎女士悲伤地登船，她们如同与情人分手一样和她们的药剂师以及外科医生话别。”这幅画可能是打算讽刺那些借绰号显示自己出身好的妇女——表明她们并不真想去美洲，或许仅是因为品行划分的问题才轮到她们。为了增加新大陆空地上的人口数量，法国政府把许多妓女和罪犯运往那里。许多人在途中或到达后不久就死了。到17世纪末的时候，新法兰西的人口依然没有超过10 000人，而英国殖民地的人口已有约250 000人。



由严厉的清教徒坚决主张的一段内容是：任何人否认耶稣基督的神力或炮制关于神的三位一体的“指责性演讲”都将受到死刑的惩罚。

在新尼德兰的殖民地里存在着更大的宽容。这个殖民地由垄断荷兰在新大陆的贸易的荷兰西印度公司兴建。荷兰人在大西洋沿岸、哈得逊河和康涅狄格河上修建贸易站，他们在收购皮毛、木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过程中经常与印第安人和英国移民发生冲突。1655 年，他们吞并了斯堪的那维亚唯一的殖民地新瑞典，后来这里变成了特拉华州。新尼德兰也有自己的问题，那就是很难吸引移民者，很少有人受到诱惑离开富裕和宽容的祖国，到敌视他们的大陆重新开始生活。因此，他们不得不拉拢任何能够拉拢到的人，这意味着新荷兰缺乏他们英国邻居那种社会凝聚力。

曼哈顿岛南端最主要的定居点是新阿姆斯特丹，1626 年，它被从一个印第安部落手中买下来后才命名。这个小镇后来成为世俗世界各地人们向往的地区。酗酒是一个永久的问题，并且不得不制定法律，禁止在大街上玩高尔夫球。这个城市由装假腿的总督彼得·史蒂文森特施行专制管理。他统治了殖民地 17 年，但是就连他也不能让这个难以控制的地区屈服。“闭上你的眼”，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写给史蒂文森特的信中说，“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信仰，只要他遵纪守法”。

英格兰在北美是占有土地最多的国家。到世纪中叶，统治者们意识到除非在半独立的殖民地勒紧统治的缰绳，否则将完全失去控制。英国内战的创伤刚愈合，作为共和国摄政者的克伦威尔和复辟的查理二世先后都企图限制新大陆刚刚开始的经济和政治的自由。

在英国内战和混战期间，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商都依靠其他国家、特别是荷兰的船只运输他们的货物。为了结束这种状况，英格兰制定了两部航海法以阻止荷兰和其他国家的竞争者分享殖民地的贸易。

早期受到法律伤害的是新尼德兰。1664 年，四艘英国战舰停靠曼哈顿岛，命令新阿姆斯特丹投降。彼得·史蒂文森特站在堡垒的胸墙后，旁边有手持火绳枪的枪手，准备用火炮回答英国的挑衅。但是他的顾问建议放弃抵抗；这里只有一小队荷兰国民军，1500 多名居民中，只有 250 名能够使用武器，许多人都拒绝开枪抵抗。英国人不战而胜，并宣称用查理国王的兄长詹姆斯·约克公爵的名字重新命名此地。同一天，理查德·尼克尔斯把这场胜利的行动通知了新英格兰，信上写着：“发自纽约”。随着新阿姆斯特丹的陷落，整个新尼德兰的殖民地都换了名字，落入英国的手中。

由新阿姆斯特丹向纽约的转变是和平进行的。它仍是一个世俗的、宽容的、凌乱的城市。它心甘情愿也能够吸引苏格兰人、胡格诺派教徒、天主教徒、贵格会教徒和犹太教徒，这些人把它变成了新大陆主要的贸易中心之一。总督拥有绝对的权力，直到 17 世纪末成立了议会，普通的纽约人才有了

绘画者的写真艺术

与信念的坚定和直率相应，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对待艺术的态度也是质朴的。他们的画家就是他们自己，一些直率、普通的人——通常是水手，为别人画肖像是他们画标牌或彩绘车厢等工作的副产品。这些受雇佣的无名画家，被称为绘画者。他们按照中世纪的画风进行工作，没有突破三维基本表现手法，通常他们把对象置于一个反差大而又简单的背景中。很明显，这样一来他们所画的肖像很容易描摹。他们严格按照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他们的同胞，因为他们相信哪怕生命中最小的细节都是神的意愿的体现。

现在发现最早的肖像是画于 1664 年的伊丽莎白·埃京顿夫人的肖像（中间）。约翰·弗里克的肖像表现的是富有的上流社会，他是波士顿的进出口商和律师（上方），无名的肖像画家也描绘了他的家属（右下方），他夫人温柔地抱着孩子。然而，也有不温柔的，在托马斯·史密斯船长的自画像中，他目光严厉地向外看着，手中纸的头两行写着："为什么我会身处这个魔鬼发现的世界之中？"









最公正的商人

在北美洲所有英国殖民地中，宾夕法尼亚对待印第安人是最开明的，因此，这里的冲突也是最少的。这个殖民地由一位富有的商船船长的儿子威廉·佩恩，于1682年建立。这块地方是国王为了偿还债务而卖给他父亲的。信奉贵格会的教义之后，他因为在英格兰宣讲宗教忍让的美德与和平主义而被几次监禁。佩恩认为他的殖民地是“神的实验”，是根据其高尚的理想兴建的。他公平地对待印第安人，承认他们拥有土地的权利并且在印第安人同其他移民和商人交易时，保护他们的利益。

总督和议会掌握着权力，但是良心的自由得到保证，在小偷也可以判处死刑的年代，佩恩只把死刑应用于谋杀罪和叛国罪上。他还是一位精明的推销商，殖民地成立后的3年内，他通过发表关于殖民地热情洋溢的报道吸引了9 000名新移民的到来。

管理城市的发言权。总督在英国的指示下容忍了各种教派的信徒，“只要他们不扰乱公共秩序”。于是纽约紧张的空气缓和了。彼得·史蒂文森特也留在了殖民地，退休后他返回了在曼哈顿的农场，并于1672年死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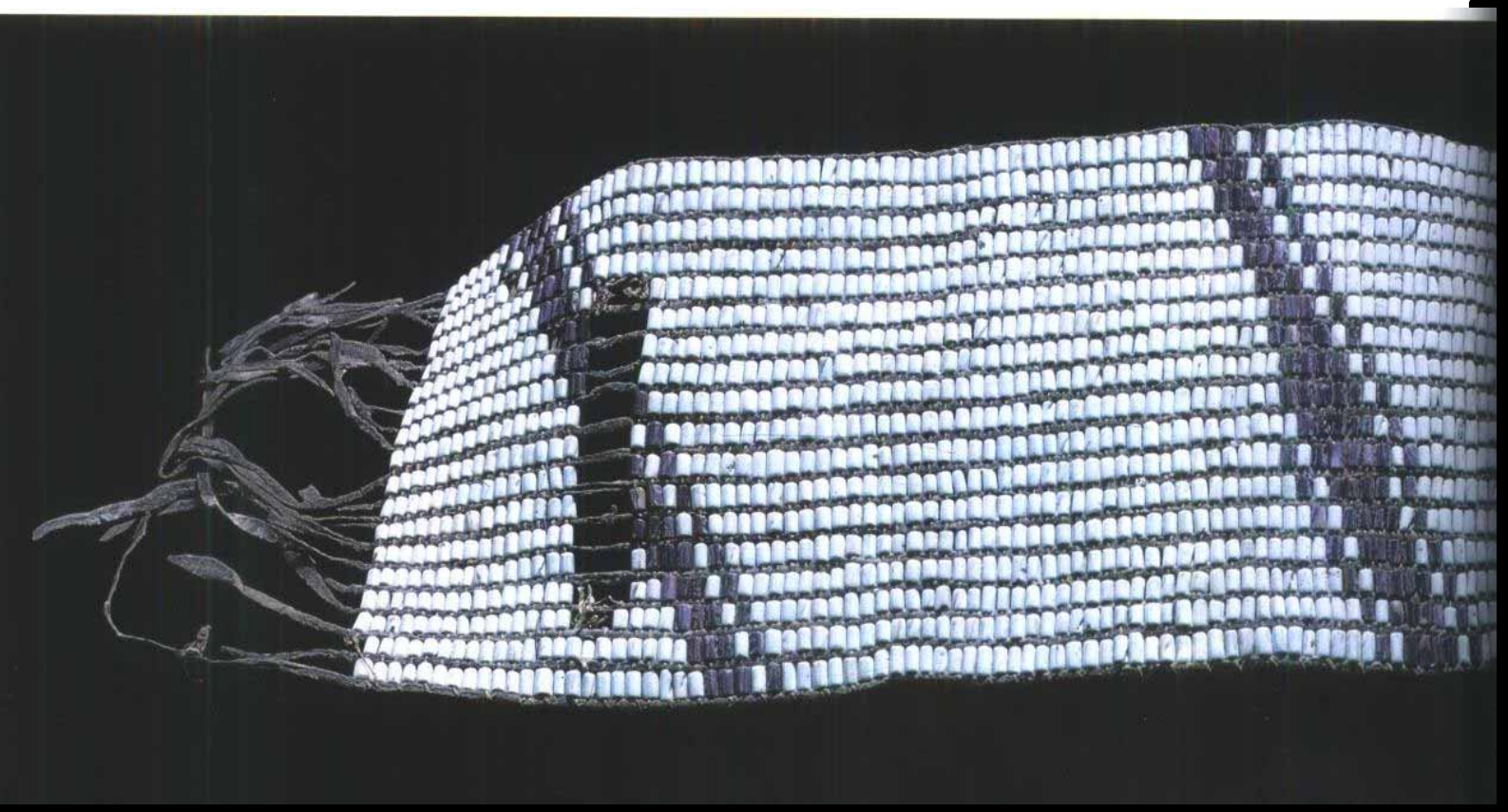
在英国殖民地，航海法受到了广泛的敌视和嘲笑。被激怒了的英国政府开始调查它的殖民地的管理机构，并找到了它想要的所有东西。国王查理需要钱，而殖民地成了他税收的来源，并且还不用依靠英国议会经常监督。由于来自伦敦的代理人试图迫使总督们执行航海法，对殖民地事务的干涉增强了。农业殖民地弗吉尼亚的总督是皇家任命的人，就很容易服从伦敦的命令。然而，马萨诸塞却不同，在这一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为独立进行近乎叛乱的斗争。

马萨诸塞顽固地反对航海法，对殖民地流传的歧视和迫害的流言忧心忡忡，使得查理国王于1676年派了一名特使——爱德华·伦道夫来调查殖民地的事务。伦道夫是一名正统的保皇党人，他写了一篇该死的报告，宣称马萨诸塞不仅公然同其他国家开展贸易，而且成立海关征税，并将税款截留。

英国的解决办法是收回这些殖民地的特许状。1686年，查理的继任者凯瑟琳·詹姆斯二世将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合并为新英格兰自治领。这是个从缅因直到哈得逊河的新的巨大殖民地。合并是为了加强殖民地的力量，抵御北面法国殖民者的威胁。移民发现，他们与法国殖民者的冲突在增加。

艾德蒙多·安德罗斯爵士被任命去管理这个自治领，他是一名王室官员，其政策看上去是与马萨诸塞湾的长老们对抗。法规不再由议会制定，税收也任意地增加。更糟的是教会也为英国圣公会服务。安德罗斯甚至允许在波士顿公地上树起了五朔节花柱，鼓励基督教举行庆祝会，这被虔诚的清教徒视为异教徒的节日。

就像上帝亲手推翻了渎神的管理一样，1688年，奥兰治的威廉这位虔诚的



清教徒推翻了詹姆斯成为英国的国王。兴高采烈的清教徒们关押了安德罗斯，并把他送回伦敦。于是新英格兰自治领解散了。

马萨诸塞的特许状被重新制定，普利茅斯和缅因成了它的一部分。特许状被认真起草以防止再出现以前的弊病。投票权由财产所有权决定，不再由教会成员决定。但是60年的神权政治不会因一张特许状而马上死亡。宗教暴行的最后一次发作猛烈地动摇了殖民地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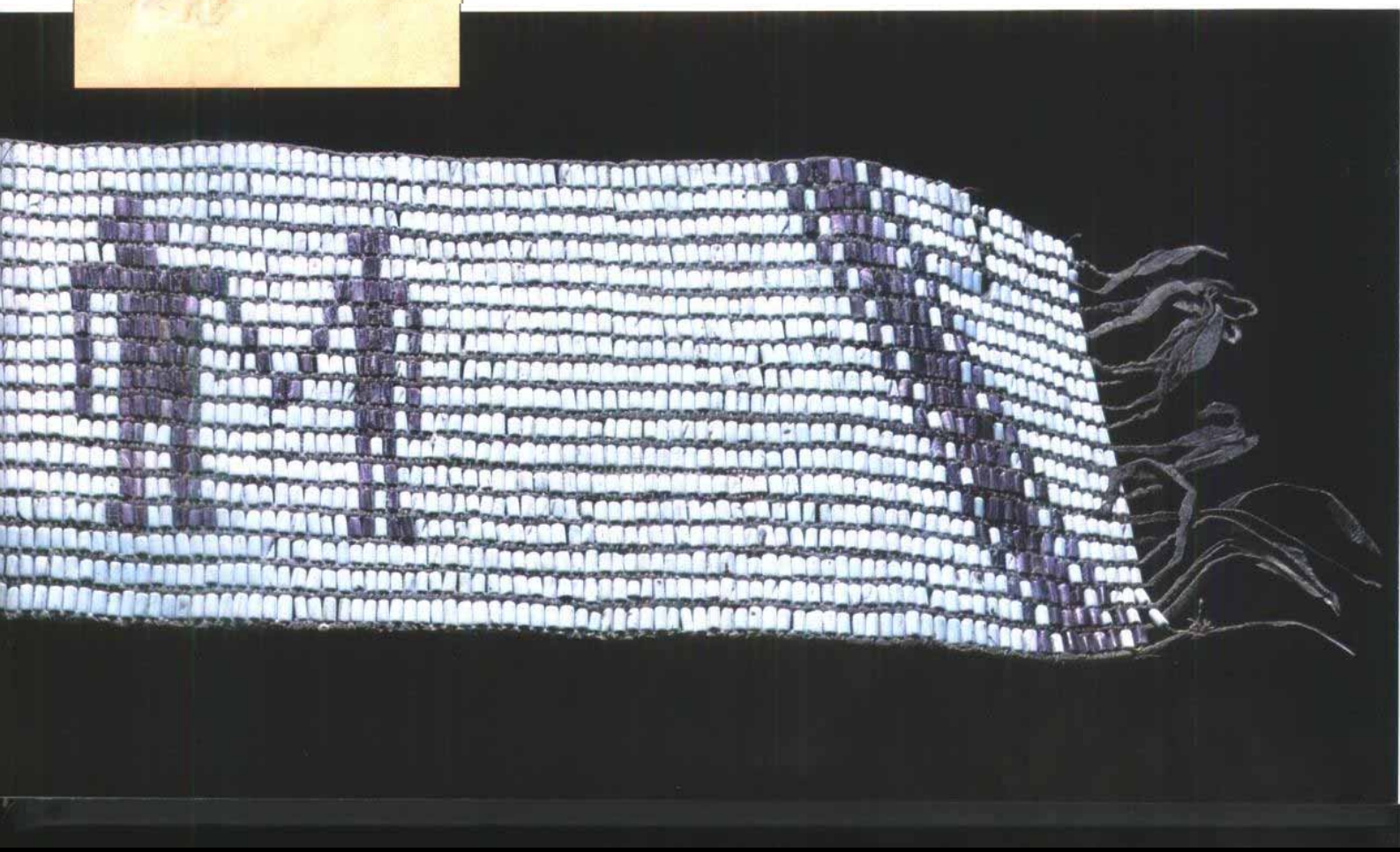
1691年塞勒姆(在马萨诸塞湾，波士顿北面的一个村庄)的管理者的女儿和侄女出现了歇斯底里的症状。女孩子们声称她们同当地妇女的幽灵见了面，这些幽灵极力主张她们同魔鬼签订了一份协议。看上去，她们的痛苦来自魔鬼因她们不肯合作而发生的愤怒。不久，其他年轻未婚的女人们也有类似的经历发生。她们指认的人被控使用巫术而被逮捕。

当总督威廉·菲力浦斯爵士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过问此事时，已有100多人——大部分是40至60岁的妇女——被监禁。经过一个夏季的审讯，19个人被判有罪并被绞死。一个男人因拒绝回答指控而被石头砸成肉泥，两条狗也被处死。证词的声音经常被着魔者的嚎叫声所压倒。教区被集体的歇斯底里控制着，很少有人从指控中脱身。直到有谣言说总督夫人也是魔鬼的同伙时，官方的审判才突然停止。疯狂迅速地落潮，但是塞勒姆女巫审判却使人窥见了新英格兰生活的表象下充斥的恐惧与疑虑。

北美沿岸最后的大量土地并不是由弗吉尼亚和西属佛罗里达之间的欧洲人开拓的。1670年，西班牙的已无力与英国抗衡，国王查理二世把这一地区赏给了宫廷内的8名心腹。为表示对国王的敬意，新殖民地被命名为卡罗来纳，分南北两部分。这里的管理沿袭了不民主的方式，由业主任命总督和行政委员会中的半数成员。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是这里的早期移民之一，大量的英国移民来自其他的美洲殖民地。查理斯镇(今为查尔斯顿)作为南卡罗来纳湿润的沿海种植园的大宗农作物——大米的出口中心，迅速地繁荣起来。



特拉华的印第安人为纪念1682年与威廉·佩恩——下方肖像所描绘的人，佛朗西斯·波雷斯画于大约1698年——签订的协议，用同沿海部落交易中获得的海贝制成了一条贝壳串珠肩带。如下图所示，一名带帽子的白人和一名印第安人在友好地握手。两方后面的斜纹提供了各自占有多大地盘的信息。



殖民地并不是完全和平的。来自西班牙的威胁是人们已料到的。但让人奇怪的是，人们发现，对西部边境地区猎鹿区，同印第安人的争夺次数反不及与法国人争夺的次数多。

“我们要将目光转向新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于1663年宣布，“遗憾的是，我们只看到很少几个居民点的兴建，……这些人每天都要受到来自易洛魁人的危胁。”这位太阳王有理由担心。1641年到1653年之间，易洛魁人已经发动了两次毁灭性的战役来反对法国。这群生活在墨西哥北部被认为最残忍、组织性最强的印第安人已经杀死了大批休伦族人——法国在生意和战斗中最忠诚的盟友。“我会让纸变红，让听众战栗”，一名耶稣会教士写道，他拒绝描绘教友们被易洛魁人折磨时所经受的痛苦。

当新法兰西处于被毁灭的边缘时，路易和他的首相巴比提斯特·柯尔柏对巨大的殖民地进行了重组。他们解散了新法兰西公司，废除了一些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部分贵族地主把他们占有的土地转租给自耕农。一个总督就是一个州的首领，主教和官员称其为省长，掌管内部事务。现在改变他们的职权，但最主要的权力由路易和柯尔柏掌握。他们鼓励新的殖民者，特别是工匠，推动妇女们移民去做士兵的妻子。这些政策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从1665年到1690年，25年间新法兰西的人口从3 000增加到15 000人。在一场对易洛魁人的冬季战役胜利之后，安全也得到了增强。印第安人穿着雪鞋消失在森林里，把跟踪的法国人甩在了荒野。

在寻找向西通往太平洋的河流时，法国人在北美洲发现了最大的一条向南流向墨西哥湾的河。耶稣会神父雅克·马奎特和路易斯·若利埃在罗伯特·德·拉萨尔的陪同下首次考察密西西比河。德·拉萨尔曾经探访过这条河的河口。在这次旅行的基础上，德·拉萨尔宣布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归法国所有，并用国王的名字命名为路易斯安那。从底特律到比洛克西沿途的一系列城堡，显示了法国在这一巨大区域建立势力的努力。

但是新法兰西依然是被围困的殖民地。17世纪最后20年里与英国之间连续的战争几乎摧毁了这块土地。英法很久以前就开始争夺纽芬兰和阿卡迪亚，此外还为哈得逊湾地区皮毛贸易和南卡罗来纳鹿制品贸易冲突。同时，对纽约北部和新英格兰归属的野蛮争斗继续消耗着两个国家的资源。

到17世纪的下半叶，在北美洲，随着人口稠密、富于扩张的英国殖民地的拓展，新的秩序正在形成。所有沿海的印第安人已经从传统的土地上退走。政治上的弱点，加上许多人因缺乏天然免疫力而患欧洲疾病，使印第安人无力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在新英格兰则不是如此。1637年的波克特战争之后，清教徒对印第安人的兴趣增加了，这主要归功于约翰·艾略特，一位热情的传教士，他把《圣经》翻译成阿尔昆冈语，并且修建了两座印第安教堂，那里可以容纳2 000多名“祈祷的印第安人”进行礼拜。甚至在哈佛还有印第安人的学院。

但是，绝大多数印第安人对白人的宗教并不感兴趣，而且还对他们的狩猎

区落到移民的手中愤恨不已。1675 年，和平突然地结束了。马萨索伊特的儿子梅塔克米特，英国称之为菲利浦王，领导生活在缅因州到罗得艾兰州之间的部落联盟进行了一场争取平等的运动。“我一天看不到家园，我一天不会解散联盟”，梅塔克米特告诉他的一位英国朋友。

那年夏天，梅塔克米特的印第安勇士们开展了一系列的闪击行动袭击了英国人的村庄和住宅。起初，这种游击战是成功的，迫使殖民主义者在那个冬天从波士顿撤退了 30 公里。但是英国的火力和人力——移民在数量上超过印第安人四分之一——保证了他们的胜利。在随后的夏天，印第安人弹尽粮绝，不得不投降。这场战争只有梅塔克米特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妻子和孩子都被俘，当作奴隶卖往百慕大。他死在一名替殖民者卖命的印第安人手上。他的头被送到普利茅斯，钉在碉堡的墙上。

菲利浦王战争严峻地考验了殖民地。有十六分之一的男性移民死于这场战争。90 个清教徒城镇中，有 52 个被袭击，12 个被完全毁坏。殖民地的边境退后了近 65 公里。这场战争中遭受更严重损失的是沿海的印第安人。大部分人撤到了西部地区。留下来的人或者被迫接受基督教住进“祈祷的村子”，或者像雇农一样地工作。梅塔克米特幸亏没有活着看到这番景象。

同时弗吉尼亚也爆发了印第安人暴动。住在皮德蒙特的多山的边境地区的人们自信他们将是一场大规模袭击的受害者。暴躁而又有魅力的贵族纳坦尼尔·培根领导内地的弗吉尼亚人开始向詹姆斯敦进军。他向集会的市民宣讲：“我来到这里，负有使命来反对那些野蛮人，他们经常无人性地谋害我们，让我们的弟兄

这幅哈佛风景的版画作于 1725 年，当时这所学院已经存在了 89 年，是美洲最早的大学。这座大学是根据资助这个研究机构的捐助人姓名命名的，它用来向清教徒提供教育，特别是为牧师职业输送年轻人。为了取得三年学制的证书，学生们必须能在诗和散文方面使用拉丁文读、写、说，并且能娴熟地运用希腊的名词和动词。当 1633 年在一间单结构的房子里开始上课时，只有一名男教师。四方院子左侧的学校建筑就是老哈佛，修建于 1674 年，对面的斯托顿学院成立于 1689 年。到 17 世纪末，哈佛的教育制度对某些新英格兰人来说显得过于随便，于是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大学，就是今天的耶鲁大学。



们流血”。通过武力威胁获得委任后，培根对印第安人发动了无情的战争。然而，他的这些举动被宣布为非法，于是，他将愤怒发泄在殖民地总督们的身上。他再次向詹姆斯敦进军，并将其焚为焦土。

一时之间，培根仿佛要接管殖民地了。但就在他与总督的军队交战之前，他突然被腹泻击倒了，或许是痢疾，并且因此丧生。反抗失败后，沿海富裕的烟草种植者们长出了一口气，他们认为培根是一个“内心隐藏着最专横与最危险的傲慢”的人，这与调查起义的皇家使团的看法如出一辙。

培根造反对弗吉尼亚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贫富差距依然。冲突唯一真正的受益人是查理二世，他乘机更换总督，加强了控制。也有失败者：造反的头头们被绞死，皮德蒙特印第安人退入了荒瘠、残破的地域。

让人比较高兴的故事来自第一个移民世纪中最后一块殖民地的建立。它的创建者的理想主义照亮了美洲早期的历史。威廉·佩恩是一位与查理二世宫廷有密切联系的商船队长的儿子，在他年轻的时候，许多贵格会教徒因为信仰而受到迫害，可他却于此时参加了贵格会，并因此激怒了父亲。年轻的佩恩在纽盖特监狱和伦敦塔都服过刑。“我宁可死在监狱中也不作半点让步”，他写道，“因为我得服从凡人的道德心”。

可能令国王查理感到宽慰的是他找到了使英国避免这个爱惹麻烦的贵族捣乱的方法。到 1680 年，查理已经从佩恩的父亲那里总计借了 16 000 英镑。国王通过把南部马里兰的大片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年轻的佩恩而抵销了自己的债务。国王的哥哥詹姆斯又把特拉华的土地给了他。

宾夕法尼亚的殖民地创建于 1682 年，根据佩恩的最高原则规划。“我到那里为人类的自由殖民打下一个基础”，他写道。主要的定居地是费拉德尔菲亚（费城），意思是兄弟友爱之城，这里街道宽阔整齐，两旁的房子及空地整洁划一。按照佩恩的意思这里要“建成绿色的城镇，永远不会被烧毁，永远充满生机”。到世纪交替之际，这里和纽约一样至少已有 5 000 居民了。

尽管宾夕法尼亚的殖民者——其中多数是德国人——因为佩恩父系社会的管理方式和他们在政府里相对有限的代表权而感到恼火，但是殖民地仍欣欣向荣。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殖民地的榜样，他和印第安人签订了几个友好条约，约定相互间彼此忍让，尊重财产所有权。“我感觉到世界上一部分人强加给你们太多的不友善和不公平待遇”，佩恩写给印第安人的信中说，“我不是这样的人”。他遵守了他的诺言。

威廉·佩恩的“神圣实验”仅是 17 世纪北美洲纵横交错的殖民地拼板中的最后一块。到 1700 年为止，大约 250 000 名忠于英国统治者的移民居住在从加拿大到卡罗来纳之间一连串殖民地上。反对他们的是敌意日增的 10 000 名新法兰西移民。1763 年，这种冲突以对英国人有利的方式最终解决。但是凯旋之后不久，英国国王就发现他要面对他统治下的造反的殖民者的愤怒。——在 17 世纪开拓的年代里很少有人能预见到这种结果。

对自然规律的阐释



“新哲学家怀疑一切”，1611 年，英国诗人约翰·道恩这样写道。他报怨自己所目睹的日益扩大影响的新世界观使“所有的东西都成了片断，所有的连贯性都消失了。”在新世纪，旧的毫无根据的事都受到挑战。但没有人能像波兰的天才尼古拉·哥白尼那样令人震撼，他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而不是地球。

在此后 10 年中，道恩抱怨的学生们推进了对自然界的观察，他们用比他们博学的先辈更为系统的方式运用实验手段。在他们探索支配物体和物质行为的基本规律的过程中，他们发展了一种世界观：是自然的力量而不是上帝的直接监督管理着世界。尽管他们的发现基本上改变了人们观察宇宙的方法，但是这些探索者主观上决不是要进行一次革命。他们大多数人相信如果自然像一个机器的话，它不过是一个神的创造品。运行其间的错综复杂的规律性，在他们看来是神完美性的反映。

与科学工作自身齐头并进的，是一些方法论的发展。这些方法论都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英国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提倡归纳法。这种理性的方法，依靠系统的、检验的观察和实验来创建事实，这些事实被当作证明基本原则的基础。与他相反的是，法国思想家笛卡尔拥护演绎法——根据基本原理按照逻辑，逐步地推导。在未来的世纪中，这两种方法支配着西方科学思想。

新天体学说的形成



奥塔维奥·里奥尼的蜡笔画描绘了1624年的伽利略。当时这位科学家正在罗马讨论关于教皇是否承认哥白尼学说的问题。1632年，他出版了一本书，比较分析了传统的宇宙观和哥白尼学说。教皇乌尔班八世发现这本书是在嘲笑他的观点时，开始由赞赏转向敌视伽利略。于是伽利略在家中被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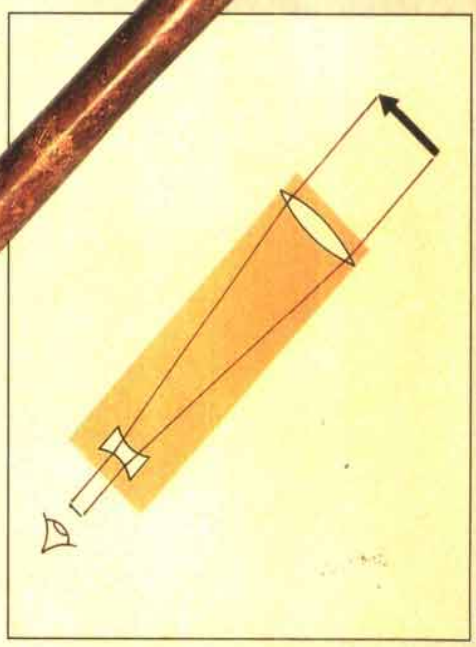
天文学作为研究宇宙的科学，把地球放在了宇宙的背景之中。16世纪到17世纪天文学家的迅速前进改变了人们关注世界和自身的方法，许多人带着怀疑和敌视来注视着天文学。

最初，基督徒接受了古代天文学家流传下来的观点：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天体围绕着地球沿着自己的轨道、按照一个周期或变化的周期运动。这幅图景在近代遇到的第一次挑战来自哥白尼的著作《天体运行论》(1543)。这本书发表了他至少30年前就持有的观点："地球的中心不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轨道都围绕着太阳"。

天文学家开普勒（1571－1630）进一步证实和提炼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他演绎出更为精确的行星运行规律，在他的《鲁道芬历》——用他的赞助人皇帝鲁道夫二世命名——中预测的行星位置空前准确。伽利略（1564－1642）——伟大的多面科学家，他也建立了运动的核心原理和机械力学——使用望远镜证实了天体，在他的《星空使者》中提到了这些，这本书出版于16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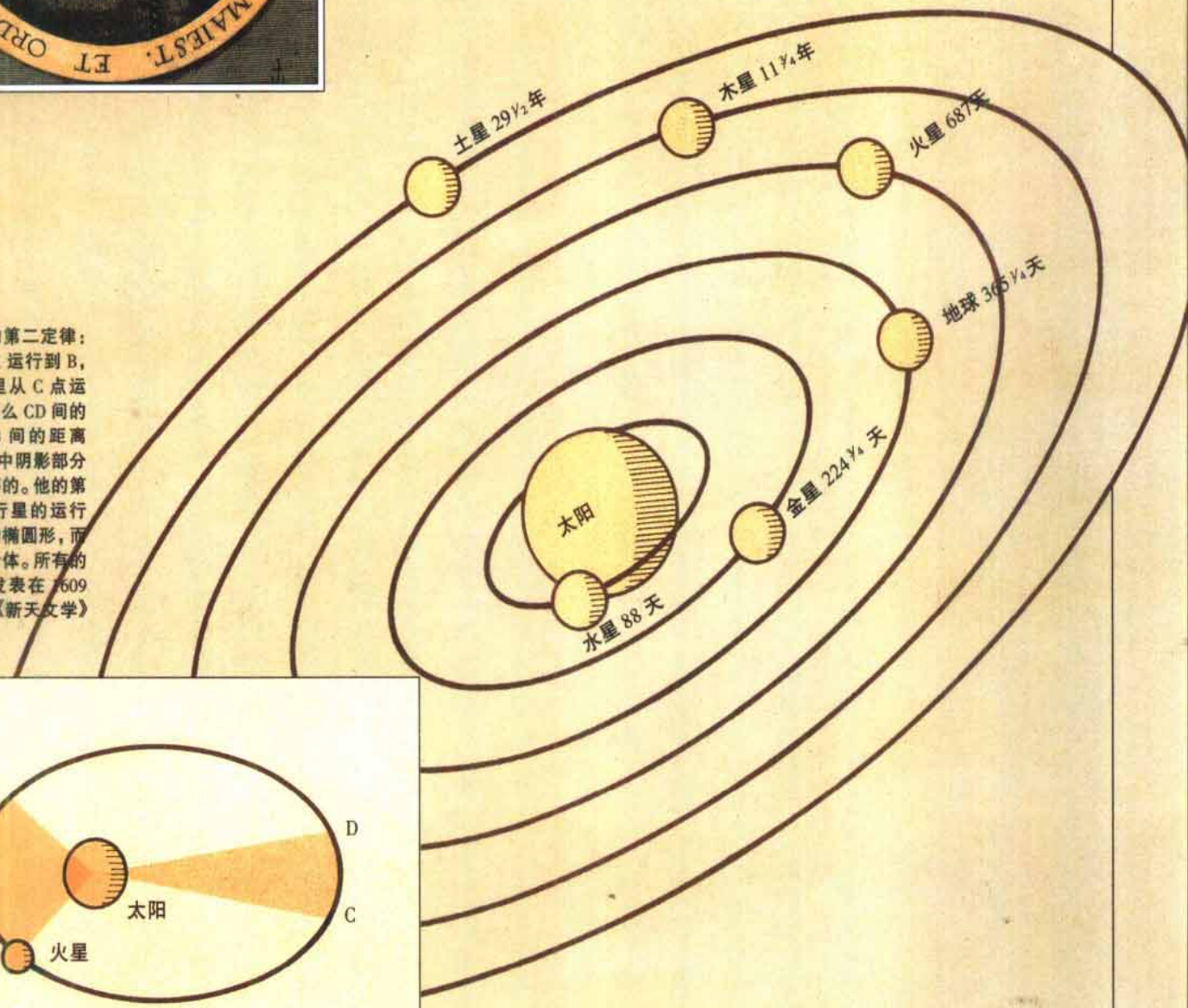
这是伽利略制造的100只望远镜中的一只。这种仪器按照管子的形式来设计，阳光从凸透镜那头射入，靠近眼的是凹透镜，通过它后形成一个放大的图像。伽利略使用它可以看到月亮上的陨石坑。





这幅雅克布·翁·海伊登的版画表现的是1620年的开普勒，当时他是帝国的数学家。最初他想参加教会，但数学方面的才能使他踏上了天文学的生涯。对美学的感受力加上很深的宗教宇宙观，他相信宇宙是按照一个协调的构思来制造的。

这幅17世纪的太阳系图（未按比例）是按照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来描绘的。行星按照自己独立的系统，在来自太阳的引力作用下进行运动。他的第三定律发表在1619年的《宇宙的协调》一书中，论述了轨道的大小如何与它们的“周期”——行星完成一周运动所需时间的长度——系统地联系在一起。



开普勒的第二定律：如果火星从A运行到B，在相同时间里从C点运行到D点，那么CD间的距离要比AB间的距离短，但示意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是相等的。他的第一定律说明行星的运行轨道是简单的椭圆形，而不是圆的组合体。所有的定律都首次发表在1609年开普勒的《新天文学》一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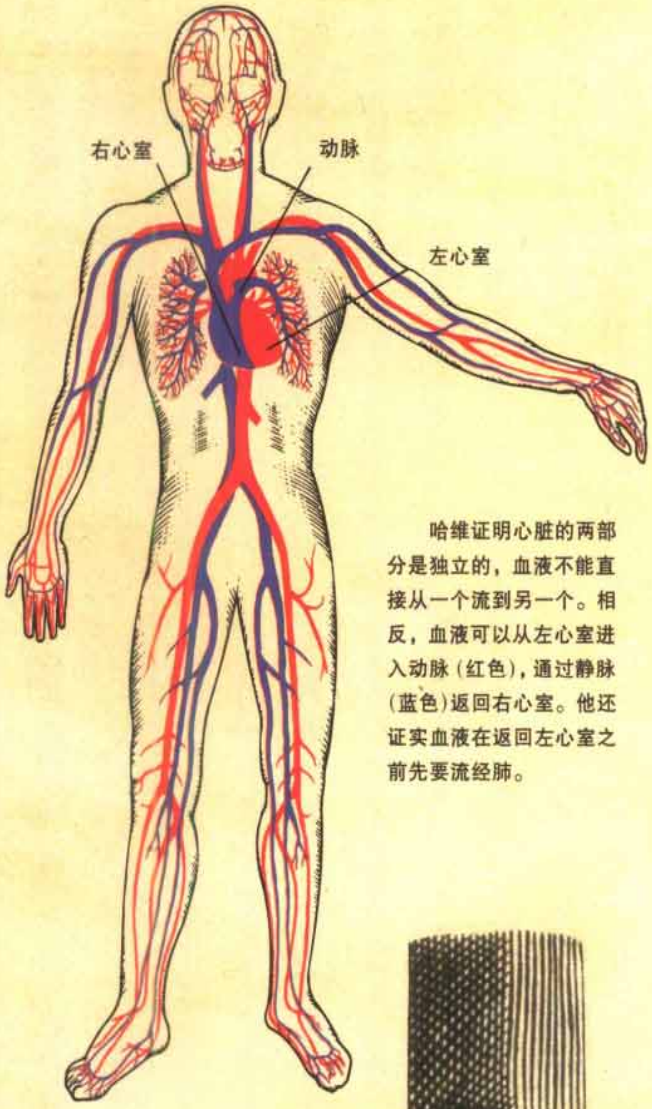
医学的突破

17世纪早期，内科医生所用的医学基本理论都是在遥远的古代由两位希腊人提出的，一位是亚里士多德，一位是公元2世纪的作家盖伦。一位佛兰芒的解剖学家昂德海思·维萨里（1514－1564）提炼了一些盖伦对解剖的描写，同时，瑞士人帕拉切尔苏斯已经采用了关于疾病有可能是局部性的而不是一般的失调的思想。然而，是英国内科医生威廉·哈维（1578－1657）通过反驳盖伦关于身体如何工作中的主要理论，才掀起了新的生理学思想的巨浪。希腊人曾指出，静脉把从肠道中食物所吸收来的营养运到肝脏，然后从那里再运往身体的其他部分。动脉组成了独立的系统，其功能是通过血液流动运送从心脏得到的“自然的热量”和从空气中得到“生命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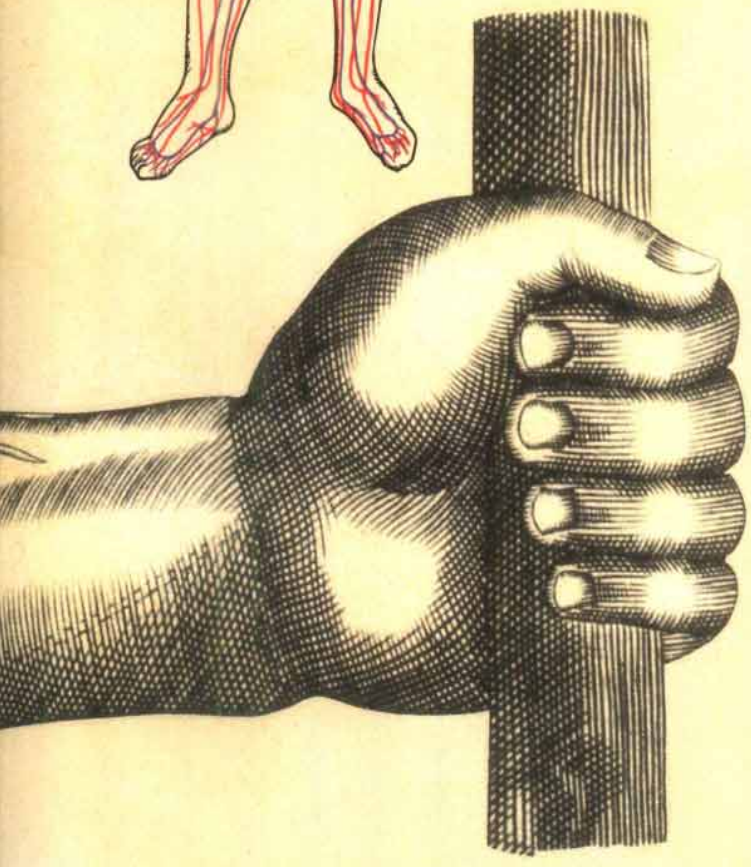
在他1628年发表的《心脏的运动》中，哈维——右图所画的肖像是很久以前的他——通过使用活的动物暴露在外的心脏和血管进行实验的记录，得到了与以前不同的观点。他宣称，心搏与心壁收缩产生的脉搏一致，心壁收缩使血液排出，迫使它“从右（心室）进入肺部，从左（心室）进入主动脉，从那里动脉产生脉搏”。他推论，大量的血从静脉流到动脉需要在一些点回流。后来意大利生理学家马塞罗·马尔必基在身体四肢发现的毛细血管提供了动脉静脉之间缺失的环节，从而证实了血液循环系统。



在《心脏的运动》的一幅图解中，哈维通过显示瓣膜如何阻止静脉中的血除了流向心脏之外不流向其他的方向，确立了血液循环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胳膊被捆绑着，因此静脉显了出来，极小的隆起部就是瓣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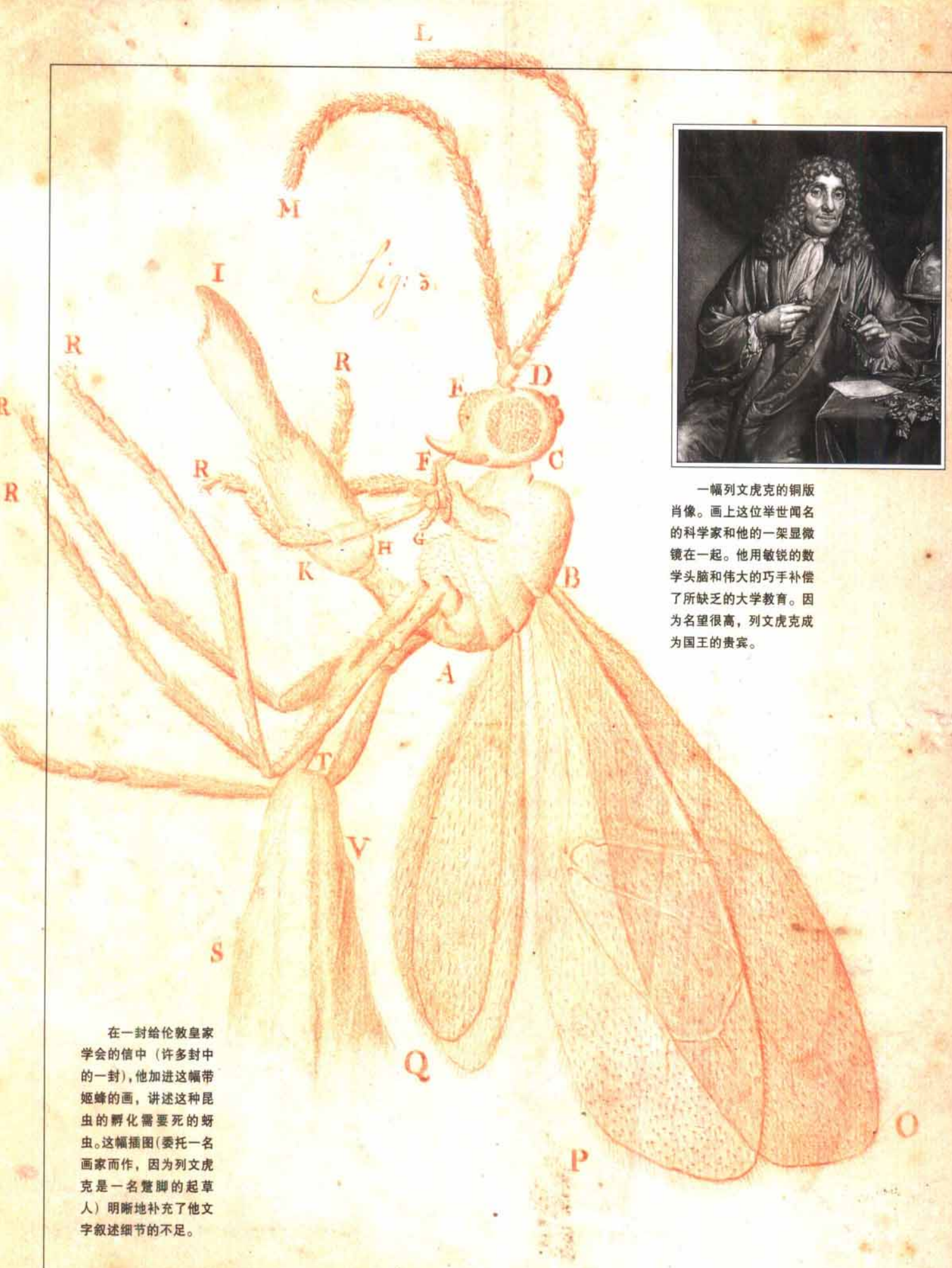
哈维证明心脏的两部分是独立的，血液不能直接从一个流到另一个。相反，血液可以从左心室进入动脉（红色），通过静脉（蓝色）返回右心室。他还证实血液在返回左心室之前先要流经肺。





坚韧的先驱

医学精确测量的一位先驱，意大利的内科医生圣克陶里斯（1561－1636）在1614年发表的《医学测量法》中的一幅图，展示他用于研究身体在吸收和排泄之后重量变化的测重装置。经过30年的系统研究——其间他发明了测量湿度和体温的仪器——圣克陶里斯设想身体通过皮肤“无意识的排汗”失去重量，他错误地认为测量分泌物的重量对疾病的诊断有用。圣克陶里斯希望探索出传统的保健观关于平衡身体消耗和排泄所耗物质的基本理论。



一幅列文虎克的铜版肖像。画上这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和他的一架显微镜在一起。他用敏锐的数学头脑和伟大的巧手补偿了所缺乏的大学教育。因为名望很高，列文虎克成为国王的贵宾。

在一封给伦敦皇家学会的信中（许多封中的一封），他加进这幅带姬蜂的画，讲述这种昆虫的孵化需要死的蚜虫。这幅插图（委托一名画家而作，因为列文虎克是一名蹩脚的起草人）明晰地补充了他文字叙述细节的不足。

微观世界的探索

天文学家使用望远镜，而生物学家的工具是显微镜，这也是17世纪头一个十年的发明，它的设计同样是为了观察以前看不到东西。

显微镜的科学价值直到17世纪中叶才被完全了解，当时马尔必基正用它来发现毛细血管。随后，在1665年罗伯特·胡克，伦敦皇家学会的创办人之一，出版了他阐述极好的《显微》，这是显示显微镜的潜力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它展示了植物的细胞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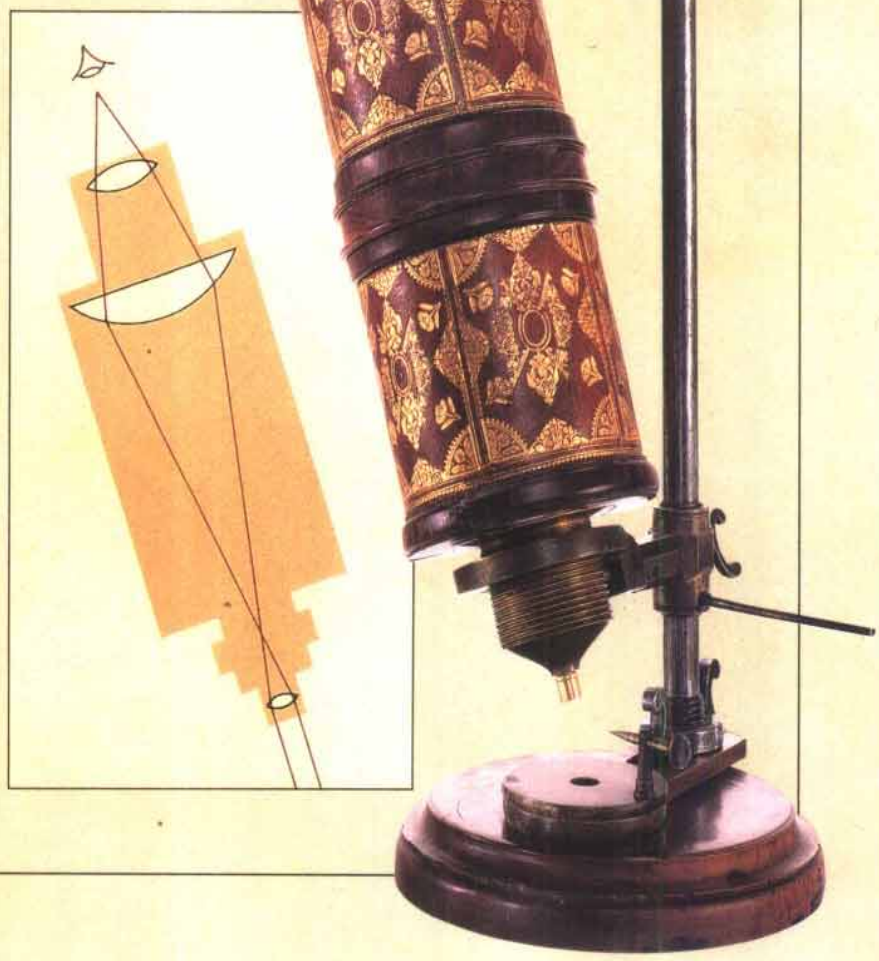
但是，是荷兰名叫安东尼·范·列文虎克的公务员，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最重大的进展。40岁的时候，他决定改进布商用于观察布匹的放大镜，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了一种能够辨别血红细胞和细菌的仪器。他还发明一种打磨高质量透镜的技术，这个秘密他从来没有对外透露。与当时已在知识分子圈中已建立的科学规范相符合，在尝试任何的解释之前，他提供了完整的、精确的观察报告。他的方法显示出微生物大量的存在，并且使他能在有性繁殖领域（他分辨了精液）创造新的理论和发现动植物中输送气体和液体的系统。



这是典型的列文虎克显微镜，这个6厘米长的仪器在两个夹紧的金属板间有一个微小的手工磨制的透镜，标本放在针尖上，标本的位置和透镜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螺纹进行调节。

高倍透镜的巨大功用

由罗伯特·胡克设计的这个显微镜与列文虎克的单镜片系统相反，它包括排列在一起的三个透镜（见插图），外边包着带有金浮雕精美而又昂贵的皮革。毫无疑问，它会被保存在图书馆包装华丽的书籍中间。胡克是一名优秀的仪器制造者，他发明了高效率的空气泵，改良了钟表和显微镜，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气象设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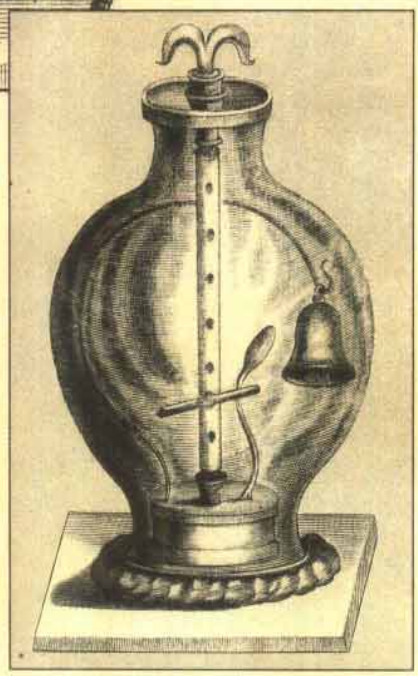
对无形世界的调查研究



罗伯特·波尔(1627－1691)体现了17世纪的科学探究精神。他是在气体物理学和基本物质理论的研究中，使用酸碱颜色指示剂进行化学分类研究的先驱。他在他的宇宙有序的理论中，找到了上帝存在的进一步证据。

17世纪最伟大的挑战之一是对气体的调查研究。公元前15世纪的希腊思想家恩贝多克利已经揭示了空气中存在物质：一个空容器底朝上地放入水中，里面不会充满水，因为容器中密封的空气阻止它进入。但是用实验进一步证明是很困难的，因为空气是难以捉摸和看不见的、无味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厌恶真空并且抽水机是靠神秘的力量运行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异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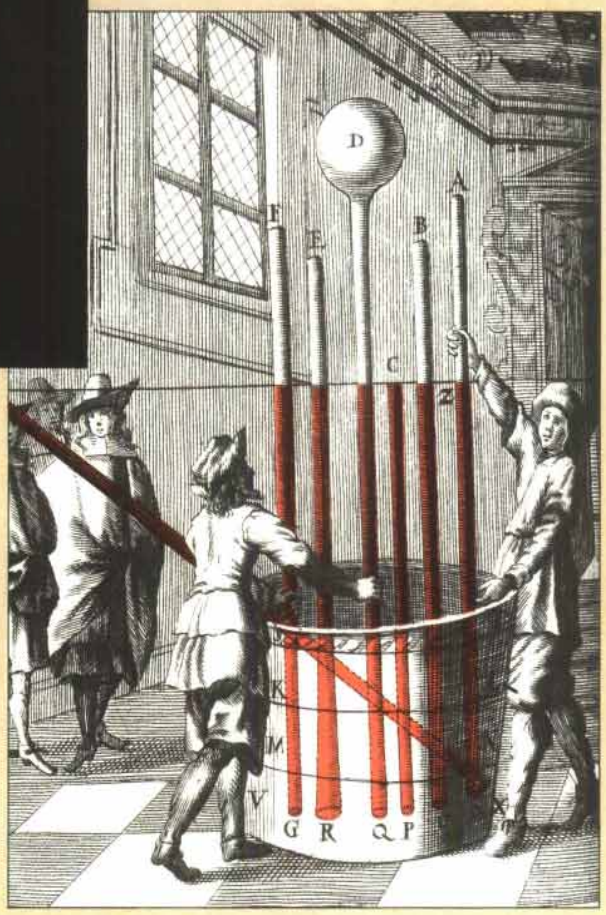
伽利略进行了重新研究，他向密封的容器里压进气体，并在天平上称重(压入的空气越多，容器越重)，并且伊文吉里斯塔·托里切利在罗马、奥托·V·盖里克（下面）在德国南方都证实了大气压的存在。然而，第一个系统地阐述其定律和准确地形容空气作用的人是爱尔兰人罗博特·波尔，伦敦皇家学会的创办人之一。为了证明空气也可以进行定量分析，他向封在一个密闭的管子里空气施加压力，当压力增加到两倍的时候，空气的体积只剩下了原来的一半，从而导出了“波尔定律”：对气体来说，压力和体积成反比。



波尔1622年出版的书《新实验》描写了真空广口瓶中的空气被抽走后，小动物如何窒息，点亮的蜡烛如何熄灭(如左图所示)，从而证明了空气对生命和燃烧的重要性。他还在广口瓶的里面放了一个铃铛来研究空气作为声音传导介体的作用(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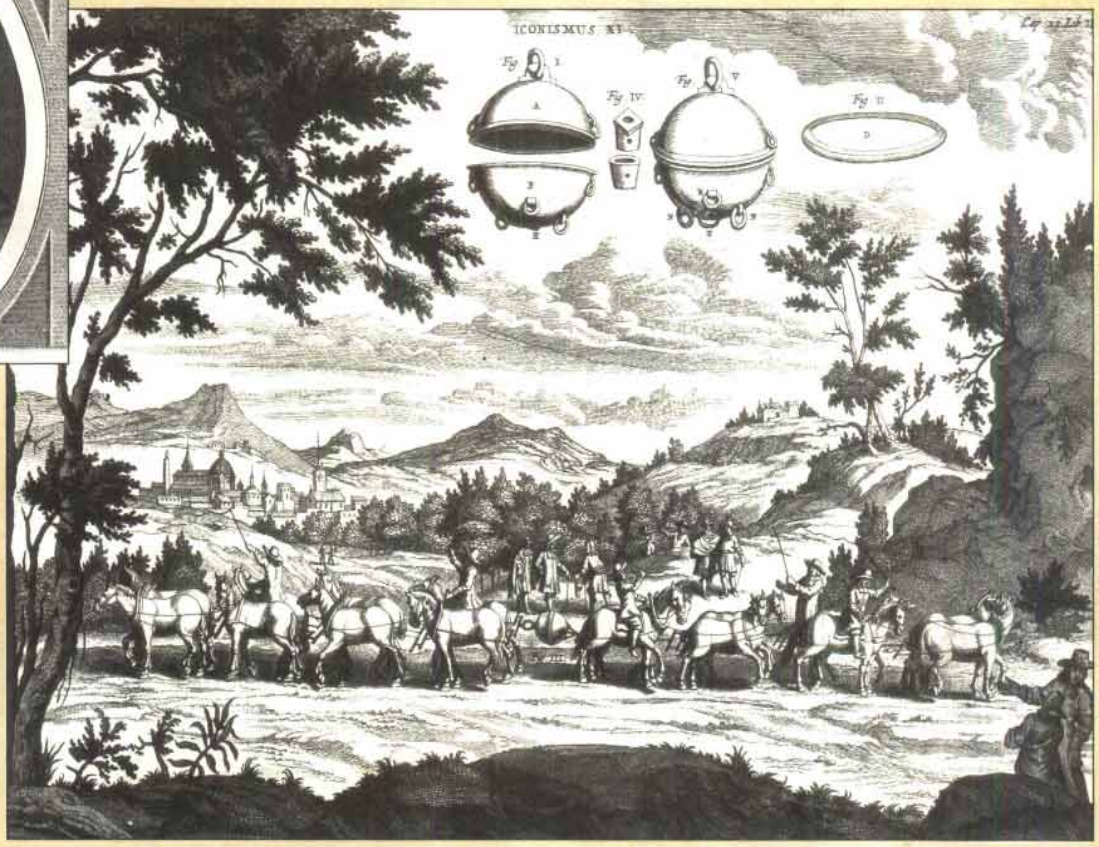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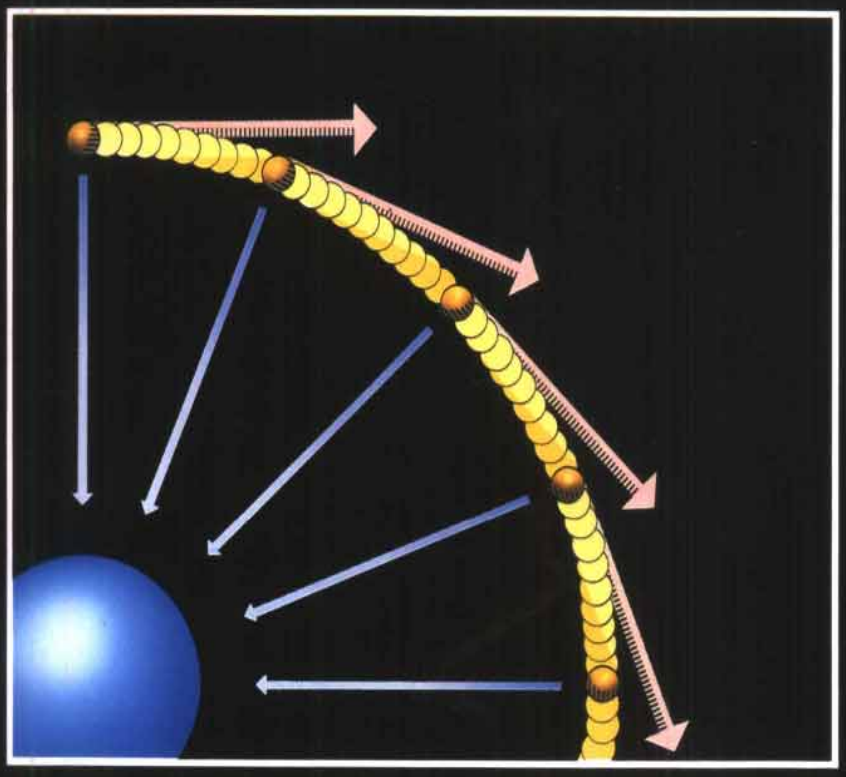
伽利略的一位才华横溢的学生伊文吉里斯塔·托里切利（1608－1647），他演示了如果玻璃管装满水银后反转过来放入碗或者大缸里，水银会保持一个相同的高度，而与管子的形状和尺寸无关。这种结果来自“普通空气的大海”的压力，在那里我们也被淹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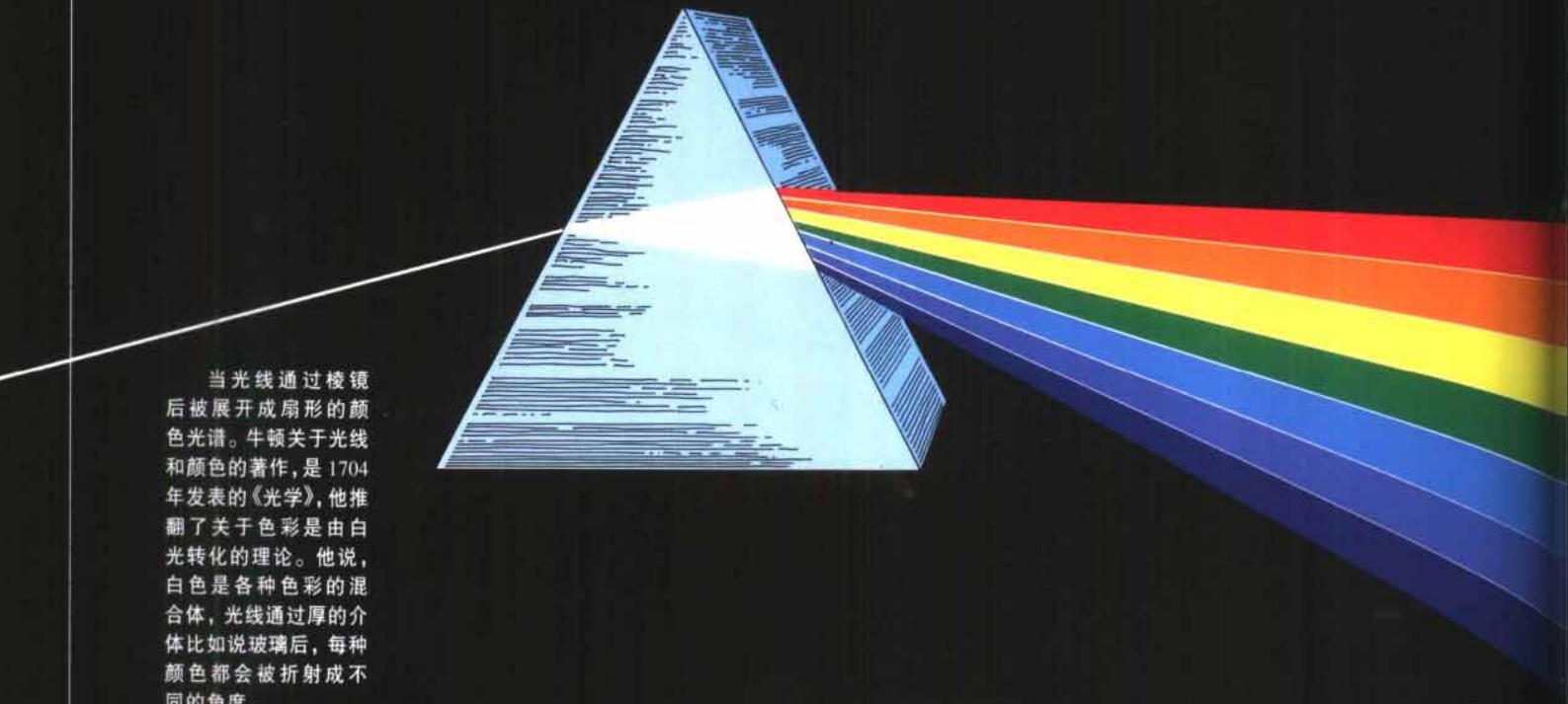


作为外交家和德国马德堡市市长的奥托·V·盖里克（1602－1686）从学生时起就在探索，力图证明真空的存在，以驳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在一次演示中，两个马队试图将紧闭在一起、中间的空气被抽走的两个铜半球拉开，但没能拉动，从而显示了大气压的力量。





月球在由地球产生的万有引力（细箭头）作用下，沿一个连续的路径（粗箭头）移动，这使得这颗卫星在它的轨道上维持均衡的状态。牛顿对围绕太阳的行星运动提出了类似的解释，他通过一种喜剧的方式应用了他的万有引力数学定律。



当光线通过棱镜后被展开成扇形的颜色光谱。牛顿关于光线和颜色的著作，是1704年发表的《光学》，他推翻了关于色彩是由白光转化的理论。他说，白色是各种色彩的混合体，光线通过厚的介体比如说玻璃后，每种颜色都会被折射成不同的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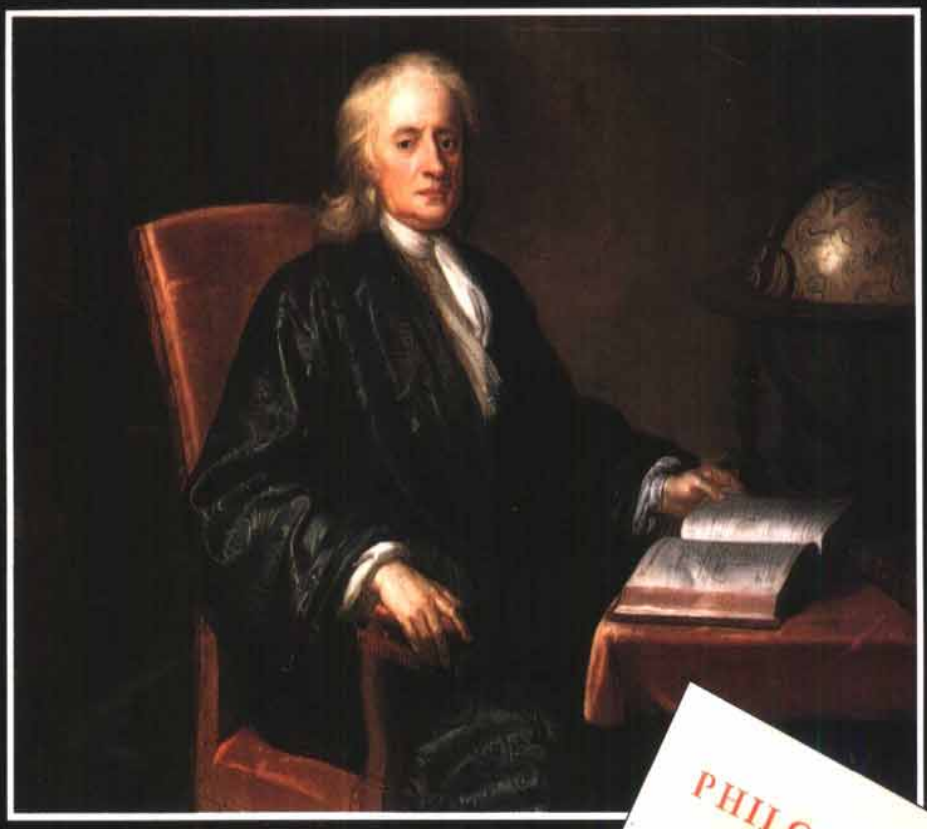
现代科学之父

艾萨克·牛顿（1642－1727），把一个世纪中的多项科学发展综合成为一幅协调的万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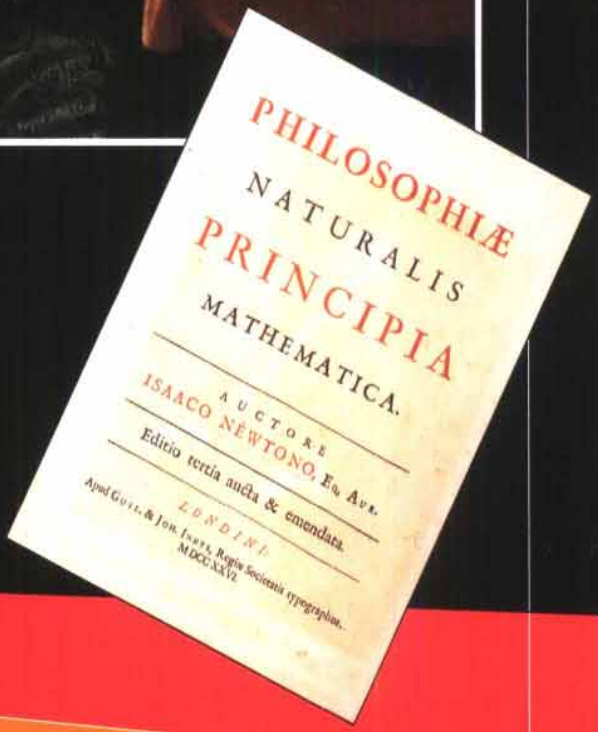
在上中小学时，他的表现很平常，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他的才智才得到开发。在那里，他被介绍去读笛卡尔的著作，从而显示了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天赋。

当牛顿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发明了用于分析数量运动和变化的微积分数学技巧。随后进行的光学和反射望远镜方面的工作，这使牛顿对运动和“力”及导致运动变化的原因产生了持久的兴趣。他发表了许多杰作：1687 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探讨了力对物体的作用。这部著作包含了他的三大运动定律：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的情况，会保持静止或在直线上保持匀速运动；物体的加速度与同一方向上受到的外力成正比例；每个作用力都有与之相等的反作用力。

他还提出重力万有引力的存在，宇宙间每个物体都会对其他物体产生引力，引力随物体的大小和相互之间的距离发生变化。这股把苹果吸向地球的力，与决定行星绕日轨道的力是相同的——这是一条宇宙统一的原理。



“现在我描绘了世界规律的框架”牛顿——1726 年所画的肖像中，他正坐在天球仪的旁边——在他的《数学原理》（右）中无可非议地宣称。这三部分论文关于力学的论述——关于力产生运动的研究——同开普勒的行星定律和伽利略的地球物理学联系在一起。



公元 1600 年 – 1610 年	公元 1610 年 – 1620 年	公元 1620 年 – 1630 年	公元 1630 年 – 1640 年	公元 1640 年 – 1650 年
在关原战役中，德川家康的部队击败了对手石田三成的部队，重新统一日本（1600 年）。 德川家康被任命为日本的幕府将军（军事统治者）——在其后 264 年里，德川家族一直担任这一职位（1603 年）。	德川家康的部队围攻并占领大阪城堡，城堡主人丰臣秀赖自杀（1615 年）。 德川家康去世（1616 年）。 德川家康的继任者德川秀忠发起对日本基督教徒大规模的迫害（1618 年）。 满族统治者努尔哈赤发动对明王朝的进攻（1618 年）。	天启皇帝即位加速了中国明王朝的覆亡（1620 年）。 日本德川秀忠去世，德川家光成为将军（1623 年）。 满族人在从前明王朝的领土沈阳建立了新都城（1625 年）。 在宁远战役中满族人被明朝军队击败，努尔哈赤战死（1626 年）。 在撤往长城以北前，一支满族军队抵达北京的门户（1629 年）。	德川家光提出一系列旨在限制日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措施中的第一项（1633 年）。 德川家光采取措施保持对日本封建贵族的控制（1635 年）。 德川家光的军队摧毁岛原城堡农民的反抗（1638年）。	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入中国首都北京，明朝最后一位皇帝自杀（1644 年）。 明朝将军吴三桂邀请满族人帮助他驱逐李自成叛乱。满族人随后宣称建立清王朝取代明朝，把年仅 5 岁的统治者推上皇位，年号为顺治（1644 年）。
远东				
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以促进与东方的贸易（1602 年）。 伊丽莎白女王去世，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继承英国王位，称为詹姆斯一世，建立了斯图亚特王朝（1603 年）。 炸药阴谋——炸掉英王和议会的企图——化为泡影（1605 年）。 在经历了 41 年的交战后，荷兰人与他们从前的统治者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商定停战协议（1609 年）。	在爱尔斯特种植园，詹姆斯一世把没收北爱尔兰天主教反叛者的土地送给新教移居者。（1611 年）。 在波希米亚爆发的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新教起义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开始（1618 年）。 荷兰主要政治家约翰·范·奥登本尼·维尔特以叛国罪被处死（1619 年）。	荷兰重新开始与西班牙的战争（1621 年）。 荷兰西印度公司成立（1621 年）。 詹姆斯一世去世，其子查理一世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国王（1625 年）。 皮尔特·海恩上将俘获一支西班牙珠宝舰队（1628 年）。 查理一世不情愿地同意了《权利请愿书》，宣告未经议会准许，征税是违法的（1628 年）。 查理一世解散议会，逮捕了 9 名议会领导成员（1629年）。	荷兰郁金香价格的投机性暴涨以戏剧性的崩溃而结束（1637 年）。 受到企图对英国国教祈祷书征税的警示，苏格兰长老会教会的支持者们用《神圣盟约》来宣誓保卫改革后的信仰（1638 年）。	英国内战爆发，一方是忠于国王的军队，一方是拥护议会的军队（1642 年）。 路易十四 4 岁继承法国王位（1643 年）。 在纳西比战役中查理一世的王军决定性地败北（1645 年）。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带来三十年战争的终结，作为和平协议的一方，西班牙最终同意承认荷兰独立（1648 年）。 查理一世被处死（1649年）。
西欧				
一群英国移民在弗吉尼亚詹姆斯河畔建立詹姆斯敦殖民地——它是英国在新世界第一个永久殖民地（1607 年）。 塞谬尔·德·尚普兰发现魁北克（1608 年）。	荷兰移民定居曼哈顿岛（1611 年）。 西印度烟草植物的引进改变了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命运（1612 年）。 弗吉尼亚总督召集下议院代表集会，这是北美第一个议会（1619 年）。	五月花号带着新教徒来到马萨诸塞（1620 年）。 印第安人屠杀 347 名弗吉尼亚移民——接近该殖民地人口的三分之一（1622 年）。 英王詹姆斯一世解散弗克尼亚公司，建立起王室对殖民地的控制（1624 年）。 荷兰人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曼哈顿岛（1626 年）。 枢机主教黎塞留发布特许状，允许从佛罗里达到北极圈的新法兰西殖民地的拓殖（1627 年）。	巴尔的摩勋爵建立马里兰殖民地（1632 年）。 哈佛大学做为一个神学院建立起来（1636 年）。 在佩科特之战中，新英格兰移民击败邻近的印第安人部落（1637 年）。 康涅狄格从马萨诸塞分离出来，成为一个自治实体（1639年）。	法国牧师和皮毛商发现蒙特利尔（1642 年）。 新英格兰联盟把康涅狄格、纽黑文、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湾诸殖民地联系起来，目的是共同防御（1643 年）。
北美				
波斯统治者阿拔斯国王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夺得大不里士（1603 年）。 阿拔斯从土耳其人手中赢得亚美尼亚城市埃里温（1604 年）。 在苏非沿战役中，波斯军队击败一支奥斯曼军（1605 年）。	为了与阿拔斯媾和，奥斯曼苏丹艾哈迈德一世同意放弃他的前任在波斯的掠取物（1612 年）。 因怀疑有个阴谋，阿拔斯安排暗杀了他的长子（1615 年）。	一支英波军队占领波斯湾葡萄牙霍尔木兹基地（1622 年）。 在与奥斯曼人的再次冲突中，阿拔斯的军队解除了土耳其人对巴格达的围困（1626 年）。 阿拔斯去世，他的孙子萨菲继位（1629 年）。	波斯与奥斯曼重新开战，奥斯曼人占领哈马丹，坎大哈落入乌兹别克统治者希哈拉手中（1630 年）。 奥斯曼人重新征服巴格达（1638 年）。	阿拔斯二世 9 岁时继承王位（1642 年）。 阿拔斯重新占领坎大哈，当时坎大哈在印度统治者莫卧儿手中（1649 年）。
波斯				

公元 1650 年 – 1660 年	公元 1660 年 – 1670 年	公元 1670 年 – 1680 年	公元 1680 年 – 1690 年	公元 1690 年 – 1700 年
日本统治者德川家光去世，其子 10 岁的德川家纲继任将军，一个由不满的浪人——没有主人的武士——酝酿的推翻德川政府的阴谋被发现并被粉碎(1651 年)。 向东部扩张的哥萨克人在黑龙江建立雅克萨要塞，对中国北部边疆构成威胁(1655 年)。 反叛领袖郑成功，在西方人中以国姓爷而闻名，没能占领中国最大的城市南京(1659 年)。	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面对威胁清政府撤空了狭长的海岸线(1661 年)。 一个 7 岁的孩子继承中国帝位，即康熙皇帝(1661 年)。 康熙设计杀了他的辅政大臣鳌拜，自己亲政(1669 年)。	以三藩而闻名的三个反叛将军开始了反对康熙的为时 7年的叛乱(1974 年)。	康熙向侵入黑龙江地区的俄国人发起进攻(1680 年)。 清朝军队从郑成功后人手中统一台湾(1683 年)。 尼布楚条约——中国与欧洲大国间第一个正式协定——结束了中俄在黑龙江河谷的战斗(1689 年)。	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去世(1694 年)。 康熙摧毁了噶尔丹领导的蒙古诸部叛乱，噶尔丹自杀(1697 年)。
荷兰共和国联合省执政者(军事领袖)威廉二世去世，留下遗腹子作为继承人 (165 年)。 约翰·德·怀特成为荷兰省议会议长(1653 年)。 奥利佛·克伦威尔被宣布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主(1653 年)。 由商业竞争引起的第一次英荷战争暂告结束(1654 年)。 克伦威尔去世(1658 年)。	查理一世被流放的儿子回到英格兰继承王位，是为查理二世(1660 年)。 路易十四到了法定年龄，开始亲政(1661 年)。 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 (1665 年)。 鼠疫肆虐英国(1665 年)。 伦敦大火毁掉了英国首都(1666 年)。 布拉达条约结束了英荷之间的敌对，条款有利于荷兰(1667 年)。	法王路易十四侵略荷兰共和国。 约翰·德·怀特被一个歹徒暗杀后，威廉三世在荷兰共和国执政，结束了“无执政时期”(1672 年)。 根据尼吉梅根条约，法国同意归还其占领的全部荷兰领土，并放弃贸易方面的限制性措施(1678 年)。	法国王宫从巴黎迁至凡尔赛(1682 年)。 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继他的哥哥查理二世后成为英国国王(1685 年)。 英国科学家艾萨克·牛顿出版了他的《数学原理》一书(1687 年)。 威廉三世受英国对詹姆斯天主教感到不满的新教徒之邀，进入英国。詹姆斯逃往法国，威廉同意与他的妻子玛丽——被废黜的君主之女——联合统治英国(1688 年)。	威廉在波耶战役中击败支持詹姆斯二世的爱尔兰叛乱(1690 年)。 玛丽女王去世(1694 年)。
荷兰兼并了新世界第一块斯堪的那维亚殖民地新瑞典(1655 年)。	路易十四与他的首相柯尔柏重组新法兰西，加强了王权控制(1663 年)。 英国人占领新阿姆斯特丹，将其重新命名为纽约(1664 年)。	英王查理二世在弗吉尼亚和佛罗里达西班牙殖民地之间建立了卡罗莱纳殖民地(1670 年)。 杰克斯·马奎特和路易斯·朱利特考察密西西比河，一直到它与阿肯色河汇合处(1673 年)。 菲力浦王战争。印第安人联盟反对新英格兰移民，结果印第安人败北，他们的首领被杀(1675 – 1676 年)。	罗伯特·德·拉萨尔到达密西西比河河口，将整个山谷命名为新法兰西(1682 年)。 为把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在王权控制下联合起来，创立了新英格兰自治领(1686 年)。 詹姆斯二世被废黜后，新英格兰自治领解体(1689 年)。	女巫审判震撼了马萨诸塞湾的塞勒姆移民区。
	哥萨克骑兵侵袭波斯腹地，这是里海战线上一系列入侵的第一次(1664 年)。 阿拔斯二世死后，王位传给他的儿子苏莱曼，他是一个放荡无节制、常常酗酒的君主(1667 年)。		波斯军队征服可依威，它的可汗变成波斯国王的仆臣(1688 年)。	萨菲王朝最后一位国王侯赛因接替苏莱曼，他试图奉什叶派为正统，在国民中激起不安(1697 年)。

索　引

A
Abahai 皇太极(满族首领),41－42,43
Abbas Ⅰ阿拔斯一世(波斯沙),11,55－56,57,58,60,61,62－63,64,65,67,68,69－71
Abbas Ⅱ阿拔斯二世(波斯沙),71
Abdullah khan 11 阿布杜拉汗(乌兹别克首领),61
asupuncture 针灸,43
Afghanistan 阿富汗,57,58,71
Africa 非洲,101,收录,144
al－Amili, Baha al－Din 巴哈·阿尔丁·阿拉米里(工程师),63
Albazin 雅克萨(堡垒),地图 36,46
Albemarle 艾尔伯马力公爵,130
Aleni, Giulio 吉利欧·安尔尼(耶稣会传教士),41
Aleppo 阿勒坡(城市),地图 56,64
Ali Riza 阿里·礼萨(波斯画家),64－65
Allahverdi khan 阿拉德尔迪汗(波斯总督),62
Amboina Island 蕃薯岛,121
America 美洲,101,135,地图 136;战船,33,也见新大陆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113,115,118,119,120,121,地图 124－125,125,126,131
Anatolia 安纳托利亚,地图 56,68,69
Andros, sir Edmund 艾德蒙多·安德罗斯爵士(总督),154,155
Anglo－Dutch wars 英荷战争,101－102,126－127,130
Anne of Austria 奥地利安妮,106－107
Anne of Denmark 丹麦公主安妮,80,81
Antwerp 安特卫普(荷兰港口),115,120
Ardabil 亚达毕尔(波斯圣地),56
Aristotle 亚里斯多德,162,166,167
Armenia 亚美尼亚,60,61;商人,63－64
Armour 盔甲:中国,48;欧洲,14,15,48;日本,14,15;波斯,59
Art 艺术:中国,41,51,52;荷兰共和国,124;日本,22,22－23,27,28,32;波斯,61,64－65;清教徒画师,153
Ashraf 阿斯赫拉夫(波斯宫殿),55,地图 56
Asia 亚洲,35,36,46,53,137;商人,51;贸易者,120
Astley, Sir Jacob 雅各布·阿斯特利爵士(王党),91,93,95
Astronomy 天文学,32,37,40,44,48,160－161,168
Austria 奥地利,73,133
Azerbaijan 阿塞拜疆,地图 56,60

B
Bacharach 柏查喇泡(德国村庄),76
Bacon, Francis 弗朗西斯·培根(英国哲学家),159
Bacon, Nathaniel 纳坦尼尔·培根(弗吉尼亚人),157－158
Baghdad 巴格达,地图 56,61,69
Baluchis 俾路支人,71
Banda Island 班达群岛,121
Bandar Abbas 班达阿拔斯(波斯港口),地图 56,68
Barbados 巴贝多斯(殖民地),101
Basho, Matsuo 松尾芭蕉(诗人),29,32
Batavia 巴达维亚(贸易基地),121,123
Beijing 北京(中国首都),35,36,地图 36,37,38,42,43,46,47,48,52
Bengal 孟加拉(贸易站),122－123
Biloxi 比洛克西(美洲,法国城堡),156
Blake 布莱克海军上将(英国人),126
Bo juyi 白居易(中国诗人),47
Bohemia 波西米亚,74
Bonn 波恩(法国军械库),132
Boston 波士顿,145,149－150,154
Bourbon, Duchess 波旁公爵夫人,108
Boyle, Robert 罗伯特·波尔(科学家),166
Bradford, william 威廉·布莱德福特(清教徒),135,140
Brazil 巴西,136
Breda 布拉达(荷兰要塞),119
Bristol 布里斯托(英国港口),94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英国东印度公司,68
Brussels 布鲁塞尔(哈布斯堡首都),115
Bry, Theodore de 西奥多·德·布里(画家),135

C
Cabot, John 约翰·卡波特(探险家),137
Cadiz 卡迪兹(西班牙港口),84
Callot, Jacques 雅克·凯洛特(艺术家),73
Calvert, Cecilius 卡尔弗特·塞西留斯(巴尔的摩领主),151
Calvin, John 约翰·加尔文(法国宗教改革家),82
Canada 加拿大,140,也见新法兰西,新世界
Canton 广州(中国港口),地图 36,50,52
Cape Breton Island 布里顿角岛(定居点),136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121
Carolinas 卡罗来纳(殖民地),136,144,155－156,158,北卡罗来纳,139
Cartier, Jacques 杰克·卡提尔(探险家),137
Caucasus 高加索,57,61,62,68
Ceylon 锡兰,123
Chaldiran 查尔蒂罕(1514 年战役),地图 56,57
Champlain, Samuel de 塞缪尔·德·山普伦(魁北克发现者),140,147
Charles Ⅰ查理一世(英国国王),55,78,82,83－85,86,87,88,89,90,91,92,93,94,95,100,101,151
Charles Ⅱ查理二世(英国国王),89,95,87,101,102,130,131,152,154,155,158
Charles Ⅴ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115
Charleston 查理斯顿(定居点),144,155
ChenHongShou 陈洪绶(中国艺术家),47
Chesaperke Bay 切萨皮克湾(定居点),140
China 中国,地图 36,137,147;针灸,43;管理,38,39,42,44,48－50;农业,36,37,50;艺术,29,41,51,52;陶瓷,36－37,50,51,52,123;中国人的生活,49,50－51;在日本的移民,25;宫廷生活,38;荷兰贸易,123;工程师和冶金家,13;火药,15;工业,36,50;耶稣会教士,37,40,41,45,46,47,51－52,53;金朝,38,39,41;商人,18;军事机构,38,40,47－48;明朝,35－36,37,38,39,40－41,42,43,44,46,47,48－49;清朝,35,41,43,44,46,49;王后的王冠,39;宗教,12,13,35,42,44;唐代,47;税收,37,49;茶礼,16,30;虎丘,50－51;贸易,36,39,45,47,50－51,52;对日本战争,18,19,37;柳条边,36,39,49
Chongzhen 崇祯(中国皇帝),38
Christianity 基督教,61,160;在日本,13,15,18,19,24－25,27,32;在波斯,64
Clarendon, Earl of 克兰顿伯爵(历史学家),87
Clarendon, Lord 克兰顿勋爵(英国大臣),102
Clement Ⅺ克莱门特十一世(教皇),35
Coen, Jan Pieterszoon 简·皮特斯祖恩·库恩(东印度公司总督),120,121
Colbert, Jean Baptiste 杰恩·巴比提斯特·柯尔柏(大臣),156
Cole Ursula 乌尔苏拉·高勒(倔强的移民),150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145,150,151
Cooper, Samuel 塞缪尔·古伯(画家),84
Copernicus, Nicola 尼古拉·哥白尼,159,160
Cornwall 康瓦尔,地图 80,91,94
Cotton, Sir Dodmore 道摩尔·考顿(使者),55
Coxinga 国姓爷,43－44;其子、孙,46
Cromwell, Oliver 奥立佛·克伦威尔(英国议员),84,88,93,94,95,10,101,102,152
Crowne, william 威廉·考恩(英国旅行家),76

D
Davenant, Sir Willian 威廉·戴维南特爵士(诗人),97
de la Salle, Robert 罗伯特·德·拉萨尔(探险家),156
Delaware 特拉华(从前的新瑞典),152,158;印第安人居住地带,154－155
Delft 德尔夫特(荷兰城镇),112,119;陶像,101
Denmark 丹麦,74
Descartes, René 笛卡尔(法国哲学家),118,159,169
De－Shima 出岛(日本岛屿),25,28－29,31,32
Defroit 底特律(美洲,法国城堡),156
De witt, Cornelius 科恩利斯·德·怀特,131,132
De witt, John 约翰·德·怀特(荷兰省议会议长),130,131－132
Donne, John 约翰·道恩(英国诗人),159
Dorgon 多尔袞(中国摄政),43
Dover 多佛条约(1670),131
Dunbar 顿巴(战役),101
Dutch Republic 荷兰共和国,74,地图 114;军队,131;布尔人,121;辩论会,124－125;荷兰语,32;荷兰人的生活,112,123－125,127,128,129;交易银行,120;渔业,119,126;洪水泛滥及补救,114,116－117,119,125,131;占领台湾,44;议长,126,130;在日本的商人,24,25,29,31,32;绘画,124;省,114,115,117,118,125;联省,117;宗教,113,114,115,118,120,131;共和政府,11;盐罐,119;船只和船坞,119－120,121;联省执政者,117,123,125,126,130,133;租税,115,133;贸易,113,114,119,120,121,123,124,125,126,133;郁金香,132;航海和殖民,121,123;战舰,25,也见英荷战争;荷兰:尼德兰及各具体的地点。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 荷兰西印度公司,121,152

E
East Anglia 东英吉利,149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120,121,122－123,126
East Indies 东印度群岛,113,120,121,130,147
Edgehill 埃吉山(1642 年战役),地图 80,91,93
Edo 江户(现代东京),10,地图 10,18,20,21,22,25,26,27,28,33
Eggington, Mrs Elixabeth 伊丽莎白·爱京顿太人像,153
Egmond－aan－zee 埃哥蒙德·安·辛(荷兰村庄),125
Egypt 埃及,56,57
Eliot, John 约翰·艾略特(清教传教士),156
Eliot, John 约翰·艾略特爵士(国会议员),84
Elizabeth Ⅰ伊丽莎白一世(英国女王),65,79,80,82,115,137
Empedocles 恩贝多克利(希腊哲学家),166
England 英国,地图 80,124;美洲殖民地,121;权利法案,101,102;东印度公司,121;对外政策,82－83,光荣革命(1688),102;大抗议书,86;爱尔兰人起义,85;商人,24,25,120;民团,85;君主,11,80;航海条例,101－102,126,152,154;议会,81,82,83,84,87,90－91,95,100－101,102;国玺,93;长期国会(1640),85,86,87,95;残缺国会,93,101,102,短期国会(1640),85;与波斯,55－56,68;权利请愿书(1628),84;宗教,74,81－82,84,86,92,93,95,100,101,102;保皇党殖民地,101;新大陆的移民,137,140,141,145,146,147,148－149,151,152,154,155,156,157,158;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115;税收,81,84,85,90－91;贸易,68,123;旅行者,124;战舰,33;酒贸易,143。也见英荷战争
English Civil War 英国内战,73,80,87－95,100－102,152
Enshu, kobori 小堀远洲(日本茶师),31
Erevan 埃里温(亚美尼亚要塞),地图 56,69
Essex, Earl of 埃塞克斯伯爵(英国国会议员),92,94
Evelyn, John 约翰·伊夫林(英国日记作家),124

F
Fairfax, Sir Thman 托马斯·法尔法克斯爵士(英国国会议员),89,94,95,100
Far Lands Company 远方公司(荷兰),113,120
Fawkes, Guy 盖·佛克伊斯(英国天主教徒),82,83
Ferdinand Ⅱ斐迪南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73,74
Ferdinand Ⅲ斐迪南三世,77
Florida 佛罗里达(殖民地),136,144,145,也见圣奥占斯丁;圣约翰河
France 法国,83,115,119,124,126,130,131,132－133;太子,107;舰队,97;胡格诺教徒(法国新教徒),84,155;新大陆的居民,136,137,140,145,146,147,151,154,155,156;三十年战争,74,75,77;商人,28;酒贸易,143
Francis Ⅰ佛兰西斯一世(法国国王),137
Freak, John 约翰·弗里克(波士顿商人),153
Frederick Henty, Prince 亨利·弗雷德里克王子(荷兰领袖),119
Friesland 弗里斯兰岛,119,125
Frois, Father Luis 路易斯·弗洛伊斯神父,15
Fur trade 皮毛交易:中国,39;新世界,136,137,140,146,147,148,152,156

G
Galen 盖伦,162
Galileo Gahlei 伽利略(意大利科学家),160,166,167,169
gase and air 气体和空气,166－167
Genoa 热那亚,109
Georgia 格鲁吉亚,地图 56,61－62
Germany 德国,115,119;德国人,158
Godewijk, Pieter Van 皮尔特·范·戈德威克(荷兰诗人),123
Go－Mizuno 后水尾(日本皇帝),19
Gosnold, Bartholomew 巴托罗谬·高斯诺德(探险家),135
Great fire of Lonton 伦敦大火(1666),96－99
Great Plague 大瘟疫(1665),97,98,99
GrimmelShausen, Han von 汉斯·梵·格瑞麦尔绍森(德国作家),75－76

Guangdong 广东(中国的省),46
Guericke, Otto Von 奥托·V·盖里克 (科学家),166,167
Gunpowder 火药,15
gunpowder plot 炸药阴谋(1605),82,83
Gustavus Adolphus 阿道尔弗斯·盖斯塔法(瑞典国王),91,93
Gu yan wu 顾炎武(中国学者),51

H
Haarlen 哈伦(荷兰城镇),119,125,127,132
Habsburgs 哈布斯堡家族,73,74,75,77,113,114,115,117
Hakluyt, Richard 理查德·哈克鲁伊塔 (地理学家),140
Harriot, Thomas 托马斯·哈瑞特,140
Harvard College 哈佛大学,150,156,157
Harvey, William 威廉·哈维(内科医生),162,163
Haydar 海德尔,(塔赫玛斯普之子),58
Heberle, Hans 汉斯·赫伯勒(日记作家),76
Henrietta Maria 亨里埃塔·玛丽亚 (英国王后),79,83,90
Henry Ⅳ亨利四世(法国国王),79
Henry Ⅶ亨利七世(英国国王),137
Henry Ⅷ亨利八世(英国国王),80,81
Herat 赫拉特(阿富汗城市),地图 56,58,61
Herbert, Sir Thomas 托马斯·赫伯特爵士 (使者),55,70
Heyden, Jacob van 雅可布·范·海伊登(版画家),161
Heyn, Piet 皮尔特·海恩(荷兰海军上将),123
Hideaki, Kobayagava 小早川秀秋 (日本将军),9-10
Hidetada, Tokugawa 德川秀忠 (幕府将军),19,21,24
Hideyori 非臣秀赖(丰臣秀吉之子),19,20,21
Hideyoshi, Kinoshita 丰臣秀吉 (日本统治者),10,15,16,18-19,20,26,28
Hokkaido 北海道,地图 10,33
Holland 荷兰,地图 144,136,150;荷兰共和国行省,118,119,123,125-126,131,132,也见尼德兰
Holles, Denzil 丹兹尔·霍尔斯(圆颅党),91
Holmby House 赫姆比城堡(诺桑普顿郡),95,100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73-74
Hooch, Pieter de 皮埃特·德·胡克 (荷兰艺术家),113
Hooke, Robert 罗伯特·胡克(英国发明家),165
Hormuz 霍尔木兹(葡萄牙人基地),62,65,68
Hudson's Bay Company 哈得逊湾公司,102
Huguenots 胡格诺教徒(法国新教徒),84,155
Hungary 匈牙利,73
Husayn 侯赛因(波斯王丹),71

I
Iemitsu, Tokugawa 德川家光(幕府将军),21,25-26,32
Ietsuna Tokugawa 德川家纲(幕府将军),26
Ieyasu Tokugawa 德川家康 (幕府将军),9,10,11,15,16,18,19,20,21,24
Imam Quli Mirza 伊玛姆·古里·米尔扎 (阿拔斯之子),70
India 印度,53,56,68,123;莫卧儿人,65,71
Indian tribes 印第安部落 (美洲),134,137,138-139,140,141,144,145,147-148,150-151,152,154,156-158;居住形态,154-155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13,29,123
Iran 伊朗,见波斯
Iraq 伊拉克,地图 56,57,60,61
Ireland 爱尔兰,80,85,100,101;阿尔斯特(爱尔兰省份),85-86
Ireton, Henry 亨利·爱尔顿(英国国会议员),88
Isfahan 伊斯法罕(波斯城市),11,54,55,60,62-63,64,65,66-67,71
Iskandar Munshi 伊斯坎达尔门什 (编年史作者),70
isle of Wight 怀特岛,100
Ismail 伊斯迈尔(波斯沙),56,57,60,65,70
Ismail Ⅱ伊斯迈尔二世(波斯沙),58,64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56,64,68;托波卡比,宫殿,63
Istanbul treaty 伊斯坦布尔条约(1590),61,68
Italy 意大利,73,74

J
James Ⅰ詹姆斯一世 (英王),65,79-81,82-83,85,141,145
James Ⅱ詹姆斯二世(英王),95,101,102,133,152,154,158
Jamestown 詹姆斯敦(英国殖民地),135,140,141,145,149,157,158
Japan 日本,地图 10,137;管理,21,24,26-27,甲胄,14,15;艺术,27,29,32;佛教武僧,13,15,16,18;基督教,13,15,18,19,24-25,27,32;商业,13,18,27-28,25,29,32,33;大名,11,13,16,18,20,21,25,28,30,31,32,33;荷兰贸易据点,121,123;天皇,11,12,16,27,28,33;人侵朝鲜(1592),18,19,37,39;金属矿,13,18,28;矿工,32-33;诗歌,29,32;宗教,11-12,13,17,24;武士,11,13,14,15,17,18,21,25,26,29,33;幕府将军,11,13,15,17,21,24,27,28,33;社会,17,24,28-29;税收,18,26;茶道,16,18,30,30,31;戏剧,22-23,29;与中国的战争,18,19,37;西方的影响,32-33
Jask 贾斯克(波斯港口),地图 56,68
Jesuits 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37,40,41,45,46,47,51-52,53;在日本,15,18;在新大陆,147,156
Jinmen 金门(中国岛屿),地图,36,44
Joliet, Louis 路易斯·朱利特(探险家),156
Jones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琼斯 (五月花号船长),143
Jones, Inigo 伊尼格·琼斯(英国建筑师),81,101
Jonson, Ben 本·约翰逊(英国剧作家),81
Joyce, George 乔治·乔伊斯(英国议员),10
Julfa 朱尔法(波斯城镇),地图 56,63-64
Jurchen 女真(部落集团),地图 36,38,39

K
Kaifeng 开封(中国城市),地图 36,42
Kangxi 康熙(中国皇帝),34,35,40,45-46,45,47-48,50-51,52-53
Kanto 关东(日本农业区),10,12,16,18,20
Kazuko 和子(德川秀忠之女),19
Ke, Mistress 客氏(中国统治者),38
Kepler, Johannes 开普勒(天文学家),160,161,169
Korea 朝鲜,地图 10,13,18,19,20,25,36,37,39,51
Kyoto 京都 (日本首都),9,地图 10,11,12-13,15,16,19,27,28,29;寺院,24;二条城堡,19;戏剧,22,23
Kyushu 九州(日本西部岛屿),地图 10,12,18,25

L
Labrador 拉布拉多,136
Langdale, sir Marmadulae 马玛杜克·兰达尔爵士(王党),88
Lau, william 威廉·劳德(伦敦主教,后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84,85,92
Leeuwenhoek, Antoni van 安东尼·范·列文虎克(荷兰科学家),164,165
Leidem 来登(荷兰城市),119,125
Leoni, ottavio 奥塔维奥·里奥尼(艺术家),160
Levant Company 利文特公司,68
Lisicheng 李自成(中国起义者),42,43
Locke, John 约翰·洛克(英国哲学家),118
London 伦敦,79,地图 80,85,86-87,90,91,92,93,97,98-99,100,121,145,149,154;皇家学会,97,164,165,166,也见伦敦大火
Louis XⅣ路易十四 (法国国王),11,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30-131,156
Louisiana 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地图 136,156
Luther, Martin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82

M
Maastricht 马斯垂克特(荷兰城市),地图 114,119
Magdeburg 马德堡(德国城镇),167
Mahmud 马哈穆德(波斯沙),71
Main 缅因(殖民地),140,154,155
Maintenon, Mme de 德·曼特农夫人,106
Malpighi, Marcello 马赛罗·马尔必基(意大利生理学家),162,165
Man chus 满族人(清代中国统治者),35-53,42
Manefeld, Count Ernst von 恩斯特·赫·曼斯菲尔德伯爵(将军),75
Marie-Thérèse 玛丽·蒂埃丝 (法国王后),106-107
Marquette, Jacques 杰克斯·马奎特 (牧师、探险家),156
Marston Moor 马斯顿荒原(1644 年战役),93,94
Marthas Vineyard 马撒威尼亚德岛(新英格兰),135
Martin Pierre-Denis 皮埃尔·丹尼斯·马丁(艺术家),110
Maruhashi Chuya 丸桥忠弥(戟教官),26
Mary 玛丽(查理一世之女),79,95,126
Mary 玛丽 (威廉二世王后,詹姆斯二世之女),101,102,133
Maryland 马里兰(殖民地),101,144,151
Mary Tudor 玛丽·都铎(英国王后),82
Mashhad 马什哈德(什叶派圣地),61,70
Massachusetts Bay 马萨诸塞湾 (殖民地),148-149,150,151,154,155
Massasoit 马萨索伊特(印第安人首领),150,157
Mather, Cotto 克顿·马瑟,150,151
Mather, Increase 马瑟·因克瑞斯,150
Maurice of Nassall 莫里斯(荷兰执政者),117-118
Mayflower 五月花号 (清教徒的船只),135,142-143,145,148,149
Mazarin, Cardinal 卡迪纳尔·马札然 (法国首相),103
Medicine 医学,32,46,162-143
Medwey 麦得威河,130
Mery 马雷(波斯城市),地图 56,61
Metacomet 梅塔克米特(印第安人首领),157
Mexico 墨西哥,123,135,136;墨西哥湾,137
Mezzabarba 梅札巴尔巴阁下 (罗马教皇的使节),35
Microscopes 显微镜,164,165
Milton, John 约翰·米尔顿(英国诗人),73,92
Mir Sani 萨尼·米尔(波斯诗人),64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河,156
Mitsui family 三井家族(日本商人),28
Mitsunari 石田三成(日本军阀),9,10,20
Moluccs Island 摩鹿加群岛,120,123
Mongolia 蒙古,地图 36,45,53
Mongols 蒙古人,35,36,37,38,40,41,47,48,73
Montespan, Mm de 德·蒙特斯潘夫人,106,108
Montreal 蒙特利尔(加拿大城市),147
Muhammad 穆罕默德(先知),56,57
Muhammad Khudabanda 穆罕默德·古达班达 (波斯沙),58
Mukden 盛京(中国后金政权都城),39,41
Münster 闵斯特(德国城市),77
Murshid Quli Khan 穆什德·古里汗 (波斯酋长),58,62,70
Mystic 梅斯蒂(美洲,印第安城堡),150

N
Nagasaki 长崎,地图 10,12,18,25,27,33
Nanjing 南京(中国城市),地图 36,43,44
Naoshige, Nabeshima, 锅岛直直(日本贵族),8,9
Naseby 纳西比(1645 年战役),地图 80,88-89,94
Nalsau 纳索家族,117
Nerchinsk, treaty 尼布楚条约(1689),46-47,51
Netherlands 尼德兰,73,75,90,97,101,102,152;荷兰,68,144,148;在印度尼西亚殖民:29。也见荷兰共和国;荷兰西印度公司;荷兰
Neustadt 纽斯泰特(德国城镇),76
New Amsterdam 新阿姆斯特丹,见纽约
Newark 纽瓦克(英国城镇),地图 80,94,95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殖民地),136,140,145,147,148,149,150,151,156,157;新英格兰自治领,154,155
New England Confederation 新英格兰联盟 (1643),151
Newfoundland 纽芬兰,136,137,156
New france 新法兰西,140,145,147-148,151,156,158
New Haven 纽黑文(殖民地),150,151
Newmarket 纽马凯特(英国城镇),地图 80,100
New model Army 新模范军,88,94,95,100,101,102
New Netherland 新尼德兰(殖民地),148,152
New Plymouth 新普利茅斯 (英国人定居点),135,140,144-145,150,151,155,157
Newton, Issac 艾萨克·牛顿(科学家),168,169
New world 新大陆,135;来自美洲的农作物,36;新大陆与英国,152,154;对新大陆的探索,135-137,140;农民,136;第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1619),145;渔业贸易,137,140,149;木材贸易,137,140,149,152;宗教,140,148,149-150,151,154,155,156;税收,154;贸易,140,149,152,154,156,也见美洲;加拿大;皮毛贸易;烟草
New York 纽约,121,123,地图 136,145,148-149,152,154,156,158
Nicolls, Capt Richard 理查德·尼克尔斯船长(英国司令),152
Nieuhof, Jan 杰·纽尔华夫(荷兰旅行家),49
Ningyuan 宁远(1626 年战役),地图 36,41
Nobunaga, oda 织田信长(大名),15-16,18,29
Nocret, Jean 让·诺克瑞特(艺术家),106-107
NôD5 | tre, André Le 安迪·勒·诺特 (园艺设计师),111
Nottingham 诺丁汉(英国城镇),87,91
Nova Scotia 新斯科夏半岛,137,140,147
Nurhaci 努尔哈赤 (中国清朝开国皇帝),39-40,41,42

O
Oboi 鳌拜(中国摄政),45
O-Kuni 阿国(日本女演员),22
Oldenbarnevelt 奥登本尼维尔特 (荷兰大臣),117,118,130
Opiz, Martin 马丁·欧佩茨(德国诗人),73
Orange House 奥兰治家族,117,125,130;公国,115
Osaka 大阪(日本港口),9,10,地图 10,12,16,19,20,21,26,27,28,29
Osnabrück 奥斯纳布鲁克(德国城市),77

Ottawa 渥太华河 147
Ottomans 奥斯曼人,55,56,地图 56,57,60－61,62,64,65,68－69,70
Overijssel 上伊塞尔(荷兰省份),125
Oxford 牛津,90,92－93,94,95

P
Pakistan 巴基斯坦,53
Paracelsus 帕拉塞尔苏斯(瑞士解剖学家),162
Pas, Crispijn Van de 科里斯皮恩·范·德·帕斯(荷兰艺术家),102
Patel, Pierre 皮埃尔·帕特尔(法国艺术家),105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殖民地),136,154,158
Penn, willian 威廉·佩恩,154,155,158
Pepys, Samuel 塞缪尔·皮普斯(日记作家),97
Percy, George 乔治·珀西(殖民者),140,141
Perry, Commodore Matthew 海军上将马修·佩里,33
Persia 波斯,11,地图 56;艺术,60,61,64－65;与基督教徒,64;基督传教人,65;军事组织,57－58,59,61－62,65;与奥斯曼人,55,56,57,60－61,68－69;兴教,56－57,61,64,69,71;丝织,68－69;税收,62;贸易,63,64,65,68
Philadelphia 费城,158
Philip Ⅱ菲力二世 西班牙国王),115,117
Phips, Sir William 威廉·菲普斯爵士(统治者),155
Place, Francis 佛朗西斯·波雷斯,155
Pocahonats 波卡洪纳斯(印第安公主),141,145
Poland 波兰,73,74
Pomeioe 波梅克(印第安部位),139
Pope 教皇,40,52,65,74;使者,65,也见克莱门特十一世;乌尔班八世
Port Roval 皇家港(法国定居点),147
Portugal 葡萄牙,24,120－121,123;奥古斯丁教义信奉者,64;枪炮手,15;在澳门,37;在霍尔木兹,62,65,68;商人 18,25;传教士,19;在北美洲,136;水手,13
Powhatan 波哈坦(印第安酋长),141,145
Prague 布拉格(波西米亚首都),74
Preston 普雷斯顿(战役),100
Pride, Col. Thomas 托马斯·普莱德上校,101
Providence 普罗维登斯(殖民地),150
Puritans 清教徒:英国内战,82,84,85,92,93;画师,153;在新大陆,148,149－151,152,154,155,156,157
Putney 普特尼(美国城镇),100
Pym, John 约翰·皮姆(英国议会议员),85,86,93

Q
Qazvin 卡兹文(萨非首都),58,62,65
qizilbash 盖扎尔什(土库曼部落民),56,57,58,61,62,64,65,70
Quakers 贵格教徒,150,152,154,158
Quebec 魁北克,地图 136,140,147

R
Raleigh, Sir Walter 沃尔特·雷利爵士(英国航海),137,139
Randolph, Edwdrd 爱德华·伦道夫(英国代理人),154
Religion 宗教:西曼礼教徒,152;阿里乌斯教徒,92;亚美尼亚人,92,118;奥古斯丁教义信奉者,64;浸礼教徒,100;佛教,12,13,24,29,47;卡尔文教,74,77,82,113,115,118,120,123;圣方洛会托钵僧,64;方袍修士,64;天主教,74,77,81,82,83,84,100,113,118,119,151,152;英国国教,81－82,84;摩教,12,17,24,42,44,45,47;多明戈会修道士,40;爱之家,92;拜略诺教徒,84,155;伊斯兰教,40;犹太教徒,118,152;路德教教徒,74,77,82;穆斯林教徒,56,61;非国教宗派,92－93,95,100;长老会教友,82,95,100,101;新教徒,73－74,77,90,113,118;求正教徒,92;什叶派,56－57,61,69,71;神道教,11－12,24;灵魂沉睡者,92,亚尼派,56,57,61;唯一神教派教徒,100;佛教禅宗,24,29,30,32,44。
Rhodeisland 罗德岛(殖民地),150
Ricci, Matteo 利玛窦(耶稣会传教士),40
Rigoud, Hyacinth 汉森斯·瑞根德(艺术家),105
Rikyu, Sen 千利休(日本茶师),16,19,30,31
Roanoke island 罗阿诺克岛(殖民地),137,140
Robartes 罗伯提斯勋爵(圆颅党),91
Rolfe, John 约翰·罗尔夫(烟草生产者),141,145
Rotterdam 鹿特丹(荷兰港口),119
Rudoph Ⅱ鲁道夫 二世(皇帝),160
Rupert, Prince 鲁珀特亲王 查理一世之侄),88,91,92,93－94,95,101,102
Russia 俄罗斯:哥萨克,37,46－47;皮毛贸易,146;枪炮,41;商人,51;袭击日本,33;沙皇,69。也见高加索
Ruyter, Admiral de 海军上将德·鲁特(荷兰),130
Ryuku Island 琉球群岛,25

S
Sadiqi Beg 萨迪奇·贝格(波斯画家),64,65
Sado Island 佐渡岛(矿业),33
Safavid dynasty 萨非王朝(波斯统治者),55,56,57,58,61,69,71
Safi Mirza 萨菲·米尔孔(波斯沙),70
Saikaku 井原西鹤(日本小说家),29
St. 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西班牙定居点),137
St. John River 圣约翰河,大屠杀发生地,137
St. Lawrence River 圣劳伦斯河,136,147;圣劳伦斯湾,137,140,147
Sakai 堺(日本港口),12,13,16
Sakhalin 萨哈林岛,33
Salem 塞勒姆,面判新在地,155
Salvius, Count Johan 约翰·沙尔维斯伯爵(瑞典外交大使),77
Sanctorius 圣克瑞里斯(意大利物理学家),163
San Juan 圣胡安(西班牙人定居点),137
Santa Fe 圣菲(西班牙人定居点),137
Savoy 萨伏依,75;萨伏伊公爵,与雇佣兵,75
Schall, Adam 汤若望(德国传教士),40,44
Science 科学,32,37,46,159－169
Scotland 苏格兰,74,79,82,85,93－94,95,100,101,124
Sekigahara 关原(1600 年战役),9－10,12－13,20
Shantang 桑塘(中国村斗),50－51
Sherley, Anthony 安东尼·谢利,65
Sherley, Robert 罗伯特·谢利(阿拔斯的顾问),65
'S Hertogenbosch 赫霍古波斯克(荷兰城镇),119
Shimabara 岛原(1638 年起义),地图 10,25
Shunzhi 顺治(清朝皇帝),43,44,45
Silk 丝绸,27,36,51,63,64,68,128;克里姆拜毯,68－69;天鹅绒,69
Slavery 奴隶制,13,26,61,62,121,123,144－145
Smith, CaptJohn 约翰·史密斯上校(殖民者),141,145
Smith, CaptThomas 托马斯·史密斯上校,153
South America 南美洲,144
Spain 西班牙,11,24,65,73,74,80,83,90,115,117,125,126,130,133;与美洲,135－136,137,140,155,156;哈布斯堡家族,113,115;国王之女,83;商人,18,25;传教士,27;贸易,121,123
Spanish Netherland 西属尼德兰,114,地图 114,115,117,119,120,130,131
Speedwell 斯必德威尔(清教徒船只),143
Spinoza, Baruch 巴鲁赫·斯宾诺莎(哲学家),52,118
Squanto 斯塔阔(印第安人),150
Stow－on－the－word 斯托昂泽沃尔德(1646 年战役),94,95
Strafford, Ear of 斯特拉福伯爵(查理一世的顾问),85
Stuarts 斯图亚特(英国王朝),79
StuyVesant, Peter 彼得·史蒂文森特(统治者),152,154
Suden, Ishin 松平定信(佛教僧侣),24
Sufigan 苏菲沿(1605 年战役),地图 56,59
Sumitomo 住友(日本商人),28
Sundial 日晷,41
Suzhou 苏州(中国城市),34
Sweden 瑞典,74,76,77,93,123,130,136;瑞典土兵,69,北见对拉华
Switzerland 瑞士,74
Syria 叙利亚,56,地图 56,57

T
Tabriz 大不里士(伊朗首都),地图 56,57,69
Tahmasp 塔赫玛斯普(波斯沙),58,60,61,70
Taiwan 台湾,36,44,46
Tanegashima 种子岛(日本岛屿),13,15
Tea 茶叶,27,36,51;茶道,16,18,30,31
Temple, Willian 威廉·坦普尔,123
Textiles 纺织品,37,36,51,52,68,123,见丝绸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72－73,73－77,83,86,91
Tianqi 天启(中国皇帝),38
Tibet 西藏,48
tobacco 烟草,15,27,123,140,141,144,149,158
Tokugawa dynasty 德川幕府(日本统治者),11,13,17,19,21,24,26,32,33
Torricelli, EvangeLista 伊文吉里斯塔·托里切利(意大利科学家),166,167
trade 贸易,见各国及各公司名下
Transoxiana, 特兰索克思亚那,地图 56,57,61,也见乌兹别克部落民
Tromp, Admiral 海军上将托姆普(荷兰),126
tulips 郁金香,132
Tunis 突尼斯(港口),18
Turkey 土耳其,36,38,56,57,68,69,132
Turkoman tribesmen 土库曼部落民,56,57,58,61,62

U
Ulm 乌尔姆(德国城市),76
Urban 乌尔班八世(教皇),160
Utrecht Union 乌特勒支联盟(1579),115,117
Uzbek tribesmen 乌兹别克部落民,55,56,地图 56,57,60,61,62,65

V
Vallière, Louise de la 路易·德·拉·瓦利埃,106
Van Pyck, Anthony 安东尼·范·迪克(佛兰德斯派艺术家),78
Vermeer 维尔美尔(荷兰艺术家),128,129
Verney, Sir Edmund 埃德蒙·维尔尼爵士(下院),87,92
Versailles 凡尔赛宫(法国宫殿),11,103－111
Vesalius Andreas 昂德海思·维萨里(解剖学家),162
Vienna 维也纳,73,74
Villiers, George 乔治·维勒斯(白金汉公爵),83,84
Virginia 弗吉尼亚(殖民地),101,136,137,139－141,144,145,149,151,154,157－158
Virginia company 弗吉尼亚公司,140,145,149

W
Wales 威尔士,地图 80,91,100
Wan Wei 王翠(中国艺术家),50－51
Warrington 沃灵顿(战役),100
Weapons 武器:中国,37,38,40,42,47－48,53,弓箭手,36,40,42,47,48;英国内战,91;欧洲人,15,26,37;火器,16,25,26,31,40－41,42,47,48,58,59,62,73,86－87,91;日本,18,25,26;波斯,57－58,59
Weizhongxian 魏忠贤(中国权臣),38
West Africa 西非,123,130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123,130,144,149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亚(1648),77,117
White, John 约翰·怀特(艺术家),138,139
Wierx, Hieronymous 哈瑞尼玛斯·威尔瑞克思(艺术家),41
Wigan 维甘(战役),100
William Ⅰ威廉 一世(普鲁士国王),77
William Ⅱ of Orange 奥兰治威廉二世,117,125－126
William Ⅲ of Orange 奥兰治威廉 三世,79,95,101,102,130,131,132,133,154－155
Willam, the Silent 沉默者威廉,115,125,130
Willams, Roger 罗杰·威廉姆斯(殖民者),150
Winthrop, John 约翰·文斯劳普(总督),149
Witte, Emanuel de 依曼纽尔·德·怀特(荷兰艺术家),129
Worcester 伍斯斯特(战役)(1651),101
Wren,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雷恩(建筑家),97
Wrttemberg 符腾堡(德国公国),76
Wusangui 吴三桂(中国将军),46
Wyatt, Sir Francis 佛朗西斯·瓦特爵士(统治者),145

X
Xiamen 厦门(中国岛屿),地图 36,44

Y
Yale Lawvesity 耶鲁大学,157
Yangzhou 扬州(中国城市),43
Yongzheng 雍正(中国皇帝),50
York 约克(1644 年围困),93
Yoshimune 德川吉宗(幕府将军),32－33
Yoshinao 德川吉野(皇族成员),14
Yugoslavia 南斯拉夫,73
Yui Shosetsu 由井正雪(军械师),26

Z
Zeeland 西兰(荷兰省份),117,119,123,125
Zuider Zee 须德海(荷兰),113,114

参考文献

EUROPE

Ashley, Maurice, The English Civil War.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4.

Bixby, William. The Universe of Galileo and Newton. New York: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Co. Inc., 1964.

Boxer, **Charles,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London: Hutchinson. 1977.**

Bracegirdle, Brian, ed., Beads of glass: Leeuwenhoek and the early microscope. (exhibition catalogue). Leiden & London: Museum Boerhaave & Science Museum, November 1982 – October 1983.

Burne, Alfred Higgins, and Peter Young, The Great Civil War.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59.

Clarendon, Edward Hyde, Earl of. Selec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Edited by G. Hueh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Dow, F. D., Radicalism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 – 166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Fauvel, John, Raymond Flood, Michael Shortland and Robin Wilson, eds., Let Newton b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Haley, Kenneth, The Dutch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2.

Hibbert, Christopher, Charles I.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8.

Hill, Christopher,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4.

Israel, Jonathan. The Dutch Republic and the Hispanic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Kenyon, J. P.:

The Civil Wars of Englan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8. Stuart England. London: Pelican Books, 1978.

Langer, Herbert, The Thirty Years' War. Poole, Dorset: Blandford Press. 1980.

Lewis, W. H., The Splendid Century.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53.

Mitford, Nancy, The Sun King.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66.

Norton, Lucy, ed., Saint Simon At Versailles.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80.

Ogg, David, England in the Reigns of James II and William I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Ollard, Richard, This War Without an Enem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s. New York: Atheneum, 1976.

Parker, Geoffrey:

The Dutch Revolt.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79.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 –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he 30 Years' Wa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Richardson, Joanna, Louis XIV.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4.

Schama, Simon,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London: Collins, 1987.

Smith, Ala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2.

Stone, Lawrence,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New York & London: Harper and Row, 1972.

Thornton, Peter, Seventeenth-Century Interior Decoration in England, France and Holland.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Trease, Geoffrey, Samuel Pepys and his worl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2.

Tyacke, Nicholas, Anti-Calvinists: The Rise of English Arminian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Walton, Guy, Louis XIV's Versailles. London: Viking. 1986.

Wedgwood, C. V.:

The King's War. London: Collins, 1958.

The Trial of Charles I. London: Collins, 1964.

Wilson, Charles Henry:

The Dutch Republic.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8. Profit and Power. The Hague: Nijhoff, 1978.

Woolrych, Austin, Soldiers and Statesmen: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rmy and its Debates. 1647 – 164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Young, Peter, Naseby 1645: The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London: Century Publishing. 1985.

Zumthor, Paul, Daily Life in Rembrandt's Hollan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2.

THE FAR EAST

Backhouse, E., and J. O. P. Bland,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4.

Clunas, Craig, ed.,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88.

Dawson, Raymond, Imperial China. London: Hutchinson. 1972. Emperor, Scholar, Artisan, Monk. The Creative Personality in Chinese Works of Art. London: Sydney L. Moss. 1989.

Henderson, H. G., An Introduction to Haiku.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58.

Hsu, Immanuel,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London &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Keene, Donald, The Battles of Coxinga. London: Taylor's Foreign Press. 1951.

Kessler, Lawrence, 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Mote, Frederick, and Denis Twitchet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The Ming Dynasty, 1368 – 16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Sansom, G. B., A History of Japan 1615 – 1867. London: The Cresset Press, 1964.

Seizo, Hayashiya, Chanoyu: Japanese Tea Ceremony. Tokyo: Japan Society, 1979.

Shimizu, Yoshiaki, ed., Japan: The Shaping of Daimyo Culture 1185 – 1868.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1988.

Spence, Jonathan D., and John E. Wills Jr.,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pence, Jonathan D.:

The China Helpers: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 – 1960. London: The Bodley Head, 1969.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4.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5.

Wakeman, Frederick: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1975.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Watson, William, ed., The Great Japan Exhibition: Art of the Edo Period 1600 – 1868.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in association with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1 – 1982.

NORTH AMERICA

Adams, Brooks, The Emancipation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62.

Billings, Warren, Colonial Virginia: A History. White Plains, N. Y.: KTO Press. 1986.

Bradford, William, Bradford's History of the Plymouth Settlement 1608 – 1650, rendered into modern English by Veliran Paget. London: Alston Rivers Ltd., 1909.

Brideubaugh, Carl, Vexed and Troubled Englishme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8.

Caffrey, Kate, The Mayflower. London: Andre Deutsch. 1975.

Cumming, W. P., R. A. Skelton and D. B. Quinn, eds., The Discovery of North America. London: Paul Elek, 1971.

Cumming, W. P., S. E. Hillier, D. B. Quinn and G. Williams, eds., The Exploration of North America. London: Paul Elek, 1974.

Debo, Angie, A History of the Ind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0.

Dingwall, E., and E. A. Heard, Pennsylvania, 1681 – 1756. London: C. W. Daniel Ltd., 1937.

Furnas, J. C., The American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Longman, 1969.

Gill, Crispin, Mayflower Remembered: A History of the Plymouth Pilgrims. Newton Abbot, Devon: David & Charles, 1970.

Hall, Clayton, ed., Narratives of Early Maryland.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1910.

Hulton, Paul, America 1585: The Complete Drawings of John White.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and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4.

Illick, J. E. Colonial Pennsylvani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Jameson, J. Franklin, ed., Narratives of New Netherland.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09.

Kammen, Michael, Colonial New York. White Plains, N. Y.: KTO Press, 1987.

King, Jonathan, The Mayflower Miracle: The Pilgrim's Own 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America. Newton Abbot, Devon: David & Charles. 1987.

Miller, Perry, and T. H. Johnson, The Purit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38.

Nash, Gary B., Red, White and Black.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Inc., 1974.

Nish, Cameron, ed., The French Regime. Scarborough, Ontario: Prentice-Hall of Canada Ltd., 1965.

Pomfret, John E., with Floyd M. Shumway, Founding the American Coloni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Porter, H. C., The Inconstant Savage. London: Duckworth, 1979.

Saveile, Max, and Robert Middlekauff, A History of Colonial Americ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4.

Soderland, Jean R., ed., William Penn and the Founding of Pennsylvania 1680 – 1684.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3.

Standard, Mary Newton, The Story of Virginia's First Century. London: J. B. Lippincott, 1928.

Tyler, Lyon Cardiner, ed., Narratives of Early Virginia.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07.

Tyler, Ron, Visions of America, Pioneer Artists in a New Lan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3.

Waldman, Carl, Atlas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 New York & Oxford: 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 1985.

Williams, Roger,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Roger Williams.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Inc., 1963.

Zee, Henri and Barbara van der, A Sweet and Alien Land: The Story of Dutch New York. London: Macmillan, 1978.

PERSIA

Arberry, A. J., Sufism: An Account of the Mystics of Isla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8.

Bellan, Lucien – Louise. Chah' Abbas I. Paris: Paul Geuthner. 1932.

Bier, Carol, ed., Woven from the Soul, Spun from the Heart: Textile Arts of Safavid and Qajar Iran, 16th-19th centuries. Washington, D. C.: The Textile Museum, 1987.

Blunt, Wilfrid:

Isfahan: Pearl of Persia. London: Paul Elek, 1966.

Pietro's Pilgrimage. London: James Barrie, 1953.

Browne, Edward Granville, A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in Modern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4.

Herbert, Thomas, Travels in Persia 1627 – 1629. Edited by W. Foster. London: Routledge. 1928.

Jackson, Peter, and Lawrence Lockhar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6: The Timurid and Safavid Perio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Morgan, David, Medieval Persia 1040 – 1797. London: Longman, 1988.

Robinson, Francis, Atlas of the Islamic World since 1500. Oxford: Phaidon, 1982.

Rogers, J. M. Islamic Art and Design 1500 – 1700.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3.

Savory, Roger, Iran Under the Safavi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Sherley, Anthony, His Persian Adventure. Edited by E. Denison Ross. London: Routledge, 1933.

Steensgaard, Niels, 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Welch, Anthony, Shah' Abbas & the Arts of Isfahan.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1973.